万卷方法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2卷

定性研究：策略与艺术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等
译



DINGXING YANJIU DIERJUAN CELUE YU YISHU

封面设计/黄河封面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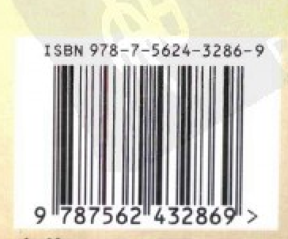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全书约200万字，对定性研究的近40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每一个专题的作者都是该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其主编诺曼·K·邓津(Norman·K·Denzin)和伊冯娜·S·林肯(Yvonna·S·Lincoln)更是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面的国际旗手。即便是这样一个精英的团队，面对这个庞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仍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工作，正如两位主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

>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
> ……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艰苦和“斗争”，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个定性研究方面的精神盛宴。为了使国内的学者也能享此盛宴，我们组织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和出版。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在征得原出版公司的同意后，将本书中文版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分别是: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原书第1、2部）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原书第3部分）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原书第4部分）
《定性研究(第4卷)：评估、解释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原书第5、6部分）



ISBN 978-7-5624-3286-9
9 787562 432869 >
定价：48.00元

万卷方法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第2卷

定性研究：策略与艺术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编

风笑天 易松国 郝玉章
张 莉 陈 璇 张艳霞
唐利平 唐美玲 王晓辉
周晓春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3)第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美)邓津(Denzin,N. K.),(美)林肯(Lincoln,Y. S.)著;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3286-9

Ⅰ.定... Ⅱ.①邓...②林...③风... Ⅲ.定性分析—研究方法 Ⅳ.C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9880号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主 编
风笑天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陈 荟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5 字数:382千 插页:16开2页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3286-9 定价:48.00元

作者简介

H·拉塞尔·伯纳德(H. Russell Bernard)　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埃本·A·维茨曼(Eben A. Weitzman)　马萨诸塞大学社会与组织心理学副教授
埃斯特·麻德里兹(Esther Madriz)　圣弗罗西斯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安德里亚·方塔纳(Andrea Fontana)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巴巴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本杰明 ·F·克莱布特里(Benjamin F. Crabtree)　新泽西药学与牙医大学教授
彼特·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教授
道哥拉斯·哈珀(Douglas Harper)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大卫·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　伦敦大学教授
戴维·J·格林伍德 (Davydd J. Greenwood)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
迪博拉·K·迪默(Deborah K. Deemer)　北衣奥华大学教育学副教授
厄弗·钱姆伯斯 (Erve Chambers)　马里兰大学人类学教授
弗吉尼亚 ·L ·奥利森(Virginia L. Olesen)　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格洛利亚·拉德森—比林斯(Gloria Ladson-Billings)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授)
基姆伯利·A·梅斯·德培雷(Kimberly A. Mays de Pérez)　塔帕德医疗翻译师
杰瑞·W·瑞安(Gery W. Ryan)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卡洛琳·艾利丝(Carolyn Ellis)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和社会学教授
凯西·查马兹(Kathy Charmaz)　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克里福德·G ·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肯尼斯·J·格根(Kenneth J. Gergen)　斯沃斯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
拉雷尔·里查德森(Laurel Richardson)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方面的教授
雷·C·里斯特(Ray C. Rist)　世界银行评估顾问
卢恩曼·王(Loonmun Wong)　服务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心理学家

罗宾·麦克塔格特(Robin McTaggart) 詹姆斯库克大学教育学教授
罗伯特·E·斯泰克(Robert E. Stake) 伊利诺大学教育学教授
洛伊丝·韦斯(Lois Weis)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
玛莉·M·格根(Mary M. Gergen)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迈克尔·V·安格罗西诺(Michael V. Angrosino) 南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
麦克尔·M·麦考(Michal M. McCall) 马克里斯特学院社会学教授
米甘·莫里斯(Meaghan Morris)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首席教授
米歇尔·法恩(Michelle Fine) 纽约城市大学社会/人格心理学教授
默顿·勒温(Morten Levin) 挪威湾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教授
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 伊利诺大学传播学教授
乔·L·金奇洛(Joe L. Kincheloe) 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化研究与教学教授
乔舒亚·加默森(Joshua Gamson) 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斯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 巴拉腊特大学教授
斯坦福·M·莱曼(Stanford M. Lyman) 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苏珊·维辛(Susan Weseen) 社会人格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托玛斯·A·施瓦特(Thomas A. Schwandt) 伊利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
瓦莱丽·J·简西克(Valerie J. Janesick) 罗斯福大学教育领导与组织变革教授
威廉姆·L·米勒(William L. Miller) 宾夕法尼亚某医院家庭医学部主席
威廉姆·G·蒂尔尼(William G. Tierney)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雅伯·F·古布里厄姆(Jaber F. Gubrium) 弗罗里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亚瑟·P·博克纳(Arthur P. Bochner) 南弗罗里达大学传播学教授
亚瑟·J·维迪奇(Arthur J. Vidich) 社会学与人类学荣誉教授
伊恩·霍德(Ian Hodder) 斯坦福大学文化与社会人类学教授
伊冯娜·S·林肯(Yvonna S. Lincoln) 德克萨斯 A & M 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
伊贡·G·古巴(Egon G. Guba) 印第安娜大学教育学教授
伊万·布莱迪(Ivan Brady)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
约翰·K·史密斯(John K. Smith) 北罗万大学教育学教授
约翰·弗劳(John Frow) 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约翰·贝弗利(John Beverley) 匹兹堡大学西班牙与拉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
詹姆斯·H·弗里(James H. Frey) 内华达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A·霍尔斯泰因(James A. Holstein) 马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珍妮弗·C·格林尼(Jennifer C. Greene) 伊利诺大学教育与社会项目评估教授
朱莉安娜·奇克(Julianne Cheek) 南澳大利亚大学健康学教授

译者简介

风笑天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松国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赵延东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科技部科学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田　凯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郝玉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乐　章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
孙　龙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邓　锁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研究人员
唐利平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徐连明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唐美玲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聂春雷　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龙书琴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黄　河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张艳霞　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陈　璇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讲师
习　涓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阿拉巴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张　莉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德克萨斯 A & M 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王晓辉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生,讲师
苏莹荣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司干部
周晓春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罗凌云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

译者前言

经过二十多人将近三年紧张的翻译工作,这本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的著作终于要以中文的形式出版了。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充满了感慨。

2000 年 8 月,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第 95 届学术年会”。每年年会中的一项常规活动是各家出版社都将自己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新书拿到会场上来展览销售。那真是一些好书啊!在书展期间,我很快发现了这本刚刚修订出版的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这部有着蓝色硬皮封面、大开本、厚达一千多页的、重重的“砖头式”著作,深深地吸引了我。虽没有购买,但心中却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一笔。

时间真快,转眼两年半过去了。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拿着一堆英文方法著作请我帮他们筛选时,我首先推荐了这本书。其原因除了这本书的影响大以外,更主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我国学术界的实际需要。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已有一些先后译成了中文,但专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的著作则基本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当出版社邀请我主持这本著作的翻译工作时,我的确十分犹豫。一方面,定性研究方法对于我(以及所有译者)来说相对生疏,翻译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此书的篇幅巨大,非一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必须组织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团队来承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手头不仅压着几本早就该写的书,同时还承担有几项科研课题,再加上平时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实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这一工作。后来,当出版社的编辑两次专程到南京拜访,我最终还是无法推托出版社的真诚邀请,接受了这份“苦差”,为此,我又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紧张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翻译工作既非我们的专业,也不是我们的长项。特别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更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一千字的译稿通常要花费译者大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和精力,而区区几十元钱的翻译稿酬是无法用来衡量这种翻译工作的艰苦和价值的。细想起来,当初之所以承担此项苦差,一是出版社的盛情之邀难以推托,二是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作点贡献的情感使然。

在这本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学生们。他们

有的获得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后已参加工作好几年,自身承担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有的在撰写自己的著作和论文;有的正在美国、香港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紧张地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有的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或为博士生入学考试而紧张地做着准备。但当我邀请他们参加翻译此书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问过报酬,有的只是不计得失,认真尽力地查找资料,斟字酌句地翻译每一段话。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合作,此书是难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句: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深感这本著作翻译的困难。虽然译者们的英文水平可以阅读英文书籍和资料,但自己看明白和将它用准确、恰当,甚至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深感翻译工作的责任重大,非常认真地对待。在翻译过程中,当听到学生们一个个叫苦不迭、一个个被翻译工作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我心中反倒充满了踏实感——只有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对待翻译工作、对译文反复推敲、不轻易放过一处疑问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才会使翻译者有这样一种感受,才会有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关于书名的翻译,需要略作说明。之所以用“定性研究”的概念,而不用诸如“质的研究”、“质性研究”、“质化研究”等概念,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习惯和误解。与有的学者采用换一个名称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我们依旧使用定性研究这一名称,其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说明,定性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纠正目前存在的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的偏误;就是为了明确地告诉读者,定性研究也是一种类似于定量研究那样的,有特定的哲学基础、特定的视角和策略、特定的操作方法和技术的具体研究方式,而不是像许多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非定量”意义上的泛泛而论或纯粹的主观思考(那种泛泛而论和主观思考或许只能称为议论、只能称为思考,而不能称作研究)。简言之,定性研究也有着一整套相对成形的、具体的方式方法,当然,其方式方法与定量研究的方式方法之间有着较大的不同。

各部分的译者是:第 1 章,风笑天;第Ⅰ部分序言、第 2 章,田凯;第 3 章、第 14 章,周晓春;第 4 章、第 9 章、第 33 章,邓锁;第 5 章、第 23 章,张艳霞;第Ⅱ部分序言、第 6 章、第 7 章,赵延东;第 8 章、第Ⅲ部分序言、第Ⅴ部分序言,唐美玲;第 10 章、第 11 章,孙龙;第 12 章、第 21 章,张莉;作者前言、第 13 章、第 19 章、第 20 章、第 36 章,陈璇;第 15 章、第 17 章,王晓辉;第 16 章、第 24 章,郝玉章;第 18 章、第 34 章、第 40 章,易松国;第 22 章、第Ⅳ部分序言,唐利平;第 25 章,黄河;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0 章,龙书琴;第 27 章、第 28 章,聂春雷;第 31 章、第 32 章,罗凌云;第 35 章,乐章;第 37 章,习涓、徐连明;第 38 章、第 39 章、第Ⅵ部分序言,苏莹荣;第 41 章,徐连明。各章译者翻译完后,由风笑天与陈璇进行了校订。

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会存在一些误译和错译的地方,欢迎各位专家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以便重印时及时校正。

风笑天

2006 年 12 月于南京

作者前言

本书第 2 版几乎是一本新书,第 1 版中的多半章节都由新的著述所替换。本版新增了 33 位各章节的作者(含合著者),新增了 6 个全新的主题内容,包括酷儿理论、表演民族志、证词法、女性研究中的焦点群体、应用民族志、人类学诗歌等。在第 2 版中保留下来的章节都作了大量的修改,有的甚至完全改头换面。

第 2 版是第 1 版的继续。在第 1 版的前言中,我们曾断言,过去的 20 年在社会科学领域悄然进行了一场方法革命,学科间的界线正在模糊化。在理论与研究中对诠释性定性方法的共同关注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越来越靠近。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趋势并非什么新趋势,但是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领域所发生的"定性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还是非常令人惊奇。人们对于第 1 版强烈、积极的反馈也肯定了我们的断言。对于第 1 版如此受欢迎我们也感到诧异。研究与教学人员都可从该版本中找到进行教学与开展新研究所需的有用资料。

本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的三大读者群依然是:想学习如何做定性研究的研究生,希望对本领域有更多了解的有兴趣的教学人员,那些已经是本书所讨论的某个领域或几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仍然希望了解该领域最新发展的学者。我们未敢设想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也不敢想象本书会成为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课本,但它确实做到了。1998 年,在第 1 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三册平装本的课本,即《定性研究方法导论》、《定性研究策略》和《定性资料的诠释》。

正如托马斯·施瓦特所言(见本书第 7 章),我们可能发现定性研究即是"开始于 1970 年代的学术界的改革运动"的别名。在这场运动中,诠释范式和批判范式以其多种不同形式成为讨论的核心。托马斯·施瓦特认为实际上这场运动包含了多重范式的理论,还包含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的认识论与伦理的批判。现在该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刊、科学协会、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学岗位等。

发生于 1990 年代早期的定性研究领域的转型在随后这十年中继续不断地获得动力。到了 20 世纪末,现在几乎没有人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回顾这次叙述性转型。现在我们进而知道男人和女人对文化的写作是不同的,而且写作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活动。

用实验法写作第一人称民族志文本现在已非常普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在探索民族志写作的新方法,其中许多人在写作小说、戏剧、表演文本,以及民族志诗歌等。社会科学的期刊在主持着关于虚构文本的辩论。公民新闻学正在塑造、在呼吁一种公民的或曰公众的民族志。

目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定性研究实践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所以,值此 21 世纪来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作为生产性调查形式(Peshkin,1993)和作为激进的民主实践形式的定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再一次地探讨。本书第 2 版的这一纲要就是要展示定性研究的话语如何能够被用来帮助创造、想象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某种形式支持这一课题。

出版商告诉我们,理想的手册应该代表某一领域知识的浓缩;它应该成为一本综合现存文献的标志性的书卷,有助于界定和塑造该学科的现状与未来。正是这一训令指导了本书第 1 版的组稿。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带一本定性研究方面的书去一个荒岛(或者准备一次研究生的综合考试),那么你需要的就是一本手册。1996 年的春夏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一训令之下,问自己如何能够最好地展现本领域自 1994 年以来所产生的新成果。

定性研究的“领域”

本书封面设计(指英文原版)的布兰克林大桥图片别有蕴涵。就像这座复杂的建筑一样,本书在新与旧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连接了多种诠释群体,延伸到不同的领地,提供了一条在公与私、科学与神圣、学科研究与艺术表达之间自由进退的通道。

无须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能发现,定性研究“领域”自 1991 年春以来已经经历了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我们正开始计划本书的第 1 版。我们再一次地了解到定性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紧张、矛盾和犹豫徘徊来加以界定。这些紧张(许多都是 1991 年以后出现的)在本领域相互竞争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纵横捭阖。

这些紧张并非存在于一个统一的舞台之上。我们发现护理与传播学方面的定性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象征互动主义社会学家所处理的问题与教育研究中批判理论家的兴趣也迥然不同。而且,定性研究者的学科网络未必相互连接,他们未必相互对话、相互阅读。

那么面对这些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不同风格、类型研究的内在矛盾,以及跨越不同学科、民族、种族、文化和性别所造成的障碍,我们再一次试图将定性研究领域凝聚、诠释、组织起来。在导语和结论章节,我们对这些张力如何自我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各章节作者中很多人对于这一领域的看法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在我们与许多作者的隐含对话中表现明显。为了读者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以那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困境,那么首先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些张力与矛盾之中。

诺曼·邓津负责的是文化研究、表演文本、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部分,强调社会文本及其建构的重要性。伊冯娜·林肯宣称是建构主义者,她极为注重的是理论和范式的形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及其后继者后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林

肯给本课题带来的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邓津的基地是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和人文学科。这些倾向塑造了本书的结构,让我们直接进入彼此的对话。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例如,关于各范式是否可以相互沟通、整合的问题),但我们俩的声音在本书中都常常可以听到。其他的编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视野,用不同的方法界定这一领域、建构本书。他们为每一主题选择不同的代言人,关注不同的问题,强调不同的方法,或者干脆组织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书的组织结构

本书的组织是从一般到具体,从过去到现在。第Ⅰ部分是对本领域的定位,从历史开始,然后转到应用定性研究传统,探讨实地研究的他者、政治与伦理。第Ⅱ部分专门讨论现在正建构并影响着人类各学科之定性研究的我们所认为的历史与当代的主要范式。其相关章节包含从相互竞争的各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论述到具体诠释性的视角。第Ⅲ部分专门讨论研究者可以用于具体研究的主要研究策略(历史地讲是研究方法)。方法问题以定性研究课题的设计为起点。而这种设计又总是开始于一个社会情境中的研究者,他的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范式(视角)再到经验的世界。如此定位之后,研究者然后才提出在任何研究中都能运用的方法的范围。第Ⅲ部分的11章广泛探讨了这些研究策略的历史与应用。

第Ⅳ部分检视了收集与分析经验材料的方法。它探讨的内容从访谈到观察,到运用文化物质文献和历史记录,到视觉的、个人的经历,再到数据资料管理、计算机应用、叙述、内容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分析方法。第Ⅴ部分探讨的是解释的艺术,包括定性资料之适合性的判断标准、诠释的过程、写作文本,以及定性政策研究与评估等。第Ⅵ部分着重论述定性研究的未来与前景。

修订版的准备工作

1996年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全天的会议上开始了关于修订版的慎重讨论。作者中有两人,彼特·拉贝拉(Peter Labella)和米奇·艾伦(Mitch Allen),参加了与来自Sage和AltaMira出版社的编辑的会谈。我们冗长的讨论再一次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从外部注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新的视角。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们聚集了在国际上和跨学科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组成编委会,这有助于我们挑选同样著名的作者、准备全书的内容,以及阅读每一章的草稿(通常有多个草稿)。我们将编委会各成员视为一扇通往他们各自领域的窗口。我们就那些需要探讨的关键主题、视角和歧见搜索相关信息。在彼特·拉贝拉的帮助下,我们还回顾了来自选用本书第1版作为教材者的调查反馈。我们寻求发现他们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哪里。在选择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作者时,我们试图跨越学科、性别、种族、范式和民族的界限。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视野来实现我们自己学科盲点的最小化。

我们从编委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反馈,包括对于新章节以及每一章中不同倾向的

建议,还有对于不同章节之作者的建议等。本书的每一作者(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都获得了国际承认)都被要求探讨以下这些问题,例如历史、认识论、本体论、试验文本、关键分歧、竞争性范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测等。

对批评家的反应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实地的对本书第 1 版的巨大反响,特别是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将本书(以某种形式)选作学生必读书目的教授们的反馈①。我们也感谢对本书的批判性反应。本书有助于开启一块长期被遗忘的对话的空间。许多读者将我们的方法用于实地时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指出了更多需要对话的地方。

对于第 1 版的批判包括以下这些:框架不够张扬、对于芝加哥学派关注不够、太注重后现代时期、有一个过于武断的历史模型、选择性太强、过分强调第五阶段和代表性危机、太重视政治正确而对知识本身重视不够、对如何去做的相关论述不够。有些人觉得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也感到很疑惑:既然已经发生了叙述的转型,那么我们如何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呢?

我们不可能为本书第 1 版和第 2 版中总共八十多位各章节的作者进行辩护。每个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某个立场。作为编者,我们试图展现多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参考文献框架。本书既不是,也不试图成为邓津和林肯观点的传声筒。我们并不是在说,做研究只有唯一一种方法,也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所谓的旧方法就是坏的。我们只是在讲,这是将这一领域理论化的方法之一,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很有用。

当然,这本书也并不简单。它超越了各部分之和,而且每一章节内部及各章节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我们希望读者在这些空间之中发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渴望在这些空间之中产生新的对话。这将是一种温和的、探索性的、邻里式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在构成今天所谓定性研究领域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诠释性群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界定本领域

这些诠释性群体是由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尝试运用定性的、诠释性的方法帮助他们(以及其他人)理解那些用以界定世纪之初日常生活之令人生畏的背景②。这些人应用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等模式进行诠释。他们运用了本书第Ⅲ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研究策略(个案研究、民族志、现象学、扎根理论、自传法、历史法、参与法以及临床法等)。作为诠释性研究者,这个群体的成员精于使用本书第Ⅳ部分所讨论的所有经验资料收集与分

---

① 我们感谢伊萨穆·以托(Isamu Ito)教授对本部分的建议,感谢彼特·拉贝拉做出的评论。

② 这一部延伸了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1995)的观点。

析的方法。而且,作为本书章节的作者和诠释者,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文章时运用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标准①。

这些学者构成了松散定义的国际诠释研究群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坏的"、淡然无味的、解放性的还是有问题的分析与诠释,他们逐渐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断地挑战"真实"与建构之间的界线;他们认识到所有的事件和理解都可以调节,都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和物质材料的实践,通过本领域的话语、对话、写作、叙述、科学论文、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和表演故事等变为真实。

这个群体在正在浮现的跨学科态势的中心与边缘都能起作用,而这一态势跨越了原来各自独立的一些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传播学、种族、民族、宗教与妇女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健康护理,以及教育学等。这一点鲜明地表现为其整体状况上的悄然变迁,表现为跨国的、跨学科的对话,表现为实践与习惯上倾向实用的变化。

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实用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一场革命悄然发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与哲学的关注,它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因而,它是一种理论立场,它认为实践与方法优先于反思与有意识行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预设话语对观察的优先权。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只是让我们对待话语要像对待观察(或者其他实地方法)一样严肃,让我们认识到话语是让我们与那些未亲临实地的人分享我们的观察的路径。

正是这种焦虑帮助我们认识话语的潜在力量,该力量现在将我们留在了后现代主义的门槛边,向我们暗示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来临。事实上,当代定性的、诠释性研究存在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域之中。本领域目前的历史分六个阶段再加一个第七阶段——未来。这些阶段在相互循环、相互竞争、相互界定。在同一时间,话语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其效果就是,既为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创造新空间、新机会和新局势,又将其他的方法搁置一旁。

有些人会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版本的定性研究边缘化和政治化,将其等同于激进的相对主义、自我叙事和摇椅上的评论。有些人批评本书对于亲历亲为的实地法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研究"真实的"世界的文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还有一些人想为本课题寻找一种有倾向性的、正统的,却机敏灵活的版本,他们回归到芝加哥学派,或回归到当前正式的、分析性的、现实主义的版本。有些人会从目前局势的内部进行批判,认为话语对观察的优先并未产生评价诠释性研究的合适标准。当只剩下声音与诠释之时,他们疑惑的是以后怎么办。许多人还要求一个规范的框架评价他们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愿望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竞争、矛盾以及哲学上的紧张使得在这些问题上业已取得的共识显得不甚突出。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详细的历史比较,尽管每一章节都包含了描述历史的内容。我们所有作者的目的都是指向未来,指向十年以后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态势。当然,

① 这些标准包括从后实证主义的(信度与效度的变异,如信用与信任)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注重强调合著的、唤起式表演文本,这些文本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了伦理上负责任的关系。

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还是在早期历史阶段所界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它也应该如此。做诠释性的定性研究并非只有某一种方法。我们这些诠释性研究者都是在比照着过去进行着现在的研究并探索着走向未来。

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些竞争性定义

定性研究课题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人们永远抵制任何企图给该课题强加某个唯一的、像伞一样笼罩性的范式的做法。诠释性的课题有多种,包括表演民族志,立场认识论,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民族志,与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课题,几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民族方法论的多个分支,预言性的、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为基础的批判文化研究模式,国际文化研究课题,等等。

这些定性研究课题中的每一种一般都同时沿着四个方向发展:①"在诠释理论中迂回徘徊";②对代表政治的分析和对文学、文化形式的文本分析,包括其生产、分配与消费;③日常生活中这些形式的民族志研究、定性研究;④对介入课堂与地方社区批判文化研究的新的教育与诠释性实践的调查。

谁的革命

总之,一个统一的但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论点组织了对本书中今日之定性研究方法论状况的讨论。首先,这个课题发生了变化,因为定性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变化了,也因为各地的诠释性研究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分裂与差异界定着全球文化经济。这是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研究中有必要超越国家或当地群体来进行思考。

其次,现在是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志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在电子化世界经济中流通。民族志可能是后现代世界中主要话语形式之一,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理所当然地了解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民族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便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定性研究(参见:Snow, 1999, p.97)①。全球与地方性的法律过程已经抹去了民族志研究者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个人的与制度的差距。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而且,不止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已受到起诉。

第三,这是一个性别化的课题。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论家质疑这样一种异性的、民族志叙事文本的传统逻辑,即,在实际的叙述中,将民族志研究者反思性地定位成性别中性化(或男性化)的自我。经历、话语、自我理解和更宽泛的关

① 詹姆森(Jameson,1990)认为,现实主义文本建构其版本的世界是通过"将读者……编入程序;在新习惯新实践中训练读者……这种叙述最终必须产生关于现实……关于真实、客观或外在世界的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是历史的,它可能在其他生产模式下进行决定性的修正,如果不是在以后阶段的话"(p.166)。新民族志文本正在生产自己版本的现实,正在教读者如何介入这一视野的社会世界。

于种族、民族、国家、性别、阶级、年龄等的文化假设相互碰撞。确定的身份已经决不可能存在;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要问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在何时何地,我是何种状况?"(Trinh, 1992, p.157)。

第四,定性研究既是一个研究课题,但它也是道德的、讽喻的、治疗性的课题。民族志不仅仅是对人类经验的记录。民族志研究者写作一些小的道德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汇聚,也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重生。正如威廉姆·福克纳(Faulkner, 1967, p.724)所言,研究者的故事写作是一种支柱,它帮助男人和女人们忍受和超越21世纪的黎明岁月。

第五,尽管对定性研究领域的界定常常存在断裂与分歧,但是该课题一直有一个中心:即明确地宣称从互动个体的视角人道主义地研究社会世界。从这一原则分化出自由与激进的行动政治学,其研究者分别来自女性主义、临床研究、民族研究、批判理论、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虽然在定性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诠释性群体,但是它们都统一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最后,定性研究的第七阶段将由民族志研究者贯彻以上假设所做的研究来进行界定。这些状况为定性研究在21世纪的转型支起了一个平台①。

本书背后的故事

写作诸如此类的一本书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和任何其他相同规模课题的困难相似。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在本领域活动中产生的根本性张力与矛盾。在本书第1版中,许多"适合"某些章节写作的学者或者联络不到、太忙、负荷过重或者去海外做实地研究去了。因此,我们找其他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却证明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适合"。几乎没有重叠的网络覆盖我们所试图囊括的众多学科。尽管这一次我们对该领域了解更多了一点,但是关于应该向谁询问如何去做我们依然不甚知晓,还有许多未知空间。我们遭遇了学科的界线——包括我们自己的——发现了在不同的诠释性群体的内部围绕我们的每一主题存在不同的传统。要知道如何跨越这些常常很困难,而我们的桥梁又常常是移动性的建构。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关于一系列不同主题的、迥异的理论风格,其建构的基础包括学科的、认识论的、性别的、种族的、民族的以及国家的信仰、疆界、意识形态等。

在许多情形下,关于谁应该写作某个章节或者某个章节应该如何写,我们常常不情愿地进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这些争端清楚地指出了本课题的政治特性,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每一章节都是一个潜在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多重诠释的领地。不止一次,我们和某个作者以及某个编委会成员产生了分歧。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要在编委们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裁决,在意义形成与交际手段之间进行连接。很遗憾,在某些情形下我们造成了感情伤害,或者甚至损害了长期的友谊。如果有先见之明,许多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真诚致歉。

① 最后,我期待一个持续的定性研究的表演转向,作者为他人表演其文本。

我们,以及作者与顾问专家,努力地探询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术语的意义,这些术语包括理论、范式、认识论、诠释性框架、经验资料与数据、研究策略等。我们发现,定性研究这一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意义是不同的。

即使有两千多页的初稿,我们还是放弃了追求全面的目标。为了最后期限和页数的要求,我们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的理论性以及关于那些我们能够明白但其他人却未必明白的内容,我们也和作者们进行着斗争。关于各章节何时完成,我们还得做斗争。而且,当我们要求更多的修改时,我们是在不断地测试着作者们的耐性。

本书的阅读

如果我们自己对本书作评论,我们将指出我们自己所见的不足。在某些意义上,这些不足类似于我们在1994年版本中的发现——过分依赖各自学科(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的视角,缺乏对自我及其在实地研究情境中的位置的研究,对新的社会与文化历史的研究太少——尽管我们努力地想避免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涉及了第1版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努力地试图涵盖应用定性研究的更多领域。我们帮助开启了各章节作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为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类学)的更多的声音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依然缺少代表有色的及第三世界人们的声音。而你,读者,肯定对本书有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关注另一些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问题。

这些都体现了本书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做定性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本书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社会实施的、共同创造的实体。而且,尽管它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但是随着一代代的学者、研究生反复地使用它、修改它,从它发起更多的方法论范式的、理论的、实践的研究,它将毫无疑问地被再创造。它并非一个最终的论断。它是一个起点,一个新思想、新研究的跳板。新的研究新鲜而敏感,模糊了学科间的界线,但总能深化我们对较大的人类研究课题的理解。

尽管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我们希望这个课题有助于定性研究在人类研究学科中逐渐成熟并扩大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原来所受到的训令,我们希望它能说服你——读者,相信现在定性研究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使你能更好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定性研究传统之中。如果能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桥梁。

致　谢

如果没有各章节的作者及编委会各成员对本书无偿付出的时间、意见与真诚的建议(常常未被给予足够的注意),本书将不能得以出版。在这里我们一并感谢所有作者与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列在本书的扉页上。他们既能够为本课题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支持,又能提供短期的、应急式的帮助。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人情债,非常个人化和家庭式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编辑彼特·拉贝拉及其前任米奇·艾伦无处不在的帮助、支持、智慧与鼓励,将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他们对本领域及其历史与多样性的把握是非凡的。他们对本课题的性质的构想极具价值。是他们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向前。而且,不管我们何时碰到问题,彼特总是耐心地在那里提供帮助。回到家,回到萨基(Sage)出版社这支舰队,托马斯·盖伊(Thomas Gay),罗尔夫·詹卡(Rolf Janke),萨拉·米勒·麦克丘恩(Sara Miller McCune)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本书这条舰船向着正确的方向行驶。

我们也要感谢以下这些个人与院系给我们的帮助、支持、洞见与耐心,包括我们各自的大学与院系等。尤其要感谢伊冯娜的院长琼·康诺莉(Jane Conoley),副院长欧内斯特·戈茨(Ernest Goetz)和系主任布赖恩·R·科尔(Bryan R. Cole),他们每个人都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为本研究提供了方便。在厄巴纳(Urbana),杰克·布拉奇(Jack Bratich)提供了必要条件。他的幽默与优雅使我们不断增加的文档井然有序,使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没有杰克,这个课题决不能够完成。还有伊利诺斯大学的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吉纳·曼宁(Gina Manning) 和德洛斯·简·希尔(Delores Jean Hill),她们保证了传真在厄巴纳、沃尔纳特·克里克、波士顿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通畅。

诺曼真诚感谢传播学院的院长金·罗茨奥(Kim Rotzoll)和传播研究所的所长克利福德·克利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在道义上、知识上和经济上给予本课题的支持。他也感谢黛安娜·蒂普斯(Diane Tipps)和汤姆·吉勒·安蒂(Tom Galer-Unti)对经济账目的管理,以及社会学系的主任约翰·利(John Lie)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在萨基出版社那边,阿斯特里德·弗丁(Astrid Virding)负责本课题的出版;我们非常感谢她和塞尔霍斯特(Judy Selhorst),还要感谢彼隆纽(Eileen Peronneau),伯格斯泰德

(Kris Bergstad),哈利(Cristina Haley)和波姆普拉斯卡(Uma Pimplaskar),她们娴熟的校对与索引技术使本书在形式上更完善。勒梅斯特(Janelle LeMaster)负责页面设计,巴拉素里亚(Ravi Balasuriya)设计了书的封面,沃伦(Marion Warren)负责的是排版部分。凯瑟林·瑞安(Katherine Ryan)和埃贡·古巴(Egon Guba)夫妇帮助我们保持课题的正常运作,聆听我们的抱怨,表现出非凡的耐性与支持。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一群人,他们在我们需要读者时毫不吝啬时间与精力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会常常发现自己对本书中所提出的不同的传统、视角与方法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们要感谢下列各位对于本课题的重大贡献,他们是:米歇尔·阿加(Michael Agar),马里兰大学人类学系;大卫·费特尔曼(David Fetterman),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系;埃贡·古巴(Egon G. Guba),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系;杰夫里·M·约翰逊(Jeffrey M. Johnson),东卡罗莱纳大学海事学院;史蒂芬·凯米斯(Stephen Kemmis),史蒂芬·凯米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J·加里·诺尔斯(J. Gary Knowles),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系;雷蒙德·李(Raymond Lee),伦敦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伦基拉(Markku Lonkila),赫尔辛基大学社会学系;马休·B·迈尔斯(Matthew B. Miles),纽约政策研究中心;约翰·奥格布(John Ogbu),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丹尼斯·帕隆博(Dennis Palumbo),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正研究系;乔恩·H·里格(Jon H. Rieger),路易斯维尔大学社会学系;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汤姆·施瓦特(Tom Schwandt),伊利诺大学教育学系;约翰·赛德尔(John Seidel),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Amherst)定性研究会;雷纳塔·泰什(Renata Tesch),定性研究管理;迪塞特·斯普林斯(Desert Springs),加里弗尼亚;亨里·T·特鲁巴(Henry T. Trueba),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系。

诺曼·K·邓津
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分校
伊冯娜·S·林肯
德克萨斯 A&M 大学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5).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it a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 349-358.

Faulkner, W. (1967). Address upon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The portable Faulkner* (Rev. ed.; M. Cowley, Ed.; pp. 723-724). New York: Viking.

Jameson, F. (1990).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Peshkin, A. (1993). The good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2), 24-30.

Snow, D. (1999). Assessing the ways in which qualitative/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social psychology: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2, 97-100.

Trinh T. M.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万卷方法 | 系列丛书

总策划：崔 祝 雷少波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2004.11出版）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第3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2004.11出版）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第2版）
By: Robert K.Yin
周海涛等译

调查研究方法（2004.11出版）
Survey Research Methods（第3版）
By: Floyd J.Fowler,Jr.
孙振东等译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2004. 1出版）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第2版）
By: Robert F.Devellis
李 红等译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2007. 1出版)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第2版）
By: John W.Creswell
崔延强等译

科学决策方法：从政策分析到政策制订（2006. 7出版）
Communic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o Policymakers
By: Roger J.Vaughan, Terry F.Buss
沈崇麟等译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选择与督导（2005. 8出版）
Telephone Survey Methods: Sampling, Selecting, and Supervision
By: Paul J.Lavrakas
沈崇麟等译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2004. 7出版）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第2版）
By: Norman K.Denzin
周 勇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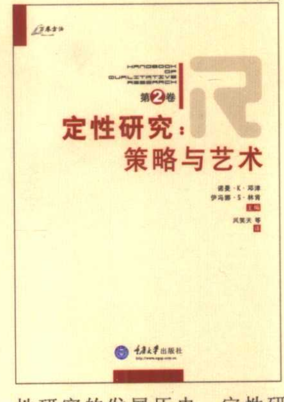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2005. 2出版）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Design & Social Measurement（第6版）
By:Delbertc. Miller, Neil J.salkind
风笑天 主译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2007. 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1)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2007. 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2)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2007. 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3)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2007. 1出版)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Vol.4)
By: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风笑天等译



本书是定性研究方法方面极为全面的工具书。全书约200万字，涉及定性研究的发展历史，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策略和艺术，定性研究的未来发展等内容，这些内容分别体现在41个专题之中。本书的56位撰写者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均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定性研究方法的相关领域卓有成效的学者。本书主译风笑天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他人员均来自北京大学、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与教学机构。

本书第2版的中译本2007.2出版。



本书约65万字，涉及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选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以至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和出版等内容。同时，为了给学者们提供更大的方便，本书提供了大量国际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传播机构的简明资料以及国际普遍认可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本书作者分别是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社会与商务管理系和坎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研究系的知名教授。此书由风笑天教授主持翻译。

本书第6版的中译本2004.12出版。

本卷目录

第Ⅲ部分　研究策略

第Ⅲ部分

研究策略

PART Ⅲ STRATEGIES OF INQUIRY

有公民意识的定性研究者都会进行历史的、互动的和结构性的思考。他们想明确一些诸如信仰、偏见和文化基调的问题,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男人和女人的变化(Mills,1959,p.7)。他们想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主要的公众和私人的问题以及个人困境。定性研究者经常将自己的经历作为研究的资料来源,他们进行历史性的反思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平进行思考。定性研究者寻找能让他们与现实经验、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建立联系的经验研究的策略,而这些联系是产生于特定的研究解释和经验资料之外的。

当然,经验研究是由范式约定和关于个人经验、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给定范式或解释观点的反复出现的问题而形成的。更进一步说,定性研究者总是在思考定性研究的实践怎样被用于去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批判理论家研究了产生阶级和经济结构的物质环境和意识形态体系,同性恋、建构主义、文化研究、种族批判和女性主义研究者研究了与民族、种族和社会性别有关的信仰、偏见和不平等问题。没有价值中立的调查,在定性研究中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要求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也必须明晰。

作为资料诠释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价值和经验活动的物质世界中。世界是由研究者的范式或解释视角构成的,这种构想的世界认可个人对范式或视角的约定。这种范式与解放的、公众的社会科学的价值及政治相联系。

当研究者计划和实施具体的调查时,他们必然面对两个问题:研究设计和调查策略的选择①。下面我们按顺序对此进行叙述。每一部分都包含着许多必须提及的问题。

---

① 为了使我们的约定与定性研究的应用和一般含意相一致,研究设计也包括两章的内容。奇克(Julianne Cheek)提出了针对这一主题的直接对策,这一对策适合那些逐渐发现自己置身于必须为其计划获取外在支持境地的研究者的需要。简西克(Valerie Janesick)提出了设计过程中极少被关注的版本。

研究设计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介绍中所说,研究设计将调查者置于经验的世界中,这一点简西克和奇克在第Ⅲ部分的文章也有所涉及①。研究设计包括五个基本问题:①设计怎样与所用的范式或观点相联系?也就是,范式怎样形成经验资料,经验资料又是怎样与范式联系起来的?②研究者怎样根据这些资料提出常规和变化的问题?③研究什么?④运用什么研究策略?⑤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方法和工具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在第Ⅳ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范式、视角和隐喻

实证主义者、后实证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和批判范式根据不同的自由度分别规定了定性研究的设计问题,这可被看做从具有严格设计原则到自发的、缺乏较好结构指导的连续统。实证主义者的研究设计主要放在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研究地点、抽样策略的叙述,以及所用的研究策略和分析方法详细说明的确定和发展上;研究计划的制订说明了研究的步骤和过程;在解释性研究中,原来的设计可能会阻碍新理解的进入,因此,尽管定性研究者可能提前设计研究步骤,但是研究设计应该允许新的未预期经验资料和复杂情况的出现。

研究设计包括反思、计划、进入、资料收集、离开现场、分析和撰写报告几部分。就像奇克在第 14 章中论述的那样,研究计划的详细程度依据研究经费的不同而不同。研究资金的来源至少有六类:当地社区的基金组织、特殊计划资助、家庭资助、社团基金、国家基金和州政府资助。研究计划包括了预算、相关文献回顾、人类主体保护的声明、许可证的复印件、访谈日程和时间进度表。实证主义者的研究设计试图包含定性研究中出现的所有问题(然而,解释主义者的设计则不然),这样的研究设计为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图示。实证主义研究者希望能创作一部作品,使之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相反,后实证主义者和非实证主义者的研究设计则比较含糊和具有弹性,如建立在建构主义的或批判的理论范式上的研究设计,以及建立在种族批判、女性主义、同性恋和文化研究观点基础上的设计。在这些范式和观点基础上形成的研究,不重视正式的计划、明确表达的假设、严格界定的抽样框架、结构式访谈提纲、预先确定的研究策略和分析的方法与形式。研究者遵循着一条发现途径,运用这一领域中公认的定性研究的模式。被《孤独的民族志学者》(*Lone Ethnographer*)的神话迷惑的学者都希望写成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Malinowski, Mead, Bateson, Goffman, Becker, Strauss, Wolcott)。然而,定性研究者从着手研究开始往往都是一个人单独进行,并总是延期完成。

---

① 艾伦(Mitch Allen)的评论恰恰符合我们对范式和研究设计关系的处理。

在第 14 章中，奇克使金钱、道德和研究市场的关系复杂化，并解构了这种关系。她说明了定性研究怎样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领域中流通和交换的商品，她讨论了与制度性审查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有关的问题，指出很多时候定性研究者不能提前回答这些部门提出的问题。研究控制也是一个中心问题，就像奇克所说的，"从他人那里获取经费来进行研究就不是一种中立的行为"。这个问题掩盖了另一个问题，即当研究者的发现不能取悦资助者时会发生什么？

舞蹈设计的艺术

在第 13 章中，简西克提出了设计过程的流动性的观点。她指出，好的定性研究设计需要一套开放的、严谨的程序。受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艾利（Alvin Aiely）、埃斯纳（Elliot Eisner）和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她从美学的、艺术的和比喻的视角来说明定性研究的设计问题。同杜威和埃斯纳一样，她认为研究设计是即兴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艺术——如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具有与经验、解释和陈述不同的形式、艺术模型和时尚体验。在舞蹈形式中，艺术是一个经过编排设计又不断发展着的产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热身、伸展运动、动作确定、放松运动、解释和叙述。

定性研究的设计决策类似于舞蹈的热身、伸展运动和放松运动阶段。恰如舞蹈反映真实的事物和创造生活一样，研究设计适应、改变和塑造所研究的每种现象。简西克使传统的设计问题、研究问题、研究场所、时间进程和研究策略适合这一研究框架。然后，她指出了试验性研究、跨学科视角、替代性的三角测量（晶体化）观点、效度、信度和概括性中的问题，提出了对这些主题的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的方法论（专注方法）的批判。她在对论文写作的建议中提出了对调查进行反思和批判。

研究谁和研究什么

定性研究所研究的有个案、现象实例或社会过程。在研究什么的问题上有三种观点：第一，可以研究单独的个案或过程，就是斯泰克（Robert Stake）在第 26 章所说的本质个案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详细研究独立的个案或事件，如一个教室、一张文艺节目表或者家庭成员的死亡。第二，研究者关注许多个案。斯泰克称之为集体个案研究。根据个案特有的和类的性质对其进行分析。第三，当一个过程由多个个案组成时，研究者可以研究这个过程的多个实例。如对酗酒者治疗过程中的重犯者的研究，邓津（Denzin，1993）研究了不同治疗方法中的多类重犯者。集体的个案研究是建立在特定个案研究基础上的。

当然，研究设计的不同取决于多焦点或单焦点个案和过程研究的需要，不同的情景有不同的抽样问题，这些需要和问题也因采用的范式不同而不同。个案或社会过程的每一个实例都具有它所属的同类现象的一般特质，然而，任何给定的实例又是特殊的和唯一的。比如，任何特定的教室与其他教室都大同小异，但是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实证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和批判定性研究者采用推论的或合乎目的的模式,而不采用随机的、抽样的模式。他们寻求其要研究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出现的群体、场所和个体。另外,对群体、概念和观察进行不断地比较是必要的(见本书第19章的论述),因为研究者试图获得对调查过程或个案的所有情况的理解。关注反例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色。

文化研究传统下的后现代民族志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抽样和选择问题,调查者可能更强调对经验资料(个案和过程)的一小部分的集中分析。继萨特(Sartre,1981,p. ix)之后,他们认为,个体或个案不会永远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或个案,他(她)必将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过程中独立的例子进行研究。萨特指出,人是"被概括的,因此是被他的时代一般化的;作为一个特殊体,他通过复制自己而继续该过程"(p. ix)。因此,研究特殊就是研究一般,任何个案都有普遍性的特征。后实证主义者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缺乏兴趣,而关注反例、普遍化和个案选择。像斯泰克所说,研究者假定读者能够对讨论的个案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进行主观概括。

这种策略的延伸出现在"实例法(methods of instances)"中(Denzin,1999;Psathas,1995)。继沙萨斯(Psathas,1995,p. 50)之后,实例方法把每种现象的实例都作为一个事件,来证明有文化者的文化理解行为。在此,比喻可能有用。在话语分析中,"没有哪种言辞能够表达其他言辞的意思,尽管它与其他的言辞有共同的结构特征;话语分析家研究言辞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当它在使用中嵌入社会系统时,语言系统的潜力能怎样地被激活"(Fiske,1994,p. 195)。这就是实例法的主张。分析家分析了当一种话语嵌入另一种话语,从而促发了系统事件产生的情况。

沙萨斯(Psathas,1995)阐明了实例的含义,"事物的实例就是一个事件……对事件特征和结构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它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p. 50)。事件是显而易见的,"它产生的机制是有文化性的……(例如)谈话中交替发言的机制"(pp. 50-51)。

分析家的任务就是明白这一实例和它的各个部分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并说明解释规则的运用,描述和阐释解释性事件本身的结构。分析家观察了互动的真实过程,"通过观察首先发生了什么,其次,再次又发生了什么等;通过注意先前发生的事;并通过调查参与者事实上做了什么,说了什么"(Psathas,1995,p. 51)。意义的问题归结到相互关系的真实过程,在此,将会看到特定的表达方式怎样起作用和赋予意义,实用主义者的原则即出于此(Peirce,1905)。在产生的结果中赋予行动意义,这一意义包括解释过去经历和预测未来结果的能力。

特殊的表达方式是否会再次出现是无关紧要的。从人群中抽样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因为不可能事先说明一个实例是怎样的一个样本(Psathas,1995,p. 50)。事实上,实例的收集"不可能在分析之前,因为我们不能事先知道什么特征能说明每一个个案是'类似于上一个个案的个案'"(Psathas,1995,p. 50)。这也意味着,对经验概括给予极少的关注。沙萨斯对这一点是清楚的。目标不是抽象或经验概括,而目标"关注的是提供能满足独特充分性标准的分析"(p. 50),每一个分析必须适合手头的个案,每一个"必须提供一个适合特殊现象的独特分析"(p. 51)。

研究策略

研究策略包括技巧、假设、规则和资料实践,是掌握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使用的从范式和研究设计到经验资料收集的策略。研究策略将研究者和特定的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手段和方法联系起来,如个案研究依靠访问、观察和文献分析。研究策略将研究者和研究范式置于特定的经验的、物质的场景和特定的方法实践中——例如,将一个个案作为研究客体(Stake,本书第 16 章)。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本书中讨论的策略。每种策略都有复杂的文献,都有自己的历史、著作和将策略付诸行动的一套方法。每种策略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包括实证主义者、后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的著作。

表演民族志

在第 15 章中,麦考尔(Michal McCall)论述了表演文本、表演艺术以及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表演民族志运动的详细历史。她区分了这种形式的早期社会科学用法,指出了她在历史中的位置,并且比较了她、莫里斯(Morris)和贝克(Becker)对表演艺术家的民族志研究。在与中西部践行自给农业妇女共同工作的基础上,麦考尔和甘默尔(Linda Gammell),泰勒(Sandra Taylor)提出了一些新的表演民族志。这些研究文本扩展了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波洛克(Della Pollock)和佩吉特(Marianne Paget)的研究。像波洛克和史密斯一样,麦考尔想把这些故事还原到它们出现的社会中。她安排了工场,让早期在工场工作的妇女在表演中扮演角色,提出了许多对创作、舞台和表演文本有用的指导。她的研究补充了门扎考夫斯基(Jim Mienczakowski)鼓吹的民族戏剧表演运动。

个案研究

斯泰克在第 16 章中指出,并非所有的个案研究都是定性的。通过对自然主义的、神圣的、文化的和现象学的范式联系的研究的关注,他认为,个案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选择,而是研究客体的选择,如一个小孩或一间教室。最后,研究者对过程或一些个案感兴趣,而不是单独的个案。斯泰克辨析了几种类型的个案研究(本质的、工具性的和集体的)。每一个个案都是复杂的、历史的和相互关联的存在。个案研究有独特的概念框架、用法和问题(偏见、理论、视角、故事讲述、个案选择和道德)。研究者习惯性地提供了这类主题的信息,如个案的自然属性、历史背景以及与情境、其他个案、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为了避免道德问题,个案研究者需要谨记:“从良心出发,从参与者立场出发,从研究群体出发。”

民族志和参与观察

在第 17 章中,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提醒我们,“民族志研究试图赋予特殊

的遭遇、事件和理解以更充实、更有意义的内容”。民族志结合了研究设计、田野研究和不同的调查方法对人类群体的生活进行描述。民族志研究经常利用个人的经历和自传,可能是现今定性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领域。实证主义者、后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界定、适用于文本的标准,以及解释过程中反思性研究者的位置等都存在争议。泰德洛克提出了参与者的观察怎样变成参与观察。结果,民族志的研究、框架、描述和解读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叙述民族志的类型已经成为现在话语关注的中心。现在,很多人明白民族志文本在研究中已非常流行。因为它产生逼真感的能力,这类文本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其他的则为民族志文本的产生和评价提供了严格的标准(见本书第 25 章、第 29 章、第 34 章)。

解释性实践之分析

在第 18 章中,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发展了他们最近的一本书中《定性方法的新语言》(*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1997)提出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们研究了从自然主义到民族方法学、情感社会学、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定性调查的各种不同的惯用语,提出了建立在民族方法学、谈话分析、本土文化的制度研究及福柯历史和话语分析的批判观点基础上的定性研究的新语言(Kendall & Wickham,1999)。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在解释的团体中逐渐赢得了一致认同。这种赞同说明了社会解释者的观点怎样与后建构主义者的话语分析以及本土的、社会的成就的意义和秩序的处境研究进行有益的结合(这一章的内容可以参考施瓦特在第 7 章的论述)。

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关注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意义的解释步骤和实践。这些反思性实践既是定性调查的主题也是研究资料。知识总是本土的,存在于本土的文化中,并嵌入组织的和相互作用的场所中。每天,这些固定模式和意识形态都出现在这些场所,包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理解。权力系统——史密斯(Smith,1993)所称的统治工具——和社会中的统治关系在这些场所中发挥作用。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在史密斯研究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批判理论。然后,他们指出了反思性话语和漫谈式的实践怎样转变为分析的程序和批判的框架。这些实践使本土社会秩序的基础显现出来,解释性资源和本土资源的强调,使定性研究中的反思性转向更有生气并显著扩大。

扎根理论

查马兹(Kathy Charmaz)是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她指出,扎根理论从其基本形式来看,应该包括对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建立解释收集的经验资料的中层理论框架的系统的归纳指导。在第 19 章中,她略述了这一观点的历史,从格拉泽(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早期的研究到格拉泽、斯特劳斯和考宾(Corbin)陈述的转变。她对这些作者的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立场与她自己的解释性结构主义观点进行了比较,她的解释性结构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中间

地带。扎根理论可能是现今社会科学中最广泛应用的解释策略。它给了研究者追求与"好科学"的标准一致的具体步骤。但在这一点上查马兹是明确的:即不采用早期倡导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而运用扎根理论是可能的(林肯和古巴长期支持的观点,Lincoln & Guba,1985。本书第6章相关内容)。

查马兹回顾了扎根理论家使用的基本策略。她的讨论扎根于自己研究的资料中,并说明了她是怎样应用理论的抽样方法、固定的比较方法、系统的编码和概念较多时的备忘录书写方法。她也运用计算机辅助分析,并简短讨论了为辅助扎根理论分析而明确设计的程序(NUD:IST和民族志;见本书第30章内容),回顾了对扎根理论批判的质疑。在查马兹手中,结构主义的扎根理论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多种解释观点的有力的分析框架。用这种方法,她消除了直接针对这一框架的早期观点的许多批判(Strauss & Corbin,1998,pp.275-295)。

生活史方法

在第20章中,蒂尔尼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史文本都是有社会性别的。同性恋理论扩展了这一观点。盖姆森(见第12章)和蒂尔尼提出所有自传的和传记的文本都是通过控制性别特征、性别认同和性需要的文化工具而形成的。因此,当蒂尔尼以两个断言开始这一章时,使读者大吃一惊。他首先论述了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是同性恋,他与他的追随者克拉克(William Clark)相恋。然后,他指出,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他关于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远征的叙述中没有描写这一事实是因为在19世纪,当刘易斯和克拉克开始他们的旅行时,同性恋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因此,关于刘易斯的生活史及他与克拉克的关系,从安布罗斯和其他的史学家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叙述。

这种开篇的方式使蒂尔尼将同性恋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带入他的生活史方法的分析中,特别是证词(testimonio),生活史的一种重要的新的形式(本书第21章、第32章)。证词,是叙述者讲述的第一人称的政治文本,而叙述者是所报道的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这些叙述报道了拷问、监禁、社会巨变和为了生存的其他斗争。这些研究试图产生(和记录)社会变革,事实都包含在讲述者所记录的事件的叙述中。作者不仅是一个研究者,更是一个历史和个人经历的见证者。

理解这种方法,生活史文献是进入生活的入口,进入一个与读者文化不同的文化的入口。这样的文本成为自我理解的工具,它们使记忆和历史与反思性的政治行动相联系,为听到先前沉默者的声音创造了空间。这样,后现代的史学家—人种学家创造了自由的文本。

新的历史和历史方法

文本,如蒂尼尔的文本,建立和发展了当代文化历史学家的研究计划(Jenkins,1997),包括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的新的社会历史,解释性人类学(Geertz),女性、社会性别和性别特征批判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自福柯

(Foucault)开始的历史学的散漫的语言转向(本书第 2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第 10 章的相关内容)。

所有的社会现象都需要在其历史情境中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历史文献和过去的书面记录,包括日记、书信、报纸、统计数据、小说和流行文学,以及流行的文化记录影片。要理解历史文献,必须要有观点的解释视角。这种视角决定了一个人怎样收集、阅读和分析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表述就是一个对过去现实的建构和重建的社会文本。

历史永远是某个人真实经历的故事,这些讲述历史的故事总是有偏见的,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事实"。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现今必须向我们诉说的显现的蒙太奇。但是,历史的诉说怎样揭示权力政治? 因为历史不能完全用做参考——它只是历史学家的建构。成文的历史既反映又创造了权力关系,因此,现今的斗争是关于我们怎样知道过去以及过去的事儿是怎样组成起来的。每一种历史方法都提供了讲述这些故事的不同方式。

作为叙述、方法和话语的证词

贝弗利在第 21 章中对证词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发展了蒂尔尼在第 20 章中提出的这种方法。贝弗利将这种方法的历史追溯到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桑切兹的孩子们》(*Children of Sánchez*)中的生活史分析。贝弗利提出证词的主要形式是用第一人称"我",一个真实而不是虚构的人的语气向读者讲述。这是一种拒绝沉默的语气,并且代表别人来诉说。然而,不像自传,证词抹去了作者的概念,使用的是一种能代表更大整体的语气,这就产生了一种民主的、人人平等的话语形式。

证词是一种开放的、解释性的研究,包括对真实世界中所选择的事件的社会解释、制造或安排的反思。这些建构可以处理(那些)没有发生的事件。在这一意义上,证词是解释的客体。它不仅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它代表着对真实世界的批判关系。对于证词"我",门楚(Menchú,1984)也是这么做的。它要求读者认同文本,相信本文的真实,正如文本坚信它对世界的解释。在这种情境中,贝弗利参与了我和门楚的论战(参见第 41 章我们对这一文本的讨论)。贝弗利总结了一个关于证词准备的非常有价值的目录。21 世纪证词将成为批判的解释写作的重要形式是确定无疑的。

参与行动研究

根据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第 22 章)的说法,参与行动研究(PAR)是一个与解放宗教学、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人类权力行动主义相联系的可以选择的研究(和社会生活)哲学。参与行动研究有几个不同的流派,从批判行动研究到教室行动研究、行动学习、行动科学和工业行动研究。参与行动研究者相信研究计划的共同拥有与社会问题的共同分析一样有价值。除了小心保护合作者的福利和利益外,他们对当地社会的一致行动承担义务。参与行动学者否定了价值中立的观念,也否定了那些宣称参与行动研究缺乏科学活力和过于政治化的批评。

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区分了三种参与行动研究的形式：第三人称是工具性的，第二人称是实践性的，第一人称是批判性的观点。他们重视那些包含了第一人称关系的参与行动研究的形式。参与行动研究的物质实践转化为实践者的理论和在社会中起作用的理论。这种转化有助于形成生活环境，连接本土与全球、个人与政治。这一传统中的研究试图使定性研究更人性化、整体化，并且与人类的生活相联系。在此观点中，人类通过参与、经验和行动重新创造现实。参与行动研究者促成了这一切的产生。

临床模式

参与行动研究与临床方法有一种天生的密切关系。尽管临床研究更多地关注诊断和治疗，而不是大规模社会变革，但两种传统都反映了承诺的转变。历史地来看，生物医学、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范式统治着临床和医学的研究。在第22章中，米勒和克莱比特里提出了一个定性研究的选择性观点，即将临床医学研究置于应用人类学和基础健康保健实践——特别是家庭实践——的关系中。他们勾勒了一幅临床实践的、经验基础的和解释的图景，使临床医生和病人重新参与到医学治疗的现实中来。他们研究了种族的、社会性别的临床问题怎样表达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米勒和克莱比特里对来源于家长制的实证主义生物医学范式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的分析。他们的观点混合了经验医学和参与的、行动的多种方法的观点。从方法上来看，这一模式运用了实验、调查、文献分析和田野研究方法，也使用了扎根理论的分析框架、个人经验的方法、临床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这个模式将医学机构和社会机构作为多种个人和医学叙述的竞争（和产生）场所。米勒和克莱比特里提出的多重方法的运用代表了一种彻底改变生物医学文化的尝试。他们的研究涉及定性研究的政治。在临床模式中，像在定性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多重方法的运用经常是通向研究过程的解释观点的唯一途径。

像凯米斯和麦克塔格特一样，米勒和克莱比特里指出了定性研究的应用怎样引起了社会变革。米勒和克莱比特里想通过改变现在医生和病人所使用的语言和范式来改变医学界的意识。这四个作者倡导的方法是社会变迁的有力动力。

同时，米勒和克莱比特里想改变医学文本的书写形式。他们想创造一种新的文本形式，使没有听说的人也能掌握的形式。只要先前的沉默可以被听到，他们就充当社会变迁的代言人。在这些文本中，研究与政治行动联系起来，语言系统和意义发生了变化，研究范式也受到了质疑。怎样表达这些声音是本书第Ⅳ部分论述的主题。第Ⅲ部分的声音唤起了行动。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1993). *The alcoholic society: Addiction and recovery of self*.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Denzin, N. K. (1999). Cybertalk and the method of instances. In S.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107-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ske, J. (1994). Audiencing: Cultur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9-198).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K. (Ed.). (1997).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Kendall, G., & Wickham, G. (1999).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 Sage.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enchú,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A. Wright, Trans.). London: Verso.

Mienczakowski, J. (2000). Ethnodrama: Performed research—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 In P. Atkinson, S. Delamont, & A. Coffey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 S. (1905, April). What pragmatism is. *Monist*, 15, 161-181.

Psathas, G. (1995).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rtre, J.-P. (1981).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D. E. (1993). High noon in Textland: A critique of Cloug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83-192.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定性研究设计的编舞艺术：米奴哀小步舞、即兴表演与晶体化 13

THE CHOREOGRAPH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MINUETS, IMPROVISATIONS, AND CRYSTALLIZATION

⊙ 瓦莱丽·J·简西克

舞蹈动作从不撒谎。它是显示心灵状态的晴雨表——对于所有可以读懂它的人而言。

马萨·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

定性研究设计非常类似于编舞艺术。正如弗里克(Flick,1998)所言,好的定性研究设计的核心在于使用了一套程序。该程序各环节都是开放式的、严格的,能正确处理所研究之社会背景的复杂性。而一个好的舞蹈设计师正是利用严格的、已检验过的程序把握住舞蹈/故事的复杂性,进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拒绝局限于用一种方式来设计舞蹈。在本章中,作者希望用两种舞蹈来展开这一比喻:一种是精确、固定的舞蹈,米奴哀小步舞;另一种是结构与形式都非常自由的即兴表演舞蹈;最后,我将讨论作为定性研究设计三角测量之替代方式的晶体化过程。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使用了舞蹈这个比喻(Janesick,1994a, 1998a)。而现在我使用舞蹈设计做比喻阐发以前的研究,有两个原因:首先,舞蹈是我最热爱的一种艺术形式,我有超过25年的当舞者、舞蹈老师与舞蹈设计师的经历。我循着许多可亲的、有影响的老师的足印成为舞蹈设计师,既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为了生存。我曾为三个州的不同群体及我自己的舞蹈公司设计舞蹈,在我不再做舞蹈设计师工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继续研究舞蹈。我曾多次于夏季在纽约市的几所学校学技巧①。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教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① 我去了纽约,因为那儿是世界舞蹈的中心。从霍金斯(Erick Hawkins)那里我认识到创造性与身体、思想是一体的,而且我还开始认识东方的思想。霍金斯和他的所有老师都是令人鼓舞的优秀人物。从坎宁安和韦斯特贝斯(Westbeth)中心的教师那里,我学会了相信身体、利用我过去作为舞蹈设计师的经历。对坎宁安而言,舞蹈是动作、声音、灯光在空间中的偶然碰撞,看者从中得到体会。坎宁安以一种类似于"禅宗(Zen)"的方式来探讨舞蹈过程。他也被称为现代舞的无政府主义者,后现代舞蹈运动的起点。所有的舞蹈都扎根于经历,所有关于经历的故事都依赖于身体,而身体正是研究的工具。身体也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工具。在舞蹈中,身体不能抑制表达过去经历的冲动。在舞蹈中,身体几乎不可能说谎或掩盖事实的真相。正如画家达里(Salvador Dali)所言"绘画是诚实的艺术,这里不可能存在欺骗"。

Teaching)学习期间,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我还在兰辛(Lansing)社区大学为学习舞蹈的学生讲授各种层次的现代舞、舞蹈设计、舞蹈史以及解剖学等。事实上,正是同时具有的舞蹈和舞蹈研究经历为我的学术生涯做好了准备,才能使我成为一个民族志研究者、一个定性研究方法教师和定性研究课题设计者。

其次,编舞的比喻只不过是使读者想起比喻法的一种工具而已。比喻通常给人带来惊喜,它不接受放之所有主题都适合的方法。我万分赞成艾斯纳(Eisner,1991)关于比喻的论述:

>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教育研究者同行交往的过程中,比喻的使用被视为不严密的表现,然而,要揭示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现象,没有什么比比喻性语言更合适的了。比喻是揭示生活之定性部分的主要工具(p. 227)。

因而,我希望读者喜欢这个编舞的比喻,展开你的想象,开拓你定性研究设计的视野。编舞是关于创作舞蹈的艺术,由于舞蹈和舞蹈设计都是关于过去的经历,舞蹈设计似乎成了我讨论定性研究设计的绝妙比喻。因为,定性研究者是研究的工具,而身体正是舞蹈的工具,因此,在讨论中这个比喻就更合适了。

在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经验中为研究项目定位和重设语境方面,定性研究者与舞蹈设计者在设计过程各个阶段的角色都极为相似。当舞蹈设计师被问及他们做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的通常回答是一件一件地讲在特定舞台之社会背景下的每个独立的事件,这和定性研究者的工作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例如,作为一个舞蹈设计师,汉弗莱(Humphrey,1959/1987)是将舞蹈设计作为一个领域来研究的人之一。她将舞蹈设计理论及其研究视为一种工艺,她并不否定人才或天才,但她坚信不可能教任何人"创造"一种舞蹈。这就像一个建筑师,不管他(她)天分有多高,他(她)都必须了解玻璃与钢筋的知识。对汉弗莱而言,制造舞蹈的工艺就是学其规则,然后将它扩展修饰。与之相似,当新手来到定性研究领域,开始设计项目时,他们的第一阶段就是学习规则,然后将它发扬光大。这一古老概念千百年前在中国绘画大师的笔下就有论述:

> 有些人崇尚方法,而另一些人傲然无视方法。无方法固然可悲,完全依赖方法则更糟。必须先忠实地遵守法则,然后根据自己的智能加以修改。所有的方法最后都归于无法(Lu Ch'ai)。

定性研究者和舞蹈设计师还有另一相似之处:他们都拒绝将艺术与普通生活经历割裂开来。定性研究者和舞蹈设计师都受益于杜威的一个观点。65 年前杜威(Dewey,1934/1958)提出艺术是表现交流与经历的。尽管杜威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年代大受批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看到了他思想的价值。杜威认为艺术为事物提供一种整体感,正如定性研究者和舞蹈设计师,他们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杜威(Dewey,1934/1958)提到"艺术家应该恢复表现生活的高雅、强烈的艺术形式(即艺术作品)和日常的事件、行为、感受(即人们广泛认可的经历的构成要素)之间的连续性"(p. 3)。这种对日常经历和作为经历的艺术深邃批判的观点非常类似于定性研究者和舞蹈设计师的观点。

米奴哀小步舞与即兴表演

好的舞蹈设计师拒绝将自己局限于舞蹈史上的某一种方法或技术。与之相似，定性研究者也不乐意受局限。弗里克（Flick，1998）最近发现，定性研究者在工作中使用不同的技术以及严格的、经检验的程序来捕捉所研究社会情境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舞蹈史上迄今所描述的舞蹈类型纷繁庞杂，从中我选择了表面上并无联系的两种舞蹈形式——米奴哀小步舞与即兴表演舞蹈——来阐述我对于定性研究设计过程的讨论。米奴哀小步舞代表最受限制的舞蹈形式，在舞蹈表演中它有一套规定的步法。即这种舞蹈有固定的舞步和转身动作，还有规定的手臂和脚的动作模式。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即兴表演的舞蹈。想象一下自己是舞蹈设计师，你会如何为这两种舞蹈设计舞蹈动作。

首先，让我们看看米奴哀小步舞。虽然冒着被视为阿甘（Forrest Gump）的危险，我必须指出，舞蹈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生活就像米奴哀小步舞——舞者为了行屈膝礼或鞠躬做了几次转身动作，最后在舞蹈开始的地方结束。然而，米奴哀小步舞并不像它所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想象你自己在1650年的法国，对于能欣赏音乐舞蹈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奢华、平静的时期。从礼貌、习俗、艺术、音乐、仪式、作为整体的生活到日常的着装，处处都充斥着严格的规则。数百万的法郎花费在舞会、上流聚会的米奴哀小步舞表演上。化妆师、舞蹈设计师、背景设计师、音乐家、宫廷中的逗乐小丑和诗人都应召而至以确保米奴哀小步舞表演完美。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舞蹈老师、舞蹈设计师被尊为天使、神的建筑师，所有的米奴哀小步舞的预备舞者需要舞蹈上的指导时都对他们毕恭毕敬。

现在你再想象一下你在当今的时代准备做一个即兴表演的舞蹈设计。即兴表演可能是与米奴哀小步舞最大相径庭的舞蹈形式。作为广义后现代舞的一部分，即兴表演舞蹈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即兴表演舞蹈是自发的、对社会状况的反思，在特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境下，表演者自己决定对观念的诠释。即兴表演在舞蹈中就像任何创造性的表演，它依赖于①准备，②探索，③诠释和表现。例如，我想起我的一个舞蹈老师在一次即兴表演舞蹈练习中说："想一首你最喜欢的诗，现在听着我放的音乐。好，开始跳。"这是一个即兴表演舞蹈学习的范例。在任何舞蹈中，舞者必须非常清楚身体和运动机能学、台词、核心意象，以及要向观众表达的理念。与之相似，舞蹈设计师在构思一个即兴表演舞蹈时，他（她）要平衡所有这些因素，最关键的是，所有舞蹈、所有舞台设计都源于某个理念，不管舞蹈是被限定为确定的形式还是自发的形式。我从布洛姆和查普林（Blom & Chaplin，1988）的描述中看到了定性研究者的工作和即兴表演舞蹈之间的联系：

> 我们可以肯定地、毫不费力地说，自发性是即兴舞蹈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它又不是无方向的，它既有意图，又有反应性……有机构成的方案会及

时产生,引导我们继续舞动;然而方案只有随着舞动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因为即兴表演是一个现象学过程,我们不能逐一检查其所有结果。但它确实存在,可以感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考察即兴表演的过程以及我们对该过程的意识,这一"即兴"的过程既是其自身,又在不断地创造自己(p.7)。

因此,定性研究者可以从米奴哀小步舞与即兴表演的舞蹈设计形式中学习。研究设计开始是一些固定的乐章:计划精确的访谈、观察、查阅文献和分析文献。这样,研究者就像是米奴哀小步舞的舞蹈设计师/舞者。同时访谈资料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使研究者可以即兴创作,可以发现参与者生活中更多的关键事件或时刻,因而,研究者就开始使用舞蹈设计师/舞者的即兴创作技术。即使是对观察和访谈的安排有时也是即兴创作的。某个访谈可以使研究者发现另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一种文献可以引出更多的文献,如此等等。与之相似,在研究中研究者规划研究进程,检查研究程序,把握研究的方向。对研究者来说,一个较可取的办法是保留一本关于研究过程的反思日志(reflective journal)(Janesick, 1999)。舞蹈设计师在笔记本和录像带上记下他们的思考和工作,研究者也可以做相同的工作以保留历史记录。

定性研究之舞蹈设计

所有的舞蹈设计师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舞蹈中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不管他是否明确阐述。与之非常相似,定性研究者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此研究中我想了解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的起点。不管研究者的观点是什么,研究者通常基于这一观点建构定性研究的问题。这一点明确之后,研究者就选择最合适的方法进行课题的研究。对于定性研究者而言,问题不能和方法完全分开。相应地,舞者和舞蹈,舞蹈设计师和他设计的舞蹈内容也不能完全分开。像舞蹈设计一样,定性研究设计以问题开始,或者至少是出于对某特定主题的学术兴趣甚至热情。当然,定性研究者设计研究的时候,头脑中想着真实的个体,目的是要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去生活一段时间。定性研究者研究某社会背景是为了按照参与者自己的观念理解参与者的生活。这和定量研究者的工作不同,定量研究者非常喜欢调查大量的对象而不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定性研究者问的问题和定量研究者问的问题大不相同。一般而言,适合定性研究的问题一直是许多教育理论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在探讨的问题。例如:

1. 有关已知创新或计划的质量问题。

2. 关于研究背景中某因素的意义与诠释的问题。

3. 和社会、组织相关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4. 和整个系统相联系的问题,如教室、学校、校区、城市、国家、机构、医院、监狱等系统。

5. 有关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

6. 有关机构的隐含课程或章程的问题。

7. 有关某机构的社会背景的问题。

8. 有关参与者对自己工作隐存看法的问题。

9. 有关个人生活意义的问题。

10. 那些使娱情的人不快、使痛苦的人宽心的问题。

这十个方面并非穷尽所有的问题,它仅仅是列举已经完成研究的基本领域,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和问题的适合性而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

就像舞蹈设计师分阶段完成其舞蹈作品设计,我将定性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热身、准备阶段,或者说研究刚开始时的前舞台设计阶段。其次,当通过研究做出设计决定之后,进行探索、付诸实施阶段。第三,做出最终设计决定或接近研究结束时的描述、论证或完成阶段。同时,除了即兴的顿悟之外,定性研究者像舞蹈设计师一样,遵循一套规则(例如米奴哀小步舞规则)。就像舞蹈设计师依靠舞者的身段来表现舞蹈的力量与和谐,定性研究者依赖研究设计来完成研究,二者都是灵活有弹性的。舞者的关键在于腰部及腰与身体其他各部位的配合,定性研究者的关键在于研究设计。矫健的舞者可以使身体前后左右倾斜,但总有一个支点,有其力量的核心。如果将研究设计比作舞者的腰,那么研究开始阶段的方案非常类似于舞者正式表演前的热身,类似于舞蹈设计师的前设计(predesign)方案。

热身、准备:研究早期设计方案及舞蹈设计诸要素

研究设计首先考虑的是研究什么、研究的情境、时间期限以及和谁一起研究。而舞蹈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动作的意义、舞蹈的主题、动感、节奏、舞句等。作为一个研究者,我通常以一个问题开始某个特定研究。例如,当我研究华盛顿市的聋人文化(deaf culture)时,在四年的时间里,我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聋人怎样在耳聋的条件下取得学业及工作的成功(Janesick,1994b)?这个基本问题贯穿了我所有的观察与访谈,并引导我在后期研究中使用焦点群体(focus group)和口述史等研究方法。在逐渐了解了所研究的十二个失聪的成年人的观点之后,这两项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然后,我利用理论抽样方法选择了三个人作为口述史研究部分的调查对象①。我之所以用这个例子是为了阐述定性研究的弹性,焦点群体使我能够修正、观察三个参与者之间关于

---

① 我最初学习理论抽样是作为一个象征互动学派(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chool)的民族志研究者在阅读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的著作中学会的。理论抽样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它允许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使用常量比较法。理论抽样还允许研究的方向性,允许研究者有自己的分类,因为这些类型源于资料并随着方法不断地、有选择性地进行重新阐述。任何研究资料都不会自己说话。研究者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方式来理解资料,任何可以帮助研究者积极搜寻有用资料的技术方法都是受欢迎的。理论抽样只是定性分析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是,这对于那些只学习了心理测量方法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而对于那些将研究视为刻板写作活动的研究者而言,理论抽样似乎是一个过渡性工具。

"失聪"的看法的相互影响、交流,这些在早期研究设计中不可能计划。在研究的起始阶段,我也不可能意识到整合这些方法的价值。这两项研究技术使我能够丰富、全面地诠释参与者对失聪的看法,也使我能够体验不同的技术与学科的应用。舞蹈设计师在设计舞蹈作品时也必须做相应的调节,例如,空间的利用问题、舞者的类型、独舞者的类型、动作的运用问题等都需要在表演前设计。彩排时,舞蹈设计师可以根据表现情况重新组织、调整这些要素。

高文斯(Judith Gouwens)、博伊德(Patricia Williams-Boyd)和德弗里斯(Byron DeFreese)的定性研究课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高文斯(Gouwens,1995)研究了两个芝加哥的学校校长,讨论与职业角色相关的个人特征,决定了主题是描述和解释校长们如何做他们的工作之后,她就能够决定访谈、观察和文献综述是适合该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博伊德(Boyd,1996)研究了一所全职(full-service)学校及其所处社区对它的影响。通过参与其中生活、访谈、观察、照相等方法,博伊德记录了每个相关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从他们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意义,以便为该地区的潜在从业者(prospective practitioners)提供指导。德弗里斯(DeFreese,1996)研究了一所学校的校长助理,探讨他如何决策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通过精心准备的访谈和研究该校助理的相关生活资料,德弗里斯发现了一种方法来公正地评价一个为社区服务的人。因而,可以说定性研究者有开放的而不是空荡的头脑,他们提出问题来指导他们的研究,但是这些问题随时可以修改,衍变为不同的形式。我常常被同事质疑:他们说,定性研究者整天无所事事,只等着问题自己冒出来,更有甚者,还有人宣称定性研究课题中根本没有问题可研究。这简直荒谬透顶!

在提出指导研究的问题的同时,定性研究者还需要选择调查场所(site),并且为选择场所提出依据。开始工作的途径和方式是定性研究的敏感问题,研究者必须与参与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谐、真诚的交流模式。通过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建立起信任关系,研究者更能够从参与者的立场了解每个参与者生活中的细微差别和意义。同时,这种模式也使参与者更乐意与研究者分享他们的所做所思。实际上,在整个研究阶段甚至在以后很长时间,这种信任关系一直都维持、存在,但是,必须注意,一定要在研究开始阶段就建立这种关系,在研究开始一段时间,比如六个月之后,再来建立信任关系是不可思议的。所有做过实地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调查起始阶段的互动中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是多么关键。舞蹈设计同样如此。如果要想创造出精彩表演,舞蹈设计师和舞蹈演员之间必须建立信任关系。

一旦研究者有了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一个调查场所、若干参与者、一段足够的研究时间,那么他(她)就需要选择最适合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与研究者对其研究目标的看法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这和研究者如何了解该研究的社会背景相联系。通常,定性研究者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类定性研究的方法与技术有大量文献可查(Bogdan &Biklen,1992; Cresswell,1997; Denzin,1989; Goetz& LeCompte,1984; Guba &

Lincoln, 1994; Janesick, 1998a; LeCompte, Millroy, & Priessle, 1992; Lincoln & Guba, 1985; Marshall & Rossman, 1995; Maxwell, 1996; Spradley, 1979, 1980; Strauss & Corbin, 1990; Wolcott, 1990b, 1994)。例如,在过去三十年里教育和人力服务研究领域发现并使用一些方法技术,如个案研究、口述史(包括叙述史和人物史方法)、扎根理论、文学批评、民族志方法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方法技术适合研究的需要。教育研究终于开始采用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的方法,如果说这些方法非常适合研究者对个体进行研究,那么教育研究对这些方法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与之类似,舞蹈设计师在创作舞蹈之前也面临相似情况。首先,通常一开始就要有关于舞蹈的灵感。例如,艾利的作品都是紧密围绕其主题,艾利将音响效果、服装、灯光以及完美的独舞者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可以与定性研究者选择贯穿研究始终的各个研究方案的能力相媲美。

小 结

总之,在热身阶段或研究开始时的选择方案阶段,有以下的问题需要考虑:

1. 什么是引导研究的问题;
2. 选择场所和参与者;
3. 进入调查场所,取得参与者同意;
4. 研究的时间安排;
5.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技术,参见以下所列方法(并非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a. 民族志(ethnography)
b. 生活史
c. 口述历史
d. 民族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e. 个案研究
f. 参与性观察
g. 实地研究
h. 自然主义(naturalistic)研究法
i. 现象学方法
j. 生态描述(ecological descriptive)研究
k. 描述研究
l. 象征主义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ist)研究
m. 微观民族志(microethnography)
n. 诠释研究
o. 行动研究
p. 叙事研究
q. 史学研究法(historiography)
r. 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6. 理论在研究中的位置;

7. 明确研究者本人的信仰与意识形态(ideology);

8. 确定获取知情同意的适当方法和取得共识处理研究中出现的伦理问题。

关于上面所提到的最后两点,我想指出,定性研究者承认研究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不存在价值中立、毫无偏见的研究。早些时候,定性研究的研究者们指出自己的倾向性(biases)、陈述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指出自己的倾向性,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研究的哪些基本问题有偏差。定性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对研究影响极大,如果研究者严格地记录整个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者在其中的独特地位的话,那么研究者立场观点的变化可以在反思日志中窥见一斑。这是一个存在巨大理论分歧的问题,我还没有发现定量研究领域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讨论自己的意识形态对研究的主导与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研究之客观性的神话不可当真。当前,所有研究者都应该质疑流行的神话,诸如研究之客观性神话等。当我们作为研究者试图理解我们的社会,并给予我们的研究内容以意义时,我们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信仰所产生的影响。没有必要假装认为研究是价值中立的。同理,因为定性研究者每天和个体面对面地交流,也不可避免地会在研究中涉及伦理问题,因为这是实地生活的一部分。从开始取得知情同意,到实地中其他伦理问题的出现,直到研究的完成,定性研究者需要考虑到可能在实地中一再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例如,在最后的报告中哪些内容会公开发表、哪些不发表。这些难题始终存在课题的研究者和调查对象(如果你愿意成为合作研究者也行)决定如何在最佳的社会背景下展示研究的信息,但是这样做不能够影响或伤害参与研究的任何其他成员。

除了起始阶段的研究设计之外,考虑一下定性研究的基本特征对研究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所列的条目并非全面,只作启示性研究工具):

1. 定性研究是整体性的。它着眼于大的场景,全景式的,一开始就追求对整体的了解,定性研究不是用来证明什么也不是用来控制人们。

2. 定性研究设计着眼于社会体系或文化内部的关系。

3. 定性研究设计关注个人的、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

4. 定性研究设计注重了解特定的社会背景,但不必对这些背景做前瞻性预测。

5. 定性研究设计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场所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6. 定性研究设计要求用于资料分析的时间与在实地的时间相等。

7. 定性研究设计有时要求研究者提出一个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事件的模型(我支持这种做法。因为提出一个模型和舞蹈设计或艺术工作有相通之处,可以作为一个启发式的研究工具。我肯定有很多定性研究者不需要或不重视建构模型,但是,正如场景设计师或建筑设计师设计模型、舞蹈设计师或舞者将舞蹈摄成图片,或如画家创作一幅素描或系列素描,定性研究者也可以将模型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工具或者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记录)。

8. 定性研究设计要求研究者成为研究工具。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有能力观察行为,必须磨炼自己观察和面对面访谈等必备的研究技巧(就像舞者和舞蹈设计师一样,定性研究者必须保持思想和身体各部位的和谐:使眼睛会看,使耳

朵会听,等等)。

9. 定性研究设计要包含知情同意决议并对伦理问题保持关注。

10. 定性研究设计除了包含对研究者本人的偏见与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的描述之外,还包括对研究者角色的描述。

11. 定性研究设计要求建构一个真实有效的叙述来描述研究中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参与者的各种经历。

12. 定性研究设计要求不断进行资料分析。

本书的其他章节深入地探讨了定性研究的这些特征,读者一定会从中受益。一旦研究者进入实地开始研究,另一些相关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第二阶段:探索与练习——研究全程中的设计决策和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舞蹈设计

伸展练习与背景工作

研究者在投入大量时间做艰苦的定性研究之前,先做一些背景工作——或者我所谓的"伸展练习",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过去我用探索研究(pilot study)这个术语,但现在我摒弃了它,因为它对于定性研究而言太局限了]。伸展实践是未来的定性研究者练习访谈、观察、写作、反思以及艺术技巧以完善研究的工具,也就是研究者自己。正如前面所介绍,在舞蹈中,舞者从某个姿势、位置开始伸展腰身(Janesick, 1998c)。同样,定性研究者在训练时,要展开他们的想象,也要伸展他们的肢体——他们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用手写作,等等。那么在这一较短时间内,研究者选择一些主要参与者进行预访谈、观察以及查阅文献将对后面的研究有多方面的帮助。

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应该上图书馆或网上了解他(她)所研究的领域已经有哪些研究成果。正如舞蹈设计师从前人的舞蹈姿势中萃取灵感创作舞蹈,定性研究者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在背景工作阶段查找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大有帮助。背景工作使研究者关注那些别人研究不够深入的特定领域,而且,研究者还可以利用预访谈来验证某些问题。

这个过程的起始阶段使研究者能够开始形成和强化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建立起有效的交流模式。如果研究者分配一些时间来阅读文献,他(她)就可能在研究中发现以前所未发现的某个不明朗的观点。以我对聋人文化的研究为例,在我和被调查者访谈以前,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加劳德特(Gallaudet)大学图书馆阅读期刊、报纸、看录像,这些都有利于我理解导致"聋人校长"事件的历史背景①。在文献回顾中,我发现在加劳德特(Gallaudet)大学选举第一任聋人校

① 加劳德特大学是唯一致力于聋人教育的文科大学。

长之前的125年间的一系列的历史情境中存在许多与我的研究相通的主题与范畴,那些相关的访谈记录对研究非常有意义。因而,花时间做背景工作有利于丰富后阶段的研究。那些打算写论文开题计划的研究生们首先应该去查阅过去10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摘要,看看自己的领域别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

研究过程中通常涉及的问题还有:时间的有效利用、参与者的问题以及研究者的问题。由于在实地研究中大量时间难以预测,定性研究者必须随时调整时间进度和访谈安排,增加或减少观察或访谈,遇到伤亡或灾难性事件时选择替代参与者,甚至重新计划研究方案。我在民族志研究方面的长期经验使我能够随着研究的进展不断丰富、调整研究设计,尤其在本研究阶段,当研究者完全沉浸于参与者直接的、本土性的行动及信仰表述时,他(她)必须能够处理好研究的基本关注点以及理论假设。仅仅是观察和访谈还不足以形成定性研究,定性研究者必须诠释被调查者的信念与行为。例如,我最近被邀请去评审一些内部资助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案。有一个研究方案其作者宣称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这个方案用大量篇幅描述调查报告(定量的)和研究日志(定性的),但是作者忘了告诉读者如何利用这些研究日志。如何将它们整合到课题中呢?在伦理方面,如何保护这些日志呢?如何将它们和定量调查联系起来呢?因此,这些资料很难成为定性研究的一部分。它就像雕刻家手中一块多余的黏土——是否应该将它放到已完成的作品之中呢?如果这块黏土可以整合到雕刻作品之中,也使作品有意义,雕刻家当然应该考虑利用它。如果添一块黏土不能对最后的作品产生意义,不能增加其艺术的完整性,那么为什么要用它呢?

只是在研究中随意运用一点定性研究的手段并不一定能形成定性研究。对于定性研究似乎有很多误解,只有我们这些人在实地中小心翼翼地整理定性研究的资料才能甄别、消除误解。对研究方案和研究过程进行艰苦细致的描述与解释不仅对研究者本人有用也对未来的定性研究者有用。

在某种意义上,实地研究者常常处于这样一种混合的状态:一方面有意识地提出和验证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本能地对外界作出反应。研究者在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文献中可以找到多数研究者都公认的重要研究法则:

1. 寻找研究的意义、参与者的观点看法。
2. 寻找社会事件之结构、过程、分布等之间的关联性。
3. 寻找冲突点:到底是什么不适合?什么是个案中证据的冲突点?

舞蹈世界同样如此。尽管格莱厄姆舞蹈技术代表着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舞理念的转变,但芭蕾舞的一些要素依然在现代舞中使用。而且,现代舞还包容了许多相互竞争、对立的表演形式,如坎宁安与撒普(Tharp)舞蹈。当舞蹈设计师向观众展示某种理念时,你几乎可以确定:在正式表演之前的排练中,它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变化。即使是跳狐步舞,有固定的形式与步法,但每个人的表演也是不相同的,身高四英尺和身高六英尺的人跨出的一步更是大不相同。即兴舞蹈表演也有相似之处,它随着不同的舞蹈设计不断地变化。作为研究课题设计师的定性研究者基本上在课题的各个不同阶段都会做出不同的方案。在进入实地之

前的热身与准备方案构成第一套研究方案;练习与探索是第二阶段的系列方案,通常发生在实地研究的资料收集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方案通常在研究的末期做出,或者说这一阶段的方案是研究者离开实地后做的,我称之为"沉静下来:描述与论证"。

沉静下来:描述与论证——研究末期的设计方案

研究的末期类似于舞蹈的尾声或舞蹈设计师决定完成其舞蹈设计工作时的状态。研究者必须决定何时离开研究地点,这通常是一个充满感情、令人伤心的事件,因为大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了和谐的关系。我通常的做法是逐渐淡出研究地点,就像一个舞者慢慢地退场。例如,我在一个关于教师课堂态度的研究中,在每天都到场观察、访谈并坚持了六个月之后,第七个月我开始从每周五次的观察、访谈减少到每周三次,再减少到每周一次,然后只是在教师方便的时候一起审阅访谈记录的文字资料(Janesick, 1982)。

离开实地之后,最后的资料分析阶段开始了。当然,在整个实地研究阶段,定性研究者已经通过不断的比较分析①,将资料分类收集。定性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将资料整合成紧凑的、真实的、有意义的论述。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4)认为叙事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方式。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研究中参与者的复杂、真实的生活故事,每个研究者都需要成为一个写文章的好手。在实地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不断地重新考虑、完善研究概念。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形成分析模型(working models)或行动理论(theories in action)以解释研究中的行为。随着分析的进展,研究者还可以确定分析模型中描述部分与解释部分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可以尝试寻找分析模型中不同要素的意义,然后通过查阅实地记录、访谈记录和文献等来进一步判断其真伪。当然,不是所有定性研究者都赞成使用分析模型。我从舞蹈设计角度建议在定性研究中使用分析模型,因为舞蹈设计就使用这一方法。随着创作的进行,舞蹈设计者建立了分析模型,以便完成最后的艺术表达。创作过程是开放的,舞蹈演员、观众等都可以讨论和评析。与此相同,我建议在定性研究设计中也使用分析模型,还因为研究者们实际上更像艺术家。

实地工作结束后,研究者需要以一种叙事的形式来展示其研究资料,以这种形式有效地组织那些在实地笔记、批判性反思日志和访谈中所记录下来的观点

---

① 不断的比较分析使研究者可以发展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从研究中归纳得出的理论,资料收集、分析与理论相互联系。研究者将理论扎根于研究中陈述调查对象信念与行为的资料。关于扎根理论可以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及格拉泽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的著作中得到详细论述,该理论基本上是和定量研究范式下的理论应用相对立。定性研究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一个场景进行研究,并在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理论而不是证明理论。这只是许多分析方法中的一种,但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初学者尤其有帮助。因而,我建议我们要参考艺术与人文学科,尤其是舞蹈设计与写作,以帮助我们拓展关于如何理解、分析、诠释定性资料的理念。

与行为。换言之,定性研究者必须直接引用笔记或访谈的内容来支持自己观察所得来的观点。研究者也需要提供某种诠释性评论来系统地陈述研究中的重大发现。理论的探讨可以在所收集的资料中表达。而且,研究者应该全面地描述他(她)的角色,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使研究者在综述全部事实论据的同时,使其对研究中重要论点的阐述具有可信度。因为在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工作最初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那么研究者角色的描述成了研究报告的关键因素。研究者必须描述和解释他(她)在研究中的社会角色、哲学立场和具体的研究任务。在研究开始时,在研究中,以及研究结束时,定性研究者都必须真实剖析自己的偏见、倾向,具体做法就是在研究中清楚地描述、解释自己在研究中的确切作用。

最近,有同事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定性研究方法的课本或期刊",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感到有责任向他解释推荐一下目前有关这方面的大量优秀书籍与期刊。事实上我也给了他我认为有帮助的信息,例如有注释的参考文献、我的定性研究方法课的教学大纲,还有一些网站及网上资料等。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定性研究者除了设计好自己的研究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附加的责任,即向那些非研究者,那些不了解定性研究方法的人解释、传送这方面的基本信息。虽然,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在课本、专业期刊杂志,以及网上都大量存在,事实上,我那些做定性研究论文的学生早在他们写论文设计阶段就开始向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灌输这些信息,因为后者很可能忘记阅读该领域相关的期刊杂志。这是定性研究者的责任,我称之为研究者的社会定位的一部分。

叙事写作

定性研究者使用归纳分析方法,这意味着范畴、主题、模式都来自资料。源于实地记录、文献和访谈的各种范畴并不是在资料收集之前就已划分。以前的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对资料编码和分类的体系,当然,没有哪个系统是最优的分析系统,研究者可以遵循文献中所论述的一些规则(Eisner,1991; Fetterman,1989; Goetz & LeCompte, 1984; Lincoln & Guba, 1985; Miles & Huberman, 1994; Patton, 1990),但最终如何叙述取决于研究者。研究者必须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来向观众说明研究的意义。贴近研究资料是最有力的叙事方法,就像舞蹈通过人的身体本身来展示意义。像定量研究一样,定性研究的目的也是要得出研究结果,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如果过分关注方法,却忽略了重大发现,这将是危险的。

实际上,博士生的研究最让我操心的还是过分注重方法问题。举例来讲,许多博士生选修了统计方法课,而且,出于各种原因,雇人为他们的研究做统计,甚至做分析与解释。定性研究者就不会落入这种陷阱。定性研究者就像舞者或舞蹈设计师角色一样,需要在场,需要关注细节,还需要有效使用研究者自己的头

脑与身体来分析、解释资料。就像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跳你的舞蹈,也没有人能设计你的舞蹈一样,除了你自己也没有人能解释你的资料。定性研究者不会雇佣他人分析、解释资料,这是和定量研究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也再次说明了舞蹈这个比喻很有用。同时它也促使我们作为研究者开始同方法崇拜论者(methodolatry)进行对话,看看我们是否允许他人像许多定量研究者所做的那样来分析和解释我们自己研究的资料数据,或者对其他定性研究者这么做视而不见,从而事实上纵容、推动了方法崇拜。毕竟博士论文需要经历研究设计、完成研究、发表研究成果的全部过程,如果别人代替他(她)做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作,那么这个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到底完成了什么呢?

方法崇拜

我使用方法崇拜——方法(method)与偶像崇拜(idolatry)的结合——来形容过分注重选择与维护研究方法而不顾所讲述故事之真正内容的取向。方法崇拜是对方法的顶礼膜拜,对方法过于奴性地喜爱与忠诚,常常出现在教育和人力服务研究领域的话语中。方法崇拜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提供一些并不符合自己需要的被调查者的回答,因为他们只要用他们所学的统计方法来做统计就行了(这不同于相关的伦理问题)。另一个例子就是某毕业论文中出现 30 多个或更多 t 检验,当然,态度很真诚,但这些 t 检验不关乎任何具体问题,而且没有什么思考。我一生中见过不少人沉醉于效度、信度及概括性三要素之中。人总是很容易受方法的诱惑而陷入其中,一旦如此,经验和知识就会分家。方法崇拜提供另一种途径使研究者不能正确理解课题调查对象的真实经历。在课题最后的写作阶段,定性研究者明智的做法是避免过分关注方法。换言之,研究者应该直接关注所发现的结果。定性研究依赖真实可信的描述资料,因此研究者引导读者去理解所研究内容的意义。

用经典的术语来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发现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与模式能使叙述详尽完备。斯普拉德利(Spradley,1980)建议要寻找文化主题或领域。邓津(Denzin,1989)遵循胡塞尔(Husserl)早期的加括号(bracketing)概念,即对现象严肃地审视,并建议遵循以下的步骤:

1. 把直接讲述所研究现象的关键术语与论述置于个人经历或个人故事之中。
2. 以资深读者的角度诠释这些术语的意义。
3. 可能的话,要获得参与者对这些发现的诠释。
4. 审视那些揭示所研究现象之本质、特征的意义。
5. 根据第 4 步所确认的现象的本质特征提供适合的陈述或定义。

在加括号过程中,研究者可以以各种形式来处理资料,然后研究者可以将资料分类、分组、整合以解释资料。研究者可使用比较分析法来寻找在研究不同时

间阶段出现的有关行为的陈述与文献索引。而且,加括号有利于研究者发现张力和冲突(tension and conflict)以及不适合的因素。完全进入研究背景以后,研究者需要时间来分析和思考研究资料。通过留出足够的时间仔细地检阅资料,研究者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生活故事中的意义。我发现穆斯塔基斯(Moustakis,1990)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方法,他提出了在五个阶段都可以使用归纳分析。首先,沉浸到研究背景之中是归纳分析的开始;第二阶段是孵化过程,研究者思考、意识到研究背景中的细微差别与意义,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取得了解;第三阶段是解释阶段,研究者加强了对所研究对象的认识;第四阶段是明确表述阶段,包括对捕捉研究中的个体经历的描述与解释;最后是创造性的综合阶段,研究者可以整体地综合被研究个体的故事,包括其生活经历的意义。这些阶段类似于舞蹈设计师在舞台上的准备、探索和解释阶段。

这些严谨的分析方法的目的当然还是描述和解释有关被调查者的生活经历与意义的本质特征。舞者诠释舞蹈,舞蹈设计师设计舞蹈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巴顿(Patton,1990)认为描述与诠释之间必须保持平衡。邓津(Denzin,1989)进一步指出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就可能造成过分的诠释。如果研究者意欲提供强有力的叙述,那么没完没了的描写是没有用的,分析和诠释能有效地保持描述的平衡。当然,没有固定的方式来保持这种平衡。许多刚开始做研究的学生问我“我必须做多少次访谈呢”或“我必须花多长时间观察呢”或“我应该看多少文献呢”,这些都是正当的问题,但都是心理测试方面的问题,诸如多长时间、多少数量,等等。定性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开始用一种诠释性、有意义的言语来重新组织这些问题,就像舞者、舞蹈设计师或任何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例如,可以不问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做多少访谈”,相反,研究者完全可以像舞蹈设计师一样这样来问“就我的研究目的及我所探讨的问题而言,以什么形式访谈以及和什么对象访谈会更明智”,这样问得到的答案会更有意义。我一直很奇怪一些同行在定性研究中只会问那么幼稚的问题“有多少……”,“控制群体在哪里”,而不是像真正的定性研究者那样思考,问一些实际的、有意义的问题。我坚信如果将定性研究者分为好、中、差三等与把舞蹈设计师分上、中、下三类的标准应是同样的,即提出有意义、有条理的问题或论点的基本能力。

用晶体化(crystallization)替代研究中的三角测量(trianglation)

如果你回顾一下定性研究方法与设计领域的文献资料,你就会发现历史上出现了周期性的、对作为研究设计过程之重要部分的三角测量的反复讨论。20 世纪 70 年代,邓津(Denzin,1978)指出四种三角测量的基本类型:

1. 资料的三角测量:在研究中使用多种数据资料。
2. 调查者的三角测量:使用几个不同的研究者或评估者。
3. 理论的三角测量:从多重理论视角解释同一套资料。

4. 方法的三角测量: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同一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我首先提出跨学科三角测量(interdisciplinary triangulation)(Janesick, 1994a)。现在快要进入新千年了,我基本同意里查德森(Richardson, 1994)的观点。他认为晶体化是检视定性研究设计及其要素的更好的视角。里查德森解释了作为后现代课题一部分的晶体化概念。晶体化认为任何研究社会领域的理论方法都有多个侧面,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也就是,晶体的形象取代了土地测量员和三角形的形象,从平面几何转换为新的物理结构。晶体"使匀称和无数形态各异的实体、物质、变质、多维和恰当的角度结合起来。晶体成长、转换、变化,但不是无规则的"(Richardson, 1994, p. 522)。举例来说,当我们看一个晶体时,我们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怎样看,是否举起来对着光看。里查德森认为,"晶体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复杂、完全局部性的对主题的理解。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对我们的所知持怀疑态度"(p. 522)。

我认为晶体化整合了其他学科,如艺术、社会学、历史学、舞蹈、建筑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丰富了我们的研究程序,加深了我们对方法和内容的理解。例如,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几乎完全依赖于文献与访谈。经常有关于方法的讨论,但这是和内容相关联的。仅就这一点,我们都可以从历史学家那里学到很多。再以艺术和舞台设计为例,只要了解了舞蹈设计师对节奏、速度、空间的利用、动作等的用心就可以拓宽我们对研究课题的视野。我们常常在自己的世界里悠然自得,而当我们解读歌德时,有时最明显的东西也难以发现,因为它就在我们眼前。因此,我建议用晶体化概念来将不同学科整合到多层面的定性研究之中。

我要求我所有的学生在去实地做毕业论文研究之前将日志写作(包含他们对研究过程的反思)和前期准备工作结合起来。日志写作是一种非常严谨的记录工具(Janesick, 1998b, 1999)。在研究中实习的学生也像研究者和参与者一样写日志,他们在课题中的地位是合作研究者。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也可利用互动的日志。这些借鉴自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技术对于帮助人们专注于手头的课题极其有用;它们也被用作描述研究者角色的有效工具。如果认为写日志不是一个有用的方法,那么研究中各成员之间的书信、小论文及其他书面材料也可以为进一步了解研究课题提供有用的资料。我喜欢将这些活动视为跨学科性的。在课堂教学中,我也使用另一些艺术的方式,如拼图、俳句(一种日本诗,只有 17 个音节)及其他诗歌形式,帮助未来的研究者在艺术的框架下思维,帮助他们"伸展"这部分的大脑。我要求学生绞尽脑汁把他们在研究课题中的工作情况用俳句写出来。下面是我的著作《定性研究者的伸展练习》(*Stretching Exercis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1998c)中的两首俳句诗;前一首是我写的,后一首是高文斯(Judith Gouwens)的作品。

坦对事无成
悄然淡去归无语
回首识真谛

鉴往事历历
须细听言外之意
件件感人事

这就是我所指的伸展练习,至少,对我而言,这样的活动是和晶体化理念相吻合的。

信度问题

定性研究文献包含了许多有关信度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Eisner, 1991; Lincoln & Guba, 1985; Patton, 1990)。定性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耐心地回答一些从心理测量学角度提出的问题。通常向定性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从心理测量学角度,围绕效度、信度和概括性三要素展开,好像没有从其他语言角度提问的。

用定性指标替代效度、概括性与信度

许多定性研究者一直努力地使我们研究所用的方法更具有适切性。因而,定性研究者自己形成了一套看待描述效度和个案研究之独特性的正确方法,而不是照搬定量研究范式的术语。我是根据经验和文献资料来解释这一点的。对个人、地点和事件的描述构成定性研究的基石。我相信将来的定性研究中这个基石仍然不变,因为这是定性研究者存在的理由。沃尔科特(Wolcott,1990a, 1995)指出,最近效度这个词变得太让人费解了,因为它原本在某个很具体的领域使用,现在却被用于别的领域。效度在定量研究领域有一套微观的、技术上的界定,大多数读者熟悉这些定义。而定性研究中的效度要处理的是描述与解释,以及解释是否符合描述的问题。换句话,就是解释是否令人信服的问题。而且,定性研究者并不认为解释事件只有一种方法,没有哪种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及其他一些学者建议,定性研究者可以通过成员考察(member check)和资料审核来反复检验某研究。规则之一就是在叙述写作时,定性研究者必须决定采取何种成员考察形式。参与者常常在研究结束后就离开了或者他们不想参与成员考察,因此研究者需要找到一种途径使参与者以某种方法审核资料。多年以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通过让局外人阅读他们的实地记录和访谈录音来形成一种成员考察(Janesick, 1998b)。这种方式很好,因为教育研究总是公共的,向公众公开的,很多情况下是政府资助的。然而,成员考察法令人不解的是其心理测量学假设,即在研究中坚持定量研究三要素:效度、概括性、信度。我想是质疑这三要素以及心理测量学语言应用的时候了,是用更精确的语言来替代它以表达定性研究的复杂性与条理性的时候了。弗里克(Flick,1998),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以及简西克(Janesick,1994a)、沃尔科特(Wolcott,1995)等人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这一领域的重新概念化提供了启发性的工具。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反复使用那些在另一个范式下更能正确应用的术语。

沃尔科特(Wolcott,1990a, 1995)对效度的弃取提出了引发争议的见解。他指

出可以通过非唯一"正确"解释的个案来理解效度问题的荒谬。舞者与舞蹈设计者深谙此理。举例来讲,在有固定动作与姿势的米奴哀小步舞中,即使两人跳的是同一支舞,舞者A的手臂动作可能与舞者B的手臂动作大不相同(Donmoyer,1990)。也有类似观点,他更强烈地反对那些研究个人及其生活意义的教育及人力服务研究领域的定性研究者们关于概括性的传统观点,他认为以传统的思维考虑概括性是不合适的,但也不完全抛弃概括性。例如官员与政策制定者似乎青睐关于特定社会状况的大型数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人花时间向他们提供更合理、可行的替代性相关资料。事实上,学术界通常对此保持缄默。现在是学术界表明观点并给官员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选择方案,以供其理解所研究的社会背景的时候了吗? 对于官员的需要而言,概括性这个旧观念,即使作为权宜之计,似乎更有用。另一方面,就我们这些对个案(在教育和人力服务以及艺术和人文领域的研究)的意义与诠释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言,对概括性的传统思维成为了缺陷,事实上还可能对个体产生严重的伤害。传统的概括性观点限制了人们重新定义社会科学在教育和人力服务研究中的角色地位的能力,而且,个案研究在人类学、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一直有坚实的地位和优势。个案研究的价值其实就是其独特性,因而,传统意义上可重复的信度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我希望我们不要继续讨论这个心理测量学的三要素问题而应讨论那些经过细致研究得出的有力论断,揭示个人生活事件意义的长期的缜密的研究。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已经丢失了研究的人文与情感因素。沉浸到研究中需要的激情之中:对人的激情,对交流的激情,对理解人的激情。这就是定性研究的贡献,它只会对教育和人力服务研究产生有利的影响。在另一范式下,人通常被排除在研究程式之外,更有甚者,人常常能够以某个定义模糊的集合体的形式放在一起,似乎他们不是有独特性的人。在定性研究中,个人不仅仅被嵌入(inserted into)研究中,而且还是研究的脊梁。我们可以用舞蹈和舞蹈设计来对比这一点。人们确实难以找到一个舞蹈演员或舞蹈设计师既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激情,也不重视作为舞蹈重要部分的个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放任心理测量学主宰我们的研究,因而形成了将个人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局面。因为我们使社会事件、教育和人力服务这些最具个人特性的领域失去了个性,我们的研究陷入了迷途。现在是重新探讨个性和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了解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故事,就像舞蹈设计师设计舞蹈一样。

意义与舞台设计:重谈米奴哀小步舞与即兴表演

> 我们有过迷失意义的经历。
> 而对意义的追求又恢复了经历,
> 以一种不同的形式。
>
> T. S. 艾略特

整个舞蹈史的特征是传统芭蕾舞与现代和后现代舞蹈形式的巨大分化，难道这不令人惊诧吗？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所有的艺术与科学都有其传统，那么理解它们的第一步就是理解它们的过去。舞蹈与舞台设计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和过去联系起来。舞蹈与舞台设计源于社会的一角，即国王与王后的宫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组织化而逐渐分化为种族、民族、阶级，舞蹈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它的语汇、步法、动作不再只代表国王与王后，而是也包含了以民间舞形式出现的普通人民的舞蹈。舞蹈因而开始分化。

分化的舞蹈形式之一民间舞源自古代原始集体舞并留存了下来。另一种来自社会的统治阶级、宫廷和社会权力中心。芭蕾舞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宫廷的官方话语，成为特定阶级和地位象征的宫廷舞蹈。直到 20 世纪，芭蕾舞的统治地位才受到一位意志坚定的柔弱女子格莱厄姆的挑战。今天的舞蹈界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要归功于一些舞蹈设计师，如坎宁安。关于舞蹈，坎宁安发表了以下这些有基本意义的观点(Banes, 1980, p.6)：

1. 任何动作都可以成为舞蹈的材料。
2. 任何程式都可能有效。
3. 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用于舞蹈，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4. 音乐、服装、灯光和舞蹈都有各自独立的逻辑与特性。
5. 群体中任何舞者都可以成为独舞者。
6. 任何空间都可用于舞蹈。
7. 舞蹈可能与任何事物有关，但它基本上主要是有关人类身体及其动作的，以步行开始。

坎宁安的舞蹈让空间不再有中心(decentralize)，将时间延伸开来。他们去掉了那些熟悉简单的形式，显得不可预测；他们有时甚至不按照计划进行；她还使用随机法，如抛硬币[巴内斯(Banes,1980)指出，虽然这种方法是任意的，但舞者的动作取决于这种偶然性事件]。偶然性颠覆了习惯并允许新的结合与诠释。坎宁安真的使“激进”这个词(radical，由“根”的词义衍申为：返回根本)变得鲜活起来。在对动作意义的探索中，坎宁安恪守了连续性和自然逻辑，同时还保持了讲故事的愿望。我发现，将定性研究设计比喻为舞蹈，对我而言其意义在于，舞蹈的内容是人所熟知的行走、奔跑或身体的任何动作。在寻求以一种情境的、个人的、有激情的方式描述、解释和理解我们所熟悉的事件时，定性研究者的工作类似于舞者或舞蹈设计师。

小结、结束语及未来的方向

定性研究者的研究可被视为类似于舞者的三个舞台阶段——热身、练习与沉静下来，或者类似于舞台设计的三个阶段——准备、探索与表现/形成。定性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中间和结尾的不同阶段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

设计有一种弹性特征,就像舞者的腰——正如舞蹈反映、适应生活,定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所面对、处理的社会现实的不同而不断被修改、变化或重新设计。定性研究者注重描述与解释,所有的定性研究设计最终都与这两者相联系。定性研究设计是一个考察与平衡的系统,包含了在不同时间、同一背景下对个体生活之意义的了解和诠释。通过在某一背景下呆一定的时间,研究者有机会利用晶体化,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检视所研究的工作,以加深对所研究的工作的理解。这就有可能用多种方法解构问题,选择多种研究方案,将话语延伸到多个研究领域。这和定量研究方法刚好相反,定量研究依赖于一种思维,依赖于心理测量,它更青睐那些或多或少地离开了社会现实的大型数据。定性研究者不喜欢方法崇拜而喜欢为了理解意义而去了解参与者活生生的生活经历。最后,舞蹈设计师通过创造一种舞蹈来陈述一种观点,定性研究者与之也有相似之处。对于定性研究者而言,所讲的故事就像舞蹈,都有复杂性、情景、原创性和激情。而且,研究者就像舞者一样,总是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研究者也像舞蹈设计师一样,自始至终都是研究的睿智的批评家。不管舞者是在表演米奴哀小步舞或即兴舞蹈,她都是在做一种诠释,同理,定性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诠释行为。

未来的方向

我对定性研究领域及其具体研究设计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看看目前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文献,你只可能乐观。下面是我持此观点的原因。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旧的界限、声音和权力结构不断地被质疑。事实上,心理测量学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心理测量在研究中的作用受到质疑。让我们来看一下教育研究的实例,许多教育批评家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教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公众、国会议员、公司经理、以及在野领袖常常指出,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学校确实没有五十年前那么好了。事实上,教育研究者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常被认为是无关痛痒的,因为他们很少研究老师、学生以及学校的有关工作。后现代主义者[或者不管我们怎样称呼的后一波(the next wave)的批评家]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问题的核心,即个人的生活以及其在组织中的应用。我们应该感谢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2. 由于国会敌对的政治环境,多年来自里根政府到布什—奎利(Reagan-Bush-Quayle)政府一直削减教育及教育研究的经费,研究者们可以获得的课题研究资助减少了,因而研究者们将不得不转而依赖历史和文献方法来做研究,不得不去图书馆或其他信息库找资料。我发现艺术和人文研究者一般转而利用这些方法,如此一来,研究者们将被迫查询历史文献,而不是以大资金项目进行协作研究,他们不得不以个人的形式去档案馆、图书馆及其他资料库。

3. 随着公司赞助者介入商业艺术,如大型公共场所的绘画、舞会、音乐、演奏会等,研究者们可能有机会说服公司赞助研究者用口述史、生活史,及其他叙述技术来记录社会成员的生活经历。例如,迪斯尼公司资助泰默尔(Julie Taymor)

创作、导演了极具原创性、想象力的百老汇的成功之作——《狮子王》。迪斯尼公司从未干预该创作,因为它高度信任这个优秀的艺术家。我认为这有利于我们拓展思维,考虑在未来定性研究者如何与公司合作。

4. 基金组织也可能有兴趣与定性研究者合作。实际上基金组织有可能支持精心设计的、长期性的个案研究,福特基金就曾资助兰菲尔(Lamphere,1992)进行了有关国际移民的个案研究,还资助兰菲尔、斯泰皮克和格伦尼尔(Lamphere, Stepick & Grenier,1994)做关于美国经济重构的研究。这是一个积极的、重要的信号,它向我们展示了基金组织怎样和定性研究者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以便记录工作场合的新手的叙述。

5. 随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重新重视以及对特定社区的重新认识的呼声出现,定性研究者可能发现对研究特定社区关键人物过去经历的文献的需要越来越大,这种研究是长期性的、精心设计的。花点时间在图书馆就会发现支持社区研究的许多资金来源,例如民间组织与基金会等。每个学期,我都被要求去和社区工作者谈话(他们愿意在社区中做口述史研究),我也会去寻求相关资料以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范例。

6. 培养写作的艺术,并因而回归交流,这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工作的核心——写日志,写书信,写合理的电子邮件。事实上,我教我的学生在他们最后的研究报告中要包括课题中参与者所写的书面资料,形式越多越好。这些资料通常包括书信、短文、日志等。毕竟,到最后,这些书面陈述成了真正永久的反叛。舞蹈设计师、别的艺术家和定性研究者也都成为这种永久反叛的一部分。

7. 我认为研究者需要发展他们的想象力,当进行定性研究设计时,他们需要利用这种想象力。长期以来,研究一直是为了少数人的(至少在教育领域是这样),研究一旦被发表就马上被遗忘(只有少数例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的研究报告缺乏激情与想象力,很多时候缺乏智慧。现在是重新点燃研究者想象力的时候了。我预言那些在工作中能利用想象力的研究者将会成为塑造未来研究课题的一支重要力量。



Banes, S. (1980). *Terpsichore in sneakers: Post-modern d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lom, L. A., & Chaplin, L. (1988). *The moment of movement: Dance improvisation*.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Creswell, J. W.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Freese, B. (1996). *A case study of an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wey, J. (1958).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Capricor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Donmoyer, R. (1990). Generalizability and the single-case study. In E. W. Eisner &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pp. 175-200).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Eisner, E. (1991). *The enlightened eye: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New York: Macmillan.

Fetterman, 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Newbury Park, CA: Sage.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oetz, J. P., & LeCompte, M. D. (1984).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ouwens, J. A. (1995). *Leadership for school change: An interview observation study of two Chicago elementary principa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Humphrey, D. (1987). *The art of making dances*. Penington, NJ: Princeton Book.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Janesick, V. J. (1982). Of snakes and circles: Making sense of classroom group processes through a case study. *Curriculum Inquiry*, 12, 161-185.

Janesick, V. J. (1994a). The dan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Metaphor, methodolatry, and meaning.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09-219). Thousand Oaks, CA: Sage.

Janesick, V. J. (1994b). *Of heart windows and utopias: A case study of deaf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For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Janesick, V. J. (1998a). The dan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Metaphor, methodolatry, and meaning.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Janesick, V. J. (1998b). *Journal writing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 History, issues, and ref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Janesick, V. J. (1998c). *Stretching exercis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Janesick, V. J. (1999). A journal about journal writing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 *Qualitative Inquiry*, 5(4).

Lamphere, L. (Ed.). (1992). *Structuring diversit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immig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phere, L., Stepick, A., & Grenier, G. (1994). *Newcomers in the workplace: Immigrant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U. S. econom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eCompte, M. D., Millroy, W. L., & Preissle, J. (Eds.). (1992).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rshall, C., & Rossman, G. (1995).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xwell, J. A. (1996).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ustakis, C. (1990). *Heuristic research design,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Williams-Boyd, P. (1996). *A case study of a full service school: A transformational dialectic of empower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tarianis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Wolcott, H. F. (1990a). On seeking and reject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 W. Eisner &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pp. 121-152).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Wolcott, H. F. (1990b).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cott, H. 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末言说的故事：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①] 14

AN UNTOLD STORY? DO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 朱莉安娜·奇克

没有讲出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作品对如何“做”受资助的研究进行论述。虽然这些资料并不是专门为定性研究写的，里面的很多内容对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都有指导价值。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讨论往往是从做研究过程的中间阶段，而不是从开始阶段开始。例如，总是把弄清楚谁接近资助，并且怎么做到这些，和知道如何准备研究计划书或填写申请指导方针一样重要。而且想当然地认为，研究者本能地知道怎么去识别和接近潜在的资助者。相应的，绝大多数对申请资助的讨论在计划书被准备好并提交后就结束了，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研究过程从那时起就是一帆风顺了似的——从我的经验来看，当然并非如此。对分配资助过程的洞察，以及对研究者和这个过程互动，并从中学习的方式的洞察，都不为传统的关于受资助项目研究的文献所关注。被忽视并需要讨论的事情包括：在接受资助之前，研究者需要考虑的事情是什么？接受资助是否以任何方式影响定性研究过程？在研究资助的甄选过程与实际研究本身的各个方面有什么伦理问题？在对定性研究实际实施资助的时候，研究者还会面对什么问题？

因而，对很多可能的研究者来说，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仍然不是太明朗。简而言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故事”（“主要优势”，1996）。因此，下面我将试图让读者知道的是“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这一很少被讲的故事的一些问题。在此，我不提供如何写研究计划书的各个部分的详细信息，也不谈论详细的研究取向和方法，我更愿意呈现那些虽然对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来说是极其重

---

① 我对来自林肯、邓津、奥斯汀（Ann Austin）和蒂尔尼对本章的草稿给予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表示感谢。他们的评价使我的讨论更严密。特别感谢林肯帮助我克服了困境，我在创造一个关于做资助的定性研究的实践性文本的同时，还试图去考察研究的微妙的商品化现象。她建议采用拉舍（Patti Lather）的概念，对每个方面采用不同写作方法，帮助我满足读者们不一致的要求。我也希望本章满足了读者的要求。

要,但未得到注意的关于"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一些方面的详细讨论。我力图集中讨论我认为对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特别重要的问题。

因而,我写本章的目标是讲述出于某种原因一直没有讲述的故事。我并不宣称我讲出了完整的故事,或者我讲的是唯一的可能性——相反,这是我的故事,是从我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和著作中得到的。这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故事。我希望读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们对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思考,以及"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收获,来对这个故事进行完善。

为本章设立基准:关于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概念

受资助的研究,尤其是受资助的定性研究构成了将要进行的讨论焦点。受资助的研究,是在财政支持下进行的研究,有各种具体的形式。研究者可以把得到的一笔资金直接用来支付工资、设备、差旅费,或其他在进行研究过程发生的费用。有些时候,对项目的支持是"非现金"的,资助人可能选择给研究者提供接触专家群体的条件或提供设备,以此作为支持研究的一种方式。这种类型的支持可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这样的支持让研究者可以得到其他方式难以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是他承担研究必不可少的。因而,当我们谈到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不仅仅是在说钱的问题。

对定性研究支持的各种形式对研究者和研究项目都有各自独特的要求。特别是项目设计研究者的自由程度和研究"成果"的形式都取决于获得支持的类型。例如,当一个研究者开创一个项目,他或者她在开发研究目标和对象方面,以及在研究的总的方向上是自由的。然而,在从事有较大研究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研究时,比如评估项目,研究者就不能够随意设定所承担项目的目标和方向。

很显然,从这些介绍性的讨论可以知道,可能有许多的方法使定性研究获得资助,而且受资助的研究可以为很多目的服务。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不应被简化为一个意义单一的同质性类别。定性方法在研究方面有多样性,受资助的定性项目也是如此。因此,不可能给希望承担受资助的定性研究项目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遵循的"处方"。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会探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研究者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时候会遇到,要么是他们在思考关于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概念的时候会遇到。当然,下面的一些内容并不必然仅仅对定性方法有用,而是可以对所有的研究都有用,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

在我确立本章的基准并对受资助定性研究的概念进行明确之后,下一部分将探讨定性研究吸引基金的技巧。在这些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讨论中,我会讲到研究者如何能识别基金团体并与之建立关系,接触潜在的资助人,对有要求的基金撰写计划书,以及探索如何通过申请,包括跨越初次申请的失败吸引基金资助。然后我将讨论研究者在承担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我的论述的绝大部分来自我正在做的或者希望做的受资助的定性研究,曾经遇到并

不得不为之斗争的问题。因而,这些论述是扎根于做这些研究的现实之中。需要探讨的问题围绕基金如何能影响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方面,这属于对研究控制的问题,以及基金可能对研究涉及的多方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些论述之后,我转向(Lather,1996)讨论研究"市场"的概念,以及是否受资助的定性研究比非资助的定性研究有优越之处的潜在可能。在这些探讨里面,我力图致力于定性的受资助研究这个概念——而不是在受资助研究和非资助研究之间建立争论,但更鼓励读者去思考他们自己对受资助研究的假设,以及将这些假设如何嵌入于他们关于研究和研究"成果"的属性的众多"想当然"中。在结尾部分,本章纵横的线索汇集到了一起。本章结束的时刻又回到了起点的问题——力劝读者深入思考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各个方面,不是仅仅思考"怎么做",而是思考关于研究成果如何"使用"这样的问题。

最后,为了设定需要遵守的准则,我希望陈述我写本章所基于的一些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立场提供了"情境文本(con-text)",即与所进行的讨论"'共同存在'的文本"(Halliday & Hasan,1989,p. 11)。我在本章所写的所有分析必须与其他事物一样,在关于其广阔的发展过程中予以考虑。这样的分析必须处于本章的情境之中,反映文本与文本主体共存。换句话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文本构成了在本章发生的讨论。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我识别出了一些我意识到影响了你现在所读文本的情境文本。首先,我是基于对定性研究方法的个人的忠实立场写本章的。其次,写作时,我认识到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实际上对研究者在项目类型、项目范围方面以及仅仅是做像其他许多人力时间集中的定性研究所需的能力方面都可以给予难能可贵的机会。

而且,同样的,我还是作为一个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项目中发现一些缺陷的人而写本章的。这些缺陷的绝大部分不可预测,这迫使我去面对一些关于研究是用来做什么的,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对基金的要求做出让步这样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同时,从另外一个立场看,我写作本章也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即与以获得研究经费的总量来衡量学术成果的要求斗争。我还作为一个曾经面对基金和项目哪一个更重要这一两难问题的人而写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带着试图避免建立任何形式争论的意图来写下面的部分。

因而,我并不是争论或反对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而是探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对研究者和研究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为研究者提供实践性的细节的同时,也鼓励读者在仔细思考操作的任何时点的共同文本,包括他们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时候。任何文本都嵌入于它所做的假设中,即关于问题的实际所在,以及向阅读该文本的读者传递的某种观点,这是潜文本(subtext)或"隐藏文本(hidden script)"(Sachs,1996,p. 633)。换个说法,潜文本是"每一文本所做的、认为它能够被理解的假设"(Agger,1991,p. 112)。本章嵌入了一个批判性的潜文本,该潜文本力图挑战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中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方面。本章与其被看做反对或支持受资助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研究,不如被当作对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持特定观点的文本来读。这取决于读者们在对待这些观

点方面所持有的立场。

开始:把研究想法转化为对资助的申请

当研究者试图为研究计划寻求资助或者处于对各种研究项目提供的合同和招标状态时,他或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识别潜在的资助资源。扎古利(Zagury,1997)明确了六种潜在的资助来源:当地社区基金、特殊目标基金会、家庭赞助基金会、国家基金会、政府拨款、企业基金或者企业资助。国家之间在资助的类型和模式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在不同国家,上述资助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然,尽管不考虑在各个国家或国家的不同区域(在许多国家存在地域差异)的资助来源的实际组合,研究者"做他们的准备工作"以发现潜在资助来源是非常必要的。

研究者可以从获得潜在资助人的名单开始。例如,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刊物叫澳大利亚拨款登记(*The Australian Grants Register*),它的作者宣称它是"给任何准备得到澳大利亚拨款方面信息的人准备的,能使人进一步更好地进行申请准备"而编辑的(Summers,1998,p. vii)。这对那些开始探察资助来源的人探询他们所处的场景中有哪些类型的拨款登记很有用处。看报纸上的广告,尤其在合同/投标部分,像工作在大学环境中的人,能够获得大学研究办公室的邮址列表一样,是识别潜在资助来源的另一种办法。获得那些既不刊登广告,也不出现在任何拨款目录上的潜在资助来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是和那些研究领域和目标相似的、已经获得了资助的人交谈。我发现,总地来说,人们非常愿意分享他们的经验。通常,他们可以向你提供可能对正在考虑之中的研究感兴趣的联系人的名字。

一旦认定了潜在的资助来源,真正的工作开始了。对研究者来说,获得尽可能多的潜在支持来源的基金机构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做到这些的一个方法是获得机构的资助指导和/或年度报告。这些文件和其他一起,为你提供了机构乐于资助什么类型的项目,及可以给项目的资助额度等方面的整体信息。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评价想做的研究看起来是否与资助人兴趣和优先考虑接近。

研究者从机构获得了这些文件之后,如果有对此项研究有兴趣的潜在资助人,研究者应该马上直接和机构联系来讨论自己的想法。具体如何来做取决于赞助人的类型。例如,如果资助人每年一次接受计划书,研究者要和处理这些申请的办公室紧密联系,以便获得处理过程的信息,并向那些可能管理申请的人介绍研究和研究者。和机构代表交谈,能够使研究者对机构资助分配的实践和程序方面有深入了解。而且,研究者有可能获知过去进行资助的更多信息。机构可能会提供资助过的项目的完整的研究和/或者计划书方面的报告。这些文件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有价值,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明确计划书的格式和范围,帮助研究者用适合目标资助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进一步,它们能让

研究者以该领域已经完成的工作为参照,更好地定位自己的建议研究。参照已经做过的研究来定位自己的研究非常关键,这能让研究者更好地回答来自资助人的问题,例如:这个研究能做吗? 有必要吗? 结果是不是要发表? 什么是研究者的专长? 别人怎么看(Zagury,1997)? 因而,研究者和潜在资助机构的个人联系很关键,因为这能提供别处不可获得的洞察和建议。

下一步,根据机构的政策,机构代表也许会让研究者和机构的资助决策委员会成员联系。这样的接触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当委员会对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很习惯的时候。像利兹和里西(Lidz & Ricci,1990)指出的,审查者和资助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有"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研究的文化上的预设观念"(p. 114)。如果特定的拨款委员会对资助的定性研究反感,研究者就有必要到其他地方寻找潜在资助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进行争论以求得变化;改变小组的人员构成以使小组对所有类型的研究都欣赏,是有可能的。我最近正是因为这个目的而被邀请加入一个拨款小组。我发现,小组的其他成员,虽然不是非常反对定性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知识背景,对判断定性的计划书的优点没有专长。作为成员,我的工作是提供这个结果。

我上面讨论的内容对研究者接触没有要求计划书的资助机构一样适用,这类机构倾向于资助一些特别的研究。一个不同之处是,研究者在资助组织里面找不到明显的直接可以联系的人。对研究者来说,在组织里的恰当部门找到恰当的人,来谈论想要做的研究和资助的可能性,非常重要。由此,研究者对组织变得熟悉,而组织成员也会了解研究者。对任何资助机构来说,一个问题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在机构给了资金的情况下,是否能信任特定的研究者可以成功地完成一个有价值的项目。

在和机构代表交谈时,研究者应该从资助人的角度出发,清楚、简洁地把可研究性和产生有价值的收益和结果的想法陈述出来。研究者在和组织的代表个人接触之前,应该考虑首先通过邮寄或面呈的途径提交一个概念文章。这个概念文章可以包括任何已经做的工作和已经收集的数据。这可以让研究者完成博格丹和拜克伦(Bogdan & Biklen,1998)所指出的和资助人第一次接触的要点:"1. 你已经做了什么? 2. 在你初步研究中,出现了什么主题、关注点或话题? 你追求什么分析性的问题?"(p. 70)

伴随概念文章的应该是研究者研究记录的陈述。对研究者来说,表明基于自己的经验,他或者她非常有可能按时,并在预算范围内完成项目是很重要的。不仅对推销研究思路很重要,而且对推销研究者同样重要。例如,和某位在某一特定组织工作的研究者合作的优势,可能对资助人很有吸引力。扎古利(Zagury,1997)为在这种情景中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反思问题:"什么素质使我们的组织所做的工作成为最好的?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客户/病人/顾客提供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东西吗? 是什么? 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优势何在? 有什么特别的、明显的、唯一的能力使资助来源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得到的吗?"(p. 26)。

许多研究者面对一个处于一种“第 22 条军规”境地的问题,研究者需要出示研究记录以提高获得资助的可能,但却不能得到资助以建立研究记录。克服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是加入已经建立了研究记录,并在相关的近似研究领域做研究的团队。这给研究者带来与集体出现的研究专家建立联系的优势。这是个人学习研究过程的可靠途径,而且能带来同事间长久关系的形成。研究者建立研究记录的另一种策略是从工作单位获取种子基金,这不像大的资助那样竞争激烈,而且主要面向更没有经验的研究者。这类种子基金,虽然金额不大,但足以让研究者开始小的研究项目,让其成果得以发表,并为其他研究建立基础。

现在,显然应该明白,获得资助并非是一个快的或者容易的过程。需要花时间进行计划,并和资助来源机构建立研究的信任与和谐。这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最重要的——勇气。必然会存在失败,个人不承受失败的话就不会有成功。不过,从我的经验来看,坚持定有收获。

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研究者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像我前面曾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的教科书,把在计划书中讨论如何获得资助作为书的开始。我相信,这根本不是开始。我刚才讨论过的策略——研究者必须明确,他或者她可以往哪个特定的资助机构写计划书——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开始。

下一步:精心写作计划书

找到潜在的资助人之后,研究者必须做下一步——精心写好计划书来求得对研究的资助。我在此处故意用“精心写作”一词,因为计划书的写作是一门手艺,需要一系列独特的技巧,其中绝大部分要从实践中学习。写计划书涉及提炼和修正研究想法,以适应目标资助机构提供的指南和申请过程的要求。不同的申请,哪怕是同一个计划书,因为联系的资助人的特性和要求不同,也会有所差异。根据潜在的赞助人的考虑写计划书,就是要为对计划书的语言形式有所假设和期望的特定听众而写。因而,像我前面强调过的,对研究者来说,知道听众和他们的期望非常重要。

写计划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的过程。研究者需要考虑研究和研究的可能成果要“适合”资助团体的议程。提供资助的人询问申请的资助项目能否尽责地、适当地使用经费,是非常合情理的。大部分资助者对待资金的分配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竞争有限资源的各个计划书的长处进行权衡。因而,研究者提交一个清晰表达关于研究目的和基本原理的计划书就是非常基本的要求。项目的成果陈述了吗?成果是重要而且有用的吗?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吗?一些资助团体的确在对某一计划书资助时只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是,整体上讲,资助人的确做出了真正的努力来资助有价值的研究计划书,绝大部分都会非常严肃地对待甄选过程的。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与你分享我自己在准备计划书方面的经验。我对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者精心写计划书时遇到的事务和问题给予特别的强调。因而下

面的内容并不是像许多研究教科书(本章的附录有三本这类书的信息)已经写的那样,是计划书的写作本身。而是强调继续揭示在受资助过程中,其他仍属没有言说的故事的方面。

所有资助机构给出的申请表格或者指南都包含着没有写出来和说出来的假设和规则——指南的潜文本。对研究者来说,研究发掘并理解这些前提,以做到使研究计划书最好地符合这些规则,非常重要。因而,研究者必须认真阅读指南和申请表格,不仅要看它说什么,还要看它没有说什么。此外,不用说也应该知道,研究者必须细心地遵循这些指导。我曾审查了很多研究资助申请,虽然我写这些显得有些奇怪,甚至像故意要卖人情,很明显,很多研究者在申请资助的时候没有遵守这些指导。例如,当对页数或字数有所限制的时候,研究者应该这样做。类似的,如果要求用非专业的语言解释什么事情,研究者也应该照办。没有人会对难以理解的语言有好印象。

也许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应该小心翼翼地遵守在研究预算和资助的使用方式方面的详细要求。在许多计划书中存在明显超出或高于拨款项目资助基准的过分表述。简单地说,研究者必须根据指南来修改计划书,而不是让指南来适应计划书。让同事阅读计划书草稿并征求批评意见是很多成功的研究者使用的确保他们计划书和指南相符合的策略。

许多写申请为定性研究寻求资助的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研究可能不适合指南所采用的语言。例如,我曾经遇到申请表格要求我写下这样的内容,例如,需要检验的假设。我的反应是用相关定性方法的术语来写,并讨论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研究中,关于假设的陈述并不合适。我指出,是由问题,而不是由假定特定研究导向的假设驱动这个研究。不过,我也注意到,许多申请指南和表格开始开发对不同研究方法更为包容的语言。例如,指南可能会问一个计划书关于"样本规模/参与者甄选"方面的讨论,而在过去这个要求只是简单的"样本规模"。

在使用术语方面仍然顽固僵化的指南,是这个资助团体根本不适合支持定性方法的良好暗示。这也说明了,研究者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可能是计划书"听众"的资助团体,以及考虑听众的可能期望是有用的。除了组织自身之外,这对计划书的特定评估人(一些可能在其他地方充当咨询角色)来说一样适用。这个计划书的审查人在期待什么?如果他们不是特别熟悉定性技术,他们是不是能够清楚目标研究实际上将会如何进行?怎么做而且为什么这么做?对研究者来说,阐述他们关心的问题非常关键,尤其是涉及效度和信度的问题。研究者必须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个过程,来考虑审核人可能会怎么看待这个计划书。这是研究者在资助机构要求提供可能接触的审核者名字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重要原则。研究者需要对这些方面像给予思考切实发展计划书时一样多的思考。

做任何研究——不管是否是定性研究——的研究者心里要有这个要点:必须形成一个清晰的问题,给研究提供动力的初始的想法必须被转变为可研究的焦点。舒特(Schutt,1996)提供了一些他认为不管研究采用什么方法都会有用的

一些标准,用来区分他所谓"普通问题和好的研究问题。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在可用的时间和资源里具有可行性,它应该具有社会的重要性,而且要具有科学的相关性"(p.35)。计划书的其余部分必须揭示这个研究问题,并且阐述会采取什么方法使研究问题得到回答。建议的研究必须被置于已经做过的研究的背景之中,必须被置于其他人在做的研究,以及和这些研究联系的情景中。研究必须在方法和实际方面进行调整,以拥有和资助人优先宣称的目标相一致的、明确的、可达到的成果的清晰方向和焦点。研究者或者研究团队的信誉也需要澄清和确立。

研究需要给出的关于研究设计、分析和数据收集的信息量,部分地取决于指南和申请表的形式。而且,也取决于计划书的读者能否从文件理解研究目的,以及为什么要做研究。信息越多并不必然意味着计划书越好。如前面所说,研究者获得关于详细程度要求的感觉的最好方法,是获得那些早期曾获得特定资助的计划书的复本。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话,研究者可以向获得过资助的人要他们的计划书复本,或者至少参与发展过程的讨论。

在研究者撰写和提交了计划书以后,他或她弄清楚相关的时间表以及决策人(委员会)后续的工作流程就非常重要。这些了解能使研究者在一系列时间内,按照期望做出某种形式反应的准备,并能通告任何必要的后续反应。

当资助决定最终做出后,一般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申请成功,研究者收到资金,并且在得到适当——例如清除伦理方面的问题——的许可以后,就尽快开始研究。另一种可能是,研究者可能被要求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东西,例如,提供关于计划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信息。这应该被解释为积极的信号,说明资助人在严肃的考虑这个提议,并感到它有些优点,但是需要对它的一些方面进行澄清。在另一情况下,决策委员会可能要求研究者和申请类似项目资助的研究者或研究群体联合。对这样的要求应仔细考虑,这对研究者很重要,因为,虽然合作有很多益处,但它需要很多善意和平等交换才能成功地工作。

这种结果的另外一种版本是,研究者被询问是否可以在一个削减的预算下完成研究,如果能的话,如何做。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时候,资助人设立了拨款的总额,如果某一计划项目在机构想要资助的名单中处于最后一个,机构只能支付一部分所要求的资金。认真思考是否接受这种资助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我相信,受资助研究在没有对必要研究活动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是不可轻易尝试的。获得任何的资助都是很有诱惑的,但是不充足的资金可能导致在实际做研究中出现各种问题。显然,获取研究资助的过程涉及准则问题,不仅是关于使用资助的智慧,还包括马上决定是否接受资助的智慧。

第三种可能的结果,由于申请拨款的竞争与日俱增,资助申请被拒绝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对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反馈。他或者她可以约见委员会主席或者信用金/基金会的代表,和他们交谈,并利用这个会谈发现尽可能多的东西。也许可以获得审核者报告的复本,它常常包含很重要的批评,这些批评能帮助研究者准备再次提交计划书。如果研究者不可能看到这些

报告,那他或她可以要求一份曾是成功项目的名单,这能使研究者弄明白研究者的想法是否符合资助者的优先考虑。如果这些都失败了,而且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反馈,研究者可以请那些曾经获得资助的研究者来审查不成功的计划书,并帮助报告刚发生的过程。透彻的谈论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他或者她下次可以进行改进的方面。

在澳大利亚,很多拨款项目的成功率是20%。由于对缩减的资助来源的无情竞争,这种低成功率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现象。这意味着,对研究者来说,得不到资助比得到资助更为可能。研究者不必把受拒绝看做是个人的错误,相反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可能因为只是没有足够的钱,而不必然反映研究者的个人价值。不过,完成研究计划书的确花费很多时间和努力,而且很难面对经常的拒绝。记住,没有任何研究者是孤独的。通过保持与他人的联系,使用本章到此所发展的策略,他们能把成功的机会最大化。

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我现在转向考虑研究者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时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一部分讨论的内容并不是研究者会遇到的所有问题,我选择这些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对受资助的定性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另外,我相信受资助的定性研究对这些问题又特别地"迷茫"。下面的讨论是围绕三组互相联系的系列问题来组织的。第一组问题需要处理研究的伦理问题,包括在考虑接受资助时要思考的基础问题。第二组问题包括谁控制研究,以及关于控制权的问题。第三组问题聚焦在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可能对研究过程中的多方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方面。

研究者"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伦理考虑

对一个研究者来说,首要的也是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伦理问题,即是否接受特定资助机构的资助。研究者必须考虑潜在的资助人、参与者、研究者之间的议程冲突。例如,在我工作的大学里,我们刚进行了是否接受来自烟草行业资助的争论,争论围绕从和健康风险有关,并且还以年轻人为目标进行有问题的促销的产业拿钱的伦理问题。而且,如果接受了资助,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在某种方面支持烟草行业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争论的结果是,大学决定,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既不寻求也不接受来自烟草行业的资助。这只是一个例子。毫无疑问,有很多例子会引发是否要从某一行业、机构,甚至政府接受资助这样的伦理问题。考虑可能包括:一个特定的产业是否涉及有问题的环境行动或健康实践,或者是否涉及可能的对第三世界劳工剥削的跨国公司。从赞助人那里拿钱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行为,它把研究者和研究与资助人的价值取向无情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需要研究者早做考虑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应该实际去做提出的研究,

研究可能获得的利益会超过研究可能导致的损害吗？有时候，在我看来伦理委员会对损害概念的解释有些狭隘。委员会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更明显的(也是很重要的)伦理问题上，例如参与者的匿名性和数据的保密性，而不是对研究结果和由结果产生的行动可能对参与者产生的广泛的潜在影响方面。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9)指出，“失去尊严，失去个人力量和自主，当发现被欺骗并客体化以后导致的失去自尊”等，是潜在损害的广泛图景的一部分。我要指出的是，这对定性研究来说尤其正确，因为它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我同意古巴和林肯的主张，认为损害“被完全狭隘地解释了……‘损害’是一个需要更多考虑的概念，而且有可能从这个扩展的定义中受益”(p.121)。

此外，关于定性和诠释性研究的品质问题，林肯(Lincoln, 1995)探讨了她所称的“显现的标准(emerging criteria)”，她认为“几乎所有的显现的标准都是关系性的，因为这些标准认同并确立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p.278)。这不仅简单地意味着在研究进行中，研究者和参与者良好的沟通，或者一旦研究者定义了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参与者就被卷入到决策中。远远不止于此。质量涉及研究的伦理，要问的最基础的问题是，和我们上面讨论的广义的损害概念来看，是否应该做这个研究。实际上，林肯(Lincoln,1995)讨论说“对诠释性社会科学质量的标准也就是伦理学的标准”(p.287)。

当他们思考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马上想到通过适当的伦理委员会或制度性的审查会议来使研究得到赞成的过程。绝大多数资助团体要求在申请的时候带上伦理方面批准的证据，作为他们批准的一个程序，或者他们把收到这个批准作为给予资助的条件。对研究者来说，知道他或者她需要获得批准的委员会非常重要，这样的委员会可能有很多。如果研究涉及特定的易受伤害的或历史上曾经被剥夺的群体，例如土著人，还需要获得处理涉及这些群体的研究的伦理委员会的进一步要求才能获得批准。不是所有的伦理委员会都认可其他委员会的批准，所以，如果一个研究，例如对医院的研究，跨越几个场所的话，可能需要几个伦理问题申请书。往往这些不同的委员会会要求研究申请符合他们特定的指南。

在本章前面描述过的关于接近资助团体的原则，在接近伦理委员会的时候一样适用。研究者必须发现尽可能多关于各审查委员会工作的程序的情况，并且应该要求查看获得接受的计划书的例子。这些能帮助研究者获得关于委员会要求的详细程度和形式方面的概念。研究者应该和曾经向该委员会申请过伦理批准的人交谈。伦理委员会和董事会通常要求关于知情同意、防止伤害和欺骗、保证参与者的隐私等方面清晰的陈述。他们的焦点一般放在数据的保密和参与者的匿名性方面(Guba & Lincoln,1989)。像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1989)指出的，这些事情通常属于合理的传统保护和处理研究中的数据和参与者的相当标准的方法。

显然，对承担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是记住他们需要确保伦理方面的批准。可是，要获得澄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伦理委员会可能一

个月只碰一次面,而且在获得批准时,可能要求研究者在下一次再提交修改过的计划书。当研究者为受资助的项目制订时间表的时候,应该把获得伦理批准可能导致的延误考虑进去。

对定性研究来说,一个有些独特的(对受资助的定性研究不必然是独特的)问题是,伦理委员会对确切的参与者是谁,如何接触他们,如果有访谈的话,他们会被问什么问题等详细问题感兴趣。在一些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也许不可能有这些明确的信息。我发现,写信给伦理委员会并解释自己如何填写他们的表格,以及为什么这样填写是有用的,对于为什么在研究实际运作之前将一些研究细节的完全概念化是不可能的解释尤其有用。陈述对参与者采取的初始方法,以及描绘在研究中关于保密等方面采用的总的原则是可能的。还要表示,如果委员会成员认为有用的话,我很乐意谈谈研究,并讨论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任何方面。我发现,绝大多数委员会都乐意倾听,并相当通情达理。当然,有时候也需要做出妥协。有一次,我得到了临时性的许可,并被要求一旦可能,就要提交详细的进展。虽然这很乏味,但我相信它不会对研究有任何形式的损害。

另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学生接触了一个极端传统的医院的医疗伦理委员会,要审核的计划书是委员会成员第一次面对这种方法的经历,因而存在着文化冲突。我们同意在要交给研究参与者的同意表格和信息表格里把"参与者"改成"病人"。我们对此深入思考,但是最后的想法是,让研究得以进行比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重要得多。反正这并没有带来重要的问题。有时,研究者会发现他们被要求用显然对他们想采用的方法有所损害的方式修改计划书,这样的话,他们必须做出我认为是最基本的伦理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是否可以继续?对这个决策的斗争常常是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另一部分没有言说的故事。

谁控制研究

在思考谁控制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相关问题。事实上,一旦研究者接受了对研究的资助,在研究的方向和成果方面,他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行动体。然而,研究者在研究实施上的自由度(例如,由于新发现导致需要改变研究方向,以及对研究的谈论与写作)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化,这取决于资助者的政策和态度。对于控制问题,研究者需要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投入细心的谈判,因为在项目开始以后再做往往就太晚了。然而,研究者往往不是不重视就是没有意识到由谁控制研究可能产生问题。从某人那里获得资助以进行研究不是中立的行动,它暗含了和资助人的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义务。研究者和资助人讨论双方关于研究的所有希望和假设是重要的。

例如,这样的一个期望涉及了关于研究什么是可以说的,以及由谁来说。换句话说,这是关于谁真正拥有研究产生的数据或发现,以及在研究中和研究完成后,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发现他们处于一种要么不能对研究进行写作,要么不能用自己想要的方式进行写作的情景。例如,我曾经做了一个受资助的研究,使用定性方法,得到了四个主要的发现,每个发现伴有一系列建

议。当我提交报告时,我发现资助机构愿意采用其中的两个。因为机构相信这些属于他们份内的事情,其他的则不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合理的,但是我关心剩余的两个是不是有被丢掉的危险。和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建议非常重要,需要按照建议实施。当资助人希望修改报告,使报告只包括他们认为和机构有关的两条发现时,我对此更为关切。很幸运的,通过保留所有发现,同时对报告结构进行调整,强调机构认为和他们有关的两条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妥协,但至少发现的所有内容都被反映到报告中了。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是有些幼稚了,没有预测到在研究的数据和结果可以或者应该放入报告,或者什么数据不可以放在报告中等方面所引起的问题。我现在更认真地谈判关于研究的发现如何报告、数据如何使用,以及我在学术文献上发表完整发现的权力的问题。

当研究的结果让资助人不快的时候,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如果结果有可能会使参与者受益,但是使赞助人不快的话,将会发生什么?谁对这些结果是否能发表具有发言权?像派拉霍(Parahoo,1991)指出的,"当然他们否决研究结果的发表的时候,控制钱包的人常常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在其他人看来,这是对权力和职责的滥用,是对公共资金的浪费"(p. 39)。当研究涉及对相对弱势的群体工作时,这个问题就尤其重要。对定性研究者来说,产生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因为大部分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和参与者发展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者发现他们处于一种由于接受资助时的合同安排而不能用任何形式发表甚至散发研究结果的境地。当合同拟定好后,研究者应该仔细检查以确保他或她在设定的条件下会觉得舒服,并可以维持生活。

这样的问题清晰地表明,研究者在决定是否从特定的资助者那里拿钱的时候,必须投入认真的思考。资助人和研究者一样,具有让研究被实施的动机。有些机构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而有些则不一定。一些资助人,尤其是在评估领域,会公然把为了"对政策和实践辩护"(Parahoo,1991)而资助研究。像古巴和林肯(Guba & Linçoln,1989)在关于评估研究的文章中所说,"评估合同常常与研究合同一样,其发布受计划书要求的影响,因此,胜出的评估者常常是那些对问题的定义、策略和方法显得'适合'客户或资助者的价值的人"(p. 124)。这也是为什么博格丹和拜克伦(Bogdan & Biklen,1998)断言"即使你做不好其他任何研究,你也可以评估或做政策研究(或者,我愿意加上,任何形式的受资助的定性研究)"(p. 209)的原因。

这些都不是为了建议定性研究者不应该寻求资助。相反,只是提醒研究者在为项目寻求资助的时候需要进行严密的自我审查。对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考虑在寻求为研究买单的人,或寻求资助的时候,他或者她保持作为研究者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研究者需要问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有人付钱的话,我会失去多少自由?我对此会有什么感受?对研究来说,资助是达到目的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资助本身一定不是目的。

关于研究控制的最后问题是,为了回报得到的资助,研究者应精确地澄清该

向资助人“提交”什么？研究者和资助人签订的合同里面要求提供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因为如果相关双方没有按照同样的方式理解的话，会有很多潜在的问题。对研究者，尤其是没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很容易低估实施项目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他们会在对资助者承诺的交付方面“过度奉献”。研究者必须认真考虑提供给资助人什么是合理的，并让资助人明白这点。时间框架应该根据每次交付而设定，让两方都意识到将会产生什么成果，以及何时可以得到这些成果。

在最后报告提交以后，一些资助人也许会要求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总结，或者在他们的论坛上陈述研究发现。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是把这些要求从研究合同中的核心提交形式中区分开来。当面对这些的确超出研究要求的要求时，我和相关的资助人进行了谈判。如果要求是在本地的会议上陈述结果，我一般都会同意。但是如果我被要求在很远的地方陈述发现，或者这个工作会涉及我的费用支出，我会再要求经费，因为这些并没有包括在这个项目接受的资助里面。如果我被要求做一个研究报告的缩减版本，以满足我没有专门做原始报告的特定群体的需要的话，我一般会同意，不过只有在资助者提供必要的编辑方面支持的前提下才做。我明确表示，我是出于表达一种良好意愿的姿态才做这些的，但是我没有做这个额外报告的时间和物力。我相信，采取这个立场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存在研究者被有意无意地剥削的潜在可能。对所有研究者来说，关键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和资助人进行开放和清楚的沟通。我发现，总地来说，和资助团体一起工作是一个享受的，并且互相满意的经历。

资助对研究中关系的影响

定性方法在研究上是以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之间诚实和开放的工作关系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在参与者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以了解他们的各个方面，学习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好的定性研究工作关系的核心是发展信任。此外，作为定性研究者，我们都要处理参与者因感到被研究所威胁，而隐藏信息，或者参与者急于取悦我们，并给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想听或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会更为复杂。

在做受资助研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要告诉参与者谁资助研究，为什么资助。成功的研究者报告了理清他们和资助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是在像资助人的雇员一样行动还是他们是独立的？对研究者和参与者能形成成功的关系同样关键的是，研究者应确保参与者的匿名性以及他们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对于那些资助者是他们的雇主，而他们又对组织持批评意见的参与者而言特别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被认出并受到雇主某种形式的“惩罚”。当在特定情景的特定群体中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保障参与者的匿名性可能非常困难。对研究者来说，非常关键的是要清楚这一点，并且和参与者讨论，谁需要知道项目中的特定信息发生的情况，谁可以接触这些信息，以及参与者保护隐私的

权力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如果参与者担心特定的资助人可以接触他们给出的信息,或者他们首先怀疑资助的动机的话,可以选择不参与研究。

而且,如果对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有关于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任何限制的话,这一点让潜在参与者知道是很重要的。对参与者反馈的常例过程包括对研究的归属和对研究的发布方式问题方面的反馈。所有的这些是为了让参与者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参与研究的决定,并给他们一些研究结果使用方面的概念。这使他们能够在探究研究结果时更好地定位,以及对他们的结果更有发言权。这是对研究的所有方面进行衡量的一部分,并且不是把参与者简单地当做强加性的从属于研究程序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团队中,在产生问题时团队成员保持协作很重要。这需要在团队形成的最初就进行讨论,这和团队成员所拥有特长对研究顺利进行有同样的重要性。团队成员必须有对决策坚持执行的信任。而且,团体成员关于如何进行团体决策的讨论很重要,谁将控制预算?以及研究进程产生异议的话如何解决?第三方——也就是资助人——的卷入,使弄清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紧迫。而且,团队需要哪位(哪些)成员去和资助人沟通,以及如何沟通要有一个清晰的指导原则。作为团队工作的一部分是,发挥团队优势给成员提供多技能多学科训练。然而,不管是从研究本身还是从与资助人相处的角度来说,资助增加了对团队内良好沟通,以及对每个成员角色的清晰理解的需要。可以用来协助研究团队使资助的项目顺利进行的策略包括:描绘所有成员的责任,包括他们对最后报告的贡献;写出所有成员需要遵守的时间表;支持所有成员与赞助方的联系;举行团体成员的常规会议来讨论问题等。

获得资助创造了另一个需要是,在研究进行中发展的研究关系——研究者和资助者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资助团体都要求做关于研究项目进展的报告,当和资助者沟通或者提交报告——是向资助者合同中指定的特定个人报告——的时候,研究者的诚实和及时是重要的。这一点对于出现了某些错误或者由于某种原因研究计划不得不改变的时候尤其适用。从我的经验来看,资助者更倾向于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发现它,而不是等到最后发现项目未能达到期望时再找问题。

资助团体卷入研究的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些研究者对子任务的情况一年向资助人报告一到两次,而有些资助机构代表寻求在研究实施中扮演参与程度很高的角色。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关于哪一方在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方面,清晰的沟通是重要的。如果研究的实施是在机构代表会认识参与者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就不得不限制他们对信息的接触,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权,对这些的澄清,对研究者也很重要。相似的,如果资助者要求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以保证研究的进程和方向,对研究者和资助人来说,理解委员会工作的限定条件很重要。通常这样的委员会对研究者在包含研究的实质焦点的广泛问题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事实上,许多经验丰富的研究者认识到顾问委员会在帮助他们透彻地思考研究问题、解释结果、考虑发布结果的通道方面的价值,即使没有资助人

的要求也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然而,如果委员会能接触研究中收集的信息的话,尤其是委员会成员与参与者有联系的话,必须清楚地理解他们从何渠道收集信息。

这样,对研究的资助能影响研究参与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属性。受资助的研究可能带来一套新的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研究者/研究团队和资助机构之间,以及在研究者和资助者希望可能出现的组织,如顾问委员会之间。当存在着清晰的沟通的时候,这些关系会提高研究成就,并有助于研究的顺利进行。当然,这样的关系不是想当然的,涉及的所有方面需要在这方面积极工作。这些关系的发展往往是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没有言说的故事的一部分。

“研究市场”:受资助的研究优先的可能性

到这里,讨论都集中在受资助的定性研究遇到的日常问题和现实。到此为止,本章在导向方面都是全面的实践性的,是来探索而非规定通往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策略。我希望现在彻底地改变议题(Lather,1996)。为了这样做,我把讨论的焦点从做受资助的定性研究的实践方面转到一个更宏观的层次——一种聚焦在对受资助的定性研究者产生影响的大的社会事物和力量的超级情景。这个转变反映在我以更具批判性的声音来探测、挑战和检验我称之为研究市场和伴随而来的研究的商品化方面的一些假设。像拉舍(Lather,1996)所说的,“这里,文本转向它本身,对自身所断言的权威提出怀疑”(p. 533)。我转而进行这样的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紧缩和政府资助削减的气候。这个削减对各种资助机构,尤其政府部门带来严重的影响,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支持研究的资源。同时,教育机构,例如大学,也经历了对资助的削减。大学运作预算削减的后果是,迫切需要大学职员为机构创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收入变成学术研究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另一种情况是,这些收入成为用来支付继续教学和研究项目的最基本资源的运作预算的一部分。学术圈产生收入的一个办法是赢得研究拨款。在一些情况下,这创造了对获得资助的新的紧迫性——资助本身,而不是研究被高度评价。也就是说,对大学管理当局来说,变的重要的是获得资助的总额,而不是研究和伴生其出现的学术成就对解决问题和催生新知识的贡献。在这种气候下,存在着把资助研究优先于非资助的研究的潜在可能。

历史上,在大学和其他地方,一直都有资助研究和非资助研究之分。有些类型的研究即使不需要资助,仍然能产生对知识的显著贡献,它们也因此受到重视。此外,研究可以为多种目的服务,它可以调查一个在特定地区或领域产生的、意义明确的问题或事情,它也可以探察或探索首次接触的问题。研究还可以仅仅是为了调查我们真实世界各方面的新的、不同方法的思考的乐趣而进行的。

一些研究项目可能是为了所有上面三方面的需要。换句话说,就像存在着多种研究方法和相应的多种技术一样,执行研究的目的也有一定的变化范围。每个研究项目都有自己预期的读者,他们关注的一些研究假设将构成该研究内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对收入的压力,学者们内心产生了微妙的转化,即把资助研究看得比非资助研究更有价值。像基特(Keat,1991)提到英国的情况,“学者们抱怨说……他们研究的价值现在轻易地被学术‘市场化’的考虑所评价”(p. 216)。于是,可以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看到,德里达(Derrida,1976)所说的关于资助/非资助研究的二元对立。

德里达认为,任何概念在语言上的正表述,例如“资助研究”,依赖于它的“对立方”的反表述——这里是“非资助研究”。在一个二元对立中,总有一个占优势的或者优先的术语,而且,相应地,也总是有一个从属的、次要的术语。一些普通的二元对立,例如阳刚的/阴柔的,理智/情感,在每个例子里,第一个术语被给予了对第二个的优先性,第二个术语常被定义为“非”主要的。而且,像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的那样,“首要术语的定义性动力在于只有参照次要术语,才可以维持首要术语的定义,因而首要术语的定义和状态实际上是被次要伙伴的否定和对立所维持的”(Cheek,Shoebridge,Willis & Zadoroznyj,1996,p. 189)。德里达指出,二元对立是由世界观构成的,而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想当然的产物。在资助/非资助研究这一例子中,很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实际中存在这样的二元对立,并去探讨这是如何产生,如何维持的。开始这样的探索有一个有趣的办法,颠倒对立双方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非资助研究被假定为首要的,而资助研究成为次要或派生术语的话,对研究的看法和理解会发生什么影响?

在资助研究被假设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气候下,资助团体设置研究议程的权力显著地增强了。像派拉霍(Parahoo,1991)指出的:“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有时候被其吸引资助的能力所定义,而所有的研究者都知道,要想获得资助,必须就资助人准备资助的议题提交研究计划书。这会意味着实践者所关心的真实问题有时被忽略了。”(p. 37)虽然赞助人资助和他们有关的研究并非不合理的,但是,如果研究者为了解决从实地产生的问题而发起的研究不能获得资助的话,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如果资助自身驱动研究议程,这也许会破坏研究者追求重要而有趣的题目的学术自由。像波特(Porter,1997)所说,“压力因而被施加在研究者身上,去剪裁他们的工作,以符合资助人的要求”(p. 655)。创造性可能因为方便性而牺牲,因为一些研究题目比其他的更流行,因为它们更可能去吸引资助。像米尔斯(Mills,1959)、斯托兹(Stoesz,1989)观察的“随着这样情况的发生,一个巨大的问题产生了——社会科学(理解为研究)成为由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官僚机构来定义其属性的商品”(p. 122)。

而且,随着财政限制,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一些资助团体减少了主要调查者的薪水资助,并争辩说,这些研究者的薪水已经被他们所供职的机构(例如大学)付过了,因此资助人不应该再付第二次补充性的工资。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

供了两个和很多主要的拨款项目有关的例子。以我的经验,许多资助团体不愿给研究者付工资使高校出现了一个趋势,在世界许多地方,要求研究者把他们预算金额的一部分(例如,在澳大利亚,一般是拨款金额的10% ~30%)交给学校,作为管理成本,比如作为项目的基础设施费。他们的理由在于,大学不应该被要求给研究提供"免费"的设施去补充资助团体。这给使用拨款做研究的研究者带来了问题,资助人一般拒绝这个征收费用,只愿意提供需要的研究费用减去征收费用的资助。这当然让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他们应该在知道仍然要被征收费用,而且导致研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削减后的资助吗?

在我看来,由于它为高校产生收入方面的能力,对资助研究的强调,已经导致了日益增强的把研究作为在研究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的观点。从研究项目中产生的信息和数据被看成"产品",在市场上交易,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研究者日益发现他们常为两种竞争性的要求而挣扎,一种是要求研究产生新知识,一种是把研究作为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特平和希尔(Turpin & Hill,1995)把这描述为在研究行动的不同领域的边界斗争:

> 一方面,研究者关心通过研究和教学产生和传播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许多政策机制,他们被鼓励去获取并维持出售这些知识的市场空间。这两个工作领域受到不同奖励标准的控制,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衡量成功的方法,不同的传播模式……简而言之,它们是文化上的区分。

在这种把为赢得研究资助的行动本身看作学术市场的货币交易的趋势下,这种挣扎被加重了。例如,许多大学里的晋升和任期委员会把个人曾获得的资助的总额作为研究成功的测量标准。这更加维持了资助/非资助研究的二元对立,因为资助研究的表现被重视,而缺乏资助的,也就是说非资助研究则不被重视。而且,大的定量研究往往比绝大部分在小范围且不需要昂贵设备的定性研究要求更多的资助。这儿真正的危险在于,用资助的总金额来衡量它本不能衡量的东西,例如学术表现,会使获取追求资助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是一个方法。

把研究看做是商品的思想与把资助研究视为比非资助研究更优越的趋势一起,对定性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特别的两难问题。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例如,不管过程如何,在某些学科领域,如医学,绝大部分资助被使用传统科学方法的研究项目所吸引。像吉尔伯特(Gilbert,1995)指出的,"关于事实和推理的呈现形式决定了研究议题被资助方和出版方接受的程度"(p.869)。这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定性研究获得资助更为困难了。不管正确与否,如果赢取资助的成功被用来衡量表现,并对研究进行评价,就存在着把定性研究边缘化的真正危险,因为使用定性方法不容易吸引资助。

所有这些带来一些非常基础的、需要定性研究者去斗争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研究和研究实施的背景假设,它推动着研究议程和研究执行。关于研究成果如何被衡量和评价的设想需要被公开。现在可以就它们对做什么研究,以及

研究产品的属性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的影响角度来思考和探索。资助是重要的,因为它使研究可以被执行,否则,由于资源限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的问题不是资助本身,而是除了能使特定研究进行下去之外,争取资助过程中的行为所带来的收获。我的讨论并不是要反对定性研究,我所建议的是研究者需要思考他们自己关于资助研究的设定,以及如何将这些设定嵌入到他们许多应有的研究和结果的性质之中。研究不是,也一定不能简化为在由利益驱动的市场上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的商品。抵制这样的简化是新千年给定性研究者——实际上,所有研究者带来的最大挑战。

结论:对做资助研究的深入思考

做资助定性研究决不仅仅是制作计划书或者实施某个研究,它是一个研究者承担的,涉及很多步骤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研究者识别项目的潜在资助来源,和潜在资助人联系,并制作出资助计划书;只有此时才到了实施研究以及结果的传播阶段。每一步都包括许多研究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研究和整合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和实际田野工作本身一样,是"做"资助定性研究的一部分。

同时,对研究者来说,从发展正确的想法到对最后成果的"使用",深入思考做定性研究的所有方面是很紧迫的。为了深入思考,研究者必须考虑与研究相伴的情境文本,考虑该文本在研究被评价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在日益增加的资助研究的优先地位的气候下尤其关键,这种优越是由于它提供了资金紧缺的机构所需要的收入。做资助定性研究不是一个中立的、价值无涉的行动。研究者需要经常地检查他们做研究的动机,以及检查资助团体资助研究的动机。

然而,即使这样,像我贯穿全章强调的那样,我的写作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为反对"做"资助定性研究。相反,良好的使用资助可以使在其他情况下不能做的项目持续进行,或得到提高。资助人和研究者之间可以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关系。参与者可以从受到资助的研究中受益。而且,我所讨论的是在保持研究者、参与者、研究项目和资助团体的整合的情况下进行资助定性研究的能力。

在本章的开始,我陈述我关于"做"资助定性研究的目标是讲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言说的故事。伴随的一个目标是我试图去创造,至少部分地创造一个"通过不同角度的转换,面对多重听众的多重声音的文本"(Lather,1996,p.525)。我希望本章的读者在尊重我的立场的同时,能够拥有自己的立场。我讲述了故事中我的部分,现在则由读者去添加他们自己的故事。

附录:计划书写作的参考文献

- Locke, L. F., Spirduso, W. W., & Silverman, S. J. (1993). *Proposals that work: A guide for planning 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 (3r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①.

本书有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聚焦在计划书的写作,第二部分包括四个计划书样本,包括一个实验设计,一个定性研究,一个准实验设计,一个资助拨款。这本书看起来是为本科生和入门的研究者所写的。第一部分覆盖了一些议题,包括计划书的基本元素、伦理问题、题目/论文设计、计划书的内容和格式、寻求资金,以及准备拨款计划书。题为"不同的前提"的一章,是为准备定性研究计划书而写的。作者宣称,本书强调了实验和准实验研究,主要是因为这是"帮助有多样研究兴趣的读者的最经济的方法"(p. xii)。

Ogden, T. E., & Goldberg, I. A. (1995). *Research proposals: A guide to success* (2nd ed.). New York: Raven.

这本书是为如何申请国家健康研究所(NIH)拨款准备计划书的指南。像标题所建议的那样,它集中在如何获得资助拨款,尤其是实验的、科学化的研究计划书。它讨论的话题包括审核过程、提高计划书有效性,以及 NIH 项目和过程。它分为三个部分:"获得拨款的基本本领"、"获得拨款的高级本领"和"对新科学家的建议"。

- Reif-Lehrer, L. (1995). *Grant application writer's handbook.* Boston: Jones & Bartlett.

这本书是为在美国成功准备 NIH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的综合指南。作者出色地给出如何写研究拨款计划书的细节。分为几个部分:"开始"部分包括在哪里获得可用的拨款信息,"理解审核过程"、"拨款申请的几个部分"、"撰写研究计划"、"提交并跟进拨款申请"、"总结陈述:辩论和修订",以及"最后的话"。最后,本书包括了大量关于可以获得的特定拨款细节和计划书的各部分的样本作为附录。



Agger, B.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① 本书第 5 版的中文译本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出版。详见"万卷方法"。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3r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Cheek, J., Shoebridge, J., Willis, E., & Zadoroznyj, M. (1996). *Society and health: Social theory for health workers*. Melbourne: Longman Australia.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T. (1995). Nursing: Empowerment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1, 865-871.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Ethics and politics: The twin failures of positivist science. In E. G. Guba & Y. S. Lincoln,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pp. 117-141). Newbury Park, CA: Sage.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89). Context of situation. In M. A. K. Halliday & R. Hasan (Eds.),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pp. 3-14).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Keat, R. (1991). Consumer sovereignty and the integrity of practices. In R. Keat & N. Abercrombie (Eds.), *Enterprise culture* (pp. 216-230). London: Routledge.

Lather, P. (1996). Troubling clarity: The politics of accessible languag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6, 525-545.

The leading edge. (1996). *A Closer Look*, 25(6), 4. Lidz, C. W., & Ricci, E. (1990). Funding large scale qualitative sociology.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2), 113-126.

Lincoln, Y. S. (1995). Emerging criteria for quality in qualitative and interpre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1, 275-289.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ahoo, K. (1991). Politics and ethics in nursing research. *Nursing Standard*, 6(1), 35-39.

Porter, S. (1997). The degradation of the academic dogma.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5, 655-656.

Sachs, L. (1996). Casualty, responsibility and blame: Core issues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ubtext of preven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8, 632-652.

Schutt, R. (1996).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Stoesz, D. (1989). Provocation on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Part 1. *Social Epistemology*, 4(1), 121-123.

Summers, J. (1998). *The Australian grants register*. Melbourne: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Turpin, T., & Hill, S. (1995). Researchers,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5, 179-204.

Zagury, C. S. (1997). Grant writing: The uncertain road to funding: Part V. From the other side: How reviewers look at proposals. *Alternative Health Practitioner*, 3(1), 25-29.

表演民族志:简史和一些建议 15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A BRIEF HISTORY AND SOME ADVICE

◎ 麦克尔·M·麦考

表演(performance)这一术语是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艺术批判和学术话语的,用以指一种新的观赏艺术形式,并用以将剧本与依据剧本所做的特定演出即舞台上的表演区别开来①。与表演相似的术语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件和即兴表演,七八十年代的人体艺术和实验戏剧。传统的文献认为,表演、事件、即兴表演、人体艺术和实验戏剧来源于20世纪早期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此处以概要的形式对那些运动作简要的概观和描述。

概 观

席卷欧洲的历史先锋派运动(大致的时间是1900—1935年)的成员企图提出一种“另类戏剧”,它在每个方面都与以往的戏剧相异:它从(以往的)文学链条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不模拟实际存在的现实,而是构建自己的现实;它消除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明显分界,为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形式,因而它可能弥合艺术(戏剧)和生活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典型特征(Fischer-Lichte,1997,p. 115)。

未来主义(futurism):1909年未来主义的兴起和玛利奈堤(Filippo Marinetti)在费加索报上发表的宣言就是一个范例。实际上,未来主义之所以闻名,与其说是因它的艺术成果,不如说是因它的宣言。但宣言和艺术成果都对本世纪的表演传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处于转变中的未来主义者的兴趣使他们放弃了静态的艺术作品,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转变动力:从关注作品转为关注创作过程,甚至将画家和雕刻家变成表演艺术家(Carlson,1996,p. 89)。

达达主义(ddaism):自达达主义1916年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吧创立……(所有)达达主义活动都是针对观众的。虽然最初他们仅仅以中产阶级为目标,这些冒险活动越来越以对观众有组织的批判形式出现,这种批判是一种反叛的策略。活动的目的是挑战和重新检视纯粹被动期待的态度和观众习惯性的接纳

① 这种区别对于戏剧评论家来说是新鲜的,但对于戏剧艺术家则是陈旧的(参见 Mamet,1997,pp. 62-63)。

态度。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消除表演过程中存在的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差异(Fischer-Lichte,1997,pp. 267-268)。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许,超现实主义对后来的实验戏剧和表演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阿托德(Antonin Artaud)在理论方面的作品,它们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极大的影响。在他的富有洞察力的《戏剧及其两面性》(*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一书中,他根据 20 世纪早期先锋派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即因为戏剧强调情节、语言、关注思维和心理方面,它已经失去了与人类生活更深层和更有意义领域的联系。戏剧那种局限于书面文本的局面必须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对"直接"和"客观"行动的展现:"哭泣、呻吟、幻影、惊讶、各种戏剧性行为、来源于某些仪式模特的非常美丽的服装、光彩夺目的灯光、完美动听的歌喉、魅力四射的和声、迷人的音乐旋律、物体的色彩、运动的物理节奏 ……面具、几码高的雕塑、灯光的突然变化。"(Carlson,1996,pp. 91-92)

事 件

1952 年,在北卡罗来纳的黑山学院,作家凯奇(John Cage)、舞蹈家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画家劳希恩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e)和其他人共同上演了一个《无名的事件》(*Untitled Events*)。它经常被当作席卷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艺术世界的即兴表演浪潮和相关表演时间的典范加以引用。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该事件再次展现了早期先锋派运动的很多主题和实践(Carlson,1996,p. 95)。在《无名的事件》中,"每个动作都安排好了时间,在观众中间和围绕着观众展开"(Carlson,1996,p. 95):

> 每个表演者都拿到了一份"总谱",里面只有"时间范围",该时间范围显示每个演员应该行动、不行动和默不作声的时间……凯奇身着黑色的套装和领结,站立在活梯上,朗读关于音乐与禅宗佛教关系的文章和节录。随后,伴随着收音机,他演奏了一曲。同时,劳希恩伯格用由发条带动的留声机播放老唱片,一只小狗安坐在留声机的喇叭边,倾听着音乐。图德(David Tudor)弹奏"事先准备好的钢琴"。过一小会儿,图德开始倒水,从一个桶倒入另一个桶……坎宁安和其他人翩翩起舞穿过过道,那只小狗紧随其后……劳希恩伯格放映内容抽象(用彩色的明胶夹在玻璃片中制作而成)和剪辑的影片,投映到天花板上他的"白色油画"上。影片首先放映的是学校的厨子,随着图片逐渐从天花板下移到墙壁上,出现了太阳落山的画面(Fischer-Lichte,1997,pp. 233-234)。

即兴表演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卡普罗(Allan Kaprow)发明了"即兴表演

(hoppenings)"一词,该标签后来被用来指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实验表演。

在现代表演的历史上,一个关键的事件是1959年卡普罗在里佑本美术馆(位于纽约市)上演的《6个片段中的18次即兴表演》(*18 Happenings in 6 Parts*)。这一首场公演使公众和媒体认为,"即兴表演"是最新的一种先锋派运动,以至于在接着的多年中,即使很多该活动的发起人明确地否认这一术语,大量的表演作品都被描绘为"即兴表演"。在卡普罗的即兴表演中,观众在三个不同的房间就坐,在那里目睹了同时在三个场所上演的六个单独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幻灯片、乐器演奏、情境造型、朗读布告牌上零碎的短笺、艺术家在帆布画布墙上绘画(Carlson,1996,pp. 95-96)。

人体艺术和实验戏剧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观赏艺术家和戏剧艺术家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表演艺术"形式:雅康西(Vito Acconci)、伯登(Chris Burden)、施内曼(Carolee Schneemann)、威尔克(Hannah Wilke)和其他观赏艺术家的"人体艺术"以及复杂的演出。复杂的演出并不是建立在单个艺术家的身体或精神状态表现上,而是致力于展现那些非文学的视听觉形象,这当中通常需要壮观的艺术场景、技术和混合媒体(Carlson,1996,pp. 104-105;另参见Sayre,1995)。它是由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布卢厄(Lee Bruer)、福尔曼(Richard Foreman)、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及后来的加里(Spalding Gary)、欧文(Bill Irwin)和其他的讲故事的人、玩杂耍的人和小丑发展出来的。

根据琼斯(Jones,1998)的观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体艺术是一套"述行的实践(performative practice)",它们借用与观众的激情和暧昧(常有明显的性暗示)关系(这些关系可用身体表现加以体现,也可通过观看照片、影片、录像和其他文本而获得),具体说明了笛卡尔现代主义主题所包含的去地点化或去中心化思想(p. 1)。而且,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人体艺术是"强烈的主体间性的",它削弱了"男权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观念",而这种个人主义观念支撑着艺术批判里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p. 3)。例如:

> 《内部卷轴》(*Interior Scroll*)在1975年首次上演……施内曼的脸和身体涂着颜料,她从自己的阴道里抽出一卷细长的纸("像一卷纸带……铅垂线……脐和舌头"),她展开纸卷,向观众朗读了一段描述。这段描述的一部分是:"我遇见了一位快乐的男人,/一个结构主义电影摄制人……他说我们喜欢你/你有魅力/但别要求我们/去观看你的电影/……我们不能观看/个人杂物/人的乱糟糟样子/感情的执着/用手触及带来的感觉。"(Jones,1998,p. 3)

在《转移区域》(*Transference Zone*)中,雅康西把自己与他生活中的七个

重要的人的一组照片和物件锁在一间屋子里。每一次,他让一个敲门的参观者进入房间,把他对这些“重要的”人的感情转移到无疑心的接受者身上……亲身体验弗洛伊德关于转移的观点(涉及将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冲突和欲望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把某人的潜意识冲突和欲望投射到另外一个主体上的过程——雅康西的作品展示了身份和主体本身的可能性以及可表现性(Jones,1998,pp. 139-140)。

另一方面,实验戏剧通过一些艺术作品发展了一种新的戏剧的审美观。这些作品接受了历史先锋派运动的计划……并且似乎要实现它:戏剧的再戏剧化。戏剧的再戏剧化是激进的摆脱文学戏剧窠臼的运动,而文学戏剧自 18 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Fischer-Lichte,1997,pp. 200)。20 世纪 70 年代威尔逊的观赏歌剧就是实验戏剧的一个例子。

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操纵,他对观赏的、听觉的和表演的艺术的融合,他对时机和建构过程中的拼贴画技术的运用,他将语言当作声音和启示来使用而不是当作话语意义来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与早期在戏剧、音乐、观赏艺术和舞蹈领域里所开展的实验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当提到《爱因斯坦在海滨》(*Einstein on the Beach*,1976),威尔逊建议:“你不用考虑其中的故事情节,因为不存在故事情节。你不用倾听其中的语言,因为那些语言不带任何意义。你只需要欣赏舞台布景、时空维度里的建筑排列、音乐以及它们唤起的情感。倾听画面。”(Carlson,1996,p. 110)

表演民族志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早期,社会学家们开始把他们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笔记搬上舞台,戏剧艺术家和表演研究院开始创作或改编民族志以便予以演出(参见 Becker, McCall, & Morris, 1989; Conquergood, 1985, Denzin, 1997; McCall, 1993; Mienczakowski, 2000; Paget, 1990; Pollock, 1990; Richardson, 1997; Siegel & Conquergood,1985,1990;Smith,1993,1994)。戏剧艺术家的表演民族志和研究表演的人们想必受到了“表演艺术”的历史和 20 世纪的“实验戏剧”的影响,而我们的表演民族志毫无疑问没有——虽然隐约地参照了“表演科学”里的表演艺术,“表演科学”是贝克尔(Becker)、莫里斯(Morris)和我称呼我们的早期作品的名字(参见 McCall & Becker,1990)。我们的工作更多地以文本为基础:文本中有故事,文本的文字有意义,而文本中鲜有可以倾听的形象。

我们的三项表演作品——《本地的戏剧团体》(*Local Theatrical Communities*)、《戏剧和社区:三个场景》(*Theatres and Communities: Three Scenes*)、《表演科学》(*Performance Science*)——都是建立在于“三个都市即芝加哥、旧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对七十个演员、导演和其他戏剧工作者(剧作家、批评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正式访谈”的基础上的。在表演过程中,我们拿着

剧本,朗读剧本,我们不穿戏服,不用道具,我们坐在椅子上或站在表演台边,身体移动仅仅表现在交换座位或在椅子与表演台之间的往返。我们扮演多重角色: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自身和各种各样我们访问过的人。例如在《戏剧和社区:三个场景》中,我们扮演了25个角色。我们通过转换身体的姿势、视觉焦点和偶尔站立来标明角色和场景的变换,来引导观众的注意力。

> 例如,当我们发表分析性陈述,我们直接面对观众,而当我们作为"社会学家"和其他角色交谈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在(出版了的)剧本的主体部分,斜体的舞台指导语指示每段台词针对的对象,第一场景开头部分更长的舞台指导语解释了我们坐在哪里、看着哪里、我们如何利用剧本以便于着力刻画我们访谈的人的言语特征(Beck et al. ,1989,p. 96)。

同样,表演艺术家富斯科(Coco Fusco)和圭勒莫(Guillermo Gómez-Peña)的模仿民族志明显地不是建立在"先锋派"运动的历史上的,虽然如同其他的表演艺术,富斯科和圭勒莫的作品较少依赖文本,而更多地依赖视觉形象。就如富斯科指出(Fusco,1995):"西方的表演艺术不是从达达主义的'事件'开始的。从欧洲'征服'的早期开始,非洲、亚洲和美洲人的'原始样本'就被带到欧洲,用来做审美研究、科学分析和娱乐"(p. 41)。"因为意识到它对我们作为表演艺术家在现在处理文化认同的问题的意义,我的合作者圭勒莫和我对为白人观众表演他者的个性这一遗产感兴趣"(p. 37)。

> 我们的计划是在一个金色笼子里呆上三天,把我们当作未被发现的、来自墨西哥湾的一个岛屿的、被欧洲人忽视了五个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展示出来。我们管自己的家乡叫瓜提诺(Guatinau),管我们自己叫瓜提诺人。我们展现了我们"传统的差事",从缝制伏都教玩偶、举重到看电视和操作一台笔记本电脑。笼子前的捐赠箱表示只需付少量费用,我就会(伴着敲击音乐)跳舞,圭勒莫(以没有条理的语言)将会讲述真实的美洲印第安人故事,我们将会摆姿势供参观者照相。两个"动物园看守员"则在旁边为参观者作讲解,用皮带系在我们脖子上带我们去洗手间,喂我们三明治和水果。在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我们在演出中添加了性的因素,只要花上五美元,参观者就可观看真正的瓜提诺男人的生殖器。有一个着重于展示非西方人历史的年表被放在一个教导性的小组中。而一个伪造的布雷坦尼卡百科全书的条目,该条目里有份伪造的墨西哥湾且显示我们的岛屿的地图则放在另一组……
>
> ……我们没有指望我们的自我知觉的评论……是可信的。我们低估了公众对博物馆作为真理的捍卫者和在这个角色上的制度性投资的信仰。而且,我们没有预期写实主义会支配对我们作品的诠释。在每个城市,超过半数的参观者相信我们虚构的事,认为我们是"真实的"……当我们把演出从公共场所转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来自制度性代表们的压力增加了……这些压力要求我们矫正观众的曲解……我们要么被视为文明的野蛮人,要么被看作邪恶的骗子,代表们认为我们败坏了博物馆的名誉,背叛了观众的

信任(Fusco,1995,pp. 39,50)。

戏剧艺术家和表演研究院的民族志表演比社会学家的更具有戏剧的特性,也更像表演艺术。他们融合了文本和观赏的要素如动作、背景、戏装和道具。贝克(Emilie Beck)对社会学文本的改编和波洛克(Della Pollock)对一个生活史的改编都是范例。

贝克改编了佩吉特(Paget,1990)撰写的"关于对一个女性癌症患者的医疗诊断的错误建构"的文章(p. 136),并且导演了名为《交谈:对误解的研究》(*The work of Talk: Studies in Misunderstandings*)的演出。其中有 7 个角色,由做表演研究和学戏剧的学生扮演:解说人、医生、患者和一个专家小组(两女两男)。小组的每个成员"在某一方面的特征都是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拘谨,像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另一个年轻、智慧超前,他常常揭穿医生隐瞒的东西并乐此不疲。第三个非常讲究实际和事实。第四个是比较下流的'求欢心切的'男性"(Paget,1990,p. 144)。解说人就是坎瑟(Cancer)。

基于佩吉特在文章中分析过的一系列资料副本,"医生和患者上演了对话"。"有时他们评论他们已经交谈过的内容或仅仅交谈,就像我在原文中所做的一样。有时他们对小组作出反应"(Paget,1990,p. 139)。他们也"一起跳舞。他们跳探戈……有时,当她站在一个小桌子上,他给她做检查或向她询问问题……专家们公布了佩吉特的分析的科学性"。"有时他们也'闲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他们模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对话或像合唱团一样行动。"当"全体演员像一个机器那样行动时,一个多杠杆的仪器流线式地产生作品。每个人都发出机器般的语音、响声并且动作同步。这部机器(演员们)围绕着病人,比比画画地表演"医生奇怪的、机械的谈话"(pp. 139-140)。

坎瑟身着长长的白色套裙、提着晚上用的包、赤着脚。

> 她既美丽又风骚……整个表演中,她密切注意着患者。她为她装扮,时而过来为她化妆,时而送来巧克力。患者属于坎瑟。小组成员偶尔也试图帮助患者。小组第一个成员时而把光线移到患者背上,时而为她按摩背。注意力转移到患者的背上,预示表演结尾的到来,这时,患者报道到,她曾光顾另一家诊所,她被告知她患了脊椎癌(Paget,1990,pp. 139-141)。

波洛克指导了《像一个家庭:一个南方棉布厂的成功经历》(*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Hall et al. ,1987)的表演,它是在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地区访问了 300 名前棉布厂工人后写成的口述史。甚至本科生"经过申请也被选派"去做"独立的研究项目,因为通过表演学习了工厂历史,该项目给予他们学分"(Pollock,1990,p. 4)。波洛克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了剧本并共同演出。学生们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他们自己。在戏中他们穿着"20 世纪早期棉布厂工人们的长裙和羊毛长裤"。舞台布景"包括从观众席上借来的椅子和从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借来的道具(一个洗衣板、一个锡壶)"(Pollock,1990,p. 18)。

(表演)开始时,一些身着戏服的演员迎接观众入座,另一些演员则忙于搭舞台、调吉他等。灯光明亮。一段精选的传统音乐沁人心脾。喧闹声也不绝于耳。当所有演员——无论是舞台上的还是在观众席上的——轮唱一曲"我看见了光明"时,大家安静了下来。在歌曲结束时,迎宾员/演员们在观众中间就坐,台上的一个演员上前就表演作介绍,也介绍了她自己。接着四个演员分别简述了一个关于他或她与工厂的故事……作为他们的自我介绍的组成部分,演员们回顾了《像一个家庭》的访谈员询问前工厂工人的问题……出于真正的好奇心,演员们问了"你有多少闲暇时间?""你去教堂吗?""当工会介入时会有什么结果?"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缓缓地、顽皮地打破表演的陈规。站在观众中间的演员回答舞台上演员的问题。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代言人,这些人显然是演员:他们是身着戏服的迎宾员,在门口欢迎观众,然后他们挨着观众入座。当演员们起身声称她是诺曼(Icy Norman)或他是麦考克勒(Hoyle McCorkle),他或她确实是在表演——代表别的人,表述别人的而非他或她自己的观点。这种自觉的戏剧帮助我们打乱传统的演员与观众的区别而又保持非传统的演员与角色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邀请观众参与到表演中来(Pollock, 1990, p. 21)。

在演出的末尾,

《像一个家庭》的一个作者被邀请参与到表演中来,来讲述他或她自己的故事,来激发观众们的故事和观众们的评论。演出结束时的喝彩都给推迟了,直到观众也获得了表演者的角色……而当喝彩真正激起时,它是双向的:表演者为观众鼓掌,观众为表演者鼓掌。他们的角色在共同的欢快中模糊了(p. 23)。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作、表演和/或为之挑选演员的表演民族志,受到了波洛克作品的影响。从1992年到1998年,我与摄影师加莫尔(Linda Gammell)和雕塑家泰勒(Sandra M. Taylor)合作研究中西部的妇女,她们在实践或提倡可持续农业①。在那段时间,我们组织了几场整天的"讨论会"——切实地对52个女性农民做群体访谈。

我们的讨论会开始于向妇女们提这个问题"你是谁,你与土地有什么联系?"作完介绍后,加莫尔和泰勒用幻灯片讲演了艺术作品和广告里的农村妇女的形象。然后,每个妇女描述她带来的一件或几件物品。这些物品是她们"用来反映农场生活和/或农场妇女的"。讲解完后,她们把物品放到我们围坐着的桌子中央。加莫尔则对着桌子中央摄影,随后描绘了妇女们手中的物品(参见Taylor,

---

① 这种农业比当代的农业综合企业系统更有可持续性。与农业综合企业系统相比,它更少依赖石油化学产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比它们生产的食品消耗更多卡路里的热量,它们会导致水、土壤、空气的污染和大量的健康问题),更少依赖长途运输(购买和销售本地食品是可持续农业的基本原则),更少依赖"经销商"(直接从农业市场上的农业那里购买,或以社区支柱农业组织的成员身份购买,也是可持续农业的基本原则)。

Gammell, & McCall,1994)。讨论会结束时,我们问了一些开放式问题,如"如果你有一个公开的机会来交流关于妇女和农村生活以及农村文化的变迁的看法,你将会说什么?"每个参与者离开时,我们给她们分发了一卷胶卷,请她们拍摄自家农场的风景并把胶卷寄给我们;我们冲洗完胶卷,给她们寄去了照片。加莫尔还用底片做出了幻灯片。

布兰丁基金会资助了我们在 1993 年夏天开展的研究,允许我们雇 3 个学生作研究助理。基金会要求我们在 10 月的一个会议上,与学生合作,向基金会官员和其他资助接受者汇报研究的结果。为此,我写作了《不"仅仅"是农民和不"仅仅"是农场夫人》(*Not "Just" a Farmer and Not Just a Farm Wife*, McCall, 1993)。因为我们只有 5 人能出席会议,所以我的剧本是根据与 4 个农场妇女开展的讨论会而写成,由我和学生表演,泰勒则充当"提问人"的角色并负责放映幻灯片。表演以卡卡克(Patty Kakac)演唱的"我只是个农民"的录音开始,也以该录音结束。卡卡克是讨论会的一个参与者,歌曲是她写的。在整个表演过程中,泰勒展示了参加四个讨论会的妇女们照的风景照。虽然我们只是坐在凳子上读剧本,没有装扮,但表演中加入的音乐和可观赏的形象使得表演不显得很受文本限制,更像波洛克改编的《像一个家庭》,而不像我早先与贝克尔和莫里斯合作的作品。

与波洛克一样,我想"把故事返还到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社区"。我明白,"在工作中,在前门门廊处,或在访谈的过程中讲述个人的故事、传统的故事和历史故事,本身就是述行的行为"。通过"再表演这些故事",我"希望我们能意识到它们述行的性质"(Pollock,1990,p. 4)。所以,我为明尼苏达食品协会的董事们(我们另外的赞助人)和讨论会的参与者安排了另外三场表演,由参与讨论会的妇女表演,在三场表演中分别扮演迈克尔(Michal)和桑德拉(Sandra)的角色,萨拉(Sara)、米歇尔(Michelle)和莉莎(Liza)(学生)的角色,帕堤(Patty)、艾丽丝(Alice)、格罗利亚(Gloria)和唐娜(Donna)(农民妇女)的角色。

一些建议

表演民族志要求民族志学者或改编者至少做以下工作:他或她必须写作剧本,然后挑选演员和/或表演和/或上演该剧(加进动作、舞台布景、戏服、道具)。我想,对于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写作剧本是最简单的工作,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把田野调查笔记或访谈文字记录改写成书面文本——即使这些书面文本通常是为读者写的,而不是为表演者和观众写的。埃默森、弗雷茨和肖(Emerson, Fretz & Shaw,1995)把民族志学者撰写的文本称作"主题型的叙述",并这样解释:

> 在编码和写作备忘录(memo)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已经开始创造和阐述许多分析型主题。在写作民族志文本的过程中,作者把部分这些主题组织成他们所研究的环境中的条理清楚的生活"故事"和事件。这种描述只需

> 选择所有田野调查笔记中的小部分,然后将他们联结成有条理的文本,用以反映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某些方面或侧面(p. 170)。

埃默森等人向学生解释了民族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如何“快速记”笔记,如何“记录笔记”以创造“纸上的意义”,如何“发现”笔记中的部分的含义,如何通过“开放编码、焦点编码和综合型备忘录”来“处理”田野调查笔记的(pp. 5-7)。在名为“民族志写作”那一章,他们解释了如何“一点一点地构建连贯的以田野调查笔记为中心的故事”(p. 179)。他们建议学生根据笔记写作“节录　评论单元”和初始备忘录。一个“节录　评论单元”包括一个分析型观点、导向型信息(例如说话者的社会地位)、田野调查笔记的一段摘录和分析型评论(pp. 182-183)。然后,埃默森等人告诉学生把这些安排在一组内,再把这些组安排到文本内,最后写作导言、“文献回顾”和民族志的结论。

除了“倾向性信息”和“分析型观点和评论”不必要之外,写作一本表演民族志剧本与写民族志非常相似:第一是要使其具体化,第二则是要“特征化”。当然,对话代替了描写和叙述。民族志表演剧本作者仍然要反复阅读他们的田野调查笔记或文字记录,以“创造和阐述分析型主题”和“把某些主题组织成条理清楚的故事”。

为写作《不“仅仅”是一个农民》(*Not "Just" a Farmer*),我反复阅读了我们于 1993 年 8 月 21 日在明尼苏达的圣克劳德(St. Cloud)举行的一个讨论会的文字记录。这份根据 6 个小时交谈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资料大约有 120 页。我需要创作一本在 30 分钟表演完的剧本(时间是那次布兰丁的会议给我们分配的),这意味着剧本只有十页半长——仅仅是“整个田野调查笔记的小部分”。

圣克劳德讨论会是由汤姆斯(Barb Thomes)组织的,他参与了 1992 年的一个讨论会。汤姆斯居住在一个农场里,在路瑟伦社会服务组织工作,为农民家庭提供风险咨询和其他服务。她邀请四个妇女参与了 1993 年的这个讨论会。唐娜和她的丈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场危机”中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工作,但不是她的外祖父母的农场。帕堤和她丈夫生活在一个 160 英亩的农场里,养蜂、出售蜂蜜、种植自己的食物,但她靠做民间歌手为生。她和艾利丝是政治活跃分子;艾丽丝是退休的农场主,前明尼苏达州长候选人。格罗利亚拥有一个 200 英亩的农场,1989 年她丈夫突然去世,她就开始独自经营农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回来与她共同经营农场。因而,这不奇怪,讨论会的重要主题是家庭农场主谋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此相对照的食品加工公司、零售商、运输、种子和化学品公司这些组织的巨额财富和巨大权力;城市移民和郊区扩张对土地的侵占和萧条的农村经济;作为城里的人,我们去了解自己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在哪里可以买到由当地家庭农场主不施用除草剂、杀虫剂或肥料而生产的粮食等这些问题的责任。次要的主题是妇女的工作在传统农场里的重要性,现在农村妇女的工作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农业为妇女提供的机会。我的剧本就是围绕这些主题组织起来的。

表演的开头是我们四个人坐在舞台上的高凳子上,齐声对着观众提这个问

题,即"你与土地有什么关系?"接着,萨拉和我,米歇尔和莉莎,以及与观众坐在一起、靠近幻灯片放映者的桑德拉,通过回答那个问题介绍了我们自己。再次,萨拉、米歇尔、莉莎以及我交换位置,把"我们自己"介绍为唐娜(萨拉)、格罗利亚(我)、帕堤(米歇尔)、艾丽丝(莉莎)。我们换成其他角色后,桑德拉开始放映幻灯片。她也提问,作评论;我主要从文字记录中引用她自己的话,但我把那些话重新组织起来,以便引导话题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激励其他的参与者评论和作回答,或解释其他参与者的评论和回答。作完自我介绍后剧本的第一部分就是一个例子:

桑德拉:[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媒体里没有真实的妇女和土地的画面,或在美术品中也没有。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谈论的和向你们求助的是给我们更好的信息,关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作为一个与土地有关联的妇女意味着什么的信息。感谢你们光临现场来帮助我们……现在,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拿出你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把它放在[那桌子]的中央。

桑德拉:林达[加莫尔]带来了一些好东西。[她说]她带来这头小奶牛,是因为她"对人们如何描绘动物这一想法感兴趣。动物又是怎样成了人类的玩偶和玩具"。

帕堤:不知怎么地,奶牛真的在华而不实的艺术世界里流行起来了,正当农民们[失去他们的农场]时……这有点令我恶心。我到工艺品市场去帮朋友买东西。出售奶牛的人——你知道,你会从出售奶牛中赚很多钱!天啊,这不是真的!这里边有些古怪。卖小奶牛,你能赚钱,但是如果你出售奶牛做成的食品,你赚不到钱……我注意到,在整个国家,无论你生产什么产品,如果是食品,你不能以此营生。但如果你为人们提供娱乐服务……这正是很多农民在做的,把人们吸引到农场来,让他们在农场度假。

唐娜:啊哈,住宿和早点。

帕堤:赚钱。

桑德拉:真的吗?

帕堤:是的,那是农业以外赚钱的另一途径。

唐娜:那像是附加的收入。

帕堤:耶,种植蔬菜的人去养殖干花了。去赚钱。他们可以通过干花赚钱,而不能通过蔬菜赚钱。

桑德拉:人们不知道超市食品和农场种植的食品吗?

唐娜:我想这里边没有什么联系。

帕堤:这个国家有个政策,即食品应该便宜。这让一些人在食品上赚钱,但不是其他人。

桑德拉:哪些人?哪些人赚钱?

帕堤:那些。

艾丽丝:做加工的,通用工厂。

帕堤:超市,管理者。

艾丽丝:食品加工公司。

[萨拉]:生产化肥的。

帕堤:耶。

唐娜:银行,任何人。我不是很爱看电视的人——不是很喜欢。不久前,电视上有个广告,关于玉米的价格,在19世纪是2美元——达到最高价。在这个时候又回到了2美元。而所有的成本却[上升了]。例如在那个时候一份报纸值5美分什么的。有没有其他人看见了那则广告?

帕堤:我没有看见那则广告,但曾见过相似的广告。

艾丽丝:以前有个农业部的公告,说一蒲式尔玉米值3美元。你准备怎样赚钱?

唐娜:耶,但公众没有看见那个公告。

艾丽丝:耶,是的。

帕堤:啊哈。

唐娜:公众将看到这些商业性的好看的色彩……

帕堤:是的。

跟我与贝克尔、莫里斯合作的剧本相比,这本剧本较少具有人为的色彩,因为它是以群体访谈为基础的。那些早先的剧本是基于没有录音的个人访谈的;当我们“编造”对话时,我们利用了访谈人和被访谈人的实际语言,也利用了访谈记录。我们也让“社会学家”提出分析型观点,作评论。例如在《戏剧和社区:三个场景》(*Theatres and Communities*)中,“社会学家”演绎了所有165段台词中的61%和67段“分析型”台词中59段。我不用“编造”《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中的对话——它已经存在,它被记录在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资料中。文字资料中也有“分析型评论”,是由农妇们提供的。“提问人”只需给表演作一下介绍,提供表演的背景信息和引导话题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

演员配备

作为社区剧院世界里“参与观察者”,我学习了关于演员配备的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我的丈夫在两个社区剧院里导演了23场业余演员演出的戏剧,作为“导演”的妻子,我观察了试演、排练和最后的表演;参与了一些后台的活动;倾听了无尽的关于艺术选择的讨论和导演的决策。我了解到,在演员的期待和导演的目的之间存在一个差距。业余演员认为“最好”的演员(有时只不过是社区里地位最高的人)应该承担“最大”的角色。另一方面,导演则想配备一组演技娴熟的结构合理的演员。就像我丈夫的老师所解释的:

在试演时,演员应该明白,导演希望就演员配备问题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导演希望尽量少花经历或尽量少作调整,尽力去培养一种超感官的敏锐的判断力,以判断所选的演员是否理解将要扮演的角色……

当然,拥有少量的配备演员的成功经验是有益的,它有助于创造和谐的和理解的关系……当我熟知演员的优点和缺点及剧本后,我的任务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把最强的演员配备到最需要他们的能力的地方——但并不必然是最重要的情节的角色。通常,剧本的最重要部分的描述最详尽,因而只要是一个胜任的演员,就能在预演和正式表演时演出应有的效果。而对于戏剧的不甚重要的部分,描述比较散漫,这些部分极其需要实力强的演员(Spayde,1993,pp.43-45)。

为了《不“仅仅”是农民和不“仅仅”是农场夫人》的初次演出,我选择了参与了该项研究并能出席布兰丁会议的我们之中的五个人。我之所以选择使用圣克劳德讨论会的文字记录,是因为我恰好有那么多演员,包括通称的“提问人”。然而,当我配备我们五个演员时,我尽力确保每个“演员”都会“理解她扮演的角色”。跟唐娜和她的丈夫的遭遇相似,萨拉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工作,但依然居住在农场里。帕堤和米歇尔都是歌手[米歇尔的“目标”是录制一盒明尼苏达音乐家的磁带,在介绍自己时,她提及唱歌:“我的母亲、姐姐和我经常唱歌。在加利福尼亚,唱歌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事。而当我们到了费格斯福斯(Fergusfalls,即明尼苏达),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唱歌。这里有很多人人都知晓的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歌曲。”]我选择莉莎扮演艾丽丝,是因为艾丽丝的年龄大致与莉莎的曾祖母相同。关于她的曾祖母,她说到:“我觉得我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是我的曾祖母,她住在伊利诺斯的一个小镇上,我们非常亲密。她84岁了,她经营很多温室,所以她能为信仰而经营。”我让自己扮演格罗利亚,是因为我认为她是最少被人理解的角色——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更少具有政治性而在农业工作和性别角色方面更为传统,在她离开讨论会之前,她很活跃,说了很多的话。因为在其他“演员”参与的讨论会中,她是个“外部人”,我担心那些演员不会理解她。但我想自己应该能理解她,因为我明了问题之所在。

导演和表演

我不会擅自给读者提供表演的建议。相反,我将引用专家们写作的上百本著作之一里边的建议。根据剧作家迈米特(Mamet,1997)的观点,“表演意味着表演一个行为,做事”(p.72)。他主张:

对于你,对于演员,传达意义的不是语言——是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舞台上的你和你的对手的变化,你们的行为冲突的激化,剧情也会变化。那种表演,那种变化,就是戏剧。但语言是确定的和不变的。其内在价值由作者赋予,他或她的已经完成。而你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是接受语言,清楚明白地说出它们,以便跟其他演员顺利对话(pp.62-63)。

迈米特还说道:

> 飞机被设计出来飞翔,飞行员被训练出来驾驶它,同样,戏剧如果是被恰当地设计的,它被设计成一系列事件,主角尽力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并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实现他(或她)的目标。演员的工作是登台,利用台词,他(或她)的意志和共识,尝试实现与主角的目标相似的目标。那就是演员的工作的目标(p.12)。

当然,我们没有表演;我们只是大声朗读我们及四位女性农民之间的交谈。我不是在指导演员,而是通过一点说明性工作,把说话的声音、交谈中的停顿以及我们的言语里的音乐用文字记录下来,把它们转写成剧本,以便于演员"清楚明白"地读出我的剧本里的话。这种方式与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的观点是一致的,她的观点是你可以"通过'寄居于'一个角色的语言找到该角色的心理现实"。(p.2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密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个系列表演(Smith,1994,p.17),她称之为《探索美国人性格之路》(*A Search for American Character*)。这个系列中最为著名的表演是《镜中之火》(*Fires in the Mirror*)和《黄昏:1992年的洛杉矶》(*Twilight: Los Angeles*)。前者描写的是在布鲁克林区的克朗黑茨(Crown Heights)爆发的持续三天的暴乱、游行和示威,这场骚乱的导火索是,一个由三辆车组成的车队中搭乘精神领袖哈希迪克(Lubavitcher Hasidic)的车闯红灯撞上了另一辆车并冲上了人行道,然后撞死了来自圭亚那的七岁黑人男孩凯图(Gavin Cato)并严重撞伤他的亲戚,出于报复,一群黑人男性刺杀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29岁的哈希迪克学者罗森鲍姆(Yankel Rosenbaum)(Smith,1933,p. xliii)。后者描写的是1992年4月洛杉矶的平民骚乱。

> 《探索美国人性格之路》的每场表演都是从我直接或间接地对介入我打算研究的事件的人们的访谈资料中发展出来的。我的剧本完全是基于访谈资料的,在舞台上,我扮演了被访者,使用的是他们的原话。《黄昏:1992年的洛杉矶》出于我对最初的罗德利·金裁定(Rodney King verdict)之后的洛杉矶的研究(Smith,1994,p.17)。

作为一个学表演的学生,史密斯认识到"思考词语本身而不是词语的言外之意对于角色的发掘很重要"(Smith,1993,p.24)。她遵循其莎士比亚戏剧教师的指导,念了一段查理三世里面的十四行诗"反反复复直至破晓"因为她没有试图"控制词语",史密斯学会了"音律与意象对于唤起角色、戏剧、时代之精神的力量"(p.24)。后来,她意识到她能够"通过再演绎别人所说过的事情来创造意象变成那个人"(p.26)。

> 演员们……被训练出来去发展我们记忆中更具有感情的和感官色彩的而非理性的方面。普通大众常常奇怪演员们是如何记住他们的台词的,而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演员们如何记忆、回想和再现感情和感受。身体跟心智一样,都有记忆。言语行为是一种身体行为。它是如此强有力,以至于它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一道,创造了一种协作的舞蹈。那舞蹈是一个人内在

品质的梗概,而内在品质是语言不能完全显现的。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能记录那舞蹈的一部分——言说的部分——并重新上演它,身体的其他部分将跟随(Smith,1993,pp. 25-26)。

最初,史密斯借用出版了的访谈资料来使她的"学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p. 26)。后来,她开始自己做访谈,然后自己表演。

我希望为基于自身的[表演]技巧增加新的内容。基于自身的技术开始于他者然后转向自身,这种技术要激发他者去寻找演员而不是相反。我需要生动的证据,以证明言语方式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假如我们置身于他者的言语模式中,漫步在他者的言语中,我们就能发现他者的个性,并且本能地体验他者的个性。我越来越坚信,与以自身为参考框架来认识他者的过程相比,表演活动即使不能提供更多关于他者的信息,也能使我们像使用前一种方式那样有效地认识他者。认识他者的参考框架的应该是他者(Smith,1993,p. 27)。

实际表演

除了配备演员和指导演员,一项表演或一场戏剧的导演也要"上演事件",其方式是"控制舞台布置":布景、灯光、服装、道具以及动作(Bordwell & Tvhompson,1993,p. 145)。我曾说过,我很少涉及实际表演,所以我不能告诉读者"如何去做"。其他的表演民族志的出版物也没有多大帮助。实际表演需要做出一些诠释性的选择。在做这些选择方面,史密斯经常与剧作家、专业导演、布景、声音、灯光和戏服设计师合作。虽然波洛克、佩吉特及贝克尔说明了他们做选择的目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做选择的。波洛克(Pollock,1990)说,她希望"重新上演"棉布厂工人的口述史能"激励他们要求自我表现"(p. 4)和"帮助找回他们的历史生活"(p. 5)。她想避免"过去是现在的错觉",因为她认为这会把戏剧即时性的优势变成最后的刺激"(p. 6)。为达到这个目的,她所做的选择是使用简单的戏服、布景和道具(以避免"过去是现在的错觉"),让演员扮演多重角色,这样"观众就从任何特定历史位置(包括他/她自己)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却局限于一个制造历史的辩证法中"因为"最重要的是,观众确认……演员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及世界转变的能力"(p. 18)。因为佩吉特出版了"关于《交谈》"的说明,我们不知道导演是如何做出体现作品已经选择的。然而,在讨论有关选择问题时,佩吉特设想贝克尔曾做过选择。佩吉特提供了下面的线索:

我把被表演的文本看作是贝克尔的版本。安排坎瑟做解说人是非常漂亮的体现意境的选择,它对演出的意义的创造有多方面的作用……不让作者和调查者参见演出是另一个体现意境的选择。贝克尔认为,我作为调查

者参加演出,会妨碍创造一种必要的氛围,这种氛围能吸引观众参与表演。这是表演中的一个难题。它使得,为了陈述某些事实,先要使它们显得荒诞奇异。

表演民族志是相对较新的一种民族志。或许,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学习戏剧和表演技巧的人们会为这种民族志的导演写作指导性书籍。同时,我也可以向戏剧导演推荐一本指导性书籍。书名叫《戏剧阅读手册》(*Backwards and Forwards: A Technical Mannual for Reading*, 1983),作者是大卫·鲍尔(David Ball),资深的剧作家和导演。拉纳姆(Michael Langham)导演(1983,p.7)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书揭示了,一个剧本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还是戏剧表演的原材料。"

> 文学和戏剧有很大不同。戏剧里的声响、音乐、动作、表情、音量——更多的方面——是要在剧本里做深挖掘的,然而通过阅读和分析的严格的文学方法是不能发现它们的。本小册子……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导演,都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Langham,1983,pp.7-8)。



参考文献

Ball, D. (1983).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 technical manual for reading play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S., McCall, M. M., & Morris, L. V. (1989). Theatres and communities: Three scenes. *Social Problems*, 36, 93-116.

Bordwell, D., & Thompson, K. (1993).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Carlson, M. (1996). *Performa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onquergood, D. (1985).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 1-13.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scher-Lichte, E. (1997). *The show and the gaze of theatre: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Fusco, C. (1995). *English is broken here: Notes on cultural fusion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New Press.

Hall, J. D., Leloudis, J., Korstad, R., Murphy, M., Jones, L. A., & Daly, C. B. (1987).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Jones, A. (1998). *Body art/performing the subjec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angham, M. (1983). Foreword. In D. Ball,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 technical manual for reading plays* (pp. vii-viii).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Mamet, D. (1997). *True and false: Heresy and common sense for the actor*. New York: Pantheon.

McCall, M. M., & Becket, H. S. (1990). Performance science. *Social Problems*, 37, 116-132.

McCall, M. M. (1993). *Not "just" a farmer and not just a "farm wife."* Unpublished performance script.

Mienczakowski, J. (2000). Ethnodrama: Per-

formed research—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 In P. Atkinson, S. Delamont, & A. Coffey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Paget, M. A. (1990). Performing the tex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136-155.

Pollock, D. (1990). Telling the told: Performing like a family. *Oral History Review*, 18,1-36.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ayre, H. (1995). Performance. In F. Lentricchia & T.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pp. 91-10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egel, T., & Conquergood, D. (Producers & Directors). (1985). *Between two worlds: The Hmong shaman in America* [Video documentary].

Siegel, T., & Conquergood, D. (Producers & Directors). (1990). *The heart broken in half* [Video documentary].

Smith, A. D. (1993).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Smith, A. D. (1994). *Twilight: Los Angeles, 1992*. Garden City, NY: Anchor.

Spayde, S. H. (with Mackey, D. A.). (1993). *Doors into the play: A few practical keys for theatricians*. San Bernardino, CA: Borgo.

Taylor, S. M., Gammell, L., & McCall, M. M. (1994). *The one about the farmer's daughter: Stereotypes and self-images*. St. Paul: Minnesota Food Association.

个案研究[①] 16

CASE STUDIES

个案研究是定性调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纯粹定性的。个案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而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总要研究特定的个案。我们可以通过反复测量，用分析的方法或整体的方法来研究个案，也可以从阐释的、有机的、文化的角度或多种角度研究个案——但在这里我们强调的就是个案。

医生观察患儿，患儿的症状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但医生的病历是定量而非定性的。社会工作者观察缺少关爱的儿童，儿童的症状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但社会工作者的记录一般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②]。在许多专业和实践领域，人们观察并记录个案。作为一种研究形式，人们往往从对个案的关注而非调查方法的角度来定义个案研究。

也许很多个案工作研究者都把他们所做的研究叫做别的名字，比如当人们问贝克尔（Howard Becker，私人交流，1980）他的研究叫什么时，他迟疑地回答："实地研究（fieldwork）"，并且说这个名称仍不能增加人们对研究者所从事工作的理解。一些人特别强调"个案研究"的名称，因为它能引起人们注意从单个的个案那里能发现什么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是这一章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从单一的个案中发现什么？我将重点讨论研究设计以便恰当地理解个案而不是去做推论。

---

① 本文是在本书第1版中我所写的"个案研究"那一章的修订版。这一版的改进受益于拉津和贝克尔（Ragin & Becker，1992）编辑的《个案是什么》（*what is the case?*）一书中的精彩论文，同时也受益邓津、林肯、博尔达（Orlando Fals Borda）、勒温（Morten Levin）、马布里（Linda Mabry），以及戴维斯（Rita Davis）的审阅意见。

② 许多个案研究既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在从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常见的重大研究时，殷（Yin，1992）分析了三个精心设计的研究：①对为解决有争议的《联邦主义者文件》（*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身份进行的定量研究；②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对前苏联的意图进行的定性研究；③他自己对人类面容识别的研究。他发现了四个共同的任务：用专家的知识来影响研究的现象，收集所有相关的资料，分析相反的解释，权衡和探索研究成果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程度。这几点在个案研究中也同样重要。

个案的识别

个案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它可以是一个孩子,也可以是一个班的孩子,可以是一个事件,比如动员专业人员去研究孩子的健康状况等。无论哪种研究,我们将只关注一个个案。关注个案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只要我们确实是在关注,那就是在从事个案研究。

一般来说,并非事事都是个案,一个孩子可能是一个个案,一个医生可能是一个个案,——但是他的诊疗由于缺乏特殊性和有界性,所以不能称为个案①。一个机构可能是一个个案,但是孩子缺少关爱的"理由"和处理不称职父母的"政策"很少被认为是个案,因为这些议题通常具有普遍性,而个案是特殊的。

如果我们研究个案,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个案都是一个有机的特定个体,个案是一个"有界的系统"。在社会科学和公共事业中,个案都是工作的内容,它有自身的目标,有自己的特性,它是一个综合体系。孩子无论多么幼稚,他始终是一个生理学、心理学、文化、美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医院作为一个个案或是机构,作为一个个案同样也如此。个案是一个系统,不管其功能正常还是非正常,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

它的行为是模式化的,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通常人们认为,有些特征是系统内部的,个案边界以内的;而另外一些特征是个案边界以外的;还有一些特征是意义重大的背景。古德和哈特(Goode & Hatt,1952)认识到,对个案研究者而言,并不总是很容易说出个案的界限在哪里。但是对于确定个案来说,有界性和行为模式是非常有用的概念(Stake,1988)。

与单个的个案相比,我们最终可能对一般现象或是个案总体更感兴趣。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他个案,我们就无法理解所研究的个案。但我们在研究个案时,我们贫乏的资源都集中在试图去理解它的复杂性了,在此期间我们很可能不会去研究相似的个案,但可能同时进行几个个案的研究,而每一次个案研究只集中调查一个个案。

拉津(Ragin,1992)特别强调了"个案属于什么"的问题,似乎个案类型和代表性是个案研究的关注点,他详细地引用了韦维奥卡(Wieviorka,1988)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拉津为社会科学家追求理论概括,写文章,认为对特殊事例的研究,只要它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重大问题,就是合理的。他认识到即使在正式的实验研究和统计调查工作中,解释的和异常的个案也具有意义,但历史学家、项目评估员、社会公共机构的研究者、各行各业从业人员都只会对单个的个案感兴趣,而不会特别关注个案属于什么。

---

① 人类文化学方法论者将"方法"作为调查议题,研究某些事情如工作或娱乐是怎样进行的(Garfinkel,1967)。为了理解一个个案,通常需要广泛地考察事情如何发展,而个案研究中的事物主要是个案,不是个案操作的方法。

即使我的个案研究定义得到认同(实际并非如此)①,对"个案"和"研究"这两个术语作详尽界定也是不可能的(Kemmis, 1980)。一个个案研究既是调查的过程也是调查的结果。斯滕豪斯(Stenhouse,1984)主张将结果称为"个案记录",偶尔我们也这样做,但是将最后的报告称为"个案研究"的作法已得到普遍确认。研究者将很多东西都称为个案研究②。但研究的对象越是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有界的系统,那我们在这一章所描述的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意义也就越大。

个案本质的和工具性的意义

我认为可以将个案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如果研究者的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特殊的个案,我称之为"本质性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因为对这种个案的研究主要不是因为它代表其他个案,也不是因为它阐明了一个特征或问题,而是因为不管它多么特殊、多么普通,这样的个案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者应战胜对其他东西的好奇心,以便把那些"亲身体验个案"的人的故事挖掘出来叙述。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解抽象概念或普遍的现象,比如文化程度、青少年吸毒,或者一个中学校长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理论建构——尽管研究者有时候可能这样做。人们进行研究是因为其本身内在的意义,比如一个特殊的孩子、诊所、会议、课程。本质性个案研究的著作有:

- 《亨里·亚当斯的教育:一部自传》(*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An Autobiography*, Adams, 1918)
- 《上帝的选择》(*God's choice*, Peshkin, 1986)
- 《面包和梦想:美国双语教育的个案研究》(*Bread and Dreams: A Case Study of Bilingual Schooling in the U. S. A.*, MacDonald, Adelman, Kushner, & Walker, 1982),以及其他大多数项目评估研究(参见:Mabry, 1998)
- 《阿伯丁郡乡村宣传活动》(*An Aberdeenshire Village Propaganda*, Smith, 1889)
- 《瑞典的教育制度》(*The Swedish School System*, Stenholm, 1984)

如果对一个特殊的案例进行研究,目的主要是给人们提供对一个问题的认

---

① 个案的定义依赖解释性范式或研究的方法。从不同的世界观或不同的情境考察,"相同"的个案,意义是不同的。不管开始如何定义个案,当我们研究的时候,其操作定义又会改变。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个案不仅被不同地描述,而且传记作家莫里斯(Morris,1979)在提到他时也用了不同的定义:"纽约来的花花公子"、"可爱的老兄"、"草地里的蛇"、"粗暴的骑手"、"美国最著名的人"。

② 像求知欲和常识的历史一样,个案研究的历史可以在图书馆的任何地方找到,博格丹和拜克伦(Bogdan & Biklen,1982),德拉蒙特(Delamont,1992),费津、奥卢姆和肖伯格(Feagin, Orum & Sjoberg,1991),斯泰克(Stake,1978),怀特(White,1992)和韦维奥卡(Wieviorka,1992)的作品中都提到个案研究史,本书也贯穿了个案研究史。

识或重新得出一个推论,我便将之称为"工具性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这种个案的意义是次要的,它只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对其他事物的理解。当然,人们也会深入研究这种个案,仔细观察它的背景,详细叙述它的日常活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它有助于研究者追求其外部意义。这种个案可以被当作其他个案的代表,也可以不是(在后面的部分,我将讨论什么时候代表性是重要的)。在这里,选择的个案可以增进对其他意义的理解,因为研究者可能同时对几个方面感兴趣,特殊的和普遍的,在本质性个案研究和工具性个案研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有一个公共地带。工具性个案研究的著作有:

- 《对校园枪击案的反应》(*Campus Response to a Student Gunman*, Asmussen & Creswell, 1995/1997)
- 《白衣男孩:医学院的学生文化》(*Boy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Becker, Geer, Hughes & Strauss, 1961)
- 《打水漂:医疗保健配额中的人力成本》(*Thrown Overboard*: *The Human Costs of Health Care Rationing*, Kolker, 1996)
- 《接近机会: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教育、社团和语言》(*On the Border of Opport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Language at the U. S. -Mexico Line*, Pugach, 1998)
- 《从文盲变成一个好学者:一项关于一位严重残疾人的识字学习的个案研究》(*A Nonreader Becomes a Reader*: *A Case Study of Literacy Acquisition by a Severely Disabled Reader*, McCormick, 1994)

如果一个特殊的个案中本质性的意义更小,研究者可能连带地观察大量个案以便研究一个现象、一群人,或总的状况,我将这种研究称之为"集合性个案研究(collective case study)"①。这是将工具性研究延伸到几个个案。在这种集合中,单个个案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事先并不一定清楚。他们可能是相似的,或不同的,类似的或迥异的。人们选择它们是因为相信,如果理解它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和推测更多的个案。集合性个案研究的著作有:

- 《教师的工作》(*Teacher's Work*, Connell, 1985)
- 《研究的实践环境:个案研究方法》(*Researching Practice Setting*: *A Case Study Approach*, Crabtree & Miller, 1999)
- 《野蛮的不平等现象》(*Savage Inequalities*, Kozol, 1991)
- 《大胆的冒险:美国科学和数学教育中改革模式》(*Bold Ventures*: *Patterns Among V. S.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Raisin & Britton, 1997)

---

① 集合性个案研究本质上就是赫里奥特和费尔斯通(Herriott & Firestone, 1983)所说的"多种场合的定性研究"。多种场合的项目评估是另一个常见的例子,许多德国社会学家将集合性个案研究与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方法一起使用。

- 《组织的黑暗面：错误、渎职和灾难》(*The Dark Side of Orgnization: Mistake, Misconduct and Disaster*, Vaughan, 1999)

研究报告(和作者)并不一定完全适合这种分类。我认为这三种划分主要是启发性而不是决定性的，佩什金(Alan Peshkin，私人交流，1992年10月)对我将《上帝的选择》归为本质性个案研究做出了反应，他说："我本打算提出我的个案以便人们能从个案本身的意义来理解，但我总是有另外的想法——从这个案例了解某一类事物，其中一些东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很重要的。"佩什金对贝森尼浸会学院(Bethany Baptist Academy)进行了三年时间的研究。直到最后一章，他才告诉读者贝森尼浸会学院对他和学校的人以及更大范围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生的事件。最重要的事情是理解个案，而结果这种理解却是很严苛的。但其直接的意义(如果还不是最终的意义的话)却是本质的。佩什金的方法是以个案为中心，而仅仅是含蓄地论述了他对公众、自由和生存的持久关注。这部作品也能被称为工具性研究。

人们也认可其他类型的个案研究。怀特(White，1992)根据三种目的来划分社会科学个案工作的类型：身份认定(identity)、解释(explanation)和控制(control)。同样地，林肯和古巴(Lincoln & Guba，1985)论述了个案研究的五种功能。拉津(Ragin，1992)将个案研究成对地进行了分类：经验的个案和理论的个案，普遍的个案和特殊的个案。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通常会研究一些独特的事件、运动或时代，比如戈特沃尔德(Norman Gottwald)对犹太人身份认同的研究。但是不管事件或关系多么复杂，多么有影响力和边界性，只要它们不被认为是带有目的和本质的有机系统，我都不会将这种调查称为个案研究。

在别的地方的教学中，个案常常被用来说明一个观点，一个状况，一种分类(Kennedy，1979)。几十年来，法学院和商学院教授一直列举这些个案①。为了职员的发展和管理培训，这些报告编成了《个案研究杂志》(*Journal of Case Research*)，成为北美个案研究协会重要的出版物。由于是工具性个案研究，它们被用来进行教学和咨询。

人们也可以将传记作为单独的一类。撰写本书第20章的蒂尔尼就将个案置于中心位置，他认为传记特别要求关注时间顺序以及对于传主的保护。同样地，许多电视纪录片也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因为许多纪录片都可作为个案研究。一些民族志学者、理论批评家和人口学家遵循个案研究的概念和体裁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扩大了分类，也拓展了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公益服务中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在这里，我的分类目的不是分类学的，更确切地说，我想强调对"个案"关注的变化和"个案"的方法论定位。因此我主要关注三种类型：本质的、工具性的和集合性的。

---

① 法律上，"个案"有特殊的定义，法律本身的实践可以被称之为个案研究。

特殊性的研究

个案研究者既要寻找个案的共性,也要寻找个案的特殊性。但是最后的结果通常总是从以下方面获取资料,对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加以描述(Stouffer,1994):

- 个案的性质
- 个案的历史背景
- 自然环境
- 其他背景(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
- 有助于确认本个案的其他个案
- 有助于了解本个案的知情者

研究个案,说明特殊性,很多研究者会在上述所有6个方面收集资料。

对特殊性的追求总是与对普遍性的追求相矛盾。单个个案所具有的特征与所有个案都具有的特征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个案都有一些重要的非典型特征、意外事件、关系和状态。理解这些非典型特征的研究不仅消耗了从事普通性研究的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普遍性研究对于人口统计学问题和政策问题的价值。

只有当个案研究对于其他个案也具有普遍性时,大多数理论研究者才会支持个案研究。个案的独特性很少具有科学理论的成分。从事个案研究的研究者甚至受到定性方法论学者的规则限制,不十分重视对特殊性进行研究(Denzin,1989;Glaser & Strauss,1967;Herriott & Firestone, 1983;Yin, 1989)。在上述研究者和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撰写的个案研究作品中,似乎认为有关特殊性个案的本质性研究没有那些关于个案总体的普遍性研究重要①。一些人强调个案研究,把它当作其他个案的代表,或是产生推论的先导,或是理论建构的前期步骤。至少在我看来,个案研究方法无法像在传记、制度性自我研究(institutional self-study)、项目评估、治疗学实践和许多行业中一样被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特殊的本质性研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强调推论(Feagin, Orum, & Sjoberg, 1991;Simons, 1980)。

仔细分析相关文献,发现个案研究方法论的论述大部分是由那些认为个案研究应该为科学的推论做贡献的人所撰写。但是,大部分的个案研究工作都是由一些关注个案"本质"意义的个人完成的,他们对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调查设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解个案本身的意义,而不是从研究者和理论家的视角来理解个案。那些设计详细说明了被理解的是个案本身的问题、

① 回想在写本章初稿时,博尔达曾希望我放弃对本质性个案工作和特殊研究所做的努力。但我一直坚持,并且认为这对支撑规范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的,这种研究探讨很多重要问题,但是缺乏科学研究的强烈欲望。

背景和解释，它的“深度描述”。相反，工具性个案研究的方法促使研究者和理论家去描述在个案研究中如何展示自己的观点。因为重要的问题更可能已成为预设知识并且伴随着一定的学科研究预期，这样的设计往往充分利用了现成的工具和成型的方案。

在本质性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的确免不了要做推论，他们常常会对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在未来情景和其他的状况中进行推论，他们期望读者去理解已做出的解释，去改变他们（读者）自己的想法。因此研究者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去充分了解个案，并在报告中描述它复杂的意义——由于对个案的描述充分，读者能够间接感受这些偶然事件，并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也可能与研究者的结论不同）。

即使本质性个案研究也可以被视为获得最后结论的一个步骤（Campbell, 1975; Vaughan, 1992），特别是那些与现有规则背道而驰的个案。由于过分关注一般化和理论化，研究者不再注意理解个案本身的重要性，这对个案就会造成一种损害①。个案研究的研究者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即对个案复杂性的研究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不是个案的所有方面都要理解——只是需要选择理解多少，每个研究者都要做出决定。

背景和情境

由于个案独特的历史，它是一个在自然、经济、伦理、美学等大量情境下运作的复杂实体。个案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可以划分为部门（如生产部、市场部、销售部），群体（如学生、教师、父母），场合（如工作日、假日、靠近假期的日子），以及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领域——太多太复杂了，最多只能选取一部分进行研究。

整体个案研究方法要求分析这些复杂的情况，正如林肯和古巴在本书的第6章所指出的，大量的定性研究都建立在整体性观察基础之上，社会现象、人类困境和个案的本质都是情境的，并且受多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定性研究者有时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因果测定（Becker, 1992），但更经常的是去感知，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感知的，任何事情不会简单地单独发生。许多人发现寻找事情发生的原因没有价值，相反去突出事件的偶然性，将一些事件看作是目的性的，一些事件看作是情境性的，其中很多都是相互关联的。他们赞成这样的调查设计：寻找能够描述个案不同作用的资料。做个案研究不是要求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情境，但是这正是大多数定性研究者做研究的方法。

问题的组织

像所有研究一样，个案研究也有一个概念上的结构，它通常由几个研究问题组成。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信息性问题，如“谁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或“他的教学效果怎样？”而且也是论题或主题性的概念，比如“雇佣政策的改变要求工作业

---

① 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说过：“一项符合要求的民族志工作，其首要条件是应该涉及所有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方面”（Malinowski, 1922/1984, p xvi）。尽管总体情况的研究不是敏锐的眼力和长期的观察所能做到的，但其精神可嘉。

绩评价标准以什么方式改变?"或"最初只是针对男性患者的戒毒方法,是否有必要为女性患者重新定义?"

论题是复杂的、情境性和问题化的关系。它们既强调一般的经验,也强调语言以及对一般学科知识的理解,比如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批评。为了寻找与实验人员及假设检验人员不同的视角,定性个案研究者关注事物的复杂性,将自然环境中的普通实践与多种学科的抽象概念和主要问题联结起来。这个更广阔的视角适用于单个的个案,但是不取代它成为焦点。研究者头脑中继续保留着推论和证明的思想①。

上面两段提到的问题主要针对特殊性个案,但是它们的表达更普遍,"不实行赞助性招聘的雇佣政策的改变,要求工作业绩评价标准改变吗?"或"一般来说,针对男性患者的戒毒方法需要为女性患者重新定义吗?"即使这些表达是为了推论,但作为个案研究的组织者,这些问题也有助于加深对特殊个案的理解。

以某一个论题开始,研究者向社会提出一些"预示性问题(foreshadowed problems)"②,全力进行与问题相关的观察并对那些可以将论题发展为论断的资料模式进行阐释。表 16.1 按顺序显示了我曾经历过的一个项目评估,问题是针对一个假想的音乐教育项目的个案研究而设计的。

表 16.1 研究中问题展开的实例

1. 主题性问题:音乐教育计划的目标。
2. 预示性问题:社区大多数人支持把重点放在乐队、合唱队、表演上,但是一些教师和社区领导人要求强调知识性,包括进行历史、文学和音乐评论的教育。
3. 潜在问题:让全体教师在必修课中讲授音乐理论,或将音乐当作一门学科来讲授,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4. 断言:研究者发现这个社区不支持用额外的资金为所有中学生提供知识性的音乐教育。

在选择问题组织研究时,研究者会考虑他们的研究是本质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如果把个案当典型,他们会问,哪些问题可以显示我们最初的关注和最重要的主题?为了最全面理解个案,他们会问,令人信服的独特性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反映?针对一项评估研究,他们会问,哪些问题有助于显现优点和缺点?但一般来说,他们会问,哪些问题有利于调查计划和活动,包括鼓励和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问题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研究中能了解到什么。不同的研究目

① 费尔斯通(Firestone,1983),休伯曼(Huberman,1994),沃恩(Vaughan,1992)讨论了从集合性个案研究中得到的推论。

②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92/1984)声称,思想禁锢的人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人在行事上有很大区别。他指出:"好的理论训练以及对最新成果的了解,与'先入为主思想'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开始做一次考察,决心验证某种假设,如果他不能经常改变他的观念,在事实面前抛弃它们,不用说,他的工作将毫无价值。但是他带到实地的问题越多,他就越习惯根据事实建构他的理论,就越习惯从理论的角度观察事实,他对研究的准备工作就越好。在任何科学研究中,先入为主的思想都是有害的,但是'预示性问题',是一位科学思考者的天赋能力的重要体现,观察者凭借自己的理论研究才首先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p.9)

的会选择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也会选择不同的问题。可以说，在研究者和现象之间存在一份合约，一个研究者在为科学研究和当事人竭诚工作后，究竟他能了解到多少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呢?

用来组织研究的问题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那些用在个案报告中的问题。观察工作也与提交个案报告不同，最后，构成报告的可能是读者预期的问题。

叙 事

一些人要求让个案"讲述它自己的故事"(Carter,1993;Coles,1989)。我们不能确定，让个案自己讲述是否能讲得全面而清楚——但是这种讲述具有很强的"解释性"研究的特质，即寻找个案参与者话语中的功能意义。报告的风格有许多种，范曼尼恩(Van Maanen,1988)将其分为现实主义的、印象主义的、忏悔的、评论的、正式的、文学的和综合的。在开始时，任何人不可能知道问题、观念、理论将会是什么。个案研究者进入场景，预料到，甚至知道某些事件、问题、关系将是重要的，然而他们发现其中有些没有多大意义(Parlett & Hamilton,1976;Smith,1994)。个案的内容即使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也会不断变化。

作为文化表现和社会学文本的叙事受到诸多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口述历史和民俗学的影响，而且在"叙事研究"的写作中正变得更严谨(Clandinin & Connelly,1999;Ellis & Bochner,1996;Lockridge,1988; Richardson,1997;参见:*Jour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即使同情和尊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研究者也可以决定个案"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至少可以决定报告中报告什么。追求的东西往往比自动说出的多，报告的东西往往比已经了解的少。尽管称职的研究者也会受到个案中最重要问题的影响，尽管赞助人、其他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也会提出建议，但是，对于理解个案必须要做的事仍需研究者决定①。结果可能是个案本身的故事，但报告将是研究者对个案故事的叙述。这里不是不考虑寻找描述个案最佳故事的目的，而是提醒读者，通常是由研究者最终决定表述的标准②。

许多研究者都想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几乎不可能;讲述完整的故事超过了任何人的认识能力和讲述能力，即使那些倾向于讲述完整故事的人也认为有责任筛选和整合。全部讲述到什么都不讲是叙事的两极。像单一现象的研究者一样，整体论研究者也必须做出选择，选择的标准有很多(Van Maanen,1998)，一些标准是由赞助机构、预期的读者、修辞学的惯例、研究者的职业经历和出版可能性提出的;一些标准是由那些能充分地代表个案、容易理解个案的观念所决定

---

① 似乎我在此声称没有参与性评估(Cousin & Earl,1992;本书第38章)或参与性行动研究(Fals Borda,1998; Herson,1996; Whyte, 1991)这样的事情，但其实是有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解释的责任是分担的，而且必须分担。大多数研究者试图通过协商进行解释，但最终他们会决定需要报告的一套解释。无论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怎样，对于他或她来说有一个永久的职业道德，就是决定署名栏里包括哪些人。在这些情况下，研究的价值在于合作性的背景，对于读者来说，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

② 个案报告是对个案的表述，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表述的集合。表述霸权一直是后现代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Clifford,1983)。在根据个人的经验进行显露的描述与什么都不说之间，做出恰当的定位。

的。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与所有的研究者在决定研究什么时的选择没什么不同。一些选择在个案研究的设计阶段就做出了,但也有一些选择持续到研究的最后时刻才做出。

向特殊的个案学习

研究者是一个至少运用了两种教学法的老师(Eisner,1985):一种是教诲式(didactically)的教育,研究者将他或她已学到的知识讲授出来;一种是为教育学家称之为"发现的学习(discovery learning)"做准备,研究者为读者提供一些他们自己的学习材料,这些材料有些是老师熟悉的,有些是不熟悉的。一个人能从单个的个案中学到什么?坎贝尔(Campbell,1975)、汉米尔顿(Hamilton,1980)、凯米斯(Kemmis,1980)和殷(Yin,1989)提出了特殊性研究的认识论①。我们该怎样向异常的个案学习,与这个个案和其他个案的相似程度有关。然而,用拉津的话来说,"与以个案为取向的比较工作相比,以变量为取向的比较工作(如定量的跨国研究)往往脱离并模糊了个案"(Ragin & Becker,1992 p.5)。

从个案报告中,我们既增加了理论知识也增加了经验知识(Geertz,1983;Polanyi,1962;Rumelhart & Ortony,1977,Von Wright, 1971)。读者们还将某些描述和断言留在了记忆里。当研究者的叙述能引起共鸣时,读者们会记住那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主义的及民族志的个案材料与实际的经验是类似的,会进入意识和理解的基本过程,特朗布尔(Deborah Trumbull)和我将这些过程称为"自然主义的概括"(Stake & Trumbull,1982)。读者开始了解一些别人讲述的事情,就像是他或她亲身经历过一样。永久的意义来自于接触,并且由反复的接触修改和巩固。

就生活本身而言,这种情况很少在单独的个人身上发生,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在一个社交过程中,人们在一起相互改变、补充、合并、丰富他们的理解。我们开始了解到有一些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个案研究者会从一种社会经验即观察出发来设计另一种社会经验,即报告。知识是以社会经验建构的,建构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参见本书第7章),个案研究的研究者是以对自己经验和背景的描述帮助读者建构知识。

从研究者传递到读者的知识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读者都带有他们的概念框架,比如先行组织者(Ausubel & Fitzgerald,1961)、图式(Anderson,1977)、认识的演变(Bohm,1985)。有些这类框架是无意识的,仔细构建的框架可以促进交际。一些话语被贴上标签进入人们的思想、谈话和作品中,用来加强或减弱某种意义。联想变成关系,关系变成

① 为定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的早期科学哲学家有布卢默(Herbert Blumer)、格拉泽(Barney Glaser)、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默顿(Robert Merton)。

理论(Robinson,1951)。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读者而言,推论都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过程。

观念,就其个人的秘密性质而言,具有结构、侧重点、隶属关系、相互联系、背景、事例说明以及或赞成或怀疑的态度。然而一旦转向分享观念,像其他人一样,个案研究者无论他们的著作多么聪明,多么详细地阐述,只能传达给读者一些自己对事件和关系的理解——而不能传达另外一些看法。他们也知道读者会增加和删减,虚构和塑造,以不同的理解和对他们个人更有用的方式来重构知识。

研究者的个案知识从写作到阅读是一个冒险的旅程,作者会寻找一些保证旅行安全的方法。一开始阅读,甚至更早一点,该个案在众多的案例中已有了自己的位置。在读者的概念中,新案例必然是一些已知案例的组合,一个没有共通性的新案例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案例又不会引人注意,研究者不可能深谙已知的案例及读者独特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需要寻求一些方法保证和实现知识的传递。

研究者认识到必须适应读者先在的知识,尽管每个人每天都要应付这种需要并利用终身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几乎不知道如何将新经验和过去的经验结合起来。根据斯皮罗(Spiro et al.,1987)的观点,大多数个人经验都是结构不良的,不管从教学法方面还是从认识论方面考虑,都是不完备的。而一个结构良好的、论题性的表述常常不是传递经验知识的好方法。读者具有某种"认知弹性",即随时准备将新学到的知识碎片纳入与情景相关的认知图式中。斯皮罗等人认为:

> 为了获取将来用于表述知识的认知弹性,最好的学习和指导方法是以个案为基础的表述。这种表述方法是将一个知识认知域视为一片自然景观,对其从不同方向进行"纵横交叉"的勘察,比照相邻案例的不同背景重新审视每个个案的"现场",运用各种不同的抽象视角对个案进行比较(p.178)。

传递的知识仍然难以理解,尤其是个案的某个小方面如何被众多的读者发现,并据此去修改既存的对一般个案的理解,即使这个个案不是典型的①。在一所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里,我以同一套课堂礼仪规则观察每一位教师,只有观察亚当时例外,他是一个差点被开除的、不驯服的小伙子,观察中为他制定了一套更加宽松的原则(Stake,1995)。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阅读我的报告之后,都同意两种说法:"是的,你必须严格地照章行事。""是的,有时候你也必须修改规则。"他们认为报告中的事是一个既有例外又可以概括的情况。人们在个案报告中发现了对人类状况的某种洞察和了解,即使知道这个个案是非典型的。他们可能太敏感以致拒绝接受这种知识,个案研究者必须提供证实观察和推论的理由。

---

① 社会学家运用"微观/宏观"的概念,指代从对单个的个案或部分的理解到对整个系统理解的跨越。即使没有合适的认识论路线可循,社会学家实现了这一飞跃,读者也是如此(Collins,1981)。

三角测量

由于报告和理解都是“结构不良的”(并且处在建构主义的氛围中),在这里发现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和对多种视角的支持是毫不奇怪的。而且我还遇到一些对他们自己传达信息的清晰度和有效性漠不关心的个案研究者。即使意义不是完整地传递而是塞进读者的大脑中,对研究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对状况、观察、报告和阅读的判断具有相关性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如何解释精确性,研究者当然希望精确,希望被承认。马克斯韦尔(Maxwell,1992)曾经撰文论述有必要分别考虑描述、解释、理论、推论以及评估判断各自的有效性。

为了减少误解的可能性,研究者运用了多种方法,其中最常用的两种是:收集尽量多的资料以及对解释程序上的挑战(Denzin,1989;Goetz & LeCompte,1984)。对于定性个案工作来说,这些方法通常被称为“三角测量”。三角测量一般被认为是运用多种视角去阐明意义的方法,证实观察和解释的可重复性①。但是,它承认没有哪一种观察和解释是完全可重复的,三角测量也适合运用不同的方法观察现象来阐明意义(Flick,1998;Silverman,1993,参见本书第 34 章)。

比　较

研究者将他们的个案作为个案报告,也知道它们将和其他个案比较。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在做比较,或是为读者提供比较个案,或承认对每个读者来说参考个案是不同的过程中承担多少责任。大多数自然主义的、民族的、现象学的研究者都会集中对当前个案进行详细描述,以便读者能较好地做出比较。研究者有时会把注意力引向可能做出的比较。许多定量和评估个案研究者会试图提供一些比较:有时提出一个或多个参考个案,有时从假想的参考个案中为参考群体提供统计模型。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方法都只能为严格的个案比较提供有限的理由,尽管在比较人类学和相关学科中有大规模比较的传统(Ragin,1987;Sjoberg, Williams, Vaughan, & Sjoberg, 1891; Tobin, 1989)。

我把比较看作是与认识特殊个案和向特殊个案学习的竞争。比较是一个总的认识论策略,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机制,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或少数几种特征上,并且模糊那些不利于比较的个案知识。比较描述与格尔茨(Geertz,1973)所说的“深度描述”相对立,比如,音乐节目的深度描述常常包括对人员安排的理解,最近计划的改变,合唱队指挥的魅力,与教堂风琴手的工作关系,学校董事会决定性投票中的各种利益,以及对单簧管感兴趣的学生的缺乏。在对这些细节进行描述的过程中表现了个案的生命力、缺陷和独特性。比较可以在这些特征中的任何方面进行,但它往往更加关注音乐节目组织中传统上更具普遍性的变化因素,比如人员安排、预算、巡回演出保险单。由于注重对一些基础方面进行比较,独特性和复杂性被掩盖了。一项以比较为特征的研究设计往往用“比较”

① 创造性地运用“成员检验”,相互验证资料的来源,这是检验定性研究效度的一种必要形式(Glesne & Peshkin, 1992; Lincoln & Guba,1985)。

取代作为研究重点的“个案”。

不管个案研究的类型如何——本质的、工具的或集合的——读者都不能从仅仅是为了比较而选取的对照个案或者参考个案中学到什么。当然,如果多个个案同属本质性研究,那么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用的①。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比较的个案中,最多只有一个具有本质研究意义的个案。读者直接从描述中了解个案的本质性意义,同时他们不忽略比较,但是不专注于比较。通过分析工具性个案研究,读者可以了解现象是怎样存在于特殊个案之中的。至于精确性,差异比简单测量更不准确。同样地,任何两个个案之间差异的结论比一个个案的结论更不可信。但是在几种典型的情况下,对某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解释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和可靠的知识(Vaughan,待出版)。

有很多个案概念化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从个案中受到启发。个案被认为是起作用有影响的事物,对这些作用影响的观察就是个案研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描述和说明。大多数自然主义的、整体论的、民族志、现象学个案研究的概念需要精确的描述和主观然而严谨的解释。对现象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好奇,对当地场境的具有同性的描述——都混合(也许是凝聚)在建构主义者的认识论中。

为研究做准备

定性个案工作最简单的规则也许是这样的:将你的聪明才智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脑力劳动表面上是可以观察的,但更主要地,它是“反思的”②。在不断地反思中,研究者致力于仔细考虑印象、记忆和记录,但没有必要追随理论家、演员和观众的思想(Carr & Kemmis,1986)。局部的意义是重要的,预示的意义是重要的,读者相应而生的意义也是重要的。个案研究者必须弄清楚这三种意义,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更关注其中一种意义。在每一个个案中,工作都是反思的③。

如果将定性个案工作模型化,从第一次看见数据到反复接触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资料有时是预先编码但又会不断进行阐释,我们仔细分析记录和表格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分类和确认模式,而且也为了“交叉”思考(Spiro et al.,1987)。对某一观察现象的诠释总是参照一个问题、一种视角或一种功用目的进行,其后又参照其他的因素进行诠释。定性个案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在现场花

---

① 通过比较创新研究项目和对照个案研究(control case)所进行的评估研究常常不能做合理的比较。无论研究做得多好,对照个案都无力代表读者所熟悉的其他个案。通过全面描述该创新项目个案,研究者应该帮助读者自己得出自然主义的推论。

② 我更喜欢将生成的意义叫做“阐释性的”,但民族志者运用“反思的”这个术语去表示“了解行动者的独特观点,本土的意义”(参见:Erickson, 1986;本书第7章)。

③ “反思的”民族志用法有时使注意力局限在自我质疑与研究者本人相关的外在物质性问题、参考框架、文化偏见(参见:Tedlock,本书第17章)。这种挑战是重要的,但是按照唐纳德(Donald Schön,1983)的说法,当我将定性个案研究称为“反思的”时候,我指的是一般的思想框架。

费较长的时间,亲自与个案活动相接触,反映并修正在实际活动中的意义。

合 作

自然主义、民族志和现象学个案工作者一直在事件、场境和价值表达中寻求“一般性”。布卢默(Blumer,1969,p. 149)要求我们去接受、完善和运用(特殊个案的)区别性表达方式,以便发现和研究共同性。研究者不能亲自看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可以通过访问别人或查找文献获得。在本书第Ⅳ部分全面论述了定性研究方法,特别是观察、访谈、编码、资料处理和解释,这些都是定性个案研究方法。

用文献说明一般性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和撰写报道。在许多研究中,都没有界限清楚的阶段划分: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到研究结束,从初步的观察开始就撰写报道。一个严密的,有页码划分的报告提纲有助于预测问题将会如何论述,个案如何变得引人注意。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做一项无结构的、开放的研究是一场灾难。个案工作者需要对随后出现的问题做出预测。许多定性的实地工作者在设备上投入很少,部分因为即使是普通的个案也很少为人所知。预算很快就被设计以及实地试验设备所消耗以致不能去研究那些预示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经成型,有些即将消失,有些变得更加复杂。“一般性”很复杂,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掌握。

当个案规模太大,一个研究者无法充分认识,或是面对一个集合性的个案研究时,可以选择小组合作的形式。方法要求综合地、整体地理解个案,但是在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中,没有哪个人能独自处理复杂性。如果这个小组相当熟悉程序并且组员合作很默契,那么编码可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在研究期间学习一套详细的分析编码系统,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负担(Smith & Dwyer,1979),会减少观察的类型,浪费了在实地工作的时间。现场、重要的群体或行动者、问题都应该尽可能地分配给小组成员,包括资历较浅的成员。个案研究的各部分和问题也必须减少到所有的小组成员都能理解的程度,最好是商定一下哪些部分研究,哪些部分不研究,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小组成员各自报告他(或她)负责的部分,其他小组成员阅读并提出评论。通常小组负责人需要在获得小组成员、资料提供者和喜欢质疑的朋友的批评意见后写一份综合报告。

个案选择

在社会科学和公共事业中,个案研究最独特的方面也许就是研究个案的选择。本质性个案工作通常从已经确定的个案开始。医生、社会工作者、项目评估员在接受个案时没有选择,这些个案在正式研究前就已经具有显著意义。工具性和集合性个案研究通常要求研究者挑选个案。理解重要的现象需要恰当地选择个案(Patton,1990;Vaughan,1992;Yin,1989)。假定我们想了解扣押人质的人的行为,并且决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调查。扣押人质并不会经常发生——在整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个案可以选择。让我们想象一下,通常的选择是银行

抢劫犯、劫机犯、一个已经分居的绑架了自己孩子的父亲等。我们想要概括扣押人质的行为，然而上面提到的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例子，都只有很小的代表性。

一个人如果按照本书第29章所提倡的方法做研究设计，那么选择合适的样本就是最重要的。对于这种设计，必须规范地抽样，要求个案能代表某个个案总体，个案中具有显著意义的现象能代表更大规模的现象。对于休伯曼和莫里斯，殷和马林诺夫斯基而言，主要的任务是获得最能解释现象的技巧(Von Wright, 1971)。开始，现象是特定的，个案只是为研究现象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即使在较大的集合性个案研究中，样本规模通常也太小不能保证随机选择。对于定性的实地工作，我们通常根据目的选取一个样本，构建多样性，并寻找机会以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扣押人质的现象，我们想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认为它与我们所了解的有关犯罪学、冲突解决、人类关系即各种"抽象维度"相一致①。我们承认，有一个假设的较大的个案总体，还有一个较小的可以观察的个案子总体。我们想从所有研究的个案中概括出扣押人质的一般特征。从代表性的角度来看，认识论的机会似乎很小，但是我们有信心从任何个案中了解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样本。人质对于扣押他们的人来说通常是碰巧遇到的陌生人。我们可以不研究父亲扣押自己孩子作为人质的情况，尽管这样的绑架可能更普遍，但是我们排除父亲。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伴随犯罪行为的扣留人质，为了获得庇护的扣留人质行为。研究者为分析现象中的各种意义，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但对于其他个案来说似乎只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的选择可能是去研究一个我们能从中获得最多的个案②。那也许意味着选择一个最容易接近的个案，一个我们能花很多时间和它在一起的个案。有学习的可能性与代表性是不同的，有时是比代表性更高的标准。如果我们能从一个非典型的个案学到更多，而从一个表面典型的个案中只能学到较少东西，那么选择非典型个案不是更好吗？

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我们对儿童博物馆里的互动式展览(游客操纵并能得到反馈)的吸引力感兴趣。我们有四个博物馆可以作为四个个案进行集合性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分类，也许是①博物馆类型(即艺术、科学和历史)，②城市类型(即大城市和特大城市)，③节目类型(即展览性和参与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12单元的矩阵。样本不可能在所有12个单元中找到，财力也不允许我们去研究12种类型。由于要研究四个博物馆，我们可能考虑要有一个艺术的、一个历史的、两个科学的(因为互动式展览在科学博物馆更普遍)，两个位于大城市，两个位于特大城市，每种节目类型分别两个。但是当我们实际考虑现存的个案、

---

① 正如在前面的部分所指出的，我将它们称为问题或问题域，肯尼迪(Kennedy, 1979)称之为"相关的属性"。斯波罗(Spiro et al., 1987)称之为"抽象维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2/1984)称之为"理论"，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理论而不是学科中的"宏大理论"将成为我们的"指导性理论"。

② 我的重点在于最大限度地去了解单个的个案和现象，如果特殊的情况能对问题产生非同寻常的理解，那么应该特别关注现象。

后勤、接待的可能、财力和其他相关特征时,我们倾向选择四个具有多样性(不符合结构性代表)交互特征的博物馆去研究,这四个博物馆能为我们了解互动式展览提供最好的机会①。从权衡设计的角度来看,四个博物馆的最好选择也不能提供对博物馆总体的令人信服的描述,当然也不能提供统计数据去推论互动性与现场特征的相互作用。因此,几种合适的类型通常只好放弃了。即使对于集合性个案研究来说,通过特征来做抽样选择也不是最好的。权衡和多样性是重要的,学习的机会则是最重要的。

个案中的个案

本质性个案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选择过程。即使个案已经预先确定(这是通常的做法),在要观察的人物、地点、事件上也存在选择。在这里,训练和直觉又一次告诉我们要寻找一个好的样本。假定我们准备研究这样一个项目:为了教学目的,将电脑放在四年级学生的家里②。个案——即学校——已经选好。尽管得到了一定的配合,每一个研究者都有一个个案可以研究,但主要的问题还牵涉到家庭。因为电脑放在家里,所以人们对电脑的使用有某种期望(电脑可以被家庭成员用来进行文字处理、资料保管、玩游戏,但应该留出一定的时间给四年级学生做家庭作业)。与放在什么地方相关,现在有 50 个家庭有电脑,研究者可以从每个家庭中都得到一些信息,但是只能进入少数几个家庭进行观察。应该选择哪样的家庭?正如在集合性个案研究中一样,研究者会注意一些有意义的特征:四年级学生的性别、兄弟姐妹、家庭结构、家庭教养、以前对电脑的使用和其他技术装置等。研究者和知情者讨论这些特征,得到一些建议,访问几个家庭,获得一些含有本质特征的资料。选择的样本应该保证多样性,但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这里,获准进入的因素,甚至好客都是选择时要重点考虑的,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们从冷淡的父母那里不能了解到什么东西③。这里,学习的机会仍然是最重要的标准。

伦　理

在本书的第 5 章克里斯琴斯讨论过定性研究的伦理问题(Coles,1997;Graue & Walsh,1998,在别的地方也讨论过)。个案研究一般涉及大众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不管是大众还是学术界都没有"知情权"。基金资助、学术目的、口头的允诺都不意味着可以侵犯别人的隐私,最好的研究价值也不可能与披露人所造成的伤害相比。定性研究者在人们的私人空间只是一个客人,他们应该有合适的礼仪举止和严格的伦理规范。

与大多数定性工作一样,个案研究也对个人的观点与境况非常感兴趣。对

---

① 费尔斯通(Firestone,1993)建议将种类最大化并且"尽可能地像一个研究兴趣的总体"。

② 这是发生在 Buddy 计划中的事实,是 1990—1993 年印第安那州公立学校改革成果的一部分。

③ 巴顿(Patton,1990),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以及费尔斯通(Firestone,1993)曾讨论过随着时间变化连续选择个案的问题。

被研究者生活和言谈的描述不仅可能造成对他们身份、职业和自我尊重的伤害，而且会暴露隐私和使他们难堪。在透露什么、保留什么方面，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契约的关系——道德义务，而这种约定通常是非正式的，但最好具有书面形式(Schwandt,1993)①。对身心健康可能造成的伤害不能一一列出但是应举例说明。用于观察和报告的问题应事先讨论，能够进入的范围也应考虑和协商。对于目标人群来说，让他们获得报告草稿，了解他们将会被如何报告、引述和解释是很重要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应充分考虑这种关注，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却又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应特别谨慎，以将风险降到最低。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被研究者也不一定能保护自己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不受伤害。研究者必须按照规定保护被研究对象(反对那些仅仅使机构免于起诉的规定)。研究者应该不仅仅遵从这些规定，还应避免研究敏感性问题，并且找几个顾问和评论员完善这种保护性制度。

由于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行为未公开，(围绕研究议题)出现了伦理问题。当制订的研究规则不允许研究者揭发，或限制他表达同情时，问题就出现了。当人们期望考察规范的行为，但没有提到一些严重违反规范的行为时，报告是不可信的。伦理的违背很少是单一的事情，如果同时应用两种矛盾的标准，它就会发生，比如不允许全部披露(按照约定)以便保护一个好的但却容易受伤害的中介机构(Mabry,1999)。来自于良心、利害相关者和研究界的推动，这种进行过程中的和总结性的反省程序是必要的。

小　结

定性个案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如下：

1. 界定个案的范围，将研究对象概念化。
2. 选择现象、主题或问题——即研究问题——的侧重点。
3. 寻找阐明问题的资料模式。
4. 对用来解释的关键数据和主要成分进行三角测量。
5. 选择合适的解释方式。
6. 提出断言或将个案概化。

除了第一步以外，剩下的步骤与其他定性研究者采取的类似。定性研究者越是关注个案的本质意义，研究的重点就越集中在个案的独特性，特殊的情境、问题和素材上。

个案研究者在写作风格上的选择包括：

---

① 保护那些提供有限资源的人是一项特别的责任。那些遵从研究者要求的人，那些在某方面为个案研究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都不应该因此而受到伤害。当伦理和道德被持续地违背或者这种违背成为研究的前提时，研究者必须采取一些改善行动。披露和批评在个案研究中都是正当的，但是诱导被访者自我谴责在研究和法律中都是不正当的。

1. 将故事讲到什么程度。

2. 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个案相比较。

3. 在多大程度上作出有效推论或者把它留给读者。

4. 在报告中包括多少对研究者互动的描述。

5. 是否匿名以及匿名到什么程度。

个案研究是科学方法论的一部分,但它的目的却不仅仅是促进科学进步。单个的或少数个案对于个案总体的代表性是不足的,对于总体推论的提出也是缺乏依据的。然而,"因为一项分析可以由多种理论观念来指导,所以一个个案研究可能会出现证实或进一步解释某种论断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与论断相矛盾的结果"(Vaughan, 1992,p. 175)。比如,当我们发现一个造成伤害的案例时,我们就不会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会好些"进行推论了。个案研究对改进理论和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确立推论的范围也有帮助。

个案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人类经验的反思也是一种有约束的力量。对于改善行为选择和期望来说,引起共鸣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规范的认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从单个个案的描述中得到对其他个案的推论的——虽然并不总是正确,但还是可以被不同观点的人分享。个案报告的目的不是去代表整个世界,而只是代表个案。这类能进行有效推论的研究标准需要修改以适应对特殊情况进行研究。对于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个案研究的作用就在其对经验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定性个案研究方法就是规训个人和具体经历的方法。

参考文献

Adams, H. (1918).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An auto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derson, R. C. (1977). The notion of schema and the educational enterprise. In R. C. Anderson, R. J. Spiro, & W. E. Montague (Eds.), *Schooling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pp. 415-43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mussen, K. J., & Creswell, J. W. (1997). Campus response to a student gunman. In J. W. Creswell,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pp. 357-373).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5, 66, 575-591)

Ausubel, D. P., & Fitzgerald, D. (1961). Meaningful learning and retention: Interpersonal cognitive variable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1, 500-510.

Becker, H. S. (1992). Cases, causes, conjunctures, stories, and imagery.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205-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ket,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8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Boston: Allyn & Bacon.

Bohm, D. (1985). *Unfolding meaning: A weekend of dialogue with David Bohm.* New York: Routledge.

Campbell, D. T. (1975). Degrees of freedom and case stud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 178-193.

Carr, W. L., & Kemmis, S. (1986). *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Carter, K. (1993). The place of story in the study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1), 5-12.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1999).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lifford, J. (1983). On anthropological authority. *Representations*, 1, 118-146.

Coles, R. (1989). *The call of stories: 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les, R. (1997). *Doing documentary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984-1014.

Connell, R. W. (1985). *Teachers' work.*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Cousins, J. B., & Earl, L. M. (1992). The case for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4, 397-418.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1999). Researching practice settings: A case study approach. In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lamont, S. (1992). *Fieldwork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Methods, pitfall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Falmer.

Denzin, N. K. (1989).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Eisner, E. W. (Ed.). (1985).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ways of knowing* (84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ickson, F. (1986). Qualitative methods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In M. C. Wittroc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3rd ed., pp. 119-161). New York: Macmillan.

Fals Borda, O. (Ed.). (1998). *People's participation: Challenges ahead.* New York: Apex.

Feagin, J. R., Orum, A. M., & Sjoberg, G. (1991).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Firestone, W. A. (1993). Alternative arguments for generalizing from data as applied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4), 16-23.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eertz, C. (1973).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pp. 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lesne, C., & Peshkin, A. (1992). *Beco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An introduction.*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Goetz, J. P., & LeCompte, M. D. (1984).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oode, W. J., & Hatt, P. K. (1952). The case study. In W. J. Goode & P. K. Hatt,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pp. 330-340). New York: McGraw-Hill.

Gottwald, N. K. (1979). *The tribes of J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 C. E.* Maryknoll, NY: Orbis.

Graue, M. E., & Walsh, D. J. (1998). *Studying children in context: Theories, methods, eth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milton, D. (1980). Some contrasting assumptions about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survey analysis. In H. Simons (Ed.), *Towards a science of the singular* (pp. 76-92). Norwich, Englan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Heron, J. (1996). *Co-operative inquiry: Research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London: Sage.

Herriott, R. E., & Firestone, W. A. (1983). Multisite qualitative policy research: Optimizing description and generalizabilit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2(2), 14-19.

Huberman, A. M., & Miles, M. B. (1994).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ethod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28-444). Thousand Oaks, CA: Sage.

Kemmis, S. (1980).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ase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tudy. In H. Simons (Ed.), *Towards a science of the singular* (pp. 93-142). Norwich, Englan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Kennedy, M. M. (1979). Generalizing from single case studies. *Evaluation Quarterly*, 3, 661-678.

Kolker, A. (1996). Thrown overboard: The human costs of health care rationing. In C. Ellis & A. P.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pp. 132-159).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Kozol, J. (1991).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Harper.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ckridge, E. (1988). Faithful in her fashion: Catherine Barkley, the invisible Hemingway heroin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8, 170-178,

Mabry, L. (1998). Case study methods. In H. J. Walberg & A. J. Reynolds (Eds.), *Advances in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Vol. 7. Evaluation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pp. 155-170). Greenwich, CT: JAI.

Mabry, L. (1999). Circumstantial ethics.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20, 199-212.

MacDonald, B., Adelman, C., Kushner, S., & Walker, R. (1982). *Bread and dreams: A case study in bilingual schooling in the U. S. A.* Norwich, Englan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Malinowski, B. (1984).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Maxwell, J. A. (1992).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3, 279-300.

McCormick, S. (1994). A nonreader becomes a reader: A case study of literacy acquisition by a severely disabled reader.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9(2), 157-176.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ris, E. (1979).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negan.

Parlett, M., & Hamilton, D. (1976). Evaluation as illumin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novative programmes. In G. V Glass (Ed.), *Evaluation studies review annual* (Vol. 1, pp. 141-157). Beverly Hills,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eshkin, A. (1986). *God's cho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lanyi, M. (1962).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gach, M. C. (1998). *On the border of opport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language at the U. S. -Mexico lin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Quinn, W., & Quinn, N. (1992). *Buddy evaluation.* Oakbrook, IL: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gin, C. C. (1992). Cases of "What is a case?"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1-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gin, C. C., & Becker, H. S. (Eds.). (1992). *What is a case ?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isin, S., & Britton, E. D. (Eds.). (1997). *Bold ventures: Patterns among U. S.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W. S. (1951).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analytic in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812-818.

Rumelhart, D. E., & Ortony, A. (1977). The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in memory. In R. C. Anderson, R. J. Spiro, & W. E. Montague (Eds.), *Schooling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pp. 99-13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chö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wandt, T. A. (1993). Theory for the moral sciences: Crisis of identity and purpose. In G. Mills & D. J. Flinders (Eds.), *Theory and concep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23).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London: Sage.

Simons, H. (Ed.), (1980). *Towards a science of the singular.* Norwich, England: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Sjoberg, G., Williams, N., Vaughan, T. R., & Sjoberg, A. (1991). The case approach in social research: Basic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J. R. Feagin, A. M. Orum, & G. Sjoberg,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pp. 27-7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L. M. (1994). Biographical method.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86-3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Smith, L. M., & Dwyer, D. (1979). *Federal policy in action: A case study of an urban education projec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mith, R. (1889). *An Aberdeenshire village propaganda: Forty years ago.* Edinburgh: David Douglas.

Spiro, R. J., Vispoel, W. P., Schmitz, J. G., Samarapungavan, A., & Boerger, A. E. (1987). Knowledge acquisition for application: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transfer in complex content domains. In B. C. Britton (Ed.), *Executive control processes* (pp. 177-199).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take, R. E. (1978). The case study method of social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7(2), 5-8.

Stake, R. E. (1988). Case study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Seeking sweet water. In R. M. Jaeger (Ed.), *Complementary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253-27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take, R.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ke, R. E., & Trumbull, D. J. (1982). 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s. *Review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7, 1-12.

Stenholm, B. (1984). *The Swedish school system.*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Stenhouse, L. (1984). Library access, library use and user education in academic sixth forms: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In R. G. Burgess (Ed.),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Ten case studies* (pp. 211-234). London: Falmer.

Stouffer, S. A. (1941). Notes on the case-study and the unique case. *Sociometry*, 4, 349-357.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Tobin, J. (198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ughan, D. (1992). Theory elaboration: The heuristics of case analysis.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173-2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ughan, D. (1999).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s: Mistake, misconduct and disast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271-305.

Vaughan, D. (in press). *Theorizing: Analogy, cases, and compara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n Wright, G. H.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hite, H. C. (1992). Cases are for identity, for explanation, or for control.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83-1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yte, W. F. (Ed.). (199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London: Sage.

Wieviorka, M. (1988). *Sociétés et terrorisme*. Paris: Fayard.

Wieviorka, M. (1992). Case studies: History or sociology?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159-1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in, R. K. (198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Yin, R. K. (1992, November). *Evaluation: A singular cra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

民族志和民族志描述 17

ETHNOGRAPHY AND 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 巴巴拉·泰德洛克

民族志意味着一个正在进行的尝试，这种尝试把一些特殊的遭遇、事件和理解置于一个更完整、更有意义的背景中。它不仅仅是新信息或研究数据的生产，更是把这些信息或数据转换成书面的或形象的形式的方法。因此它包括了研究设计、田野调查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方法，用这些方法去创造关于人类生活的，植根于历史、政治情景中的，富含个人直接体验的说明、记述、阐释和描绘。作为一种描述的实践，民族志与其说是在田野中获得的过去经验的清晰记录，不如说是一种田野调查的延续。田野调查不间断的性质连接了重要的个人经验和一个知识领域，所以，民族志兼具自传的内在主观性和文化分析的外在客观性。

因为民族志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产品，民族志学者们的生活都以一种方式嵌入他们的田野调查经验里，这种方式是，他们所有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涉及道德选择。经验是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正是由意义所引起，并因意义而被理解。因为民族志学者们穿越了地域和语义的界限，通过各种交织的声音塑造文化，理解文化，他们对一些人而言是英雄，对另一些人却显得荒谬可笑。他们是一群戴着异族服饰，穿着内部人的服装的外部人，并且逐渐习得了与服饰一致的语言和行为。

民族志长期以来被奉为一种方法，一种理论取向，甚至是人类学内的一种哲学范式，最近被推广到（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有用的方法论）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民俗学①、女性研究、社会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在大量的应用领域如教育、咨询、组织研究、规划、临床心理学、护理、精神病学、法律、犯罪学、管理学以及工业工程学等领域，民族志也被证明是有用的。无论它被应用到什么领域，都有一个核心假设，即通过与人们（某人自己或他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亲密的和相对长期的互动，相对于采用其他任何方法，民族志学者们都能更好地

---

① 接受一个高度参与的角色，有时甚至做学徒的人，有：Reichard，1934；Hurston，1938；Dunham，1969；Jules-Rosette，1975；Maquet，1975；Riesman，1977；Chernoff，1980；Cooper，1980；Harner，1980；Peters，1981；Hayano，1982；Schipper，1982；Tedlock，1982；Dalby，1983；Johnson，1984；Turner，1985、1993；Rose，1987；Coy，1989；Dilley，1989；Stoller，1989a；Wafer，1991；Seremetakis，1993；Knab，1995；Friedson，1996；Emad，1997；Tarn，1997；Prechtel，1998。

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的信仰、动机和行为(Hammersley,1992)。

民族志简史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学家已经采用了大量的民族志方法去收集、分析和呈现信息。在 19 世纪晚期,英国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发表了《关于人类学的记录和质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874)。这份文献的目的,一是帮助作为旅行者的理论家获取"准确的人类学观察,二是使那些自己不是人类学家的人们能提供科学的人类学研究所需的资料"(p.6)。这份充满了民族中心主义观点和主要问题的文件被广泛发给旅行者、商人、传教士、政府官员。埃德华·泰勒这位牛津大学博物馆的管理员和人类学的审稿人,帮助修订了早期的问卷,但很快又断定,某些更有价值的结论应建立在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的"个人调查"的基础之上(Stocking,1983,p.73)。为实现该目标,他创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加拿大自治的西北部落的物理特性、语言、工业和社会条件并出版调查报告"(Tylor,1884)。另一份相似的文献是由福拉泽(James Frazer)撰写的,名为《关于野蛮、半文明人类的礼仪、风俗、宗教、迷信的问题》(*Questions on the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Superstitions, etc. of Uncivilized or Semi-Civilized People*,1887)。因为他的这本小册子出版的目的是促进他自己对《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比较研究,它恰好被设计来收集那些切合他自己的理论的资料。作为一种调查方法,问卷在早期的不成功的使用导致学者们尝试自己的田野调查,以收集他们自己的,可能更为可靠的信息。

第一手的学术性"田野调查"的概念来源于实地博物学者哈登(Alfred Cort Haddon)的著述。1930 年,在他接任伦敦人类学研究院院长的就职演讲中,他阐明了"新田野调查"的迫切需要。他告诫要谨防"速效收集资料方法",强调对于研究者来说,必要的不是仅仅"收集标本",而是通过长时间的耐心的移情理解,从本土人那里发掘出资料中蕴藏的更深层的关联和意义(Stocking,1983, pp.80-81)。他的运用移情方法的理念在北美早已成为一种惯例。到 19 世纪晚期,得益于斯蒂芬森(Matilda Cox Stevenson)、弗来彻(Alice Fletcher)、鲍斯(Franz Boas)、库辛(Frank Hamilton Cushing)在土著美国人中开展的田野调查,经验地获取关于异族文化的知识模式取代了"扶手椅方法(arm-chair methods)"(Visweswaran,1998)。库辛在新墨西哥的祖尼普韦部落(1879—1884)时,写信给自己在史密斯索尼安学院的雇主,信中他说道:"我的方法定能成功。我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我吃他们的食物,住在他们的房屋里……鉴于此也感谢上帝,我的笔记将包含很多所有其他探索者未曾传达的信息。"(Cushing,1929. pp. 136-137)

虽然库辛认识到自己直接参与到研究对象正在进行的生活中,并将此作为

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从而跻身成为早期民族志学者之一，但将田野调查当作一种范式或理论加以系统阐述的却是马林诺夫斯基。然而，田野调查方法显然不是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的①。他的功绩是确立了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志的中心要素的地位（Rabinow，1985，p.4）。自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2）提议民族志学者的目标应是抓住“本土人自己的观点”（p.25），学者们就一直期待通过田野调查者学习一个局内人或本土人那样去观察、思考、体验，甚至行动，参与观察能实现对人类的理解和认识。由于强调经验的方法，强调研究者要进入他（她）所研究的社会，至少被该社会部分社会化，学者们普遍建议田野调查者采取“边缘本土人（marginal native）”（Freilich，1970）或“专业的陌生人（professional stranger）”（Agar，1980）的角色。作为“自我否定的特使”，田野调查者提出了一种关于他们的研究的社会情景的民族志。在研究情景中，民族志学者应该与他们所研究的人保持一段友善的距离，培养和睦的关系而非友谊、怜悯而非同情、尊重而非信仰、理解而非认同、赞赏而非爱。如果民族志学者培养了友谊、同情、信仰、认同、爱，那么，就如我们已被告知的那样，他（她）在冒成为“完全的成员”（Adler & Adler，1987）或“成为本土人”的危险。

“变成本土人”的消极形象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殖民主义小说里。小说塑造了殖民者，他们被赋予一种深刻的种族话语，这种话语同样反映殖民地的其他方面。虽然殖民者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文化和种族进化的最高阶段，但他们同样被想象成有可能从顶峰跌落下来。退化、“变成本土人”，或换句极端的表达，“退化到热带土著人的状态”，是描写热带地区的白人旅行者和居民的小说的一个的共同主题（Ever，1999；Pick，1989；Young，1995）。两部此类的经典小说是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Wild*）。在康拉德关于库尔茨（Kurtz）由体面向野蛮堕落的描写中，他创造了一个故事，它揭示了殖民主义者在国外的脆弱性。如许多民族志学者一样，伦敦小说中的角色的生活方式与土著人的相异，他们保持着殖民主义者的声望、权力、权威，它们是由服饰、手表、收音机等物品显现出来的。他们“变成本土人”的方式，是道德的退化，而不是吸纳表面上的服饰和本土人的纹身等文化标记。

早期的“变成本土人的田野调查者”的民族志例子包括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昂克尔（Curt Unkel）、埃尔温（Verrier Elwin）。这些欧洲学者（分别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在20世纪早期进入田野，目的是研究本土居民的文化。他们在大部分或全部余生中都居住在那里，流利地使用当地的语言，深深地认同本土的文化。大卫—尼尔在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锡金、日本、中国居住14年，学会了大量的非欧洲语言，包括所有的西藏方言。她独自在山洞里

---

① 自从纳德（Nader，1969）提倡“上层研究”，对政治精英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科学和生物医学里很多有威望的领域精英的研究，参见：Latour，1987；Martin，1987；Traweek，1988；Cassel，1991，1998。也有人企图做“平行研究”（Cassel，1988，p.89），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伙伴之间只有很小的权力差距。欲了解“上层研究”、“下层研究”、“平行研究”之间在优点和问题方面的比较，参见：Schrijvers，1991。

冥想,在冰雪覆盖的山峰与瑜珈隐士相伴,学习佛教哲学和西藏密经(David-Neel,1963,1959)。在正式成为佛教徒后,她乔装打扮去拉萨拜见达赖喇嘛,当时拉萨禁止所有外国人进入(David-Neel,1927)。尽管她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精于创造脱离躯体的思维形式、幻想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温度,她仍保持着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哲学怀疑论。她曾写道:"理性地和科学地进行的通灵训练能导致人们期待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取的关于此类训练的信息……构成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有用的文献记录证据。"(David-Neel 1932,p.6)

昂克尔正式被巴西的古阿拉里(Guaraní)印第安人接纳,取名为里穆恩达居(Nimuendajú),但他在贝伦(Belém)城的家仍然保持着欧洲风格,在那里他撰写了详细的民族志专题论文(Nimuendajú,1914/1978,1939,1942,1946,1952)。虽然在开展田野调查以前,他只接受过一点点正式的训练,但他与著名的民族志学者洛伊(Robert H. Lowie)相互合作①,在他们的合作下,他的写作方式可能被称为是"对话式的(dialogic)"(Damatta,1994,p.123)。埃尔温是20世纪30年代只身来到印度的英国人,与一个部落的女子结了婚,被接纳为印度公民,并被誉为重要的印度人类学家的先驱(Misra,1973)。他出版了异常详细的民族志和民俗集,它们无论在印度还是英格兰都深获赞赏(Elwin,1932,1942,1946,1947,1954,1961)。

对于这些民族志先驱来说,田野调查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生新阶段。更为甚者,他们的民族志经验的鲜活事实是他们知识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中心。就如埃尔温(Elwin,1964)在其自传中所言:"对我而言,人类学并不意味着指'田野调查':它意味着我的整个生活。我的研究方法是,在研究对象中间住下来,与他们共同生活,尽一个局外人所能去分享他们的生活,通常同时撰写几部著作……这意味我不只单纯地依赖提问的方法,而研究对象的知识逐渐得到透彻的理解,直至成为我的一部分"(p.142)。这些民族志学者是如此地完全融入他们主人的社区,以致于他们可被描述为"完全成员(complete members)"(Lee 1995,p.61)。"完全成员"角色可被进一步划分为"皈依者"和"双重行动者",前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所研究的社会环境最终却成为其中的成员,后者虽然也可能被招为真正集体成员,但加入集体的目的仅仅是要描绘社会环境,一旦目标实现后就离开了集体。事实上,库辛就是一个"双重行动者"。在祖尼(Zuni)开展田野调查时,他被一个部落接纳,并就任战时的牧师之职(Cushing,1882,1883)。因为这些活动,他再三地、错误地被描绘为已"变成本土人"(Gronewold,1972)。然而,依照他自己的田野调查笔记和信件,他寻求这些组织的成员资格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参与秘密会议的通行证,以便于观察、作田野笔记、绘制草图(Brandes,1965,p.48;Cushing,1979,p.135;Cushing,1990,pp.237-245,353,401)。当他被美国民族志局(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召回华盛顿特区后,他的研究兴趣由民

① 想获悉对作为一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非现代的努力的民族志的讨论,参见:Ardener,1985;Strathern,1987b;Ashley,1991;Crapanzano,1990;Manganaro,1990;Wolf,1992;Denzin,1993;Visweswaran,1994,pp.85-94;Hastrup,1995,pp.49-51;Pool,1995;Dawson,1996。

族志转向了考古研究和图书馆工作，再也没有回祖尼(Cushing,1990,p.26)。

因为这些早期民族志学者保留着核心的欧洲价值观和哲学思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非西方文化的成员，搁置目的性的问题，把他们描述为"双文化的"，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就如给予足够的时间和付出足够的努力，一个人能讲"双语"，同样，一个人能学会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恰如其分地行动，甚至习得另一种世界观。其主要的途径是直接参与新文化的实践。采用这种经验方法与简单地变成本土人迥然不同，许多民族志学者已经能把学者的才能与学徒的才能结合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经历一段学徒身份长期被视为平衡民族志学者与他们的顾问间的权力差别的途径。通过打破原来的外来调查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重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徒身份成为一种协商民族志的尝试。它授权给顾问，授权的方式是允许他们选择调查主题、学习方式，甚至是关于共享的知识和经验的论文或一本著作的写作方式。学徒们和其他参与性民族志学者已给予他们的顾问在手稿付梓前审查全部手稿或手稿的部分章节的权力(Simonelli & Winters,1977)。随后，他们(即人类学者—译者注)可能邀请这些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来做民族志的合作撰稿人。此类关系经常出现在第一世界的人类学家与第三世界或第四世界的顾问之间(Bahr, Gregorio, Lopez, & Alvarez, 1974; Fischer & Abedi, 1990; Gudeman & Rivera, 1990; H-umphrey, 1996; Lambek, 1997; Tehindrazanarivelo, 1997)，或是出现在中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与下层阶级成员或犯罪亚文化成员之间(Prus & Irini, 1980; Prus & Sharper, 1977)。

当民族志学者开始在欧洲、美国、中东等地的城市中心开展深入细致的长期参与观察田野调查时，他们的工作需要的是"上层研究"(关注精英机构)和"平行研究"(与相同阶级或权力位置的人们共同工作)而不是"下层研究"(研究亚文化和边缘人群)①。在与那些参与高度精巧的和建立已久的地方传统的人们的新型合作关系中，文本通常是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协商的战略场所(Archetti, 1994, pp.11-13; Rogers, 1997; Shryock, 1996, 1997; Terrio, 1998, pp.27-28)。在与他们的文化同时代的人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研究者们不仅逐渐意识到了资料和知识产生过程的互动式理解，而且也意识到了民族志的写作、发表和阅读过程中的政治和文学问题。

民族志的体裁

虽然已有一些关于不同类型民族志的讨论——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后结构主义的——但那些讨论大部分是相当一般性的、肤浅的。这些讨论中被忽略的事实是，数千本用不同语言和体裁写成的著作被称为"民族志的"。研究者们可以且实际上用许多不同方式描述相同的材料，他们采用不同的样式、风格

① 批判女权主义和批判民族志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参见：Wellmer,1971; Geuss,1981。

和体裁。因为读者对民族志有各种期望——包括总体的形式和组织、比喻、人物形象——涉及他们(即读者)期望阅读到的文章,就像对于其他作者一样,明了上述限制因素,对于民族志学者是重要的(Gerhart,1992;L. Richardson,1990)。因此,虽然体裁通常被认为是与写作有关的,但它在作品阅读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读者从文本中理解到的意义受他们所属话语社会的影响,一个作者需要明确自己想要针对哪些读者来写作。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个民族志学者通常会使用大量的体裁为不同群体的读者撰写研究结果报告,与他们交流研究结果。

一个民族志学者的写作可能开始于一篇在硕士或博士论文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专著。每章按空间的或逻辑的顺序展开,讨论一个标准的主题——环境、社会关系、个性、世界观——通过积累等价的章节和数据而成。每章的标题被设计成能清晰地表明其内容,就如在百科全书或编目分类中能发现的一样(Thornton,1988)。然后,民族志学者可以着手撰写更为易懂的描述性体裁。因为它们依赖于真实的经验,具有明显的线性结构,所以更易于为普通的受过教育的大众理解(MacClancy,1996)。这些体裁包括个人文献,如传记和顾问的生活史、回忆录、顾问的自传、民族志学者的自传,以及田野调查日记和编年史。其他形式的文献,如旅行记录片和自我的民族志也是常见的。很多更重视社会效果的文学体裁,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小故事、诗歌、戏剧,也被用作民族志描述的工具。

民族志学者发展的最早的、最普遍的记叙体裁之一,是传记或"生活史"。虽然传记可以单纯地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但最常见的传记具有田野调查背景。生活史作为写作民族志文献的另一种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基(Znaniecki)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1918—1920)和拉丁(Paul Radin)的《隆隆的雷声》(*Crashing Thunder*,1920)。在那时候,民族志学者收集生活史材料的目的,是阐明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事实,而非个人的生活或人格的各个方面(Shaw,1930;Underhill,1936)。生活史依赖举隅法这种修辞手法,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体被选择出来,借以代表一整个文化。因此①,根据波扎斯(Ricardo Pozas)的观点,他的传记《查姆拉人——胡安》(*Juan the Chamula*,1962)"应被当成一部小型的关于查姆拉人文化的专著"(p. 1)。只是后来人们关于人格的兴趣被加进了生活史(Langness & Frank,1987,pp. 21-23)。刘易斯(Oscar Lewis)干劲十足地推动把生活史当作首要的文化文献的体裁。他采取家庭传记的体裁来撰写民族志,并在其现已成为经典的著作《五个家庭》(*Five Families*,1959)中发展了"贫困文化"的观点。在导言中,他对自己建构的家庭形象的描述,既非"小说,亦非传统的民

① 更多的关于女权主义和民族志批判理论中的反思性的角色的信息,可以在以下作品中找到:Scholte,1969;Babcock,1980;Ruby,1982;Caplan,1988;Stacey,1988。关于对话民族志的例子、有关民族志研究的对话方法的讨论、批判性对话,参见:Stavenhagen,1971;Dwyer,1977,1979,1982;D. Tedlock,1979,1987;Webster,1982;Crapanzano,1985;Buckley,1987;Feld,1987;Tyler,1987a,1987b;Page,1988;Fischer & Abedi,1990;Harrison,1991;Jordan,1991;B. Tedlock,1991;Tedlock & Mannheim,1995。在社会学里,象征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知识社会学讨论这类问题,但社会学更关注自然发生的交谈而不是对话的比喻(the trope of dialogue)(Rapport,1997)。

族志。因而需要一个更好的术语。我宁愿称之为民族志现实主义,而非文学现实主义"(p.5)。他的写作技巧依赖几层举隅法,用此方法,一个单独的家庭代表相同的一类家庭,单独的一天代表任何一天或每一天。他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五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五个不具有不寻常事件如生日、浸礼、葬礼的日子——在五个平凡的、具有代表性的墨西哥家庭里。这本著作很快就为更具民族志色彩、情感动人的描述所效仿:《桑切斯之子》(*The Children of Sánchez*, 1961)、《佩蒂罗·马丁内斯》(*Pedro Martínez*,1964)、《生活》(*Lavida*,1965)。

第二种类型的个人文献是"回忆录",在其中,作者引导读者进入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生活的一个角落,那生活是鲜活生动、富于情感、充满了独特的事件。通过收缩镜头,作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其田野生活片段的窗口。虽然大部分民族志学者以其真名发表了回忆录,但还是有一些用的是笔名。费尔德(Margaret Field)用笔名 Mark Freshfield 发表了回忆录《风雨交加的黎明》(*Stormy Dawn*, 1947),它是在西非的盖(Gâ)部落所做的民族志。博安南(Laura Bohannan)将自己作为新入门的民族志学者在西非的经历写成《返回笑声》(*Return to Laughter*, 1954),用的笔名是 Elenore Smith Bowen。德鲁克(Drucker)以笔名 Paul Record 发表研究墨西哥人的民族志回忆录《热带荒野》(*Tropical Frontier*, 1969)。波韦(Karla Poewe)出版在非洲开展田野调查的回忆录《一个女人类学家的沉思》(*Reflections of a woman Authropologist*, 1982),笔名是 Manda Cesara。某些作者借用笔名使自己与回忆录保持一段距离的一个原因是,如此做能使他们面向普通读者发表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也使这种活动完全地,甚至秘密地与他们的专业同行分隔开来。这种隔离活动也许表明,这些作者觉得出版个人性的素材可能有损于他们作为科学家的可信度。然而,在随后的生活中,就像博安南和波韦一样,他们可能选择向同行披露自己的笔名,且因他们的著作而获得赞誉。

第三种民族志体裁即"叙述民族志",是前两种类型即生活史和回忆录的嫁接。当人们试图准确地描绘传记的主人翁,同时又期望在文本中揉进自己的经历时,这种杂交体裁就被创造出来了。例如,格拉潘扎诺(Vincent Grapanzano)在《土哈密》(*Tuhami*, 1980)一书中,描绘了他的摩洛哥主人翁和他自己与该主人翁一起工作时的情感和心智反应。他花大量笔墨叙述了自己和土哈密长期面对面互动中存在的心理和文化上的紧张和渴望,显现了因为他们互为对方移情的对象,他们是怎样变得对双方的邂逅饶有兴趣的。因而,虽然土哈密最初是传记的首要焦点,但在写作过程中,格拉潘扎诺自己被塑造成了第二个焦点。结果,在一部叙述民族志中有一具备丰富心理动力的双重人物描写。一个类似的传记与民族志式的邂逅的相互交织构成了肯达尔(Laurel Kendall)的《一个朝鲜萨满僧的生活和困苦时光》(*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haman*, 1988)的主体结构,那种交织既存在于田野调查中,也存在于其后的回顾中。在这里,在一系列通过回忆再现的和磁带记录下来的萨满的自传式交流中,肯达尔将自己和她的田野调查助手刻画成一个女萨满僧的有同情心的学生。借助肯达尔附加到整本书内用特殊式样印刷的她个人的和理论的插曲,我们见证了大量的关于一个

女萨满僧积极地与一个女民族志学者、该学者的助手和读者进行交流的叙述性露斯·贝哈事件①。

传记和个人回忆录的交织同样构成了贝哈(Ruth Behar)的《被改变的妇女》(*Translated Woman*,1993)一书的主体结构。在书中,她承认,当意识到经过将近三年时间的研究殖民地的妇女们向她们的调查者们提供的回答,与大量城镇妇女建立关系之后,她已经让一个研究对象接管了她的研究,她是多么的担忧而又多么欣慰啊。纵贯全书,她用斜体的铅字描绘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一直记得几天前我受过的伤害。当我坐在半开的门口读书时,一个男孩从我面前跑过,瞟了我一眼,尖叫了一声'外国姥!'(Gringa),那在我听起来像是憎恨。"(p. 250)因为比哈是个美籍古巴人,她觉得这个从另一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口中说出来言辞上的冒犯十分意外,十分痛苦。

这些心理内容丰富文献的贡献,就是边界的不确定性,而边界问题在以前是自身研究他者时最重要的问题。这种形式的边界地带的文化生产成了民族志交流和文化描述的新方向。在它的初期,在单一的民族志文本中同时表现自身和他者的这一深刻变化,与其他的写作策略被混为一谈,并被认为是虚构的"人类科学中的实验片段"(Marcus & Fischer, 1986, p. 165)。然而,如罗萨尔多(Rosaldo,1989,p. 23)所指出,这一分析体现了对托马斯·卡恩(Thomas Kahn)的实验主义观念的轻率的运用。正在进行的社会思想和实践的重构,不应被描述为一个独特的且基本上是无历史记载的实验片段,而应被看作是民族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化,它使重要的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分析的和与著者有关的问题具体化了。

女权主义否认认识论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分裂。就如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一样,民族志批判理论既是反思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学者们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即以在自身与他者之间批判性的、相互作用的交谈和对话中共同创造民族志知识,并以唯一适宜的方式表述出来。法国民族志学者克拉斯特里斯(Pierre Clastres)在他的田野调查历时描述中,鲜活地描绘了对这种对话的强烈期盼。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南美洲,他遇到了巴拉圭境内的阿特旗人(Atechi),他们仅仅是此前不久才与外来者有所接触。当他与他们见面时,他们拒绝接受他的礼物,或拒绝与他交谈,即使他操的是与他们的语言相近的方言。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他们仍然质朴","几乎与我们的文明没有什么接触,几乎未被我们的文明的微风所污染",一个社会"如此健康,以至于甚至不与我交谈一句话,不与另一个世界通气"(Clastres,1998,p. 97)。根据克拉斯特里斯作品的翻译者,小说家奥斯特(Auster,1998)的记述,克拉斯特里斯的历时记事是"一个男人经历的真实的故

① 下列民族志学者(无论是被描述的文化的成员还是外来者)撰写了小说:Bandelier, 1980; Haggard & Lang, 1890; Drberg, 1930; Coon, 1993, 1940; Graule, 1934; McNickle, 1936, 1978; Hurston, 1937; Elwin, 1937, 1938; Underhill, 1940; Arguedas, 1941/1985, 1958/1978; Osgood, 1953; Ekvall, 1954, 1981; Miller, 1959; Matthiessen, 1965, 1975; Leighton, 1971; Stewart, 1971; Buelow, 1973; Wendt, 1973, 1979; Wilson, 1974; Bista, 1980; Salerno & Vanderburgh, 1980; Jaffe, 1983; Bennett, 1986; Ghosh, 1986, 1993, 1996; M. Jackson, 1986; Thomas, 1987; Deloria, 1988; Courlander, 1990; Gear & Gear, 1990; Narayan, 1995b; Price, 1998。

事”,“研究结果不仅是他正在研究的人们的形象,也是他自己的形象”,并且“他以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娴熟的技巧来写作”(p. 8)。换句话说,他的历时记事采用的是叙述民族志的形式。

一个小说家可能会认为克拉斯特里斯的写作手法并不稀奇,因为社会科学家阅读或撰写的最流行的作品的题材就是小说,特别是那些建立在作者个人历史和背景、学术训练和田野调查经历三者之间融合基础上的小说。虽然这些富于想象的作品的一部分可被归类到科幻小说、神话或历史小说,但其中的大部分也是人们称之为“民族志小说”的著作(Buelow,1973;Langness & Frank,1978;Schmidt,1981,1984)。民族志小说与其他类别的小说不同,因为它不仅要遵循文本本身内部所要求的原则,而且要符合小说所描述的外部文化的原则。因而,民族志小说综合了内在的文本准确性和外在的文化准确性。考虑到此类小说应该是完整的民族志,它必须包含准确的信息,即关于小说所描绘的民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和该民族是怎样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联系或如何拒绝与更广阔的世界相接触的信息。

瑞士考古学家班德利尔(Adolf F. Bandelier)是这种体裁的创始人。他的小说《快乐制造者》(*The Delight Makers*,1890/1971)描述的是美国西南部的普布洛印第安人。班德利尔指出,虽然小说情节是他构造的,但他忠实于他和其他民族学家都观察到的那个乡村的自然地理风貌,以及本地的建筑、传统、生活方式、习俗。他真正亲眼目睹了小说描绘的情景。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复杂的人类,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由规则控制着的社会。这本小说虽然很快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奉为经典,但它却未能成功地吸引预定的读者群即普通民众。就如乔瓦诺维奇(Jovanovich,1971)所指出的,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班德利尔“已经冒险脱离了人们关于古老西部的印象,他描述了敌人、印第安人。在他的笔下,他们好象是真正的人(即白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世界里奋斗、拼搏,而不是在一片早已灭绝的森林里啃食青草的神话里的生物”(p. 17)。确实,几乎是40年之后,普通公众才准备去赏识将印第安人视为真正人群(real people)的小说。1929年,拉法奇因其民族志小说《欢笑的男孩》(*Laughing Boy*)荣获普利兹文学奖。小说的主角是欢笑男孩和苗条少女。前者是传统的纳法贾文化的完美典型,后者是教会学校抚养成人的被同化的纳法贾人,他们堕入了爱河。透过他们的婚姻引发的各种社会互动,我们了解到纳法贾人是母系的、从母居的、半定居的靠园艺和打猎为生的人,他们认为和解是法律诉讼的最重要的积极的结局。由纳法贾文化塑造的欢笑男孩的行动天生重视心智、肉体和灵魂的统一。因为他的妻子缺乏这种整和能力,欢笑男孩遭到了威胁,几乎被毁掉①。

在拉丁美洲,几乎是同时代,秘鲁民族学家阿圭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是他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印第安人主义小说家。他结合土著的魁克华语的句法和西班牙语的词汇,为他的民族志小说发明了一套语言。他在普魁沃(Puquio),一个

① 拉法奇(La Farge)继续写作了其他的一些建立在美国西南部和危地马拉的本地人的人种知识之上的小说(1931,1937,1945,1951)。他也根据民族志和民族志学者的工作写了两部短篇小说集(1957,1965)。

高原村庄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期和青年期。《血的节日》(*Yawar Fiesta*, 1941/1985)被广泛地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这本小说戏剧性地描绘了在普魁沃发生的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之间的冲突。一个新近的文学民族志学者是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他曾经讲授过英国文学和人类学。皇家文学协会因他的小说《最后的清凉日子》(*Last Cool Day*)授予他威尼弗雷德· 霍尔菲纪念奖。因为他的这本小说和其他的民族志小说是建立在他的西印第安人出生和成长经历以及近来的与美国黑人生活的经历基础之上,这本小说既是自我研究的练习,也是文化的描述。他和阿圭达斯都享有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来自于田野情境,在此情境中,民族志学者处于他或她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中间。这本著作与杜博依斯(Du Bois,1903/1969,p. 45)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中的"双重意识"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

当他把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隔壁的男孩》(*The Boy Next Door*,1951)出售给《幻想与科幻小说》(*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杂志的编辑博克尔(Anthony Boucher)时,奥利弗(Chad Oliver)仅 22 岁。福利(Martha Foley)把那篇小说列入了她的名叫"美国杂志里的独特短篇小说"的有声望的名册中(Nolan,1968,p. 110),一年后,奥利弗在德克萨斯大学完成了自己的人类学硕士论文,并开始在那里执教。论文的题目叫《它们造就了一个塔:科幻小说的故事》(*They Builded a Tower: The Story of Science Fiction*,1952)。他很快成了博克尔(Boucher)所谓"真正的科幻小说"的正走红的海因雷恩—克拉克(Heinlein-Clarke)小说的竞争者,海因雷恩—克拉克小说中对科学的描述很引人入胜,同时小说也非常富于人性(Oliver,1957,封面上的内容摘要)。奥利弗的科幻小说《阳光下的阴影》(*Shadows in the Sun*,1954)被《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誉为当年"它那个领域里的最佳作品"。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奥利弗(Oliver,1962,1981)出版民族志,把人类学的主题引进到科幻小说中来。他最初于 1958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保卫者的精神》(*Guardian Spirit*)通过考察科技和工业革命后的人类与原始人类之间的联系,检视了文明的基本定义。随后的小说《另一片海的海岸》(*The Shores of Another Sea*,1971)以肯尼亚为背景,他在那里从事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这部小说里,一个追猎狒狒的科学家突然觉察到他的动物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眼睛里那冷静的眼神显露出它们已经被一种怪异的智力接管。它们正在研究他。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猎手,相反是被追猎的。奥利弗将传统的科幻小说、早期人类、已消亡种族、未来的战争以及民族志反思性结合起来,锻造出了经典的民族志小说①。

一些社会科学家选择了其他的文学体裁,如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戏剧来展

① 荣获金刺奖(the Golden Spur Award)的《狼兄弟》(*The Wolf Is My Brother*,1967)被誉为最佳的西方历史小说,它以美国西南部为背景,奥利弗就生活在那里。他最后写的小说《碎鹰》(*Broken Eagle*,1989),是一部有关古老西部的长篇叙事性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晒延武士,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当作英雄在沙湾大屠杀中被杀害了。最近,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赖克斯(Kathy Reichs)运用她的法庭人类学的知识和经历而成了最热门的神话作家。她的民族志小说戴德(Dead,1997)是综合她经手的多个案件的材料写成的,而女主角则是建立在她自己的职业背景基础上的。主角的酗酒问题和婚姻上困境则"纯属虚构"(Montell,1997)。

示民族志资料①。著名的南非民族志学者库帕(Kupa,1947,1960)在她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几部文学著作,包括一部小说、一部戏剧和一些短篇小说(1965,1970,1943/1984)。在1981年的非洲民族主义会议的一个小组会议上,她声称自己最佳的民族志作品是她的戏剧《我心中的女巫》(*A Witch in My Heart*)。有几部集中描写民族志学者和民族志田野调查经历的戏剧已经被演出和出版了②。泰德洛克(Tedlock,1986,1988)和康多(Kondo,1955,1977,p.22)曾撰写了几部戏剧,并以制作人和剧作家的身份与专业剧组进行合作。民族志学者艾伦(Catherine Allen)和剧作家加纳(Nathan Garner)合作讲授了一门课程,然后共同创作了一本民族志戏剧,名叫《神鹰夸特》(*Condor Qatay*)。他们后来共同撰写了关于《神鹰夸特》的创作过程的一篇论文和一本书,认为戏剧创作为人种资料的描述和阐释与分析提供了合适的途径(Allen & Garner, 1995, p.69; 1997)。拉夫林(Robert Laughlin)曾出任由玛雅人写作和表演的戏剧的民族志顾问、剧作家和演出经理,该剧讲述了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地区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起义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Laughlin,1994;Skomal,1995)。

另一种描述带有情感反应的人种经验的方法,是将经验和情感融合起来。这类作品采用了游记、历时叙事、日记的形式③。民族志游记具有旅游宣传画册的随和和闲谈的格调,而历时叙事和日记则倾向于展示内心的思想、苦乐参半的情感和作家的偏见。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73)以抒情的笔调写道:"里约(Rio)的海湾侵蚀到城市的中心:你站在中心,似乎它的另一半,像传说中的Ys城,已然被海浪吞没。"(p.76)在《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1938)中,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采用了闲聊的口吻:"如果你去牙买加,你准想到阿康蓬镇拜访玛努人(Maroons)。他们现在生活在诺威上校的统治之下。诺威上校是个聪明的爽快人。但我事先警告你,别去骑他那匹外斜视的、大肚子的骡子。"(p.21)莫兰(Brian Moeran)的《奥库布日记:一个日本山谷的写照》(*Okubo Diary: Portrait of a Japanese Valley*,1985)是改写三本日记的内容而形成的,日记是莫兰在日本乡村开展四年的田野调查留

---

① 民族志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包括以下作者的作品:Stewart,1975 ,1989 ,1995;Nelson,1980;Frank,1981;Jaffe,1982 ,1995;M. Richardson,1984 ,1990;Applebaum,1985;Skafte,1986;B. Tedlock,1986;Waldorf,1986;Stacey,1990;McNickle,1992;Wolf,1992;Altork,1994;Nimmo,1994;Zedeño,1994;Goldschmidt,1995;Narayan,1995a;Reck,1995;Ruiz,1995;Springwater,1996;Flynn,1997。

② 撰写民族志戏剧或其戏剧曾被演出的有:Kuper,1970;Brook,1976;Higgins & Canan,1984;D. Tedlock,1986,1998;Grindal & Shephard,1987;Richardson & Lockridge,1991;Kondo,1995,1997。民族志学者的生活也是戏剧表演的中心内容。哈斯特拉普(Hastrup,1992)讨论了她作为戏剧表演的对象的经历。基于肖斯泰克(Marjorie Shostak)的田野调查笔记、日记和其间写的家信,比纽姆(Brenda Bynum)创作了一部关于肖斯泰克与她的民族研究对象尼莎的关系的戏剧。该剧曾于1995年12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人类学协会会议期间上演。1996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在洛杉矶举行,分阶段阅读的一份材料是戏剧《温顺妇女的神话》(*Myth of the Docile Woman*),它讲述的是在血汗工厂的女缝纫工中开展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她对布朗大学的性别歧视的成功控诉(Schevill & Gordon,1996)。

③ 如下一些作者写过民族志日记、信件和游记:Leiris,1934;Elwin,1936;Lévi-Strauss,1955;Condominas,1957;Matthiessen,1962;Bista,1979;Ribeiro,1979;Chaffetz,1981;Brandão,1982;Moeran,1985;Good,1991;Behar,1995;Price & Price,1992;Goodale,1996;Turner,1996;Kirk,1997;Yu,1997;Clastres,1998。

下的。部分因为他的儿子在小学时受到严重的伤害,莫兰将当地的学校委员会告上了法庭,《奥库布日记》充满了疏离感和忧郁的自我反思:"那些山峰的轮廓,我是多么的熟悉,小鸟的歌唱,穿行梨树林的微风,翩翩起舞的竹子,它们将我引入梦乡。它们永远不属于我,或许永远不属于我。然而我却享用它们,我深深沉醉于其中。"

还有一些向读者讲述一切(tell-all)的民族志日记。法国诗人和民族志学者雷里斯(Michel Leiris)出版了颇有震撼力的田野调查日记《幻影非洲》(*L' Afrique fantôme*,英文名是 *Phantom Africa*,1934)。该日记记录了达喀尔—吉布提(Dakar-Djibouti)远征队考察桑格的窦冈(the Dogon of Sanga)和冈达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活动,以及很多非洲人的活动(Beaujour,1987)。他揭露了研究队伍里欧洲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收集这次探险的方法的博物馆的不道德行为。雷里斯的这个做法导致了他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格里奥勒(Marcel Griaule)永远的决裂。随后的著作 *L' Age d' homme*(1939),被译为 *Manhood*(男性气质,1983),将小说和私人日记结合在了一起。雷里斯超越了仅仅历时地收集轶事和照片、按照片集锦的模式建构故事的做法。自我选集法发展出了一种没有表白内心的企图的摄影式的视点。这是一个去魅的神话,它以知觉、语录和记忆的形式,将严重的存在无用感和想拯救其有意义的细节的强烈渴望结合起来。通过打断去往非洲的流畅的民族志故事,雷里斯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自身和他者可以被放进连贯的叙事中去。在选集的末尾,他很突兀地引用梦中的话说:"我向我的情妇解释,用布把自己包裹起来是有必要的。"(1983,p. 146)

或许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日记,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死后出版的《日记》(*Diary*,1967)。《日记》暴露了自封的参与观察方法的发明者的弱点,暴露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u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的作者暗藏的秘密,他不仅对基里维纳文化参与得不够,而且怀有种族偏见(Willis,1969,p. 140)。作为对由这本秘密日记的出版引发的争论的回应,民族志学者们对他们自身政治的、伦理的和种族的背景,他们的偏见,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和他们描述的文化的参与的性质、参与不足,都有自觉的认识(Caulfield,1979;Nash & Wintrob,1972)。他们也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帝国主义观念感到震惊,对社会科学里的殖民主义做法感到不安(Asad,1973;Banaji,1970;Gough,1968;Lewis,1973;Stavenhagen,1971)。一小群人类学家勇敢地公开对自己提出了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这门学科不存在,它有必要被创造出来吗?"对这个问题,海米斯(Dell Hymes)和《再造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1969)这个集子的其他撰稿人的回答是"不"。对第二个问题,即"如果再造人类学,它应该是我们现在拥有的人类学吗?"回答同样是"不"。如斯科尔特(Scholte,1969)所建议的,新创的人类学应该是"一门批判的和有助于解放的学科"。

社会科学里的第二个争论进一步加强了这股新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一次的争论围绕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名为《论疯人院里心智健全的人》(*On D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而展开的(Rosenhan,1973)。文章描述了一个新奇的研究

设计。在该设计中,八个社会科学家伪装出一些症状并把自己带到了精神病院门诊部,其目的是想获准进入精神病人的病房。获准进入病房后,他们不在提及自己的症状,也没有被认出是研究者。当研究结果发表后,临床医生被激怒了,控告那几个社会科学家制造了他们本来没有的数据。虽然仍有人开展秘密的民族志研究(Rose,1987),但秘密的观察已经被视为不道德的,也不再流行了(Brink,1993)。

这些争论促进了对民族志资料的收集、民族志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涉及的伦理的和作者个人的问题的探讨。一些研究者开始向民族志学者推荐一种更具有人情味的和政治上更为精明的角色,并提倡把认识论的理解和个人的理解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新的立场和批判的做法,推动了参与观察向"对参与的观察"的转变。在对参与的观察中,民族志学者不仅与其他人共同参与了际遇的民族志场景,而且也观察这种共同参与。这种转变促成了民族志的重大转型,即民族志学者可以在一个描述框架内同时展现自身和他者,描述的重点是人种对话的过程和特点,他不用如以前那样必须在回忆录、集中描述自身的自传、生活史或集中描述他者的标准论文之间作选择了。

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

参与观察最初是在小而同质的社会研究中发明出来的方法。一个民族志学者长时间地居住在一个社会里,学习当地的语言,参与日常生活,持续地进行观察"参与观察"这个逆喻必然包含着同时存在的情感介入和客观超然。民族志学者们试图同时承担两种角色即被他人的生活所吸引的参与者和冷静的无偏见的观察者。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奇异的移情而又超然的方法,生产了以某种方式反映本土人自己的观点的资料。人们甚至认为,若不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能研究该社会,因而所有社会研究都是参与观察的一种形式(Hammersley & Atkisnson,1983)。

作为科学方法的参与观察这个比喻的特权,鼓励民族志学者通过创作形式根本不同的作品即学术性专著和个人文献如生活史、回忆录来展露他们的观察技巧和社会参与。这种具有二重性的方法区分了公共的与私人的、客观与主观经验领域。例如比特尔(Beatle,1960)首先发表了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学术专著,他觉得这是一本"客观的"民族志著作。五年后,在他的出版商的建议下,他撰写了田野研究的第二部著作,他将此著作描述为"主观的"第一人称的描述(Beatle,1965)。虽然第二部著作强调了公开的方法——运用助手、信息提供者、问卷、逐户调查、作笔记、摄影、记日记、写作研究论文——但是他仍对它是"自传体的"或"主观的"而耿耿于怀,他在序言中对它的评论是"有点不正派的事业"。

对在严肃的民族志中展露自己的不安心理,同样可以在拉比诺(Rabinow,

1977)的回忆录中察觉。在该回忆录中,他指称自己1975年出版的专著是"处理相同资料的更传统的人类学方式"(p. 7)。与拉比诺类似,杜蒙特(Jean-Paul Dumont)在发表第一人称的田野调查描述(1978)之前出版了标准的民族志专著(1976)。然而,针对在民族志中包含自己,他展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对他来说,标准的描绘他人的民族志并不比描绘自身的文章或专著传统。事实上,如皮维里(Peter Pivière)曾指出的,我们从杜蒙特的第一人称的描述中获得的关于潘里(Panré)的信息,比从他的专著里获得的更多。其部分原因是,他的田野调查描述自觉地围绕对潘里而言他是谁这个中心问题来展开,而不是围绕对于他来说,潘里是谁这一问题展开的,这后来是大多数民族志关注的固有问题。

与这些作者不同,巴利(Nigel Barley)同时发表了他的民族志专著和田野调查描述。其专著《象征结构:道威阿斯文化的研究》(*Symbolic Structu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Dowayors*,1983b)是一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第一人称的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描述《泥泞茅舍里的历险》(*Adventure in a Mud Hut*),是巴利的西非田野调查描述,它有趣、详尽而不加掩饰,是第一人称的。两本书在口吻、要旨和资料方面的显著差异,暴露出巴利对在民族志中表现他自己的极度尴尬。在他的经验的民族志中,他是个愚蠢的、悲伤的、无能的、滑稽的角色,他一瘸一拐地毅然前行,最终完成了他发起的田野研究。本土居民们同样扮演了小丑:愚蠢的老人盯着狮子和豹子的照片,把照片翻来转去,从各个角度观看,最后说出"我不认识这个人"此类蠢笨的话(Barley,1983a,p. 96)。在这里,声称是个人文献的,最后成了整个民族志事业的一篇讽刺文章。

一些民族志学者选择了探索涉及跨越文化边界的复杂的个人的和政治的维度,而不是把焦点放在民族志邂逅的尴尬或滑稽的边缘上(De Vita,1990)。沃尔夫(Wolf,1964)描述了在一个新墨西哥北部村庄开展田野调查期间,他是怎样冒着被伤害的危险,完全溶入并认同了他看到的和经历的每件事都与他相关的社区:"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对我而言发生了什么:我穿越了文化模式的网络和各种各样的概念网,陷入了爱的无序状态;我以冷酷的眼光饥渴地四处观看。"(p. 235)贝哈(Ruth Behar)在《脆弱的观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ver*)中当作重要的民族志项目精确地描绘了这些冒险。无论民族志学者在其研究项目中倾注了多少心血,项目的成功不仅靠个人的努力。它与各种外部的社会力量相联,包括当地的、国家的,有时甚至是国际的关系,它们使研究成为可能,它同样与读者相联,读者们把研究项目当作有意义的努力加以接受。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客观的、中性的和超然的,就如它们是冒险、可能的失败和成功的希望。更近一段时间,对身体暴力的恐惧、强奸、友谊、爱、性行为和色情的田野调查遭遇——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这类私密的话题,开始变成了社会科学的论题①。

---

① 有关涉及这个主题的例子,参见:Weston,1991,1993;Scheper-Hughes,1992;Kleinman & Copp,1993;Newton,1993;Wade,1993;Blackwood,1995;Bolton,1995;Dubisch,1995;Grindal & Salomone,1995;Kulick,1995;Kulick & Wilson,1995;Lewin,1995;Nordstorm & Robben,1995;Behar,1996;Daniel,1996;Kennedy & Davis,1996;Lewin & Leap,1996;Wafer,1996;Willson,1997。

自我民族志和女权主义民族志

另一个影响民族志学者的研究及写作的主题和类型的改变的重要因素是选择去做民族志学者的人群的变化。在阶级方面,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学者来自中层和下层阶级。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女性与公开的男性或女性同性恋者。在民族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混血儿(欧亚混血儿、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等)和第三及第四世界的学者。这种转变不仅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而且激发了批判意识,导致人们认为调查者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观念和行为,与研究对象的这些属性一样,应该被放在相同的历史时刻和批判平台上①。

促进这些转变的是一群口齿伶俐的"本土的"和"女权主义的"民族志学者,包括各种身负两种文化的内部人或外部人。虽然内部人无疑可能更容易接触某些类型的信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例行化方面的信息(Jones,1970;Ohnuki-Tierney,1984),但可以将本土民族志与本地民族志区分开来,因为本土民族志学者是那些来自非欧洲或非西方文化社会和有殖民主义的历史或基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关系的学者。就如一出生就是女性并不自然拥有"女权主义"意识,少数民族出生的人也不自然地具有"本土"意识。然而,人们认为,女性的"双重视角"或"双重意识"——与被认为是黑人和其他少数人种所拥有的双重意识相似——为女性在理解世界范围内被压迫的人群方面提供了某种优势②。

本土民族志学者曾批判了社会科学里的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做法(Harrison,1991; Hsu & Textor,1987)。他们批判了社会科学奇怪地对诸如南亚的种姓制度这类问题的入迷(Appadurai,1986;Daniel,1984),而缺乏对亲属关系、交换、互惠研究中的情感因素(sentiments)的系统阐述。汤加人类学家 Epeli Hau'ofa(1982)特别提到,对人类关系中这些气氛紧张的领域内的情感的忽视,导致了大多数在大洋洲地区(或许还有其他地区)开展的此类研究不完整,从而研究的意义也打了折扣(p.222)。他举例说明了这种形式的扭曲的道德后果,指出当美拉尼西亚的领导人被当作"典型的西方资本家画进漫画"(Hau'ofa,1975,p.258),这种歪曲导致波利尼西亚种族主义者对美拉尼西亚人的反感。本土民族志学者也反对仅仅将"女性统治的"这个术语应用于一个假设的完全由女性统治的社会。易葛布(Igbo)人类学家 Ifi Amadiume(1987,p.189)号召要认识构成母系文

---

① 解决阶级、性别、"种族"和种族主义、民族、民族主义和性等相互交叉的重要尝试可在以下西部作品找到:Barh,1996;Lewis,1996;女权主义民族志学者和本土民族志学者的例子有:Visweswaran,1988 ,1994;Abu-Lughod,1990;Bell,1993;Narayan,1993;Hong,1994;Kanaaneh,1997;Rang,1997;Harding,1987,p.9;Rose,1990 ,p.10;D'Amico-Samuels,1991;Harrison,1991;Panini,1991;Strathern,1987a。

② 关于"本土"和"本地"民族志实践这个竞争领域的背景资料,以及在理论上给女性和其他小群体以优势的"双重意识",参见:Fahim,1977,1987;Huizer,1979;Nash,1980;Fei,1981;Madan,1987;McClaurin-Allen,1989;Deck,1990;Kim,1990;Harrison,1991;Limôn,1991;Driessen,1993;Jones,1995;Motzafi-Haller,1997。

化面貌的一些因素如母系中心、母系中心主义和西非的女性倾向。

这些学者努力通过披露自身和他者都是易受经验影响的共同创造知识的主体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Abulughod,1993)。他们认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不是完全分开的两类人。对他们来说,理论不是一个透明的、与文化无关的区域,不是一个徘徊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免税智力市场,缺乏与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的所有联系。来自田野调查以外的知识和经验应该被融合到人种描述之中,民族志学者应该表明各种观念与他们有怎么样的关系,从而弥合他们狭隘的学术世界与广泛的文化经验之间的鸿沟。就如越南民族志学者和电影摄影师敏哈(Minh-ha,1989)所说:"为了对他者的描写能接近他者,我只能选择对资料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批判关系。这种关系既界定被写作的主题又界定写作的主体,在询问'我想要什么,要了解你还是我?'这一问题的同时将自我解构"。杜蒙特(Dumont,1978)在他的叙述民族志的结尾部分所说的,"对他们来说,我是谁?"(p.200)。

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区而写作,或者至少获取一定程度的内部人身份,应该是参与性的写作,它集中关注自身与他者之间的辩证的、政治的、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新的观点。1972 年,杨懋春(Martin Yang)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讨论他的研究生教育和他所谓的"直接的田野调查"在他备受推崇的民族志《中国村庄》(*A Chinese Village*)的创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他的田野调查是在他上大学前一直居住在其中的村庄里展开的。杨(Yang,1972)指出,"我实地考察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积极参与其中的他人的生活"(p.63)。这种民族志经历有多种称呼:人种社会学、人种民族志、自传人类学和自传民族志(Deck,1990;Fogelson,1984;Hayano,1979;Reed-Danahay,1997;Strathern,1987a)。杨不是第一个出版关于自己的群体的民族志的本地民族志学者。肯雅塔(Kenyatta,1938)、费孝通(Fei Hsiao Tung,1939)、奈卡尼(Nakane,1970)和其他学者曾经出版过此类著作。但与其他学者不同,杨写了一篇关于撰写自传民族志的经历的反思论文。

土著人相对于民族志学者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而民族志学者与土著人之间的政治性交流和言语上的际遇很少受到关注(Chilungu,1976)。基辛(Keesing,1985)提供了一个关于跨性别交流的微观政治的重要例子。快欧人(Kwaio)是生活在南太平洋所罗门岛的一个传统的群体。在快欧人中开展田野调查时,基辛发现即使快欧人没有我们所说的自传这种体裁,但男人们积极地、巧妙地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同时,他发现自己不能从女人们那里获得自传式叙述。她们以开玩笑的方式和他交谈,而且句子零碎,口齿不清,而这一切是在一个老人面前发生的,是这个老人强迫妇女们跟基辛合作的。八年后,在与一个女性民族志学者联合开展田野调查期间,他发现,在他们两人都在场的场合中,快欧妇女们主导了交谈的过程,在作录音的场合中,她们甚至把女性朋友也带来做观众。与描述个人生活故事和社会规范的男人们不同,妇女们创造了关于女人的美德的道德文本,插入个人经历只是要说明一个妇女的可能的生活之路。

显然，妇女们早先口齿不清的状况和后来的畅谈，以及男人们对他们的文化的系统化描述，是对更广阔的权力场域的反应，权力场域使人确信某些体裁比其他的更有影响力。

女权主义学者可能已经料想到因女性民族志学者到场而引发的那种改变。她们大概已经明白，自传体裁之所以是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它在文化上局限于西方，而且因为它是由呈现出男性主题的性别观念造就的。快欧妇女们对讲述个人生活故事和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社会规则的拒斥，以及她们对女性的道德正当性的坚持，唤起了其他女性自传中的相似策略。在这些自传中，能觉察到一种"分裂的意识"的影子，它暴露了作家的这种意识，即在她们的自我建构中，她们是被看作女性而被阅读的，因而对她们的评价与对男性的评价不相同（Gal，1991；Tedlock，1995）。

女性撰写民族志和自传，常常被这样的动机所驱动，即要使读者确信作家的自我价值，要阐明和鉴定她们的自我形象。很多这些自我形象以轻描淡写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以使她们显得不很亲密。女性民族志学者常常或倾向于直截了当地和客观地展现她们的经验，或采用一种自由的、迂回的或意识流的方式来写作，笔调间接、晦涩（DeVault，1990；Stanley & Wise，1983）。有些时候，为了掩饰专家欲望或权力欲，她们嘲弄自己田野调查者的身份。无论是新手还是有经验的研究者，女性民族志学者再三地披露她们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疑虑。在《讲故事的人、圣人和恶棍》（*Storytellers, Saints and Scoundrels*，1989）一书中，那拉廷（Kirin Narayan）没有提供异族文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内部人的观点，从而削弱了自己的民族志学者的权威。相反，她细致地描述了一个既是内部人又是外部人的妇女的尴尬。她坐在一群南亚人中间倾听教义。她是同他们一起长大的，并且与他们在一起时有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但因她倾听教义的目的是收集资料，而不是感化心灵，她有些被冷落了。在书中，她报告了古鲁（guru，印度教的宗师。译者注）这样对她说："你在录音，你要拿这做生意……在你的大学里你会说，我看见了这，我看见了那，这就是巴嘎凡（Bhagavan，印度教圣徒的职位。译者注）。这是你学习教义的原因：但不是要理解它。"（p. 59）

相反，男性撰写民族志和自传的意图，常常是要通过集中关注生活的一个阶段或单独的一个性格特征来使作品成为一个整体。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要求男性追求成功的职业，我们在他们的自传中看到了和谐和秩序。男性生活的单向性通过某种方式恰当地投射到了他们自信的逐步展开的叙述中。因而人类学家里德（Kenneth Read）对自己的田野调查的描述是充满喜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一直是兴高采烈的。至少这是我能用来描述我心情的唯一的一个词。在这种心情中，对我能力的确信，对我自己的发现，对他人的同情，对他们给我的教训的感激交织在一起。"（p. 6）

相反，对女性生活的描写往往不是历时的，也不是逐步展开的，而是杂乱无章的，片断化的，或被组织成自成体系的多个部分，而不是连接为整体的章节（Krieger，1983）。女权主义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已将自传揉进历史剧和评论里，将

日记揉进分析性文章里,将诗的精神放进跨学科的散文里。一群女性民族志学者曾用女性方式建构她们的碎片文本: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信件、日记摘录、冥想、诗、梦、图画、故事。此类尝试中最重要的和确实成功的例子是布朗(Karen McCarthy Brown)的《劳达妈妈》(*Mama Lola*,1991),它是一项研究墨西哥城的乌笃宗教活动的民族志。在这本装帧精美的书中,布朗使用了风格各异的语言:主角、乌笃女神职人员的语言,民族志学者布朗的学术语言,作为她自己构造的故事的讲解人和角色的布朗个人亲密的语言,虚构的祖先故事的讲解人的神秘语言。女性的描述也常常有个人和职业之间的冲突的特点。里面可能有传统的妻子、母亲、姐妹,或者女儿及其他角色与非传统的抱负和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沃德(Martha Ward)的回忆录《风中的巢穴》(*Nest in the Wind*,1989)中,她降低了自己的权威。她指出:"我可能向自己灌输了比我应该有的还更多的知识。这段时间写下的描述、信件、笔记、报告为我提供了一个框架,但记忆力和我观念的转变改变了我的视角。"这个诚然不可靠的叙述者还提到"这本书不是为我的同龄人或同事写的,它仅仅是范曼尼恩(Van Maanen,1988)所说的'印象派神话'"(p.3)。

女性民族志学者不仅披露了田野调查中一致性的缺乏甚至不坚定的信念,而且披露了她们从事田野调查不是出于专业的原因,而是偶然的、非正式的或个人的原因。鲍德(Barbara Bode)声称她去秘鲁做研究的动机是填补她的小孩夭折给她造成的心理空虚。在《无钟可敲》(*No Bells to Toll*, 1989)的序言中,她解释说,她去秘鲁,主要是要把自己从悲剧中解脱出来。在她撰写的传记《尼莎:一个昆族妇女的生活和言语》(*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1981)中(Kung:纳米比亚东部和博茨瓦纳西部的一个种族。译者注),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承认,因为它感到孤寂,她希望更多的有组织的互动给她提供分享别人生活的机会,她才有了收集尼莎的个人信息的动力。斯泰西(Stacey,1995)指出,她开展关于生活在加利弗尼亚硅谷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偶然的民族志研究",是因为迟来的做母亲需要和喜悦,它把她的田野调查限制在距离她在洛杉矶海湾的家的附近区域。她的《美好的新家庭》(*Brave New Family*,1990)的普及版,作为两篇第一人称的纪实性中篇小说,被她收录到了通篇以第三人称讲述美国家庭生活的历史变迁的报道里边。

这种性别化的文本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阅读中习得的。在不甚太远的过去,每当一对夫妇在同一领域里工作,男人写作被认为是更为核心的重要的论题,主要采用的是讲解的写作方法,女人写作则被认为是边缘性的论题,采用的是叙述性的方法。早期的关于这种分工的一个例子,是查理斯(Charles)和塞利格曼(Brenda Seligman)共同的民族志研究生涯。就在结婚前,塞利格曼放弃了她的医学预科训练,去做她丈夫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搭档,研究锡兰(Ceylon)的维达斯人(Veddahs)和苏丹的努巴人(Nuba)(Stocking,1995,p. 117)。虽然她成了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方面的专家,她的丈夫仍收集被认为是那个时候更为重要的主题即体格类型和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他们共同出版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Seligman & Seligman,1911,1932)。

另一对一起做研究一起写作的夫妇是南非的艾琳·詹森·克莱奇(Eileen Jensen Krige)和杰克·克莱奇(Jack Krige)。在这个案例中艾琳是训练有素的民族志学者,在研究德蓝士瓦(Transvaal)北部的拉维都人(Lovedu)时,她把自己做律师的丈夫也拉了进来,但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出版的著作是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两人共同开展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在撰写他们的民族志《雨女王的王国》(*The Realm of a Rain-Queen*,1943)的过程中,她主要承担了他们描述为"更为女性化"的论题,包括健康、生育能力、家庭、小孩、鼓和雨的祭仪、雨女王。她的丈夫负担他们认为是"更为男性化"的论题,包括生计、经济交换、社会群体,以及部落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这种分工反映了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角色的类型化。这本书跟艾琳对日常生活促人心扉的描写是一致的(Hammond-Tooke,1997,pp. 85-89)。

在最近由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弗尼(Robert Fernea)合著的《阿拉伯世界》(*The Arab World*,1985)和《努巴人民族志》(*Nubian Ethnography*,1991),也出现了类似的依性别而安排的写作上的分工。妻子以轻松的旅行日记的风格描述夫妇俩的所见所闻,而丈夫承担的却是抽象概念和一些类型化的且权威性的评论。伊丽莎白描述的是自己游览了很多地方,感受了各种文化,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和早期学者所描述的,弗尼则占据阿拉伯文化有权威的"核心地带"的战略位置。这些文本策略共存于很多书中,意味着不同的阅读方式,赢得了很不同的读者。这些高度性别化的叙述的效果,是突显不同点,而不是弗尼所谓的共同的观察和阐释。

就如男性有时曾用英雄典范描述自己的生活,以表现他们全面的重要性,女性同样可用夸张手法描述她们或她们的顾问的生活,将它们讲述成神话,或为它们树碑立传。奥克利(Okely,1992)报道说,在一遍又一遍向她的男同事讲述她在吉普赛人中开展田野调查的故事过程中,这些故事自然而然被添枝加叶,渲染成了英雄的故事。考虑到职业认同和性别认同是在语言学习中获得的,语言学习塑造了社会人,民族志叙述的男性化并不奇怪。在人类学早期,像理查兹(Audrey Richards)这样的女性通过成为"名誉男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地获得了学科上的平等。当她们声称在田野调查中她们被授予了名誉男性身份时,专业男性化也被披露出来。然而,多数尽力按男性方式行事的女性实际上发现她们被视为"假男人",既不拥有男性角色,也不享有女性角色。南非民族志学者杰克逊(Jackson,1986)在给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像来自火星的男人;我想我应该说,除了对于巴拉人(Bará)来说我是外国人、女人,她们没有多大差异。"(p. 263)

Ifi Amadiume(1987)建议,那些造成田野调查中名誉男性和假男人的观念和做法都应该受到检视,修改甚或抛弃。她指出,接受这样的一个角色事实上可能是新男权同志,也是新殖民主义。在研究她自己的母系伊格布(Igbo)社区期间,当她发现一个重要的妇女委员会被当地的男性领导们从组织里排除了,她不是

选择认同那些男性的做法,而是清楚地指出这种严重削弱当地妇女地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在直接介入到提高妇女们关于这一事件的意识后,她主动流放到英国,在那里她声明,她计划开展研究,并用她的笔支持家乡的政治斗争。

在开展田野研究过程中,女性可以并且经常进入女性的世界,以一种政治性、以女性为中心的视角来写作。在作品的谋划、辞藻、格调方面,都能发现名誉男性民族志学者角色向以女性为中心的民族志学者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强烈参与性的女权主义意识的结果(Maguire,1996)。今天,女权主义民族志学者们虽然在被看作是由男性统治的学科里工作,但是他(她)们正在通过讲述不同的故事,实践反理性中心和反男性中心的写作方法——甚至反对外表、父权真理、理性和男性渴望。

结　论

民族志长期以来被尊为人类学的一种理论取向和哲学范式,最近被吸纳为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民俗、妇女研究、护理、法律、规划,甚至工业工程学的有用的方法论。无论在哪个领域,它都有一个核心假设,即通过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直接的互动,相对于采用其他任何方法,民族志学者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的信仰、动机和行为。

在过去,人类科学效仿强调超越意义领域的现实结构的物理科学。然而,因为人类不仅生存于物质的和有机的领域,同样也生存在意义领域,民族志学者们现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个领域。创造意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叙事,它关注人类生活的现实维度,把许多事件组合成一个整体。近来提供了调查叙述模式的那些民族志学者已经意识到,人种科学需要将自身理解成多元科学,而不是要努力成为自然科学。人类,无论调查中的客体还是主体,都存在于多层现实之中,多层现实是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意义领域是从物质和有机层面自然发生的,而不是它们的产物。

伴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出版的《日记》引起的争论和对秘密观察的拒斥,有一个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的转变。从客观化的方法论向主体间性的方法论的转变使得人种描述也必须转型。对人种信息的收集和人种描述的出版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的研究,激发了民族志学者们将政治的、哲学的、个人的因素揉进单一的叙述里。民族志学者们可以让自身和他者同时出现在一个包含了多种对话声音的叙述里,而不用在集中关注自身的回忆录、生活史或集中关注他人的标准论著之间作选择。

经验是主体间性的和具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和固定的,而是社会性的和过程性的。主体间性和对话涉及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由社会因素即差异(性别、民族、种族)标识的身体部分地表现了身份。作为一个女人、黑人或穆斯林的经验从来不可能是单一的。它将总是取决于由社会建构的位置和地位的多样性。这

些定位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差异的，对于民族志学者以田野调查者、观察的参与者和生活史的收集者的身份去接触的每种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志实践和民族志建构方面的转变反映了民族志学者和民族志读者的人群的重要变迁。随着更多的中层和下层阶级的个人、更多的少数民族和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学者、更多的女性阅读民族志和从事民族志工作，调查者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观念和行为，与被调查者的这些属性一样，被放进了相同的历史时刻或批判的平台。结果是，对于民族志的研究、设计、陈述与阅读在伦理实践与编码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参与观察变为对参与的观察，叙说民族志流派出现，并从边缘跻身主流。

参考文献

Abu-Lughod, L. (1990).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 and Performance*, 5 (1), 7-27.

Abu-Lughod, L.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dler, P. A., & Adler, P.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Agar, M. H. (1980).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Allen, C. J., & Garner, N. (1993). *Condor Qatay* [Play]. (Produced and performed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orothy Betts Marvin Theater, March 31, 1994)

Allen, C. J., & Garner, N. (1995). *Condor Qatay*: Anthropology in perform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7(1), 69-82.

Allen, C. J., & Garner, N. (1997). *Condor Qatay: Anthropology in performan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Altork, K. (1994). Working Norman's birthda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19(2), 159-162.

Amadiume, I. (1987). *Male daughters, female husbands: Gender and sex in an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Zed.

Appadurai, A. (1986).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enter and periphe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 356-361.

Applebaum, H. A. (1985). *Blue chips.* Lawrenceville, VA: Brunswick.

Archetti, E. P. (1994). Introduction. In E. P. Archetti (Ed.), *Exploring the written: Anthropology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writing* (pp. 11-28).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Ardener, E. W. (1985).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decline of modernism. In J. Overing (Ed.), *Reason and morality.* London: Tavistock.

Arguedas, J. M. (1985). *Yawar Fiesta* (F. H. Barraclough,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Arguedas, J. M. (1978). *Deep rivers* (F. H. Barraclough,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Asad, T. (Ed.). (1973).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Ashley, D.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Auster, P. (1998). Translator's note. In P. Clastres, *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pp. 7-13). New York: Zone.

Babcock, B. (1980). Reflexivity: Definitions and discriminations. *Semiotica*, 30(1-2), 1-14.

Bahr, D., Gregorio, J., Lopez, D., & Alvarez, A. (1974). *Piman shamanism and staying sicknes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Banaji, J. (1970). The crisis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New Left Review*, 64.

Bandelier, A. F. (1971). *The delight makers: A novel of prehistoric Pueblo Indi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0)

Barley, N. (1983a). *Adventures in a mud hut: An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abroad.* New York: Vanguard.

Barley, N. (1983b). *Symbolic structu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attie, J. (1960). *Bunyoro: An African king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eattie, J. (1965). *Understanding an African king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eaujour, M. (1987). Michel Leiris: Ethnography or self-portray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470-480.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5). Writing in my father's name: A diary of *Translated woman's first year.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65-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ll, D. (1993). Yes Virginia, there is a feminist ethnography: Reflections from three Australian fields. In D. Bell, P. Caplan, & W. J. Karim (Eds.), *Gendered fields: Women, men and ethnography* (pp. 28-43). London: Routledge.

Bennett, J. A. W. (1986). *Downfall people.*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Bista, D. B. (1979). *Report from Lhasa.* Kathmandu: Sajha Prakashan.

Bista, D. B. (1980). *Shotala.* Kathmandu, Nepal: Sajha Prakashan.

Blackwood, E. (1995). Falling in love with an-Other lesbian: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 fieldwork.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51-75). New York: Routledge.

Bode, B. (1989). *No bells to toll: Destruc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Ande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Bolton, R. (1995). Tricks, friends, and lovers: Erotic encounters in the field.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40-167). NewYork: Routledge.

Boon, J. A. (1982). *Other tribes, other scribes: Symbolic anthropology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s, histories, religions, and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wen, E. S. (pseudonym of L. Bohannan). (1954). *Return to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novel.*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Brandão, C. R. (1982). *Diário de campo: A antropologia com alegoria.* São Paulo: Brasiliense.

Brandes, R. S. (1965). *Frank Hamilton Cushing: Pioneer Americanist.*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Brink, P. J. (1993). Studying African women's secret societies. In C. M. Renzetti & R. M. Lee (Eds.), *Researching sensitive topics* (pp. 235-248). Newbury Park, CA: Sag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874).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ands.* London: CRAA.

Brook, J. P. (1976). *The Ik* [Play].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Peter Brook, Round House Theatre, London)

Brown, K. M. (1991). *Mama Lola: A Vodou priestess in Brookly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ckley, T. (1987). Dialogue and shared authority: Informants as critics. *Centr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7(1), 13-23.

Buelow, G. D. (1973). *The ethnographic novel in Afric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Bynum, B. (1995, December). *My heart is still shaking.* Play perform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A.

Caplan, P. (1988). Engendering knowledge: The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Today*, 4(5), 8-12.

Cassell, J. (1987). *Children in the fiel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assell, J. (1988). The relationship of observer to observed when studying up. In R. Burgess (Ed.),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1, pp. 89-108). London: JAI.

Cassell, J. (1991). *Expected miracles: Surgeons at w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Cassell, J. (1998). *The woman in the surgeon's bo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ulfield, M. D. (197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r partisan participation? In G. Huizer & B. Mannheim (Eds.), *The politics of anthropology: From colonialism and sexism toward a view from below* (pp. 309-318). The Hague: Mouton.

Cesara, M. (pseudonym of K. Poewe). (1982). *Reflection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No hiding place.* London: Academic Press.

Chaffetz, D. (1981). *A journey through Afghanistan: A memo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ernoff, J. M. (1980). *African rhythm and African sensi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lungu, S. W. (1976). Issues in the ethics of research metho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perspective. *Current Anthropology*, 17, 457-481.

Clastres, P. (1998). *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P. Auster, Trans.). New York: Zone.

Condominas, G. (1957). *Nous avons mangé la forêt de la Pierre-Génie Gôo.*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Coon, C. S. (1933). *The ruffian.* Boston: Little, Brown.

Coon, C. S. (1940). *Flesh of the wild ox.* New York: Morrow.

Cooper, E. (1980). *The woodcarvers of Hong Kong: 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periphe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urlander, H. (1990). *The Bordeaux narrativ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Coy, M. W. (1989). Being what we pretend to be: The usefulness of apprenticeship as a field method. In M. W. Coy (Ed.),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pp. 115-13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rapanzano, V.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apanzano, V. (1985). *Waiting: The whites of South Af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Crapanzano, V. (1990). Afterword.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00-30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ushing, F. H. (1882). My adventures in Zuñi.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25, 191-207, 500-511.

Cushing, F. H. (1883). My adventures in Zuñi.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26, 28-47.

Cushing, F. H. (1979). *Zuñi: Selected writings of Frank Hamilton Cushing* (J. Green, E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ushing, F. H. (1990). *Cushing at Zuni: The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s of Frank Hamilton Cushing* 1879-1884 (J. Green,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Dalby, L. C. (1983). *Geish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matta, R. (1994). Some biased remarks on interpretivism: A view from Brazil. In R. Borofsky (Ed.), *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119-132). NewYork: McGraw-Hill.

D'Amico-Samuels, D. (1991). Undoing fieldwork: Personal, polit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F. V. Harrison (Ed.),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Moving furth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for liberation* (pp.

68-87).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Black Anthropologists/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Daniel, E. V. (1984). *Fluid signs: Being a person the Tamil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niel, E. V. (1996).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vid-Neel, A. A. (1927). *My journey to Lhasa: The personal story of the only white woman who succeeded in entering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David-Neel, A. A. (1932).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 New York: Claude Kendall.

David-Ned, A. A. (1936). *Le bouddhisme, ses doctrines et ses methodes.* Paris: Plon.

David-Neel, A. A. (1959). *Initiations and initiates in Tibet.* New York: University.

Dawson, L. L. (199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7, 3-41.

Deck, A. A. (1990). Autoethnography: Zora Neale Hurston, Noni Jabavu, and cross-disciplinary discours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24, 237-256.

Deloria, E. C. (1988). *Waterlil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Denzin, N. K. (1993). The postmodern sensibilit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pp. 179-188). Greenwich, CT: JAL.

DeVault, M. L. (1990). Women write sociology: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A. Hunter (Ed.), *The rhetoric of social research: Understood and believed* (pp. 97-1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De Vita, P. R. (Ed.). (1990). *The humbled anthropologist: Tales from the Pacific.* Belmont, CA: Wadsworth.

Dilley, R. M. (1989). Secrets and skills: Apprenticeship among Tukolor weavers. In M. W. Coy (Ed.),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pp. 181-19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riberg, J. H. (1930). *People of the small arrow.* New York: Payson & Clarke.

Driessen, H. (1993). *The politics of ethnographic reading and writing: Confrontations of Western and indigenous views.* Saarbrücken, Germany: Verlag.

Dubisch, J. (1995). Lovers ill the field: Sex, dominance, and the female anthropologist.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29-50). New York: Routledge.

Du Bois, W. E. B. (196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Essays and sketches.* New York: Fawc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Dumont, J.-P. (1976). *Under the rainbow: Nature and supernature among the Panaré Indi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umont, J.-P. (1978). *The headman and I: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ing experi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unham, K. (1969). *Island possess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wyer, D. (1978). *Images and self-images: Male and female in Morocc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wyer, K. (1977). On the dialogic of fieldwork.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 143-151.

Dwyer, K. (1979). The dialogic of ethnolog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 205-224.

Dwyer, K. (1982). *Moroccan dialogues: Anthropology in ques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kvall, R. B. (1954). *Tents against the sk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Ekvall, R. B. (1981). *The lama knows.* Novato, CA: Chandler & Sharp.

Elwin, V. (1932). *Truth and India: Can we get i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Elwin, V. (1936). *Leaves from the jungle: Life in a Gond vill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 (1937). *Phulmat of the hills.* London.

Elwin, V. (1938). *A cloud that is dragonish.* London.

Elwin, V. (1942). *The Aga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 (1946). *Folk-songs of Chhattisgar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 (1947). *The Muria and their ghotul.*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 (1954). *Tribal myths of Orissa.*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 (1961). *Nagaland.* Shillong: Adviser's Secretariat.

Elwin, V. (1964). *The tribal world of Verrier Elwin.*,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mad, M. (1997). Twirling the needle: Pinning down anthropologists' emergent bodies in the disclosive field of American acupuncture. *Anthropology of Consciousness*, 8(2-3), 88-96.

Eves, R. (1999). Going troppo: Images of white savagery, degeneration and race in turn-of-the-century colonial fictions of the Pacific.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1, 351-385.

Fahim, H. (1977). Foreign and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The perspectives of an Egyptian anthropologist. *Human Organization*, 36, 80-86.

Fahim, H. (Ed.). (1987).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Fei H. T.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Trubner.

Fei H. T. (1981).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Feld, S. (1987). Dialogic editing: Interpreting how Kaluli read *Sound and sentiment.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190-210.

Fernea, E. W. (1965). *Guests of the sheik: An ethnography of an Iraqi villa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Fernea, E. W. (1975). *A street in Marrakech.*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Fernea, E. W., & Fernea, R. A. (1985). *The Arab world: Personal encounte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Fernea, E. W., & Fernea, R. A. (1991). *Nubian ethnographies.*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Fernea, R. A. (1970). *Shaykh and effendi: Changing patterns of authority among the El Shaban of southern Iraq.*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ernea, R. A. (1973). *Nubians in Egyp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irth, R. (1985). Degrees of intelligibility. In J. Overing (Ed.), *Reason and morality.* London: Tavistock.

Fischer, M. M., & Abedi, M. (1990). *Debating Muslims: Cultural dialogues in postmodernity and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linn, J., Marshall, L., & Armstrong, J. (Eds.). (1998). *Fieldwork and families: Constructing new model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Flynn, S. I. (1997). A feast of mangoes.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2(1), 119-124.

Fogelson, R. D. (1984). Who were the AniKutani? An excursion into Cherokee historical thought. *Ethnohistory*, 31,255-263.

Frank, G. (1981). Mercy's childre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6(4), 8-12.

Frazer, J. G. (1887). *Questions on the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superstitions, etc. of uncivilized or semi-civilized peoples* [Pamphlet]. London: Author.

Frazer, J. G. (1981). *The golden bough: The roots of religion and folklore.* New York: Avene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0)

Freilich, M, (1970). *Marginal natives: Anthropologists at work.* New York: Harper & Row.

Freshfield, M. (pseudonym of M. Field). (1947). *Stormy dawn.* London: Faber.

Friedson, S. M. (1996). *Dancing prophets: Musical experience in Tumbuka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l, S. (1991). Between speech and silence: The problematics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gender. In M. di Leonardo (Ed.),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pp. 175-2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ar, W. M., & Gear, K. O. (1990). *People of the wolf.* New York: Tor.

Gerhart, M. (1992). *Genre choices, gender questio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Geuss, R. (1981).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Haberm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hosh, A. (1986). *The circle of reason.* New

York: Viking.

Ghosh, A. (1993). *In an antique 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Ghosh, A. (1996). *Calcutta chromosome: A novel of fevers, delirium, and discovery.* London: Picador.

Goldschmidt, W. (1995). Pietro's hous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0(1), 47-51.

Good, K. (with Chanoff, D.). (1991). *Into the heart: One man's pursuit of love and knowledge among the Yanomam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Goodale, J. C. (with Chowning, A.). (1996). *The two-party line: Conversations in the fie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ottlieb, A., & Graham, P. (1993). *Parallel worlds: An anthropologist and a writer encounter Africa.* New York: Crown.

Gough, K. (1968). Anthropology: Child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19(11).

Griaule, M. (1934). *Les flambeurs d'hommes.* Paris: Calmann-Lévy.

Grindal, B., & Salomone, F. (Eds.). (1995). *Bridges to humanity: Narratives on anthropology and friendship.*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Grindal, B., & Shephard, W. H. (1987). Redneck girl: From experience to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Stewar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17(1-2), 193-218.

Gronewold, S. (1972). Did Frank Hamilton Cushing go native? In S. T. Kimball & J. B. Watson (Eds.), *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 The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pp. 33-50). San Francisco: Chandler.

Gudeman, S., & Rivera, A. (1990). *Conversations in Colombia: The domestic economy in life and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H. R., & Lang, A. (1890). *The world's desire.* London: Longman, Green.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Hammond-Tooke, W. D. (1997). *Imperfect interpreters: South Africa's anthropologists 1920-1990.*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Ed.). (1987).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ner, M. (1980). *The way of the sha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Harrison, F. V. (1991). Ethnography as politics. In F. V. Harrison (Ed.),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Moving furth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for liberation* (pp. 88-109).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Black Anthropologists/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Hastrup, K. (1992). Out of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ist as an object of dramati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327-345.

Hastrup, K. (1995). *A passage to anthropology: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Hau'ofa, E. (1975). Anthropology and Pacific islanders. *Oceania*, 45, 283-289.

Hau'ofa, E. (1982). Anthropology at home: A South Pacific islands experience. In H. Fahim (Ed.),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pp. 213-222).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Hayano, D. M. (1979). Auto-ethnography: Paradigm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uman Organization*, 38, 113-120.

Hayano, D. M. (1982). *Poker fa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ggins, C., & Canan, D. (1984). *The Ik* [Play].

Hong, K. (1994). Experiences of being a "native": Observing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Today*, 10(3), 6-9.

Hsu, F. L., & Textor, R. (1978). Third World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reprisal of anthropological paradigms.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19(1), 5.

Huizer, G. (1979).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From naïveté toward liberation? In G. Huizer & B. Mannheim (Eds.), *The politics of anthropology: From colonialism and sexism toward a*

view from below (pp. 3-141). The Hague: Mouton.

Humphrey, C. (with Onon, U.). (1996). *Shamans and elders: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power among the Daur Mongols.* Oxford: Clarendon.

Hurston, Z. N. (1937).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New York: Collier.

Hurston, Z. N. (1938). *Tell my hors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Hymes, D. (Ed.). (1969).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Jackson, J. (1986). On trying to be an Amazon. In T. L. Whitehead & M. E. Conaway (Eds.), *Self, sex, and gender in cross-cultural fieldwork* (pp. 263-27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Jackson, M. (1986). *Barawa and the ways birds fly in the sk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Jaffe, H. (1982). *Mourning crazy horses: Stories.* New York: Fiction Collective.

Jaffe, H. (1983). *Dos indios.*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Jaffe, H. (1995). *Straight razor: Stories.* Normal, IL: Black Ice.

Johnson, N. B. (1984). Sex, color, and rites of passage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Human Organization*, 43, 108-120.

Jones, D. J. (1970). Towards a native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29(4), 1-59.

Jones, D. J. (1995). Anthropology and the oppressed: A reflection on "native" anthropology. In E. L. Cerroni-Long (Ed.), *Insider anthropology* (pp. 58-7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Jordan, G. H. (1991). On ethnography in an intertextual situation: Reading narratives or deconstructing discourse? In F. V. Harrison (Ed.), *Decolonizing anthropology: Moving further toward an anthropology for liberation* (pp. 42-67).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Black Anthropologists/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Jovanovich, S. (1971). Adolf Bandelier: An introduction. In A. F. Bandelier, *The delight makers: A novel of prehistoric Pueblo Indians* (pp. v-xix).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Jules-Rosette, B. (1975). *African apostles: Ritual and conversion in the church of John Marank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naaneh, M. (1997). The "anthropologicality" of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2, 23-49.

Keesing, R. (1985). "Kwaio women speak": The micropolitics of autobiography in a Solomon Island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7 (12), 27-39.

Kendall, L. (1988). *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haman: Of tales and the telling of tal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ennedy, E. L., & Davis, M. D. (1996).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Kenyatta, J. (1938). *Facing Mount Kenya: The tribal life of the Gikuyu.* London: Secker & Warburg.

Kim, C. S. (1990). The role of the non-Western anthropologist reconsidered: Illusion versus reality. *Current Anthropology*, 31, 191-201.

Kirk, R. (1997). *The monkey's paw: New chronicles from Peru.*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Kleinman, S., & Copp, M. A. (1993). *Emotions and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Knab, T. J. (1995). *A war of witches: A journey into the under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Aztecs.* San Francisco: Harper.

Kondo, D. K. (1995). Bad girls: Theater, women of color,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49-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ndo, D. K. (1997). *About face: Performing race in fashion and theater.* New York: Routledge.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ige, E. J., & Krige, J. D. (1943). *The realm of a rain-queen: A study of the pattern of*

Lovedu socie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lick, D. (1995). The sexual life of anthropologists: Erotic subjectivity and ethnographic work. In D. Kulick & M. Wil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pp. 1-28). New York: Routledge.

Kulick, D., & Willson, M. (Eds.). (1995).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New York: Routledge.

Kuper, H. (1947). *An African aristocracy: Rank among the Swaz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per, H. (1960). *Indian people in Natal.* Natal, Brazil: Natal University Press.

Kuper, H. (1965). *Bite of hunger: A novel of Af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Kuper, H. (1970). *A witch in my heart: A play set in Swaziland in the* 1930*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per, H. (1984). Work, misses?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9, 15-1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La Farge, O. (1929). *Laughing boy.* New York: Literary Guild of America.

La Farge, O. (1931). *Sparks fly upwa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 Farge, O. (1937). *The enemy god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 Farge, O. (1945). *Raw materi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 Farge, O. (1951). *Behind the mount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 Farge, O. (1957). *A pause in the deser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 Farge, O. (1965). *The door in the wal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mbek, M. (1997). Pinching the crocodile's tongue: Affinity and the anxieties of influence in fieldwork.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2 (1), 31-53.

Langness, L. L., & Frank, G. (1978). Fact, fiction, and the ethnographic novel.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3 (1-2), 18-22.

Langness, L. L., & Frank, G. (1981). *Live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biography.* Novato, CA: Chandler & Sharp.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ughlin, R. (1994, March 24). *From all for all.* Play performed at the conference "La Sabiduria Maya ah Idzatil The Wisdom of the Maya," University of Florida.

Lee, R. M. (1995). *Dangerous fieldwork.* Thousand Oaks, CA: Sage.

Leighton, A. H. (1971). *Come near.* New York: W. W. Norton.

Leiris, M. (1934). *L'Afrique fantôme.* Paris: Plon (Terre Humaine).

Leiris, M. (1939). *L'age d'homm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Leiris, M. (1983). *Manhood: A journey from childhood into the fierce order of virility* (R. Howard,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évi-Strauss, C. (1955).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Terre Humaine).

Lévi-Strauss, C. (1973). *Tristes tropique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Lewin, E. (1995). Writing lesbian ethnography.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322-33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win, E., & Leap, W. L. (Eds.). (1996).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ewis, D. K. (1973).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Current Anthropology*, 14, 581-597.

Lewis, O.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Lewis, O. (1961). *The children of Sá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Lewis, O. (1964). *Pedro Martínez: A Mexican peasant and his family.* New York: Random House.

Lewis, O. (1965). *La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Lewis, R. (1996).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Limón, J. (1991). Representation, ettmicity, and the precursory ethnography: Notes of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In R.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pp. 115-135).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MacClancy, J. (1996).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In J. MacClancy & C. McDonaugh (Eds.),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pp. 1-57). London: Routledge.

Madan, T. N. (1987).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ies: An overview. In H. Fahim (Ed.), *Indigenous anthropolog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pp. 263-268).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Maguire, P. (1996). Considering more feminist participatory research: What's congruency got to do with it? *Qualitative Inquiry*, 2, 106-118.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NewYork: E. P. Dutton.

Malinowski, B.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N. Guterma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anganaro, M. (1990). Textual play, power, and cultural critique: An orientation to modernist anthropolog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p. 3-4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quet, J. (1975). Meditation in contemporary Sri Lanka: Idea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7(2), 182-195.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E.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Matthiessen, P. (1962). *Under the mountain wall: A chronicle of two seasons in Stone Age New Guinea*. London: Penguin.

Matthiessen, P. (1965). *At play in the fields of the Lord*. New York: Random House.

Matthiessen, P. (1975). *Far Tortuga*. New York: Random House.

McClaurin-Allen, I. (1989). *Theorizing "native" anthropology: Who, what, why and how*.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cNickle, D. (1936). *The surrounded*. New York: Dodd, Mead.

McNickle, D. (1978). *Wind from an enemy sk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McNickle, D. (1992). *The hawk is hungry and other stori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Meyerson, J. (1990). *Tambo: Life in an Andean vill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iller, W. (1959). *The cool world*. New York: Fawcett.

Misra, B. (1973). *Verrier Elwin: A pioneer Indian anthropologist*. New York: Asia.

Moeran, B. (1985). *Okubo diary: Portrait of a Japanese valle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ontell, G. (1997, October 24). An anthropologist's best-selling thrille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8.

Motzafi-Haller, P. (1997). Writing birthright: On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D. E. Reed-Danahay (Ed.),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pp. 195-222). New York: Berg.

Nader, L. (1969). Up the anthropologist: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284-311). New York: Random House.

Nakane, C. (1970). *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rayan, K. (1989). *Storytellers, saints and scoundrels: Folk narrative in Hindu religious teach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Narayan, K. (1993).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 671-686.

Narayan, K. (1995a). Come out and serv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0(1), 51-59.

Narayan, K. (1995b). *Love stars and all that.*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Nash, D., & Wintrob, R. (1972). The emergence of self-consciousness ill ethn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y*, 13, 527-542.

Nash, J. (1980). A critique of social science roles in Latin America. In J. Nash & H. Safa (Eds.), *Sex and class in Latin America* (pp. 1-22).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Nelson, R. K. (1980). *Shadow of the bunter: Stories of Eskimo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ton, E. (1993). My best informant's dress: The erotic equation in fieldwork. *Cultural Anthropology*, 8, 3-23.

Nimmo, H. A. (1994). *The songs of Salanda and other stories of Sulu.*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Nimuendajú, C. (pseudonym of C. Unkel). (1939). *The Apinayé.*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Nimuendajú, C. (pseudonym of C. Unkel). (1942). *The Serente.* Boston: Frederick Webb Hodge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Fund.

Nimuendajú, C. (pseudonym of C. Unkel). (1946). *The eastern Timbir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No. 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Nimuendajú, C. (pseudonym of C. Unkel). (1952). *The Tuku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imuendajú, C. (pseudonym of C. Unkel). (1978). *Los mitos de creación y de destrucción del mundo como fundamentos de la religión de los Apapokuva-Guarani.* Lima: Centro Amazonico de Antropología y Aplicación Practic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4)

Nolan, W. F. (1968). Chad Oliver. In W. F. Nolan (Ed.), 3 *to the highest power: Bradbury, Oliver, Sturgeon* (pp. 109-160). New York: Avon.

Nordstrom, C., & Robben, A. C. G. M. (Eds.). (1995). *Fieldwork under fir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violence and surviv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hnuki-Tierney, E. (1984). Native anthropologists. *American Ethnologist*, 3, 584-586.

Okely, J. (1992).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and embodied knowledge. In J. Okely & H. Callaway (Eds.), *Anthropology and autobiography* (pp. 1-28). London: Routledge.

Oliver, C. (1951, June). The boy next door.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

Oliver, (S.) C. (1952). *They builded a tower: The 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Oliver, C. (1954). *Shadows in the sun.* New York: Ballantine.

Oliver, C. (1957). *The winds of time.* New York: Doubleday.

Oliver, C. (1962). *Ecolog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as contributing factor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Plains Indi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liver, C. (1967). *The wolf is my brother.* New York: Bantam.

Oliver, C. (1971). *The shores of another sea.* New York: Crown.

Oliver, C. (1981). *The discovery of humanity: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ntam.

Oliver, C. (1989). *Broken eagle.* New York: Banram.

Osgood, C. (1953). *Winter.* New York: W. W. Norton.

Page, H. E. (1988). Dialogic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the ethnograph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4, 163-181.

Panini, M. N. (Ed.). (1991). *From the female eye: Accounts of women fieldworkers studying their own society.* Delhi: Hindustan.

Peters, L. (1981). *Ecstasy and healing in Nepal: An ethnopsychiatric study of Tamang shamanism.* Malibu, CA: Undena.

Pick, D. (1989). *Faces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c.* 184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ol, R. (1995). Breaking the conspiracy of si-

lence: Some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and new mode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In K. Geuijen, D. Raven, & J. de Wolf (Eds.), *Post-modernism and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08-119). Assen-Maastricht, Netherlands: Van Gorcum.

Pozas, R. (1962). *Juan the Chamula: An ethnological re-creation of the life of a Mexican Ind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echtel, M. (1998). *Secrets of the talking jaguar: A Mayan shaman's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indigenous soul.*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

Price, R. (1998). *The convict and the colonel.* Boston: Beacon.

Price, R., & Price, S. (1992). *Equatoria.* New York: Routledge.

Prus, R., & Irini, S. (1980). *Hookers, rounders, and desk clerk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hotel community.* Salem, WI: Sheffield.

Prus, R., & Sharper, C. R. D. (1977). *Road hustler: Career contingencies of professional card and dice hustler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Rabinow, P. (1975). *Symbolic domination: Cultural form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Moroc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binow, P. (1985). Discourse and power: On the limits of ethnographic text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0, 1-13.

Radin, P. (1920). Crashing Thund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Ind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6, 381-473.

Rang, S. (1997). Native anthropology and other problem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2, 23-49.

Rapport, N. (1997). Culture as conversation: Representation as conversation. In A. James, J. Hockey, & A. Dawson (Eds.),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pp. 177-193).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K. E. (1986). *Return to the high val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ck, G. (1995). Resurrectio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0(2), 160-164.

Record, P. (pseudonym of P. Drucker). (1969). *Tropical fronti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Reed-Danahay, D. E. (Ed.). (1997).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New York: Berg.

Reichard, G. A. (1934). *Spider Woman: A story of Navajo weavers and chanters.* New York: Macmillan.

Reichs, K. J. (1997). *Déjà dead.* New York: Scribner.

Ribeiro, B. G. (1979). *Diário do Xingu.* São Paulo: Editora Paz e Terra.

Richards, D. (1994). *Mask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and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 Lockridge, E. (1991). *The sea monster*: An ethnographic drama.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335-340.

Richardson, M. (1984). The museum. *Southern Review*, 20, 919-927.

Richardson, M. (1990). *Cry lonesome and other accounts of the anthropologist's projec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iesman, P. (1977). *Freedom in Fulani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vière, P. (1980). Review of *The headman and I: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the fieldworking experie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7, 213.

Rogers, S. C. (1997). Explorations in terra cognit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9, 717-719.

Rosaldo, R. I.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Rose, D. (1987). *Black American street l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ose, D. (1990). *Living the ethnographic life.* Newbury Park, CA: Sage.

Rosenhan, D. L. (1973).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Science*, 179, 250-258.

Ruby, J. (Ed.). (1982). *A crack in the mirror: Reflexive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uiz, O. (1995). Testimon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0(2), 164-166.

Salerno, N. F., & Vanderburgh, R. M. (1980). *Shaman's daughter.* New York: Dell.

Scheper-Hughes, N. (1992).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evill, J., & Gordon, A. (1996). *The myth of the docile woma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OnStage.

Schipper, K. (1982). *Le corps taoïst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Schmidt, N. J. (1981). The nature of ethnographic fiction: A further inquir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6(1), 8-18.

Schmidt, N. J. (1984). Ethnographic fiction: Anthropology's hidden literary style.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9(4), 11-14.

Scholte, B. (1969). Toward a reflexive and critical anthropology.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430-457). New York: Random House.

Schrijvers, J. (1991). Dialectics of a dialogical ideal: Studying down, studying sideways and studying up. In L. Nencel & P. Pels (Eds.), *Constructing knowledge: Authority and critique in social science* (pp. 162-179). London: Sage.

Seligman, C. G., & Seligman, B. Z. (1911). *The Veddas.* The Hague: Osterhout.

Seligman, C. G., & Seligman, B. Z. (1932). *Pagan tribes of the Nilotic Sudan.* London.

Seremetakis, C. N. (1993). *The last word: Women, death and divination in inner Man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w, C. (1930). *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ostak, M. (1981).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ryock, A. (1996). Tribes and the print trade: Notes from the margins of literate culture in Jord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8, 26-40.

Shryock, A. (1997). *Nationalism and the genealogical imagination: Oral history and textual authority in tribal Jord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onelli, J. M., & Winters, C. D. (1997). *Crossing between worlds: The Navajos of Canyon de Chelly.*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kafte, P. (1986). Narayan's road: The wheel of change in Nep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11, 102-104.

Skomal, S. (1995). Monkey business in Chiapas.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36(7), 41.

Springwater, C. (1996). Stories of red clay: Man of the mesa.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1(2), 192-199.

Stacey, J. (1988).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21-27.

Stacey, J.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Stacey, J. (1995). Disloyal to the disciplines: A feminist trajectory in the borderlands. In D. C. Stanton & A. J. Steward (Eds.), *Feminisms in the academy* (pp. 311-32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tanley, L., & Wise, S.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avenhagen, R. (1971). Decolonizing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uman Organization*, 39, 333-357.

Stewart, J. O. (1971). *Last cool days.* London: Andre Deutsch.

Stewart, J. O. (1975). *Curving roa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ewart, J. O. (1989). *Drinkers, drummers, and decent folk: Ethnographic narratives of village Trinida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ewart, J. O. (1995). Carnival mourning. In B. Grindal & F. Salamone (Eds.), *Bridges to humanity* (pp. 213-230).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Stocking, G. W., Jr. (1983).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Fieldwork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from Tylor to Malinowski. In G. W. Stocking, Jr. (Ed.),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pp. 70-1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cking, G. W., Jr. (1995).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toller, P. (1989a). *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toller, P. (1989b). *Fusion of the worlds: An ethnography of possession among the Songhay of Ni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oller, P., & Olkes, C. (1987). *In sorcery's shadow: A memoir of apprenticeship among the Songhay of Ni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rathern, M. (1987a). The limits of auto-anthropology. In A. Jackson (Ed.), *Anthropology at home* (pp. 59-67). London: Tavistock.

Strathern, M. (1987b).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251-282.

Talbot, D. A. (1915). *Woman's mysteries of a primitive people: The Ibibios of southern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Talbot, P. A. (1923). *Life in Southern Nigeria: The magic,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e Ibibio tribe.* London: Frank Cass.

Talbot, P. A. (1969). *The peoples of southern Ni-geria.* London: Frank Cass.

Tarn, N. (with Prechtel, M.). (1997). *Scandals in the house of birds: Shamans and priests on Lake Atitlan.* New York: Marsilio.

Tedlock, B. (1982). *Time and the highland May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Tedlock, B. (1986). Keeping the breath nearb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11, 92-94.

Tedlock, B.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 69-94.

Tedlock, B. (1995). Works and wives: On the sexual division of textual labor. In R. Behar & D.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pp. 267-28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edlock, D. (1979). The analogical trad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dialogical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5, 387-400.

Tedlock, D. (1986). *The translator* or *Why the crocodile was not disillusioned*: A play in one act. *Translation Review*, 20, 6-8.

Tedlock, D. (1987). Questions concerning dialogical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3, 325-344.

Tedlock, D. (1998, April 24-25). *Man of Rabinal: The Mayan dance of the trumpets of sacrific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a Mayan play produced and performed in the Katharine Cornell Thea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Tedlock, D., & Mannheim, B. (Eds.). (1995). *The dialogic emergence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ehindrazanarivelo, E. D. (1997). Fieldwork: The dance of power.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2(1), 54-60.

Terrio, S. J. (1998). Deconstructing fieldwork in contemporary urban Franc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1(1), 18-31.

Thomas, E. M. (1987). *Reindeer moon.* New York: Pocket Books.

Thomas, J. (1983). Toward a critical ethnography. *Urban Life*, 11, 477-490.

Thomas, W. I., & Znaniecki, G. (1918-1920).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Boston: Richard G. Badger.

Thornton, R. J. (1988). The rhetoric of ethnographic ho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285-303.

Traweek, S.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rinh T. M.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urnbull, C. (1961). *The forest people: A study of the Pygmies of the Cong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urnbull, C. (1965). *Wayward servants: The two worlds of the African Pygmies.*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

Turner, E. (1985). Prologue: From the Ndembu to Broadway. In E. Turner (Ed.), *On the edge of the bush: 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 (pp. 1-15).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rner, E. (1987). *The Spirit and the drum: A memoir of Afric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rner, E. (1993). The reality of spirits: A tabooed or permitted field of study? *Anthropology of Consciousness*, 4(1), 9-12.

Turner, E. (1996). *The hands feel it: Healing and spirit presence among a northern Alaskan people.*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yler, S. A. (1987a). *The unspeakable: Discourse, dialogue, and rhetoric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yler, S. A. (1987b). On "writing-up/off" as "speaking-fo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3, 338-342.

Tylor, E. B. (1884). American aspects of anthropology. In *Report of the 54th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p. 898-924). London: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Underhill, R. (1936). *Chona, Papago woman.* Menasha, WI: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Underhill, R. (1940). *Hawk over whirlpools.* New York: J. J. Augustin.

Urton, G. (1981).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earth and the sky: An Andean cosmolog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isweswaran, K. (1988). Defining feminist ethnography. *Inscriptions*, 3-4, 7-44.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isweswaran, K. (1998). "Wild West" 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gender. In H. Silverberg (Ed.), *Gender and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he formative years* (pp. 86-1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e, P. (1993). 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among Colombian blacks. In D. Bell, P. Caplan, & W. J. Karim (Eds.), *Gendered fields: Women, men and ethnography* (pp. 199-214). London: Routledge.

Wafer, J. (1991). *The taste of blood: Spirit possession in Brazilian candomblé.*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Wafer, J. (1996). Out of the closet and into print: Sexual identity in the textual field. In E. Lewin & W. L. Leap (Eds.), *Out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 (pp. 261-27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ldorf, S. (1986). The pig ma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Quarterly*, 11, 95-101.

Ward, M. C. (1989). *Nest in the wind: Adventures in anthropology on a tropical islan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Webster, S. (1982). Dialogue and fiction in ethnography.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7, 91-114.

Wellmer, A. (1971).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Wendt, A. (1973). *Sons for the return home.* Auckland, New Zealand: Longman Paul.

Wendt, A. (1979). *Leaves of the banyan tree.* Harmondsworth: Penguin.

Weston, K. (1991).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ston, K. (1993). Lesbian/gay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339-367.

Willis, W. S. (1969). Skeletons in the anthropo-

logical closet. In D.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pp. 121-152). New York: Random House.

Willson, M. (1997). Playing the dance, dancing the game: Race, sex and stereotype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Ethnos*, 62(3-4), 24-48.

Wilson, C. (1974). *Crazy February: Death and life in the Maya highlands of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M. A. (1992). *A thrice-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f, K. H. (1964). Surrender and community study: The study of Loma. In A. J. Vidich, J. Bensman, & M. R. Stein (Eds.),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studies* (pp. 233-263). New York: John Wiley.

Yang, M. M. C. (1945).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ang, M. M. C. (1972). How *A Chinese village* was written. In S. T. Kimball & J. B. Watson (Eds.), *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 The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pp. 63-73). San Francisco: Chandler.

Young, R. J. C.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Yu, P. -L. (1997). *Hungry lightning: Notes of a woman anthropologist in Venezuela.*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Zedeño, M. N. (1994). Saint versus the hummingbird.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19(2), 162-164.

诠释实践之分析 18

ANALYZING INTERPRETIVE PRACTICE

定性研究分析一直呈现摇摆不定的局面。一个时期自然主义盛行，此时以对社会领域详尽描述为目标。后来，分析转移到为社会所建构的世界及其经验的过程。当后现代的敏感性再次着力于分析本身，将分析看作是社会现实的来源时(Gubrium & Holstein, 1997)，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便加剧了。但，即便如此，这种振荡不可避免地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定性研究者当前关注的是社会意义及秩序的进步，本章将在这一方面展开论述。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分析的发展和多样化，及其所声称的在定性研究领域地位的日益上升，分析学家们也从巧妙的"误解"性的理论和规范性方法的新型混合体中获得了新的灵感。最近，民族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关注的重点也在逐渐迎合建构主义的趋势(Gubrium & Holstein, 1997; Holstein & Gubrium, 1994, 2000)，以使其分析的敏锐度更加突出、视野更加开阔。与此同时，在进行散漫的语言描述的社会科学中独树一帜的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也充满了建构主义对文化、制度和历史的关注。本章将简要介绍一些学者所做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话语分析之间探索并扩展一种散漫和互动的方法。

过去有段时间，定性研究人员的兴趣是将社会现实的建构、管理和维持的过程进行纪实性的描述。舒茨的社会现象学(Schutz, 1962, 1964, 1967, 1970)、伯格和拉克曼的社会建构主义(Berger & Luckman, 1967)，以及符号互动论过程取向的特性(例如，Blumer, 1969; Hewitt, 1997; Weigert, 1981)等，它们都对建构主义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描述社会秩序的实际过程方面，民族志方法学的分析无疑最具根本性，其经验也最为丰富(Garginkel, 1967; Heritage, 1984; Holstein & Gubrium, 1994; Maynard & Clayman, 1991; Mehan & Wood, 1975; Pollner, 1987, 1991)。分析的重点一直集中在社会现实是"如何"被建构的，而民族志方法学在日常生活的构成机制描述方面独占鳌头。

最近，人们又开始关注与民族志方法学相关的一些问题，这反映出人们对社会构成的内容、条件和源泉的关注迄今为止仍未结束。自然主义的陈旧问题再次复苏，但其分析却更为复杂，经验也更为敏锐。对现实之构造的分析再次涉及

意义构成和社会秩序的文化与制度的情境。虽然新兴的经验主义仍以社会构成过程为核心,但其"诠释性实践"的色彩却日益浓厚,这也是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中被领会、理解、组织和表达的过程、条件和源泉的多面体(Gubrium & Holstein, 1997;Holstein,1993;Holstein & Gubrium,1994,2000)。诠释实践涉及社会现实构造的方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也就是说,它的中心有两个:一是人们系统地构建其经验和世界的方式,二是了解和形成构成现实意义结构和制度化的生活。人们以对社会建构过程的方式和内容的日益关注回应了马克思(Marx,1956)的一句名言:人们积极地构造自己的世界,但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语言。诠释实践的分析学的兴起正是用来解决这个二重性问题,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概念性词汇。本章将从该分析学在几个主要社会学传统中的概念基础开始,概述该分析学的其中一个流派。

本质问题

诠释实践的分析学有不同的概念基础,其范围从舒茨对社会现象学的发展,到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早期研究而形成的民族志方法学的研究计划所体现出来的对经验的关注,再到对话和互动的研究(Sacks,1992;Silverman,1998),以及由福柯提出的制度和历史话语的同时期研究(Dreyfus & Rabinow,1982)。这些都是最新的发展,我们现在开始逐一讨论。

现象学背景

胡塞尔(Husserl,1970)的哲学现象学为舒茨和其他社会现象学家提供了出发点。关于知识的经验性基础这一问题,胡塞尔认为感知和客体之间不是被动关系,相反,是人类意识积极构造经验对象。换句话说,意识往往就是对某个事物的意识。意识并非凌驾于经验之上而独立存在,并或多或少地以一种完美的方式感知和构思着对象和行为;相反,意识从一开始就作为其对象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虽然"建构"一词很久以后才流行,但可以说,意识在感知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世界。胡塞尔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意识的结构,正是这一结构使得人们领会经验世界成为可能。

舒茨(Schutz,1962,1964,1967,1970)将胡塞尔的哲学问题转向了社会普通成员对其日常生活的关注,同时介绍了一套与民族志方法学研究相同的原则。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重点是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即每个个体所想当然的世界的样式。他警告说,"对个人观点的保护是唯一的,却能充分地保证社会现实的世界不会被由科学观察者虚构的、不存在的世界所取代的途径"(Schutz, 1964,p.8)。从这一点看来,科学观察者如何使现实世界变得有意义。观察者所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员如何领会其所经验的对象并据此采取行动,仿佛它们是独立的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迪尔凯姆(Durkheim,1961,1964)的社会学范式与

这一目标相同,不同和独立于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类型学的出现是其范式的基础。

这与舒茨称为"自然态度(the natural attitude)"下的假设完全不同。这个观点认为从原则上世界"就在那儿(out there)",也可以说在类型上它不同于认知和理解的行为。自然的态度假定生活世界在人们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人们离开之后还将依然存在。舒茨建议在研究成员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时,首先要将世界"括起来(bracket)"以便于分析。也就是说,分析家必须先暂时将现实撇开,这样才可能对构建过程("如何"构建的问题)进行观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独立的、不同的经验世界才成为人们客观的现实。观察者应暂时抛开存在论对事物和事件的性质和本质的判断,这样他才能重点观察生活世界中的成员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对其相信是真实的事物和事件进行主观构建的——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关注这个世界或是否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些事物和事件都是存在的。

舒茨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性倾向使他相信一种常识性的知识,即人们通常将社会形式"客观化(objectify)"。他说,每个个体都是用一套知识(由源于社会的一般观念和类型所构成)来看这个生活世界的。这些概念、民间理论、信仰、价值观和态度被应用于经验的各个方面,这样它们不仅富有意义,而且还具有了日常的、熟悉的外表。在这个知识库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其成员早已熟悉的世界。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分类的方式将特定对象的知识与特定的事件连接起来,日常生活中的纷繁现象都被包含在一些划分好了的共用观念(或类型)之中。这些"类型化"使得个体能对其经历进行理性解释,从而使得不同的事物和芜杂的事件能被归类为具体的类型。换句话说,类型化可以将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为可识别的形式,使其具有意义。反过来,随着经验的成型,知识本身也在实践中日益丰富和变化。

普通语言是一种形式法则。从自然的态度看来,词语的意义主要被认为是按照意义的相应理论,它在真实世界中所指的或所代表的东西。在这种基础上,语言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递准确的信息。然而,作为一种类型化过程,词语和类型都是社会世界的组成成分。在普通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类型化在使用者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生活世界是以一种大家熟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个世界真实存在,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意义。个体之间产生互动,而在这个互动的环境中,所有个体都是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同时经历其中的,即便出现某种错误的理解时也是如此。相信了主观之间是在分享同一个现实之后,可以进一步假定我们可以相互理解。主观间的理解属于一项社会成就,这套理解通过共同的互动假设得以维持,并在类型化过程中不断存在下去。

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

虽然民族志方法学得益于舒茨的理论,但它却不是舒茨的社会现象学的简单延伸。民族志方法学通过"现象学的敏感性"(Maynard & Clayman,1991)和对日常社会实践(Garfinkel,1967)的突出关注的结合来解决秩序的问题。从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世界的真实性是通过其成员的互动来实现的,这种互动

机制产生并维持成员生活中的可说明的环境[2]。可以说，民族志方法学家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究竟如何"进行"社会生活，其主要目的是记录社会成员如何具体地建构和维持社会实体，如性别、自我和家庭。

虽然加芬克尔的研究具有现象学基础，但他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对其导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行动理论的响应(Heritage,1984;Lynch,1993)。根据帕森斯的理论，社会秩序是通过规范和价值体现的社会整合来实现的，而根本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加芬克尔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替代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种观点将演员描绘成了"文化瘾君子(cultural dopes)"，他们对外界的社会势力和内在的道德训诫产生自动反应。在加芬克尔(Garfinkel,1952)看来，社会秩序是普通社会成员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分析而形成的。他认为社会成员都拥有普通的语言和互动技巧，日常生活的可说明的特征都是通过这些技巧而产生的。这种方法强调社会成员在社会秩序产生过程的作用。加芬克尔将社会成员定义为道德规则的主动使用者，而非一定程度上的终结者，这样就使所处的世界具有一定的秩序性。于是，社会成员为形成日常现实而采取的整体的"方法"便成为民族志方法学的研究主题。

社会成员所使用的经验调查"方法"从现象学的框架中脱离了出来。通过采用"民族志方法学的无差别性(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Garfinkel & Sacks,1970)平行的方针，研究者暂时搁置以社会世界为优先的探求，而重点研究社会成员产生社会秩序意识的方式。诸如犯罪或精神疾病这样的社会现实并非想当然地自然存在，相反，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它们的存在，以弄清它们对相关成员而言如何成为现实。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普通的构成性的工作上，这种工作产生了局部不可怀疑的稳定现实。这种方法拒绝对成员活动的正确性进行任何判断。社会学有一个普遍倾向，即从表面正确的社会学观点出发讽刺和批评常识性的观点，与此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对社会成员的实践分析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即，社会成员之间有适当的方法来看待和解释现实世界。波尔纳(Pollner,私人交流,1983.5)将遵循的规则简单概括为：别与成员辩论！

民族志方法学家们研究过社会秩序的多个层面。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对可识别的行为结构、动机体系或者动机与社会结构的因果关系是如何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实际思维中进行纪实性的描述(Zimmerman & Wieder,1970)。传统社会学将规则、规范和共享意义看成是对成员行动的外在解释，而民族志方法学反过来研究社会成员自己是如何看待和使用这些规则、标准和共享意义，以解释成员行动的规律性。民族志方法学暂时搁置行动是由外在规律控制或内在驱动的观点，以便观察社会成员自己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规律。行动的表面即是规则的结果——这被理解为行动的表面要么顺应了规则，要么未能顺应规则。在通过前瞻性地(prospectively)运用规则来"解释"行动或者为行动提供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ly)由规则激发的解释的过程中，社会成员表达着一种对结构和秩序的意识，并在此过程中为所有实践性目的进行着理性的、连贯的、重复性的和可反复的种种行动(Zimmerman,1970)。

比如,在陪审团商议某案例时,一位陪审员在讨论案子时可能这样解释她的观点:法官对陪审团在作出裁决前就怎样考虑该案例所做的法律要点说明(instructions)促使她有了那些想法。她积极地利用法官的法律要点说明来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理、合法、正确,因为,她的观点是"根据规则"而形成的(Holstein,1983)。相反,另一位陪审员可能说明其观点是出于对正义的维护,同时还引用了某条价值观或道德原则作为其依据(Maynard & Manzo,1993)。从民族志方法学的立场来看,这些观点的合理性或正确性与涉及的推理并无分歧。问题的重点在于个体对法律要点说明、价值观、道德原则和其他依据的利用,以便在社会行动中构造一种一致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之间对引导他们形成其观点及最终判决达成共同理解。

对可说明的社会秩序的展示便形成了民族志方法学的分析范畴。民族志方法学家并不认为社会成员首先对种种情况的意义和定义达成了共识,相反,他们考虑的是社会成员如何利用天赋的能力来对其行动进行巧妙的解释并赋予其合理性,然后才达成共识。社会秩序既不是由外部公认的社会力量强加而来,也不是那些已经或多或少社会化了的社会成员的外在表现,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家认为它们是世俗的理性实践的产物(Poller,1987)。如果社会秩序是在实践中并且通过实践而实现的,那么,社会各领域和环境因素都是自我形成的。就像此前提到的,社会成员在交往行动和赋予其行动以意义的过程中不断"进行(doing)"着社会生活。他们的语言游戏,就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8)所述,构成了种种的日常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游戏就是"生活形式(forms of lives)"。

这个观点涉及普通社会行动的两个属性。首先,所有的行动和对象都是"具体化(indexical)"的。它们依赖于一定的情境,或者说把情境具体化了。如果缺乏可辨别情境的对象和事件,其意义也会是模棱两可的。实际的意义正是在情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其次,提供有意义情境的各种因素都是自我形成的。每个因素都可用来解释某个行动(比如上面的那位陪审员说她就是顺从了法官的旨意),从而形成某种情境(在这个例子中,即法律程序的职责需求),以便对该陪审员自己相同和相关的行动及他人的行动进行评价。该解释过程同时也形成了特定的情境,在该情境的基础上,该陪审员又使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具备了合理性。在形成了这样的情境之后,该陪审员又可以回过头来这样解释自己的行动,比如:"正因为那样,我就有了如此这般的观点。"这样就使得业已形成的情境具备更多的合理性(即便不是绝对可接受的)来解释其行动。换句话说,实践论据处于其所描述和解释的环境因素之中,同时又对其起作用。于是,社会秩序与其现实"作用于本身(reflexive)"。对环境因素的解释和描述构成了该环境,同时又被它们构成的情境来定形。

在研究过程中,民族志方法学密切关注的是自然产生的对话和社会互动,把它们看作所研究情景中的组成要素(Atkinson & Drew,1979;Maynard,1984,1989;Mehan & Wood,1975;Sacks,1972)。这样,根据是否强调了互动的意义或对话的结构及其他因素,便产生了不同的经验主义的方向。民族志方法学倾向于把研

究重点放在经过局部处理过的意义和情境上,在这些意义和情境之中,通过社会互动产生了待研究的客观现实。这些研究考虑的是与局部意义构造有关的一定情境下的对话内容(Gubrium,1992;Holstein,1993;Lynch & Bogen,1996;Miller,1991;Pollner,1987;Wieder,1988)。他们将注意力放在社会秩序是如何在日常交往中通过对周围情境的详细描述而建构的,这些情境及其局部的了解和看法对社会互动过程中说话的内容起着桥梁的作用。这些研究对日常生活做了非常多的描述,既有真实情境的对话片断,又有对互动进行的民族志的说明,以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从对话分析与社会互动和情境的关系程度来说,它可以用到(非福柯式的,non-Foucauldian)话语分析(DA)的形式,强调谈话及会话如何用来产生意义(Potter,1996,1997;Potter & Wetherell,1987)。

对强调对话本身结构的研究而言,它分析的是产生意义的会话"机器(machinery)"。此处的重点是连续的、逐字的构成社会特征的对话或"互动中的对话(talk-in-interaction)",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会话分析(CA;Heritage,1984;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Silverman,1998;Zimmerman,1988;另见本书第31章)。这些研究的分析是对交流过程的详细说明,在该过程中,说话者按照一定方法和顺序来构建他们对会话实践的关注。由于往往摒弃了民族志的详细说明,而只对地点情境进行了简洁的引入性介绍,其所表现出的分析意识是,尽管对所谓"构建性的对话(institutional talk)"或"工作中的对话(talk at work)"的分析在这方面平衡得更好,但是只有传记式的和社会的细节可被理解为会话机器的结果(例如,Drew & Heritage,1992)。尽管因为缺少对民族志细节的关注,一些人认为会话分析与民族志方法学的联系很小(Atkinson,1988;Lynch,1993;Lynch & Bogen,1994;争论文献见:Maynard & Clayman,1991;ten Have,1990),但会话分析显然与民族志方法学一样对局部和方法学的社会行动构建感兴趣(Maynard & Clayman,1991)。

赫里蒂奇(Heritage,1984)把会话分析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假定:其一,互动是有序组织的,这一点体现在日常会话之中。互动的各方都表现出与说话者的个人特点无关的、稳定而可识别的特征。这样,会话分析阶段可被看作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中,并且通过社会互动,而不是被内在力量(如动机)或外在的决定因素(如社会地位)所构建的。其二,社会互动是基于情境的,因为对话产生于一定情境的同时也反映着其产生的情境。该假定强调了对话和互动的局部调节和局部构建,从而证明了此前提到的具体化和反身性这对二重特质。其三,这些特质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互动之中,因此,对话或互动细节的所有形式都是相关的。

会话分析遭到了民族志学家的猛烈批评。他们认为,会话分析忽略日常生活情境的结果,会出现把社会生活简单归类为所记录的对话和会话的顺序排列的风险。比如,林奇(Michael Lynch)就把会话分析比作了分子生物学。一方面,这证明了林奇对会话分析的观点,即认为它是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另一方面,它把对话看成是一套构建于社会的、相对可预见的技巧,正是这套技巧把有

序的社会活动集中到了一起。根据林奇(Lynch,1993)的观点,会话分析试图描述的是"构成要素及其组合规则的简单秩序,所采取的方法就像分子生物学一样"(p.259),分解 DNA 以获取分子结构及其组合规则。

作为一门"分子社会学(molecular sociology)"(Lynch,1993),会话分析注重标准而有序的产生社会行动的会话"机器"。该机器以多种方式颠倒了对人类能动作用的传统理解,用会话对道德秩序的需求来替代心理和动机的需要。虽然这样并非忽略所有的能动作用,但的确是将它们放在了会话权利和义务的"自由经济(liberal economy)"的地位上(Lynch,1993),用来测试民族志方法学对确定性理论的容限。

同林奇和博根(Lynch & Bogen,1994)所标榜的会话分析的"更加丰富的实证主义"相反,加芬克尔、林奇和其他学者阐述了他们所谓的"后分析(postanalytic)"的民族志方法学,这种方法学在社会互动的持久结构或机制方面不太强调普遍性(Garfinkel,1988;Lynch,1993;Lynch & Bogen,1996)。该研究以高度局部化的能力为中心,该能力构建了日常"工作"的具体领域,特别是天文学家(Garfinkel,Lynch, & Livingston,1981)、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Lynch,1985),以及数学家(Livingston,1986)的工作。研究的目的是对一定知识和活动限制下的社会实践之"存在的个体性(haecceity)"("此"性)进行纪实性的描述(Lynch,1993)。这些活动的实时性工作细节被看作是它们所产生的知识的具体化的特征。要将知识与产生知识的高度具体化的场景进行分离是不可能的。该方法主张最小程度的理论化研究,因为它拒绝概念化或门类化,而极力主张对具体和局部的实践(这些实践是对秩序和可说明性的证明)进行详细的描述性研究(Bogen & Lynch,1993)。

虽然会话分析和后分析民族志方法学成功地展示了社会实践的全貌,但它们都忽略了对话、情境和社会互动的概念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加芬克尔的早期研究和萨克斯(Sacks,1992)的开创性的会话实践报告中是显而易见的(Silverman,1998;及本书第 31 章)。加芬克尔和萨克斯都未能想象出会话机器本身也是可识别的社会形式的产生者。对社会现实构建方式的注意与对有意义的内容的注意取得了平衡。情境、文化理解和日常生活的调节作用被认为是与对话及社会互动相互交织在一起(本书第 31 章)。特别是萨克斯,他把文化理解为实践上的事情,一种用来识别话语和交谈中可能联系的源泉。不管他们是描述(加芬克尔的)"良好的有组织的理由"还是(萨克斯的)"成员身份的分类方法",他们的本意都是要避免将社会实践简化为任何类别的高度局部化或瞬间性的"此"性。

这样一来,民族志方法学最初的一些使命便宣告夭折了,因为会话分析和后分析民族志方法学愈来愈将其研究对象限制在社会实践与对这些社会实践直接说明的关系上。如果后分析和会话分析的全部目的是要描述说明实践,而正是此种说明使描述在产生描述的环境中成为可理解的描述,那么,建构主义者就可能需要开辟一个新的课题来延续民族志方法学对互动研究的敏感性,同时将其

研究对象延伸至建构性和被建构的日常生活内容。福柯就是该课题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者之一。

福柯式的话语分析

民族志方法学是在互动的层面上展开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而福柯则是以不同的经验主义范畴研究日常生活。福柯与民族志方法学家差不多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登上分析法的舞台，他研究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权力/知识体系是如何构建主体及其世界的。福柯的理论将这些体系看作"话语(discourses)"，强调它们不仅仅是思想意识的主体，或其他符号的组成，而且是工作态度、说话方式、参考词汇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行动过程。福柯(Foucault,1972)自己解释说话语不是"仅仅的事物和词语的交互部分——一种事物之间的模糊的网络，一种明显的、可见的、有色的词语链"(p. 48)。相反，话语是"系统形成它们所讲的客体(及主体)的实践"(p. 49)。即使是建筑设计，比如监狱，也显示出某种社会逻辑，这种社会逻辑指明了用来解释个人及其所处客观社会情境的方法(福柯，1979)。

就像民族志方法学看待社会互动一样，福柯把话语看成是具有社会反身性，既构成又有意义地描述了世界及其主体。但在福柯的分析中，话语构建的"内容(what)"和模糊技巧的"方式(how)"同等重要。虽然这在分析上倾向于文化"自然主义(natural)"，但福柯把话语当成社会实践显示了对主观性实践理解的重要性。如果他认为主体和客体是通过话语构建的，那么他也会同意主体是在非故意的情形下主动形成话语并在其工作之中运用这些话语(Best & Kellner,1991)。就像福柯(Foucault,1998)所解释的：

> 就算主体是积极地通过本体实践来构建自身的话，这些实践也并不是由个体自己所创建的。因为个体仅仅是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了这些实践的模式，同时也是由他的文化、社会和社会团体建议暗示并强加到该个体身上的(p. 11)。

这个观点补充了民族志方法学纪实性地描述日常对话和社会互动实践所完成秩序的兴趣。福柯特别关注社会场景或组织地点，比如说收容所、医院和监狱，它们指明了话语实践发生的场所，并将特定主体的话语与生活经历的构建联系起来。话语体系的组织特性是民族志方法学所关心的问题，其实践的倾向是将社会世界及其主观性看成是寓于并体现于话语的准则之中。

有几个评论家曾经指出，福柯(Foucault,1980)所指的"权力/知识"(或论述)的体系与民族志方法学陈述语言使用的制度化权力有着惊人的共通性(Atkinson, 1995; Gubrium & Holstein, 1997; Heritage, 1997; Miller, 1997b; Potter, 1996; Prior, 1997; Silverman, 1993)。这种明显的相关性表明福柯所描述的不同制度或文化场所的"实践中的话语"可以被比作民族志方法学的以不同社会互动形式表现的"话语实践"[3]。本章中，我们将继续使用"实践中的话语"和"话语实践"来强调这种共通性。

虽然民族志方法学家和福柯流派从不同的知识传统出发,有着不同的经验基础,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们各自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他们都在研究话语的反身性。他们都不认为实践中的话语或话语实践是由外部的社会力量或内部的动机所引起或解释的,相反,这两者都是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机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人所知或被施行。对这两派学者来说,“权力”是来自于对社会生活截然不同形式的清楚描述,而不是一些人利用特定的资源去影响其他人的生活。虽然实践中的话语表现为“政体/政权”或现存的行为模式,该模式(在历史和制度上)“约束”或形成其追随者的生活,而话语实践是在构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模式中体现的,但两者所指的实践都是社会世界业已发生的“做”或者正在进行的行为。

对福柯来说,权力就像其他知识一样贯穿着话语的过程,这也就是“权力/知识”一词的来源。话语过程不仅是在使用词语,也在赋予它们意义、建构认知,并形成理解及持续的互动过程。这种“工作(work)”同时又反过来组成现实,否则词语的作用就会被限于参考和指定。对某种主观性话语的使用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这个主体,事实上,它同时也有意义地根植于话语的某一类主体。比如,在用医学话语交流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产生医生和病人这两个角色,他们各自的行动又分别涉及对社会上作为主流科学知识诊治技术的运用和接受。社会话语的这种理所当然的性质对“思考”(或讲话)的似乎错误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将病人确定为病人的话语中,病人也扮演着“有力”的角色。这是一种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它是有力的,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已知和共享的东西用于实践。语言并不只是它所代表的内容而已,就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8)所说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形式”。如果民族志方法学家关注的是社会成员如何利用日常的方法来说明其进行的活动和所处的世界,那么,福柯则使我们了解造成其可能结果的相关条件。比如,在西方后工业化的世界中,如果认为医药和巫术对治病救人同等重要,这是很不可思议的,甚至是可笑和荒谬的。医学话语的力量特别在于其“看到却未被注意到”的能力,以及它发现唯一的可能而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能力。

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都是按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验资料,而不是建立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框架。根据传统的理解,理论主要是解释所研究事物的现状,它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比如自杀率为何提高,或者人们为何感到消沉。而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目的是回答个人的经验是如何用某些特定的词语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都是理论前的问题,其目的分别是要理解理论的主题首先是如何形成的,又将如何发展。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描述现实社会的基础。

现在,在这一点上仍然保持一致。因为福柯的课题(而且是大多数课题)研究的是历史范畴,其经验资料的分析对象并不包括实时性的对话和社会互动。虽然福柯将现存的社会形式与新形式的“产生”进行比较,指出了形成并显示不同组织方面现实变化的话语形式的重大变化,但他没有说出这些日常变化所采

取的方式方法(Atkinson,1995;Holstein & Gubrium,2000)。当然,他对新技术的出现作了大量论述,比如医学上的监督技术和现代犯罪司法体系(Foucault,1975,1979),但他没有描述这些技术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的。近期的福柯追随者——如罗斯(Rose,1990),对形成私有本体的“灵魂控制(governing the soul)”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翔实的描述——也没能对日常新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

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家致力于对日常的、互动的过程进行纪实性的描述,正是通过该过程,现实被构建成可说明的各种结构。他们对组成资源、可能性和限制性都不作考虑。在具体互动中表明日常与现实的接触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回事,但要理解这些日常接触都有哪些一般性的构成要素又是另外一回事。从互动的对话机器我们无法知道表明和指导对话的进行需要多大的工作和资源,也无法知道产生某种特定结果的后果,而这两者都是构成实践的重要要素。人们在谈到其所处的世界和这些世界的主观性时,也会描述生活的具体形式。在这一点上,福柯的理论给民族志方法学提供了分析谈话和社会互动中各种机会和可能的敏感性,而不必将它们当作产生日常社会秩序的外部模式。

转向诠释实践的分析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诠释实践和现实建构,那么就需要将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分析更明显地放在一起。这并不是像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那么简单。人们争论的中心往往是如何构建先前存在的较大和较小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假定是这些社会形式有着不同的可以识别的类型。在这场争论中所产生的问题又使诸如社会体系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别永久化。相反,认为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分析相似的学者重点关注构成社会中会话实践和实践中会话的互动的、制度性的和文化方面的差别。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构成过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形成的,而不是如何将宏观和微观理论联系起来以便更完整地说明社会组织。加芬克尔、萨克斯、福柯及其他人可能继续进行各自不同的研究课题,但这些课题却不太可能互相支持,也不会在那些坚称自己的分析方法与众不同的教条的研究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4]。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杂交的、用于现实构成的分析学,是在各种制度、文化和社会互动中形成交叉的分析学。这种分析学是从既存的传统中“误读(misleads)”和协调(co-opts)有用的观点,综合研究的分析学,以便得到分析方法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性,同时也不会忽视各自方法的特点、局限及贡献。

超越民族志方法学

一些会话分析家已经接近于迈向这个方向,他们分析了在制度性情境中形成的互动谈话的有序机制。他们研究了“工作谈话”,其目的是说明在特定互动

体(Boden & Zimmerman, 1991; Drew & Heritage, 1992)中产生的语言环境是如何反过来以不同的方式形成日常会话的“最简单系统”(Sacks et al., 1974)。民族志方法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从另一个方向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各种制度及其代表性文化是如何在成员的社会互动中并通过成员的社会互动(或“现实工作”)而形成、管理及维持的(Atkinson, 1995; Dingwall, Eekelaar, & Murray, 1983; Emerson, 1969; Emerson & Messinger, 1977; Gubrium, 1992; Holstein, 1993; Mehan, 1979; Miller, 1991, 1997 a)。那些自我意识到属于福柯式民族志的学者也已经将日常的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联系起来,以局部详细地记录那些日常生活的文本,如精神病治疗的病例记录或验尸报告,其形成是如何再现组织性的话语(Prior, 1997)。

这些努力都以各自的方式来考虑现实构成的方式和内容。但这在分析上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只提出方式的问题,而未整体地分析内容的问题,会在内容的考虑上过于武断。尽管互动中的谈话“技巧性(artful)”不强,但正如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所指出的,并不是怎么样都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分析时过于强调情境或文化因素,那必将成为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所说的文化、制度或判断上的“傀儡”。

在寻求认真记录在各种环境中所进行的互动时,民族志方法学者和会话分析学家都严肃且谨慎地考虑过“不是怎么样都行”的问题。系统地分析日常推理及会话顺序表明,结果由他们作为论题的经历范围内的相互影响的部分构成。但这样处理社会建构的内容问题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方法对于作为日常生活中构建内容、时间及地点资源的制度和文化话语缺乏全面的认识。

为了扩大和丰富民族志的分析范围和视野,我们已经将分析的范围延伸到在社会互动中发生作用的制度和文化内容。这并不一定需要像福柯那样做出历史性的延伸,虽然不一定排除这一点。相反,我们需要一种“谨慎的”(和自觉的)自然主义来讲述日常生活的实际结果(Gubrium, 1993)。诠释实践的分析方法就是这样,它所关注的是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即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式话语分析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将二者综合起来。这种分析法努力避免将社会形式理论化,以免话语实践被想当然地与这些形式的构成联系起来。同样,这种分析方法既考虑制度话语又考虑文化话语,以免他们消失于实践推理的局部显示或互动谈话有序组织的形式中。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诠释实践分析法使我们在实践中“持续关心”日常生活,就像休斯(Hughes,1984)所说的社会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以关注当成员形成其主观性及相关社会经验时,他们是如何有技巧地运用话语的。

强调诠释实践的方式和内容间的相互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互相影响意味着一种动态关系。我们在分析时应尽量避免偏爱话语实践或实践话语的任何一方。用民族志方法学的术语来讲,诠释实践分析法的目的在于记录两方面的相互影响:一面是建构日常生活的现实感所必需的实际推理和会话机制,一面是产生大量互动并为诠释互动提供媒介的制度条件、资源和相关的话语。用福柯的

话来讲,分析的目的在于描述制度话语和构成局部主观性及其经验世界的“区分实践(dividing practices)”(Foucault, 1965)之间的相互作用。真实世界实践的对称性需要我们平等地对待整体的和独立的束缚。

定性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诠释实践的两方面,既注意技巧过程又注意意义构成和社会秩序的本质条件。例如,梅纳德(Maynard,1989)指出,传统的民族志学者最常问的问题是“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事情的?”而民族志方法学中经典的研究话语则是问“参与者是如何做事情的?”尽管梅纳德自己的工作通常都是从第二个问题开始,但他警告不要忽视第一个问题。他解释说,在研究人们如何做事情时,民族志方法学往往不那么强调影响行动的条件。梅纳德意识到“外部社会结构在其自身内部建构的同时,也是社会互动的资源”,因此他认为,民族志研究和话语研究可以为彼此提供信息,这使得调查者可以更充分地记录“互动结构是如何在作为局部产物的同时,使得由于外部原因而导致其他事情发生”(Maynard, p. 139)的方式。他说:“除了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工作日世界的”,调查者应该努力理解人们如何“发现并展现这些世界的特征以便于人们可以‘看见’这些特征”(p. 144)。

梅哈恩(Mehan,1979)对此表示了类似的兴趣和关注。他提出了一个话语取向的“构成民族志(constitutive ethnography)”计划,该计划“通过说明世界的社会事实是如何从建构中产生,并变成外在的和具有束缚性的,来同等地看待结构和建构活动”(p. 18)。梅哈恩(Mehan,1991)分析了诠释的对比性例子,以描述“在制度、文化及历史情境中”人们进行现实建构的“末端(distal)”及“近似性(proximate)”特征(p. 73,81)。

从类似的民族志方法学和话语分析的立足点出发,西弗尔曼(Silverman, 1993)同样关注谈话的制度性及社会建构(Silverman, 1985, 1997)。为寻求一种展示制度和情境意识的定性调查模式,他建议考虑谈话的不同制度情境的话语研究应为定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样,米勒(Miller,1994)曾提出“制度话语的民族志学(ethnographies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籍以记录“特定环境下的成员是如何使用不同的资源来组织自己的实际行动,以及成员的行动如何受到环境中可用资源的束缚”(p. 280;另见:Miller, 1997b)。这为会话分析和福柯式话语分析都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米勒(Miller,1997a)记述一治疗机构的话语民族志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它说明了治疗病人的话语方面的成果。在他对 Northland 诊所,国际上著名的“简单治疗”中心,所做的 12 年的民族志研究中,他描述了治疗哲学的有意识的变化而带来的病人主观性的显著转变。当米勒开始他的实地工作时,Northland 诊所使用了“生态系统简单治疗法”。这种治疗法重视病人生活及其问题的社会情境。在这种治疗环境中,病人的主观性和导致他们的问题形成和加剧的社会关系系统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要求工作人员弄清楚并介入这些系统的状态,以改变系统的变化,促进病人的好转。米勒指出这种方法来源于现实问题中的“现代”话语。

在几年的实地工作之后,Northland 诊所开始使用更为"后现代"的方法,即详细说明对日常生活语言学及建构性话语的干预过程。临床医学家开始应用一种被称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简单治疗"法,即将烦恼看成是谈论日常生活的方式。这促使工作人员将治疗过程看作是一系列的语言游戏,这里显然是借用了维特根斯坦对此术语的意思。这里的想法是:和所讨论的病人的实际困难一样,这些烦恼也都是建构的——谈话方式或是生活形式。这改变了病人的制度性主观性:从个人困境和消极经历所组成系统的相对被动者到能够构想积极经历并发现有益解决方案的主动的问题解决者。当干预的基础变成解决方案的日常语言,而非问题的话语时,病人由叙述的身份转变成揭示完全不同的自我。就如同治疗机构自身随时间而改变一样,实践话语和话语实践也随时间而改变。这建构了完全不同的"病人"和"问题",并在制度上形成及说明。

很显然,史密斯(Smith,1987, 1990)从女性主义的观点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她的分析受到民族志方法学以及越来越多的福柯思想的影响。撇开民族志方法学,史密斯(Smith,1990)倡议她所称的"话语和日常生活的辩证法"。在强调话语的"影响和相互影响"的同时,她清晰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女性应该在其世界中处于"积极的"位置。

> 话语很容易被误解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妇女在社会环境中的价值及其理解,并把这种权力看成是时尚业和媒体所任意支配的东西。但女性是积极的、有技巧的、可以做出选择、可以思考、不会被愚弄的。在话语内部,存在着影响和相互影响(p. 202)。

同样,哲学家施莱格(Schrag,1997)也强调了分析性相互影响这一方法比理论综合的优势。他在谈到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时表述了这一方法:一方面,需要提防不要将我们所指的实践话语缩小为言语行为或互动谈话;另一方面,防止用制度性话语来代替社会互动中的本地文化。鉴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自我,施莱格回应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分析中保持建构性的内容和方式之间的平衡,以免在研究生活经验时忽略或过于强调二者之一。

>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确保为话语留有空间,使它成为一种讲述两方面关系的顺应时势的事件,一方面是言语行为和语言的客观化,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者设计的叙述学的抽象化和具体化。将话语视为某人向他人提及某事的事件受到来自"下方(below)"和"上方(above)"的威胁——来自下方的威胁是指一种自然力崇拜存在论的倾向:集中于言语行为和语言单位的各种可孤立的组成要素……来自上方的威胁是指一种对抽象的叙述学结构的整体论偏爱:不谈及话语事件。只有坚持"中间"的领域,才可以看见话语和叙述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我们以后会称之为真实体验的领域,我们得以观察到这一令人敬畏的事件:通过话语和叙述的共生而达到的自我理解(pp. 22-23)。

事实上,我们回应了施莱格关于不要将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合为一体的警

告。将两者合二为一也就缩小了普通研究的试验范围。将实践话语的分析法缩小为话语实践存在着风险,会漠视制度性差异和文化配置的作用,而且它们不是由社会互动"说服而存在的(just talked into being)"。相反,将话语实践视为不过是制度性话语的残余物,就有完全排斥本地文化的风险。

分析交叉

我们不是试图将诠释实践的分析看成是综合或整合,而是看作更像一种有技巧的变戏法的行为:有时集中于日常生活的方式,有时又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内容。这需要一种新的交叉形式来记录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相互影响。我们将这种漠视日常生活现实的摆动方法称之为分析交叉(analytic bracketing)(Gubrium & Holstein, 1997)。

民族志方法学对建构现实方式的关注需要暂时有意地忽视那些现实。与现象论者一样,民族志方法学者在分析之前也是把他们对现实的信仰放在一边,以便于可以看见那些日常生活的实践。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对相关者而言,主体、客体和事件逐渐变得可见、合理和有序。民族志方法学便是从那开始记录话语实践是如何组成社会结构的。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85,p. 19)所指出的那样,应该给语言"放个假(take off holiday)",以便于看清语言是如何建构客体的,否则,语言将被视为主要是用来描述的。

分析交叉有所不同。它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都被使用,而不仅仅是在初始阶段。随着分析的进行,观察者会将日常生活现实交替定位为成员建构现实的过程和建构现实的资源。在某一时刻,分析者可能会漠视日常生活的结构,以通过话语实践记录其结果。而在下一步的分析中,他或者她又交叉话语实践,以评估建构现实所用的资源的局部可用性、分配,以及/或者其规则。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注意工作语言又要注意假日语言,轮流考虑这些语言游戏,尤其是制度性的话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以及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能采用哪种游戏。用福柯的话来讲,这也就是要时而考虑实践中的话语,时而记录相关的、有着清晰局部条理的话语实践。

分析交叉相当于一种定向程序。它交替关注诠释实践的内容方式(或相反的顺序),以便收集日常语言的图片。这些图片既有以情境为背景的,又有建构于情境之上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之间来回变动,轮流记录每一个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参照另外一个实践。话语机制或实用话语变成了一种临时现象,而对另一方的关注只是暂时地被推迟而不是被遗忘了。对诠释实践的这两方面所做的分析不断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真切地反映出社会互动、社会互动的直接环境,以及所发生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是相互构成的,我们不能说分析应该从哪个开始或者到哪个结束,尽管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所偏好。正如那些民族志方法学方向的人经常做的那样,以史密斯(Smith,1987,1990)为例,她倡导应该从"人所在的地方"开始。我们将其理解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处在制度性情境当中。相反,

会话分析家坚持从话语实践开始,即使一些未被分析的内容典型地反映出他们的成就[5]。

不管从哪儿开始,无论是话语的文化和制度细节,还是话语在社会互动中的使用,哪一方都不能事先决定另一方。如果我们暂不考虑谁先谁后或是谁有优先权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并从那里开始,只要我们牢记诠释实践内部的相互影响,需要我们分析时在它的主成分间来回变动。当然,我们不想使这些成分具体化,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分析任务集中在两个领域的辩证作用,而不是由一方复制另一方。

尽管我们不提倡规定从哪里开始,但也没有必要担心这个总任务是不可能的或者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例如梅纳德(Maynard,1998)把分析交叉比作"想要搭乘方向不同的火车,开始跳上一列,然后用某种方法跳到另外一列上"。他问到,"当火车开往不同的方向,你怎么能从一列跳到另外一列上呢?"(p. 344)这个问题事实上只不过是详细阐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首先应怎样交叉。这个问题当然是梅纳德和其他民族志方法学者以及话语分析者各自课题的基础。答案很简单:交叉(以及解交叉)原则的知识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那些交叉生活世界或者漠视它的人,当他们从事各自的经验材料研究时,他们会很乐意先不考虑现实。这已经成一种例行程序,就如早上起床,吃早餐,然后去上班一样[6]。另一方面,想要将包括分析交叉在内的任何一种交叉加以实际操作,使之变成明确编纂的、有序的程序,就将会把交叉变成一系列像食谱一样的分析指令。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我们确信,除了最顽固的强调操作的人,没有人会把一种分析法替换成一本食谱[7]。

然而分析交叉并非没有规律的,它有着清晰的程序上的要求。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分析交叉的主要目标是交替分析诠释实践的两方面。分析交叉研究者必须不断地将注意力转向多个方向,这样就不断产生新的混合研究方法。一些分析家采取一种更偏向内容的话语分析形式(Potter, 1996; Potter & Wetherell, 1987)。其他人采用的方法有"构成民族志"(Mehan, 1979),"实践民族志(ethnography of practice)"(Gubrium, 1988)或者其他散漫意识的民族志方法(Holstein, 1993; Miller, 1991, 1997a)。这些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们要求既要注重实践话语又要注重话语实践。

这个双重要求提醒我们在描述实践话语的构成作用时,必须小心,不要天真地把它们套用到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按照民族志方法学的要求,分清成员的资源和我们自己的资源。因此,当我们考虑实践话语时,我们须注意它们是如何影响而不是决定成员的社会建构活动。分析交叉实质上一直都具有临时性,它反对完全将话语看成权力或知识的系统,而把它们与在现实经验中的呈现方式分离开来。分析交叉也永远是经验性的,因为它并不想当然地将话语运用看成简单设置的操作原理[8]。

反对一概而论

处在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十字路口,诠释实践分析法反对一概而论。它

限制了福柯分析法的倾向，即将所有诠释都看作是特殊权力或知识支配下的产物。如福柯在其"现在的历史"中所写，他倾向于特别强调话语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建构意义范围的优势，认为话语充分详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差异。一种互动性更强的、敏锐的话语分析——依赖于话语实践的分析法——则反对这种倾向。

因为诠释实践是以制度功能的话语为媒介来实现的，我们得以辨别出权力/知识在分开进行的日常生活事务中是如何操作的。然而，在一个制度场所的运用不一定适合于另外一个场所的实践。制度组成截然不同，但有时也会重叠的各种实体。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媒介或主观性赋予个人，而另一方面，主观性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形成，如家庭系统，该系统中出现了家庭疗法中的主体和媒介问题(Gubrium, 1992; Miller, 1997a)。

此外，如果诠释实践是复杂和动态的，它就不具有随意的社会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话语贯穿在无数的场所，而且具有多样的社会性。演员使用不同的、局部有细微差异的、与各自生平有关的术语，来系统地建构他们共享的现实。尽管这会造成衡量话语如何运作水平的大幅下降，但远不会出现福柯的读物中所说的由权力或知识所支配的完全一致的情况。尽管如此，在参加者提及的正在进行的事务中，社会组织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参加者的谈话和互动反映了社会组织的要求。

诠释实践的分析法必须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在日常生活的无数场合中建构什么样的现实或/和主体？事实上，话语的不同结合形式互相抵触，有碍于建构一般的或一致的主体、对象和社会现实。诠释随着它们所参照的制度和文化而变化，这反过来又随着社会互动的环境而变化。当实践话语在方法上适应即时情况时，它们彼此折射，而本地的话语实践则在该过程中变化与创新(Abu-Lughod, 1991,1993; Chase, 1995)。

从方式和内容到原因

就传统而言，定性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内容和方式的问题。原因问题一直是寻求解释和预测行为的定量社会学的标志。定性研究者通常非常谨慎地处理原因问题。解释是件很棘手的事情，只有在表明其对解释弹性的肯定时，定性研究才会慎重地涉及解释。描述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事情或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是一回事，但"事情为什么会像那样发生"的问题能导致推理的跳跃和经验的推测，这会使定性分析远离其通常做法。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回答原因问题时，采取在经验及概念上和传统定性研究相一致的方式。

诠释实践分析法为在定性研究中提出特定的原因问题所提供的基础是非常有限。为提出原因问题，我们需要为那些需要解释的问题指定一个解释域(domain of explanation)。例如，社会学中常见的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区分就具体说明了两种解释的立足点。最常见的是，用宏观社会学作为立足点来解释宏观社会现象，例如，用城市/农村或传统/现代的差异来解释面对面

关系的特点。帕森斯(Parsons,1951)的社会系统框架就曾经是这种解释的主要模式,它使用宏观层次的系统变量来解释个体生活和行动的功能及变化。

有一种可以使定性研究解决原因问题,而又不会危及其传统分析兴趣的方法,即从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入手。可以把临时解释的出发点放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如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如何成为我们解释实践的中心。话语实践中有将内容问题进行交叉,并作为解释社会模式建构的细微差异的出发点。实践话语中则有将方式问题进行交叉,并作为出发点来解释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产生的限定的意义模式。

事物为何是按照它们在日常生活的样子被组织的呢?我们从实践话语和话语实践的相互影响中可以找到两种答案。一种答案源于话语实践的解释立足点,它把我们带向艺术的谈话和互动,并且这些谈话和互动设计指定了我们社交世界中的局部轮廓。从这些立足点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话语不是行动的模板,其形成受到话语实践日常生活中意外的影响。实践话语是因为说服而去行动的,它们不会从外部或内部来规定所说和所做的事情,就好像它们是独立的、不同的影响源。为了回答为什么社会结构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出现细微差异,我们可以将事物组成的内容进行交叉,来揭示那些可识别的活动及意义系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特定领域内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话语实践为回答为何可辨别的社会秩序在局部上呈现完全不同的特色提供了基础。

我们也可以回答有限的、与话语实践有关的原因问题。比如说话语行动为什么会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展开,或为什么它们会出现特定的结果?当我们将那些有关我们是谁、是干什么的,以及我们在做的是什么之类的组成问题交叉时,那些原因问题的答案就会出现。就谈话本身而言,它几乎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什么样的意义或行动模式会被巧妙地产生并加以控制。谈话就像一匹疾驰的马,而我们几乎或是根本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奔跑、往哪里跑、最后会到哪里、到了那里又发生什么,它在比赛、疾驰、打马球、送信,还是别的什么。每一种可能性都需要一个话语来确定它的行动路线,以及说明它可能传递的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这种谈话环境的体系为什么是按现有的方式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为何话语实践会朝着现有的方向进行,到哪里去,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意义。实践话语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基础。

保持批判意识

实践话语与话语实践的互相影响要求对定性研究保持批判意识。诠释实践中的每一部分都是提出与研究的经验假设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内在根据,批判意识是分析方法的一部分,而非游离于其外,事实上,批判意识是分析交叉的另一方面。如果说为了扩展我们日常生活的知识,分析交叉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

不仅注意大量的内容问题，也注意必要的方式问题，那么，它同时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对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问题的忽视。和先前的交叉不同的是，这个持续的分析交叉不会让我们安逸地置身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而对所经历的现实置若罔闻。分析交叉也不会让我们舒适地按照一成不变的自然主义方法来如实地记录日常生活，事实上，它不断地让我们脱离这两种毫无生气的做法。

谈完了有关实践话语的问题之后，有必要将某些问题的数目和数量问题化或是政治化，否则，这些问题的建构、管理或维持容易被认为过于武断或是个人主义。“什么”问题的紧迫性警告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互动的人际中介、技巧或机制就是全部内容。这种紧迫性促使我们对以下情况进行研究：在时间和环境中通过话语实践所构建事物的更广泛的来源，反映并影响建构过程的当前环境，以及那些以其特有的方式建构世界的人的个人及人际间的相关性。尽管诠释性实践分析法并没有像自然主义一样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它也没有认为日常生活就是在会话或是叙事的场合下，在互动谈话中平地而起的。其政治后果是使分析方法转向社会组织及其控制，其暗含的意思是说，现实不是完全依赖于谈话或者社会互动的建构质量。我们应转向更广义的情境中去寻找变革或稳定的其他来源。

当需要进行话语实践时，有必要对想当然的现实的代表性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如何”问题的紧迫性警告我们不要假定现在的世界是必然的。这个警告促使我们将现实进行“分解(unsettle)”来寻找它们的结构，以揭示形成并维持特定现实的过程。在诠释实践的分析中，对“如何”问题的关注提醒我们记住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是我们所制造的，不管它们正常还是不正常、守法还是违法、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在此之后，我们由此及彼，不断地构建和再构建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从政治意义上说，这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决定各种可能和方向，尽管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组织可能阻碍其发生，但如果我们揭示出社会改革的结构性流动和延伸，我们也就揭示了这种变革的潜力(Gubrium & Holstein, 1990, 1994, 1995, 1998; Gubrium & Holstein, 2000)。

对这种分析论的批判意识使得无论进行话语还是话语实践时，都一直有必要持有异议，从而使得方法论在寻求其目标的过程中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话语和话语实践的这种由反省而形成的相互影响将分析交叉转变成批判性的交叉，从而为记录诠释实践和评论自身结构提供了基础，这使得分析本身的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始终存在。



Abu-Lughod, L. (1991).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pp. 137-162).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Abu-Lughod, L.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tkinson, J. M., & Drew, P. (1979). *Order in court.*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Atkinson, P. A. (1988). Ethnomethodolog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441-465.

Atkinson, P. A. (1995). *Medical talk and medical work.* London: Sage.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S. Heath,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st, S., &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den, D., & Zimmerman, D. (Eds.). (1991).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Bogen, D., & Lynch, M. (1993). Do we nee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problems? In J. A. Holstein & G. Miller (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 (pp. 213-237).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Chase, S. E. (1995). *Ambiguous empowerment: The work narratives of women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Denzin, N. K. (1998). The new 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405-415.

Dingwall, R., Eekelaar, J., & Murray, T. (1983).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family life.* Oxford: Blackwell.

Drew, P., & Heritage, J. C. (Eds.). (1992). *Talk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eyfus, H. L., &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rkheim, E. (1961).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Durkheim, E. (1964). *Th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S. S. Solovay & J. H. Mueller, Trans.; G. E. G. Catlin, Ed.). New York: Free Press.

Emerson, R. M. (1969). *Judging delinquents.* Chicago: Aldine.

Emerson, R. M., & Messinger, S. (1977). The micro-politics of trouble. *Social Problems*, 25, 121-134.

Foucault, M. (1965).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lt, M. (1975).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Ed.; L. Marshall, J. Mepham, & K. Soper,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lt, M. (1988).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M. Foucault, *The final Foucault* (J. Bernauer & G. Rasmussen, Eds.; pp. 1-20). Cambridge: MIT Press.

Garfinkel, H. (1952).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A study in social orde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arfinkel, H. (1988).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quidd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I of IV): An announcement of studies. *Sociological Theory*, 6, 103-109.

Garfinkel, H., Lynch, M., & Livingston, E. (1981).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1, 131-158.

Garfinkel, H., & Sacks, H. (1970). On the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In J. C. McKinney & E. A. Tiryakian (Eds.), *Theoretical sociology* (pp. 338-366).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Gubrium, J. F. (1988). *Analyzing field real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rium, J. F. (1992). *Out of control: Family therapy and domestic diso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rium, J. F. (1993). For a cautious naturalism. In J. A. Holstein & G. Miller (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 (pp. 89-101).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0). *What is family?*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4). *Constructing the life course.*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5). Life course malleability: Biographical work and deprivatiz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65, 207-223.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8). Narrative practice and the coherence of personal st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 163-187.

Heritage, J. C.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Heritage, J. C. (1987). Ethnomethodology. In A. Giddens & J.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today* (pp. 224-27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itage, J. C. (1997).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talk: Analysing data.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61-182). London: Sage.

Hewitt, J. P. (1997). *Self and society.* Boston: Allyn & Bacon.

Hill, R. J., & Crittenden, K. S. (Eds.). (1968). *Proceedings of the Purdue Symposium on Ethnomethodology.*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Holstein, J. A. (1983). Jurors' use of judges' instruction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11,501-518.

Holstein, J. A. (1993). *Court-ordered insanity: Interpretive practice and involuntary commitment.*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4). Phenomenology, ethno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ive practi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62-2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0).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ghes, E. C. (1984). Going concerns: The stud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In E. C. Hughes, *The sociological eye: Selected papers* (D. Riesman & H. S. Becker, Eds.; pp. 52-6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Husserl, E. (1970). *Logical investig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Livingston, E. (1986).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ynch, M. (1985). *Art and artifact in laboratory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ynch, M. (1993).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nch, M., & Bogen, D. (1994). Harvey Sacks' primitive natural sci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1, 65-104.

Lynch, M., & Bogen, D. (1996). *The spectacle of history: Speech, text, and memory at the Iran-Contra hear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56).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 Bottomore, Ed.). New York: McGraw-Hill.

Maynard, D. W. (1984). *Inside plea bargaining: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 New York: Plenum.

Maynard, D. W. (1989). On the ethnography and 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J. A. Holstein & G. Miller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Vol. 1, pp. 127-146). Greenwich, CT: JAI.

Maynard, D. W. (1998). On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extramodern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 343-345.

Maynard, D. W., & Clayman, S. E. (1991). The diversity of ethno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385-418.

Maynard, D. W., & Manzo, J. (1993). On the sociology of justice. *Sociological Theory*, 11, 171-193.

McHoul, A. (1986). The getting of sexuality: Foucault, Garfinkel, and the analysis of sexual discours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65 -79.

Mehan, H. (1979). *Learning lessons: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classroo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han, H. (1991). The school's work of sorting students. In D. Boden & D. Zimmerma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p. 71-90). Cambridge: Polity.

Mehan, H., & Wood, H.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Miller, G. (1991). *Enforcing the work ethic.*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iller, G. (1994).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280-306.

Miller, G. (1997a). *Becoming miracle workers: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brief therap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Miller, G. (1997b). Building bridges: The possibility of analytic dialogue between ethnography,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Foucault.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24-44). London: Sage.

Parsons, 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Pollner, M. (1987). *Mundan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ner, M.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70-380.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otter, J. (1997).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way of analysing naturally-occurring talk.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44-160). London: Sage.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rior, L. (1997). Following in Foucault's footsteps: Text and contex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63-79). London: Sage.

Rose, N. (1990).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Sacks, H. (1972).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bility of conversational data for doing sociology. In D. Sudnow (Ed.), *Stud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p. 31-74). New York: Free Press.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 1-2). Oxford: Blackwell.

Sacks, H., Schegloff, E. A., &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Schegloff, E. A. (1991). Reflections on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D. Boden & D. Zimmerma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p. 44-70). Cambridge: Polity.

Schrag, C. O. (1997). *The self after postmodern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utz, A. (1962).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utz, A. (1964).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utz, A.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man, D. (1985).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ociology*. Aldershot, England: Gower.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Strategie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Ed.). (1997).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8). *Harvey Sacks: Social science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London: Routledge.

ten Have, P. (1990).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Bulletin de Methodologie Sociologique*, 27, 23-51.

Weigert, A. J. (1981).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Longman.

Wieder, D. L. (1988). *Language and social realit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Woolgar, S., & Pawluch, D. (1985). Ontological gerrymandering. *Social Problems*, 32, 214-227.

Zimmerman, D. H. (1970). The practicalities of rule use. In J. D. Douglas (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pp. 221-238). Chicago: Aldine.

Zimmerman, D. H. (1988). On conversation: The conversation analytic perspective. In J. A.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1 (pp. 406-432). Newbury Park, CA: Sage.

Zimmerman, D. H., & Wieder, D. L. (1970).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 In J. D. Douglas (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pp. 285-295). Chicago: Aldine.

扎根理论: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方法[①]



GROUNDED THEORY: OBJ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METHODS

⊙ 凯西·查马兹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定性革命"的先声(Denzin & Lincoln, 1994, p. ix)。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写作了《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Glaser & Strauss, 1967)一书。他们支持定性研究,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认为定量研究是系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形式的观点。扎根理论方法基本上包括了系统的归纳法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用以指导收集和分析为解释所收集资料而构建的中层理论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扎根理论研究者发展了对其资料的分析与解释,关注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对这些资料的使用反过来渗透于并完善他们的理论分析。自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发展了扎根理论方法以来,定性研究者一直宣称他们在应用这些方法以使其研究合法化。

现在扎根理论方法已是内外受敌。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反对扎根理论主要支持者所持的明显、微妙的实证主义理论前提,也反对扎根理论方法本身的逻辑(Denzin, 1994, 1996, 1998; Richardson, 1993; Van Maanen, 1988)。扎根理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论。格拉泽以及后来的斯特劳斯和考宾把该方法导向了有些相互冲突的方向(Glaser, 1992;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4, 1998)。但是,他们的立论都充满实证主义色彩,以客观主义为基础(Guba & Lincoln, 1994)。格拉泽(Glaser, 1978, 1992)的立场常常接近传统的实证主义,假设有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现实,一个发现资料的、中立的观察者,一个对所研究问题的演绎研究方法和一种对资料的客观主义处理方式。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的立场假设有一个客观的

---

① 作者注:我对建构主义较早的论述出现在我的一篇题为"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过去的经历: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方法(*Studying Lived Experience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Obj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Methods*)"的论文中。该文提交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举行的(1993年5月19~22日)题为"研究人类过去经历:象征互动和民族志研究'93'"的定性研究大会上。我感谢 Robert Prus, 他激励我在会议论文中提出我的观点;我感谢 Lyn Lofland,她为论文写了一篇详细的介绍;我感谢 Sonoma 州立大学的第一个写作小组的所有成员,Julia Allen, Patrick Jackson 和 Catherine Nelson,他们鼓励我从事这一主题的研究。我感谢 Julianne Cheek, Norman K. Denzin, Udo Kelle, Kyrina Kent, Yvonna Lincoln,他们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许多有帮助的、有思想的评论。

外在现实,努力使资料收集不带偏见,建议有一个客观技术程序并验证结果的有效性。他们的立场带有后实证主义色彩因为他们也主张倾听被调查者的声音,尽可能精确地代表被调查者,发现并承认被调查者对于现实的、和他们不同的看法,认识到分析对象和分析过程中艺术性和科学性同时并存(Strauss & Corbin, 1998)。为了使这些观点更深入,我补充了另一种理论立场、另一种关于未来定性研究的视角: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尊重经验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在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取中间路线,为21世纪的定性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建构主义假定多重社会现实的相对性,认识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创造知识,研究的目的是对研究客体之意义的阐释性理解(Guba & Lincoln, 1994; Schwandt, 1994)。扎根理论的威力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经验世界的工具。我们可以从实证主义立场重新运用这些工具,形成一套强调建构主义特征的、更开放的扎根理论研究实践。我们可以将扎根理论方法用做理论的、启发性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研究程序。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认为研究者要将其置于自然的背景中,这使定性研究偏离了实证主义的方向。我的论点包括三方面:①扎根理论方法不必是生硬的或规定性的;②在运用扎根理论的同时强调意义,加深(而不是限制)解释性理解;③我们吸收扎根理论的同时可以剔除实证主义对早期扎根理论立场的理解。当然,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之间不是决然区别而是中间存在一个过渡区。而且,个别扎根理论研究者一直在修正他们的观点(Glaser, 1994; Strauss, 1995;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4,1998)。为简明起见,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穿插了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当理论支持者的立场变化时我指出这种变化①。

在本章中,我提出了对扎根理论方法的总体介绍,讨论了近年的一些论战,引用自己早先的研究为例,描述了建构主义方法。研究者可以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定性资料或者定量资料,尽管这些方法传统上是和定性研究相联系的。而且,不管研究者是从客观主义还是从建构主义出发都可以运用这些方法。

扎根理论的活力在于它给定量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清楚明确的规则,依据这套规则可以使概念之间的关系具体明了,以建立解释性的理论框架。扎根理论方法并不强调资料收集技术的细节;它的分析过程的每一步都朝向概念的形成、完善和相互联系。扎根理论方法包括:①同时收集与分析资料;②分两步的资料编码过程;③比较法;④为建构概念分析的记录写作;⑤为完善研究者的理论观点的抽样;⑥理论架构的整合。

格拉泽(Glaser,1978, 1992)提出了以下评价扎根理论的标准:适合、有效、相关和可修正性。理论必须源于对所收集资料的分析并适合这些资料,理论必须解释资料。所以扎根理论家不能在他们的学科店铺里兜售臆想的理论概念,

① 本人对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的比较请参考本章的下一个部分,“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与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

不能粉饰其资料。任何现存的概念都必须凭自身而被分析(Glaser, 1978)。扎根理论必须有效,它必须提供有用的概念和对资料的合理组织以解释所研究的现象。扎根理论的相关性源于它既提供了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解释,又提供了研究背景中的基本程序。扎根理论是可历时的,因为它说明变异;扎根理论是灵活可变的,因为研究者可以随着条件的变迁或资料的进一步收集而修正他们初步的,甚至较成熟的理论分析。

许多扎根理论研究反映了客观主义取向和扎根理论的创立者们的理论倾向(Biernacki, 1986; Johnson, 1991; Reif, 1975;Swanson & Chenitz, 1993; Wiener, 1975)①。但是,从其他理论视角(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本土方法论等)出发的研究者也可以运用扎根理论作经验研究。这些扎根理论允许不同的基本假设、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不同的分析侧重点和理论层次。

因而,不同研究者都可以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形成基于解释性方法的建构主义研究。扎根理论者不需要屈从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的假设。相反,他们可以研究经验世界而无须狭隘的客观主义方法假设,无须假设他们的分析是真理。因此,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主观经历的研究可以在布卢默(Blumer,1969)所呼吁的对意义的经验研究和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扎根理论的过去与现在

扎根理论的发展

在开创性的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中,格拉泽和斯特劳斯首先在关于死亡的合作研究中提出了他们的研究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5, 1968)。他们挑战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定量研究范式的霸权。芝加哥学派(Park & Burgess, 1925; Shaw, 1930; Thomas & Znaniecki, 1918—1920; Thrasher, 1927/1963; Zorbaugh, 1929)长期以来对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传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破坏了这一传统并使之边缘化。对客观性和事实的科学假设进一步强化了通过精确、标准化的工具和多种可量化的变量来寻求可信性。实地研究日渐式微。它被视为研究者在真正的研究工作开始以前所做的、可以完善定量方法的一种初步练习,而不是被视为自身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式。量化的传承也日渐导致了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分野。理论家和研究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探索不同的问题。理论上讲,定量研究应检验逻辑演绎模型所展示的现

① 例如,帕特里克(Patrick Biernacki,1986)在关于从自然戒毒的研究中抽取访谈的样本做理论上与有效性的考量时,控制了参考群体(pp. 214-219)。有些同仁将帕特里克的研究归类为新近出现的后现代的民族志。但是,在他去世之前,通过和他的交流,我很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研究视为现实主义的定性研究。在这类研究中,调查者努力地想准确地报告一个世界。帕特里克和我都认为我对扎根理论的运用比他的更具有现象学和建构主义的特征。斯特劳斯认为,比较我和他(斯特劳斯)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联系。

存理论。但是大量的定量研究却是非理论的,它们强调控制变量而不是理论检验。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的研究之所以被视为革命性的是因为他们对以下几方面提出了挑战:①理论与研究之间武断的划分;②将定性研究视为更"有力的"、定量方法的初步试行研究的观点;③认为追求活力使定性研究不合法化;④认为定性研究方法是不能形成印象的,是不系统的;⑤将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分裂;⑥假定定性研究只能产生描述性的个案研究而不能发展理论(Charmaz, 1995c)。随着《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的出版,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号召定性研究朝着发展理论的方向进行①。他们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进行定性研究的理论范式,允许、鼓励进一步研究。而且他们为理论的完成提出了指导方向。

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发表之前,长期以来,定性分析的传授主要是通过口授。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为系统的定性资料分析提出了书面的、正式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分析程序和研究策略。格拉泽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实证的定量研究方法培训应用于定性分析的发展。扎根理论方法的基础就包括格拉泽的认识论假设、方法论术语、归纳逻辑和系统方法。斯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布卢默和帕克等学习过。他将芝加哥学派的实地研究和象征互动引入到扎根理论。因而,斯特劳斯通过扎根理论将实用主义哲学研究的程序、行动和意义引入到经验研究之中。

格拉泽于1978年发表的著作《理论的敏感性》(*Theoritical Sensitivity*)从根本上推进了扎根理论方法的发展。但是,格拉泽在书中所运用的抽象术语和浓密的写作使许多读者无法读懂。而斯特劳斯于1978年发表的著作《社会科学家的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使扎根理论易于被更好地读懂、理解,尽管该书在理论上比较早期的方法文本更宽泛。

重新表述与放弃联系

随着斯特劳斯和考宾于1990年共同发表了著作《定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②,扎根理论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一个新的代言人和更多的信徒。该书的目的是发展扎根理论方法。它引导读者经历几个相似的分析步骤,用实例说明研究的程序,把新的技术装备引入了混合的扎根理论之中。该书赢得更多的读者但却失去了斯特劳斯早期著述与经验研究的新鲜感与开放的特点。经修改的、更具可读性的《定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一书的第2版弱化

---

① 林德史密斯(Lindesmith,1947)和克莱希(Cressey,1953)早期都曾尝试通过归纳分析来编写定性研究的分析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犯罪学与越轨的研究中保留了下来,但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探讨却没什么影响。

② 考宾有很强的护理学背景,拥有护理学的博士学位。她在建立护理研究的定性方法方面长期以来都居领袖地位;自从她的著作《基础》(*Basics*)发表以来,她已经在社会科学和其他一些领域获得了突出的地位。

了其指导性特征,目标是将读者引入一个对于他们的研究与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在这两个版本中(1990, p.7; 1998, p.x),作者都关注与所谓"正常科学"相一致的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解释与研究者的倾向性(Kuhn, 1970)。斯特劳斯和考宾从行为主义的角度,而不是诠释的角度,分析了关于假设的重要实例(1990,pp.63-65, 78-81, 88-90, 145-147)①。或许 1990 年版本的科学基础反映了考宾的早期训练和斯特劳斯日渐增强的、对扎根理论具有验证特征的坚持(Strauss, 个人交流,1993.4)②。《定性研究基础》一书是发展了扎根理论的方法还是提出不同的技术程序,这取决于读者的看法。

格拉泽(Glaser,1978, 1992)强调在对"基本社会过程"的分析中浮现资料和理论。格拉泽的立场(Melia, 1996)在他与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 1990)于 1992 年决裂以后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他主张收集资料时既不带强制性,也不先入为主地带着问题或理论框架。在格拉泽的著作《扎根理论分析基础:浮现对强制》(*Basics of Grou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 1992)中,他回答了斯特劳斯和考宾在《定性研究基础》一书中的观点。格拉泽一再地发现斯特劳斯和考宾在其预设、分析问题、理论假设和方法技术等方面强制性地运用资料和分析(Glaser, 1992, pp.33, 43, 46-47, 50-51, 58-59, 63, 78, 96-100)。对于格拉泽而言,运用系统的比较就足够了。"范畴在比较中出现,通过更多的比较显示出其特征。这就是问题的全部。"(Glaser, 1992, p.43)。

除了格拉泽犀利的批评之外,读者们可能发现自己陷入了斯特劳斯和考宾提出的所谓重大的方法上的进步的技术迷宫之中。罗布里奇特(Robrecht,1995)认为新的研究程序使研究者偏离了数据资料,导致了理论框架的整合性差。格拉泽认为斯特劳斯和考宾倡导的是主观设计性的比较而不是源于分析过程中数据对数据、概念对概念、范畴对范畴的比较。格拉泽把他们的理论视为"完全主观想象的描述"而不是扎根理论。格拉泽争论说扎根理论方法的目的是产生理论,而不是验证理论。他的这一观点是和定量研究阵营相一致的,后者认为理论验证依靠随机抽样和标准化研究程序。关于这一点,斯特劳斯和考宾没有直接回应格拉泽,但是正如米莉亚(Melia,1996)所观察到的,他们确实在给本书第 1 版的论文中阐述了他们关于扎根理论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建议方法要不

---

① 当讨论将资料类别化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时,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运用了以下这个假设发生在餐馆的例子来说明"在等待用餐时,你注意到一个穿红衣的女子。她刚好出现在厨房里。但你的常识告诉你,餐馆不可能付钱给一个穿红衣的女子只是为了让她站在那儿,特别是站在繁忙的厨房里。你的好奇心被激起了,所以你决定做一个归纳分析,看看你是否能确定她的工作是什么(一朝是扎根理论研究者,永远是扎根理论研究者)"。

你注意到她有意地在厨房——一个工作场所——到处观看。目光一会儿注意这边,一会儿注意那边。她在关注厨房里正在进行的工作。你问自己,她在那儿干什么?然后,你给她的行为贴上标签"监视"。监视什么呢?监视"厨房里的工作"(pp.63-64)。

这个例子体现着作者的思路。它从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仔细地观察餐馆中那个女子的外在行为。它并不从餐馆工作人员的角度关注现实究竟是什么。当然,这种类别的划分并非来自和其他餐馆的比较研究。

② 斯特劳斯批评了我写于 1995 年的关于扎根理论的初稿。在那篇论文中,我曾宣称扎根理论并不具有证实性(Charmaz, 1995c)。他认为我是错误的。

断地发展(Strauss & Corbin, 1994)。与之相似,斯特劳斯和考宾并没有回应有人指责他们在《定性研究基础》第2版中放弃了扎根理论而追求完全主观想象的描述。但是,他们确实精彩地论述了描述的重要性以及主观构想对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pp. 16-21)。

斯特劳斯和考宾的《定性研究基础》以及格拉泽对它的批评都肯定了科学,而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认识论的论战中(Adler, Adler, & Johnson, 1992; Kleinman, 1993; Kuhn, 1970; Lofland, 1993; Snow & Morrill, 1993)或后现代的批判中(Clough, 1992; Denzin, 1991, 1992a, 1996; Marcus & Fischer, 1986)都没有涉及。虽然他们存在巨大差异,但双方都接受现实主义的主体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格拉泽保留在实证主义阵营中,斯特劳斯和考宾的实证主义倾向则较小。虽然他们的成名作《定性研究基础》持客观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在许多著作中却游离于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假设之间。例如,为了保持客观性,他们主张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观性的介入(Strauss & Corbin, 1998, p. 43)。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与考宾都假设有一种研究者能发现并记录的、外在的现实——格拉泽是通过发现数据资料,给它编码,并进一步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斯特劳斯和考宾则通过分析性问题、假设和方法的应用。在早期的著作中,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曾暗示现实依赖于观察者,依赖于产生现实的方法。因为格拉泽以及斯特劳斯和考宾都遵循客观主义写作风格,都对作者身份保持沉默,通常都像一个局外专家一样来写作自己所收集的数据资料(Charmaz & Mitchell, 1996),借此形成客观主义立场①。而且,早期扎根理论的一些相关的说教性、规定性的论述将这些方法包裹上一层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外衣(Charmaz, 1983; Glaser, 1992; Stern, 1994b;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4)。

那么谁的理论是真正的扎根理论呢?格拉泽(Glaser, 1998)认为他的理论是纯粹的扎根理论。这是对的——如果人们同意早期的论述应该设为是标准的话②。不同理论的支持者假定扎根理论的基础要素应该包括不同的内容。他们所认为"应该"包含的东西形成了他们各自关于真正的扎根理论的理念。扎根理

---

① 例如,当写作"相互伪装"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5)论述道:"这种特别清醒的情境不可能存在,当然,除非病人和相关人员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该病人来日无多。所以,那些有利于公开的清醒状态(封闭式的和怀疑性的清醒认识并不具有公开性)之存在的结构性条件也有利于相互伪装状态的存在。而且,至少有一个互动者必须有这种愿望来假装病人并非无药可治,并且其他人必须赞同这种伪装,相应地采取行动。"(p. 67)考宾和斯特劳斯(Corbin & Strauss, 1987)在下面这段文字中也采用了一种遥远的声音:"身体失败以及随后的表现失败的影响可以通过它对于BBC(生物的身体概念)的每一维度的影响来加以衡量。由于每一维度(生物时间、身体、自我概念)的存在是与其他维度紧密地联系着的,某一维度的身体失败的后果在另外两个维度上有更深的感受。正是BBC三个部分的联合作用力深刻地影响了生物连续性和意义。"(p. 260)考宾和斯特劳斯的一些关于慢性病的研究,例如《没有尽头的工作与照顾》(*Unending Work and Care*, 1988),读起来似乎比他们的其他作品距离感小一些。这个差异可能由于两个因素,即:斯特劳斯患慢性病的经历以及考宾直接参与了资料收集。

② 斯坦(Stern, 1994a)同意这个观点。她将近来扎根理论方法的进展视为一种对该方法及对其分析能力的破坏。

论必须是客观的和实证的吗? 不。扎根理论提供了一套灵活的策略,而不是僵化的规定。扎根理论者应该采纳象征互动主义吗? 也未必如此。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注重行动和过程、注重象征互动之下的意义及浮现对扎根理论起了补充作用。象征互动主义也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意义概念。但是扎根理论也可以从其他理论视角来运用这样一些概念。实用主义? 是的,因为应用性和有用性是衡量扎根理论分析的标准之一。是否我们应该期待扎根理论者坚持他们的论述呢? 也不完全这样。发表的著作与它们写作的背景是分离的。作者原先的目的和所期待的读者可能都不明显。作者可能一方面写一些机械的规定给初学者以帮助他们开始研究,另一方面却写一些更深入的论文供同行阅读。新的进展可能影响到作者。但是读者依然执着于自己早先写下的文字。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4)在本书第 1 版的文章中比其《定性研究基础》(1990)第 1 版表现了更灵活的态度,两著作都描述了扎根理论的方法和地位。例如,他们注意到未来的研究者可能运用扎根理论和其他理论相组合,这一点我将要讨论。下面提出的一个简化的、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可以为不同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提供有效的工具①。

扎根理论的策略

关于数据资料

扎根理论方法注重分析策略,而不是资料收集方法。这些方法和有限的访谈研究相联系,似乎将扎根理论方法限定为访谈和限定访谈的数目都是可以接受的(Creswell, 1997)。研究者可以将扎根理论技术和不同形式的资料收集形式合用(Clarke, 1998; Star, 1989)。定性研究者应该用浓密的描述收集大量丰富资料(Charmaz, 1995c; Geertz, 1973)。有证据指责扎根理论者轻视资料的收集(Lofland & Lofland, 1984)。然而,许多扎根理论者已经收集了完整资料,即使是那些基本上依赖访谈法的研究者(Baszanger, 1998; Biernacki, 1986; Charmaz, 1991, 1995b)。也许因为扎根理论方法注重早期分析策略的发展,其资料收集方法一直充满问题和争议。

关于通过先入为主地构想的问题、范畴和假设来强制形成资料,格拉泽(Glaser,1992)与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的看法有鲜明的差异。也许双方都对,尽管方式不同。格拉泽的比较方法和对过程的重视为使资料分析有效、有价值、有创意(不同程式化的技术)提供了有利的策略。每个定性研究者都应该注意格拉泽所警示的:不要通过强加臆想的问题将资料强迫性地置入先入为主地主观构想的范畴之中。但是,资料收集可能要求研究者们提出问题

---

① 更进一步的关于如何做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的讨论请参见:Charmaz,1995c。

后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不是和调查对象直接交流的话——然后在观察日记中记录下一步做什么。研究者通过汇集有关细节来建构丰富的资料。斯特劳斯和考宾的许多问题和技术可以帮助初学者提高资料收集能力。格拉泽(Glaser, 1998)假设资料是透明的,假设我们研究者在实地中通过听取调查对象所告诉我们的重要事件将能够看到基本的社会过程。但是,研究者所看到的可能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确定的(Mitchell & Charnaz, 1996)。调查对象假定的或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可能比他们所谈论的东西重要得多。依赖调查对象外在联系的非情境性可能会导致研究问题的狭隘、资料的局限性和分析的琐碎。

多数扎根理论者的研究似乎认为他们的资料是客观的。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8)断言"资料的现实性",并告诉我们"资料数据不说谎"(p.85)。资料是叙述性的建构(Maines, 1993)。它们是对经历的再建构,它们不是原先的经历本身(Bond, 1990)。不管是我们的调查对象回馈我们的假设、以访谈记录的形式不断给我们提供资料,还是我们记录民族志故事以便反映我们所可以最好地回忆和叙述的经历,资料总是重构的。

如果我们要收集丰富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观察、对话、正式访谈、自传、公共记录、组织报告、调查对象日记和我们自己用磁带记录的内容。扎根理论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开始于编码,以备忘录的形式出现,比较流行的形式是会议论文。但是我们关于这些观点的论述最终却很少发表。相反,我们所做的是重新回顾我们的观点,回顾(或许)我们的资料,而且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以新的形式将它们重新创造(Connelly & Clandinin, 1990)①。

资料的编码

我们如何做扎根理论研究? 最初是分析。我们扎根理论者在收集浮现的数据资料时将它编码。通过编码,我们开始将资料定义和分类。我们不应该(也没那么做)把我们的资料贴上醒目的类别标签。编码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资料的新的理解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关注资料的收集,而且可以引导我们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进。扎根理论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求将数据切换为预设的标准化的代码,扎根理论研究者是在对数据资料的诠释过程中形成编码。

编码是形成理论的开始环节。编码表明我们的资料和初步理论已经形成,而初步理论进而解释这些资料并指导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初步的或开放的编码是通过逐行地检查资料并在逐行编码(line-by-line coding)中定义行动或事件而进行的(Glaser, 1978)。这种编码形式使我们不断地研究我们的资料。除了开始用归纳法形成思想之外,逐行编码还阻止我们将外部理论或我们自己的一些

---

① 扎根理论研究者根据资料进行研究。并非每个定性研究者都这么做。勒德曼(Lederman,1990)观察到一些人类学家在发展他们已经完成的作品时避免使用他们的实地笔记。她论述了人类学的实地笔记如何为研究者实现不同的功能——当研究者在研究的实地时以及当他(她)在家时。民族志研究者在实地时,他们的写作既可以贴近调查对象又可以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但是当他们回到家中以后,他们就转而忠于其学术圈了。这时,在实地中可以提供对现实的具体把握的同样的实地笔记也难免让人顿生疑窦。勒德曼认为将实地笔记想象为固定的,稳定的资料此时难以令人信服。相反,实地笔记可以假定有多重意义而且可以重新解释和反驳。

信念强加给资料。这种编码形式帮助我们尊重研究对象自己对于现实的看法，而不是假定大家拥有同样的观点和共享同样的世界。逐行编码深化了我们对感知概念的运用——也就是那些使我们了解总的研究问题的背景观念。感知概念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组织、理解经历的途径；它们嵌入了我们学科的关键部分和我们的理论倾向之中。尽管感知概念可以加深理解，它们是为建构理论提供起点，而不是逃避理论分析的终点。我们可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运用感知概念，即他们是资料数据研究的分界点。

逐行编码很可能导致我们对任何借用的外部概念的细化和具体化。我的关于患病经历的许多研究都应用了自我和身份等概念。表 19.1 中引用的那个女人的谈话，其内容是她很热爱她的工作，即她是居家护理的支持者。通过对她的谈话逐行编码，我形成了"身份弃用(identity trade-offs)"编码，并在后来将它发展为一个类别。逐行编码使我们不断地考虑资料的意义，就资料的问题反复追问自己，指出差距并在随后的资料收集中关注它。请注意我使编码保持着活力。这些行动的编码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做什么，背景中发生了什么。

表 19.1 访谈记录逐行编码示例

逐行编码	访谈记录 a
决定放弃 根据成本 权衡利弊 放弃身份 决定身份弃用	所以我决定，这(工作中产生的痛苦、疲劳和压力)可不是个活法。我不一定要工作……所以带着极大的遗憾，也不是出于我的计划，我递交了辞呈。这是我所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
a. From Charmaz(1995b, p.671)	

给行动编码有利于做比较，这是扎根理论的一项重要技术。扎根理论的不断比较法的含义包括：①比较不同的人(比如他们的观点、情境、行动、话语和经历等)；②比较相同个体在不同时间的资料；③事件的比较；④数据资料与类别的比较；⑤一个类别和另一类别的比较(Charmaz, 1983, 1995c; Glaser, 1978, 1992)。

格拉泽(Glaser,1978, 1992)强调重视不断比较法。斯特劳斯(Strauss,1987)在他的研究和教学中号召进行比较——经常是假设比较，或当他教学时，对学生生活的比较——在每一分析层次上做比较(Star, 1997)①。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引进了新的研究程序：维度化(dimensionalizing)、轴心编码(axial coding)、有条件的模型(the conditional matrix)。这些程序意欲使研究者产生更浓密、更复杂、更准确的理论。维度化和轴心编码可以在编码的起始阶段

① 斯特劳斯思想活跃，喜欢比较研究。他教学生比较一些有关人、行动、背景及组织等不同的类别，从而找出各类别的特性(Star,1997)。

完成,随后可以创建一个有条件的模型。沙茨曼(Schatzman,1991)早期曾形成了维度性的概念以重新组织和解释某属性或现象之意义的复杂性。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的观点是鼓励研究者将属性置于维度的连续体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某类别的属性形成一种"维度的轮廓"。斯特劳斯和考宾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新的所谓"轴心编码"的方式重新汇集资料的技术。这种编码目的是在类别及其子类别之间建立联系,它包括类别的背景条件、类别的情境、类别寓于其中的社会互动的条件、类别产生的结果等。

选择编码(或重点编码)(selective or focused coding)运用的是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将大量数据资料分门别类的原初码。这种编码更有目的性,而且比逐行编码更具概念特征(Charmaz, 1983, 1995c; Glaser, 1978)。这类编码解释大部分的数据资料而且对资料的分类也最精确。明确决定选用何种编码使我们能够检验浮现的理论框架与它所解释的经验现实之间的适合性。在表19.1所显示的原初码中,"身份弃用"是唯一一个在我所发表论文中分析过的。当我比较调查对象的访谈时,我发现了关于身份的相似论述与关注。

我们用来综合、解释数据资料的类别源于我们的重点编码。反过来,我们的类别塑造也正在形成的新分析框架。类别通常可以细分为几个不同的子类别。例如,"重大事件"类别就包括积极的事件和经历过的消极事件(Charmaz,1991)。类别通过属性分析的具体化将描述转化为理论分析,请看下例:

> 重大事件突出地留在记忆中是因为它有边界、强度和情感力量……某个事件在现在和将来情感上不断地回环往复,因而塑造了思想——尽管是微妙地。

在讨论选择性编码时,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引进了"有条件模型",这是一个勾勒出与现象或类别相联系的条件与结果的图像。斯特劳斯和考宾将这种模型描述为一系列的同心圆。外部的圆圈代表那些离行动和互动最遥远的条件;内部的圆圈代表离行动和互动最近的条件。他们建议研究者创造一些模型使自己了解主观所想象的、影响所感兴趣现象的条件的范围和理论假设之结果的范围。这种模型可以深化研究者对所研究现象的解释和预测。

备忘录写作

备忘录(memo)写作是介于编码和最终分析之初稿之间的步骤。这一步骤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我们的数据资料和编码。它可以帮助我们界定资料收集的要领——包括进一步的初始编码和随后的理论抽样。通过备忘录写作,我们可以详细论述编码驾驭下的研究程序、假设和行动。备忘录的写作促使我们探索编码;我们将它所确认或建议的程序扩充。因此,我们的编码既依赖物质又依赖结构来整理资料。

行动编码(如前所述)促进了有用的备忘录写作。因为它们帮助研究者关注相互联系的过程而不是静态、孤立的主题。当我们在备忘录中详细描述行动码的特征时,我们将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并界定它们是如何切入更大的研究过程

之中的。通过在研究早期的备忘录中讨论这些联系和定义这些过程,我们降低了迷失在资料大海之中的可能性——备忘录的写作使我们注重理论分析和研究。

备忘录的写作帮助我们将分析性解释和经验表现连结起来。我们将原材料直接带入备忘录,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这些联系和对它们进行直接考察。来自不同背景的原材料有利于作精确的比较,抽出观点,分析类别的属性以及发现模式。下面是一个早期备忘录的第一部分。1983 年当我比较了一系列当时访谈的资料之后,我迅速地写下了这个备忘录①。

形成一个双重自我

双重自我(dual self)在本个案中是指生病的自我(sick self)和监控性自我(monitoring self)之间的对比[实际上身体的自我(physical self)可能比生病的自我更恰当,因为有些人试图认为自己是"好的"(没病),但他们依然觉得他们必须不断地监控,目的是维持这种状态——当然,不奏效时,他们也容易陷入自责]。

在萨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身体自我和监控性自我之间明确的对话。通过学习时间(或身体教育),自学和自我确认,萨拉不仅形成了一种对自己身体之需要的感觉,而且还形成了如何处理这些需要的相当不错的时间感。

就双重自我而言,监控性自我将身体自我的内部信息外在化并使其具体化。这就好像是在双重自我的两个维度之间就身体自我的最终确认而进行的对话和磋商。结果,合格的监控性自我必须能够注意到身体自我所发出的信息。学习时间是一段必需的集中思考,检验成为一种有效的监控性自我。

例如,马克描述了一个换肾者的谈话,谈论如何保养他身体内新移植的肾脏时,那种发生在身体自我和监控性自我之间的对话。

双重自我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米德的主观我和客观我。客观我起监控作用,它关注主观我。主观我是创造、经历和感觉的自我。监控性的客观我界定这些情感与冲动。客观我对情感等作评价并发展出一系列行动,就这样,被定义为需要的就受到了关注。在这里,身体自我被视为一个客体,它被用来和过去的身体(或心理自我)进行比较,和觉察到的他人的地位比较,和一个界定了的健康水平比较,和潜在危机的信号比较等。

监控性自我的后果之一就是,当它似乎"有效"时会受到实践者的鼓励(毕竟,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是很现代的信息)。然而,当个人的监控战术和实

---

① 最初的备忘录通常特别长,从头到尾都包含了资料的碎片。1983 年我用比较有距离感的口气写下的备忘录反映我早年在写作与扎根理论方法方面社会化学习的影响。它也反映出我在读研究生第一年中所接受的相对主义观点和后来在扎根理论方法训练中所习得的客观主义态度之间的紧张冲突(Charmaz,1983)。到 1990 年,当《好日子,坏日子》付印时,这本书读起来就不太有距离感而更有建构主义色彩,尽管这本书基本上保持 1983 年的备忘录不变。在此期间,我逐渐地将我研究经验问题时所持的现实主义意向与建构主义中潜在的相对主义观念整合起来(Charmaz,1990)。而且,我努力地使抽象的思想变得可行。

践者对于合理行为的理念相冲突时，或个人的监控战术不成功时，监控性自我就可能受到责难。

下面的段落显示了备忘录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该研究发表的论文中（Charmaz, 1991）。理论分析和经验背景的结合使节选的备忘录与原文非常和谐。备忘录记录了研究者理论分析的发展步骤。备忘录帮助研究者：①摸索到关于资料的理论见解；②设定分析的过程；③将类别完善；④界定不同类别范畴之间的关系；⑤获得一种作资料分析的自信感和能力。

形成一个辩证的自我

辩证自我（dialectical self）是生病或身体自我和监控性自我之间的对比。使疾病受其自身的发展的制约，而不是仅仅隐瞒疾病，这样做导致了监控性自我的形成。发展一个辩证的自我意味着对自己的身体高度注意。那些这样做的人相信他们察觉到了哪怕是最细微的身体变化。例如，马克在第二次肾移植后感觉到他已经学会感觉器官排斥的最初征兆。

当人们不再视自己为"生病的"时，他们仍然监控他们的身体自我以避免以后患病。为说明这一点，萨拉解释道，她花费了几个月的"学习时间"以便能够发现她身体的需要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需要。萨拉评论说，"我努力地弄明白它（身体的疾病）；努力地理解它，它就是我自己和混合连结组织疾病（诊断），你知道，我要尊重它，要了解它——要对时间要素，对我自己的身体在做什么，在如何感觉等有一个真正深入的认识。"当我问她，"时间要素"是什么意思时，她回答：

> 在一个月中的某些时间我比平时容易动感情得多，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我可能在清晨醒来，而且能感觉到这样……所以我确实学到了我能够做什么，什么时候停下来，以及什么时候不得不放慢节奏，等等。而且我通过学习而喜欢这样——这样给予和索取。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在我的大脑中编排好了，我现在甚至想都不需要想。不管事态如何，我都将知道什么时候坐下……放松一点，这就是那一天的要求。那么结果是我没有生病。

在辩证自我中，监控性自我将身体自我的内部信息外在化并使其具体化。这就好像是和身体自我最终生效之间的对话和磋商。例如，马克参与了"人和肾"的对话，鼓励新的肾和他保持一致（McGuire & Kantor, 1987）。一个职称的监控性自我从身体自我那里得到信息，而且正如萨拉所评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控就变得理所当然。

辩证自我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米德（Mead, 1934）的主观我和客观我。客观我起监控作用，它关注主观我。主观我是创造、经历和感觉的自我。监控性的客观我界定着主观我的行为、感情和冲动。它评价感情并组织行动以满足界定的需要。在这里，一个生病的人将他的身体自我视为客体，赞美它，拿它和过去的身体自我比较，和感觉到的他人的健康状况比较，和身体

的或精神的健康的理性相比较,和潜在危机的信号比较,等等(Gadow, 1982)。

辩证自我是病人面对不确定性时出现的多重自我之一。病人是否认为辩证自我有效,这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以萨拉为例,辩证自我指导着她组织时间,进行工作,以及和他人发展关系。在工作中,萨拉认为她必须使自己小心由太多要求所造成的压力。和朋友一起时,她感到必须把她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和医生一起时,她拒绝医生的控制,因为她相信她对自我状况的了解比医生多。

当监控性自我奏效时,实践者可能鼓励它,但是当它失败时,或监控的战术和他们的意见相冲突时,实践者则责难它(Klainman, 1988)。辩证自我的发展说明了一些人对他们的疾病和生活所持的积极态度。简而言之,辩证自我帮助人们将疾病控制在他们的生活背景之中(Charmaz, 1991, pp. 70-72)。

请注意这两篇备忘录在题目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我试图选择一个最能表现对该类别的经验描述的术语。我试图探寻某些调查对象和他们身体间的线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高度地关注那些他人不承认,不在意或不能辨识的信号。术语"辩证自我"比"双重自我"显示了一个更加动态的过程。

尽管许多扎根理论者注重外在的行动和表述,我却要找寻主体未言明的假设和隐含的意义①。然后我就问自己这些假设和意义是如何与类别所产生的条件相联系。例如,一些患慢性病的人假设他们的身体已经异化,成了一个他们与疾病战斗的恶性的战场。这种认为身体异化以及与疾病开战的假设影响他们是否以及如何适应其状况。当我提出"向生病的身体投降"这一类别时,我就问:是什么条件促成了投降(Charmaz, 1995b)。我确定出三个:"①放弃控制自己身体的愿望;②放弃战胜疾病的理念;③肯定(尽管是含蓄隐晦地)人的自我是与生病的身体绑在一起的。"(p. 672)

理论抽样

因为扎根理论者修正我们的类别并将其发展为理论建构的要素,所以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资料数据中发现缺口,在我们的理论中发现漏洞。然后我们回到实地,在限定范围内收集资料来填补这些理论上的缺口和漏洞——即进行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选择抽取具体的事件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寻求精确的信息以有助于理论的形成。

理论抽样代表着扎根理论的一种界定性特征,它依赖于扎根理论中的比较方法。我们运用理论抽样来发展我们浮现的范畴,使这些范畴更确定、更有用。所以抽样的目的是修正完善思想,而不是增加原样本的数量。理论抽样帮助我

---

① 我使用主体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我将他们视为依附从属于调查研究的,而是因为研究参与者这个术语太笨拙了。

们确定理论的界限,帮助我们指出我们范畴的适合性与相关性。

尽管我们通常是对人进行抽样,我们也可以抽取情景、事件或文献,这取决于研究和理论的需要。我们可以返回到同样的背景或个人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对于我原先的一个分析类别,“活一天算一天”,我的做法是返回到我曾经做过访谈的调查对象那里。我已发现慢性病患者将“活一天算一天”作为一种策略以保持对他们不确定的生命的一些控制。只有回到原先选择的调查对象,我才了解到这个策略当患者后来自己回想的时候,对于他们如何看待将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光和事件的流逝使他们可以放弃早些时候还颇为珍惜的计划,使他们在不遭受损失、破坏的情况下预期着未来。

理论抽样是正式理论形成的轴心部分。在这里,浮现的抽象理论在很多实际领域都具有解释力,因为其中的过程和概念是抽象的、一般性的(Prus, 1987)。因此,通过理论抽样帮助我们剔除我们概念类别中一些不太明显的特征,找出影响类别应用的条件和制约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实际领域的数据资料了。例如,在几次对患病经历的分析中我探讨了身份失落现象。我可以根据身份失落在其他情境的表现(如丧失亲人和非自愿失业)来修正我的概念。对于那些经历了非预期性身份获得的人(如意料之外的工作提升)的比较分析也可以有助于理论的修正与完善。

理论抽样的必要性意味着我们研究者不能够仅在一个资料收集阶段,进行一次访谈就建构起坚实的扎根理论。相反,理论抽样要求我们要完成资料与资料之间的比较,要求我们形成一套理论上相关的类别来解释我们的资料。进而,我们的类别将我们带回到实地以获得更多的关于这些类别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相关且有用的看法。

理论抽样帮助我们界定类别的属性,确定在何种情境下它们呈相关状态,确定它们产生、维持和变化的条件,发现它们的结果。我们对研究过程的重视,以及理论抽样对范畴之局限性的描述也有助于我们界定类别之间的歧异。通过运用比较方法,我们可以确定类别之间相互连结的条件。当我们决定哪些类别最能解释所研究的内容以后,我们就把这些类别当作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资料中的许多事件或问题(Strauss & Corbin, 1990)。斯特劳斯(Strauss,个人交流,1993 年 2 月)主张理论抽样要在研究的早期进行。我建议晚一点进行,目的是保证相关资料和分析方向的浮现不是强制性的。另外,较早地进行理论抽样可能造成理论分析早产似的结束。

扎根理论者在研究的结束时,通常以类别的“浸透(saturation)”(例如,新的资料切合到已有的类别之中)为标准(Morse, 1995)。但是“浸透”是什么意义呢?在实践中,浸透似乎很有弹性(Flick, 1998; Morse, 1995)。扎根理论方法具有诱惑性,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很快地获得对资料的掌握。我们所获得的这种掌握是最好或最完整的吗?它是否引导我们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呢?在论文中宣称为扎根理论组成部分的资料既包括一些个案也包括持续的实地研究。后者更有可能实现浸透的标准,而且它还和所研究世界的亲密熟悉性有共通之处。

当我们把一些类别定义为浸透了的(有一些我们不这样定义)时,我们会以一种扩展的、更具理论性的形式重新写作备忘录。我们把这些备忘录用于讲课、报告、论文和书的章节等。当我们整理安排备忘录时,分析的工作还在继续,因为我们有可能发现歧义或新的关系。

电脑辅助分析

电脑辅助技术为数据资料的编码、分类和整合提供了一条捷径。有些程序,包括 NVD · IST 和 Ethnograph 等明确定位为辅助扎根理论分析。Hyper-Research,一个设计为回收资料和将资料分类的程序,被定性社会学家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分析研究①。这些程序在数据资料的海洋面前证明非常有帮助,它们管理着数据资料。雅曼达(Amanda,1996)指出电脑编码还有一些优势,包括同时使用不止一个编码词做多重搜索的能力以及帮助研究者将备忘录置于文本的不同位置的作用等。资料分析程序也能有效地将研究中的关系以视图形式呈现在屏幕上。但是它们不替分析者思考——这也许使一些学生懊恼(Seidel, 1991)。然而,理查兹双氏(Richards & Richards,1994)认为,编码—回收方法通过为编码搜索资料和观点的汇集对理论的出现起支持作用。泰什(Tesch,1991)进一步注意到,概念的操作和机械的数据资料管理常常如影相随。

定性分析的软件程序也饱受争议。科菲等人(Coffey et al. ,1996)和朗基拉(Lonkila,1995)在论文中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即定性分析程序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概念和使用者对它无批判性地接受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担心这些程序过分强调编码会导致形成一个虚假的关于扎根理论的观念;他们还注意到机械的操作不能替代解释性的分析。然而,费尔丁和李(Fielding & Lee,1998)系统地实地研究了人们运用计算机辅助定性资料分析程序的经历之后,发现这些担心找不到基本的经验证据。我对这些程序仍持保留态度,理由有四:①扎根理论方法经常不被了解;②这些方法长期以来被用于验证研究,而不是进行研究;③这些软件包显得更适合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而不是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④这些程序可能无意中形成一种错觉,即解释性的工作可以还原为一套程序。林肯(Lincoln,个人交流,1998 年 8 月)问她的学生:“为什么你愿意加入那种把你和人类生存的最深刻部分联结起来,然后却把它自己交给机器去处理的研究?”部分的解释性工作能获得一种整体感——整个访谈,整个故事,数据资料的整体等。不管计算机程序对于管理研究中的组成要素是如何地有帮助,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只是研究中的碎片②。而且这些碎片可能显得有它自己的存在,好像很客观,好像离开了它们原来的情境,离开了我们的建构与解释。因为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反映了实证主义,基于此的计算机辅助程序不仅促进了软件的广泛

---

① 关于如何选择资料分析软件,请参见:Weitzman & Miles,1995。

② 要对我们所做的研究获得一种整体感,我们可能需要所有的文献,如果没有完整的资料的话。林肯(Lincoln,个人交流,1998 年 8 月)告诉我她把她所有的资料都摆在一个大桌子上。这样她可以获得一种整体感;同时,她还可以计划如何将不同的部分结合起来。

被接受,也促进了单一维度的有关定性研究的观念被广泛接受。

对扎根理论的严峻挑战

以上的论述表明,最近时期的论战导致了对扎根理论的重新评价。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已经主导了方法的界定以及方法在定性研究中的应用。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主要的扎根理论倡导者的思想已经和方法本身熔为了一体。后来,批评家们又对方法的性质及其局限作了一些假设(Conrad, 1990; Riessman, 1990a, 1990b)。里斯曼(Riessman,1990a)认为扎根理论方法在尊重访谈对象和描述故事方面还存在不足。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3)发现做扎根理论分析容易导致异化和文学形式化。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4)还发现定性研究报告并非像其作者所认为的那样直接可信。作者们有选择地挑取证据,清洗主体的叙述,有意无意地采取有价值取向的比喻,假设研究者是万能的,这些都使读者感到乏味。

这些批评挑战了作者对于所研究主体的代表性地位,挑战了他们解释调查对象之生活的权威性,还挑战了民族志研究者已经回答过了的、作者的声音(Best, 1995; Dawson & Prus, 1995; Kleinman, 1993; Sanders, 1995; Snow & Morrill, 1993)。这些批评显示扎根理论方法错误地表现了调查对象故事中的意义①。康拉德(Conrad,1990)和里斯曼(Riessman,1990b)认为扎根理论研究中"资料的碎化(fracturing the data)"可能限制了研究的理解力,因为扎根理论者的目的是分析资料而不是要完整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经历。从扎根理论的观点看,资料碎化的意思是研究者在界定资料的研究主题时创造的编码和分类。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提出这种研究策略,原因有三:①有助于研究者避免沉浸于轶闻故事之中,避免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研究对象的观点;②防止研究者面对成堆的资料无从下手;③创造一种新形式供研究者组织和解释资料。但资料碎化的批评者认为扎根理论方法导致了经历与研究主体的经历分离,意义和故事分离,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分离②。简而言之,这些批评者认为扎根理论方法:①限制了进入研究主体的世界的途径,因而降低了对主体经历的理解;②破坏了社会世界和主体经历的表现;③依赖观察者的权威,视其为专家观察

---

① 建构主义假定意义是多种多样,问题叠出的;客观主义假定世界是真实、执著、外在和可预测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承认所处世界的现实性,还试图证明这些现实是通过行动、意图、常规等由社会创造的。

② 有关不同的学者对这些问题如何反映的详细报告,参见1992年《当代民族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期刊关于怀特的《街角社会》中现实与解释的辩论(Adler et al. ,1992)。博依伦(Boelen,1992)对怀特的研究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并藉此挑战他所作的具体结论(但不是挑战民族志具体化概念本身)。对博依伦论点的反映却各不相同,有接受客观主义理论前提的,也有质疑该前提的(Denzin, 1992b; Orlandella, 1992; Richardson, 1992; Vidich, 1992; Whyte, 1992)。维迪奇(Vidich,1992)指出博依伦假定只存在一种可能的现实而怀特却没有将这个现实抓住。邓津(Denzin,1992b)和里查德森(Richardson,1992)却质疑怀特和博依伦都有的客观主义理论前提。

者;④提出了一套客观的程序,其分析以这套程序为基础①。

研究者可以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一步探索关于主观经验的知识、扩大这种知识的代表性,同时,既不停留于这种知识的外部也不接受客观主义的假设和程序。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认为人们创造和维持有意义的世界是通过赋予现实以意义并在其中行动的辩证的过程来实现的(Bury, 1986; Mishler, 1981)。所以,社会现实并不独立于人类的行动。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比较了大量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论述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文本(Chenitz & Swanson, 1986; Glaser, 1992; Martin & Turner, 1986; Strauss & Corbin, 1990; Turner, 1981)。采取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立场,研究者可以将扎根理论方法进一步引入解释性社会科学的领域,它与布卢默(Blumer,1969)的方法相一致,即强调意义,不假定有一个单维度的外在现实的存在。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认识到,不管是资料收集还是资料分析都存在互动的特征,它解决了近来对扎根理论方法的批判,而且将实证主义假设和后现代的批判调和起来。不仅如此,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通过从经历主体的立场来研究经历,促进了定性研究传统的发展。

扎根理论在定性研究中的位置

扎根理论研究属于较宽泛的实地研究和定性研究的领域。多数扎根理论研究依赖通过实地、民族志或调查研究所收集到的详细的定性资料,但是它们完全浸入到具体的社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同于民族志研究。扎根理论者也不试图研究整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相反,我们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的碎片。正如其他定性研究形式一样,扎根理论只能描述当时的状况。但是,扎根理论对基本社会过程研究的追求有助于确定事件之间的联系。社会世界总是处于过程之中,研究对象的生活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他们自己也在改变。因此,扎根理论者——或在更宽泛意义上,定性研究者——建构了一幅描绘、再现、处理研究对象生活的画卷。可以说,它更像绘画而不是照片(Charmaz, 1995a)。我对于扎根理论的观点接近于阿特金森(Atkinson,1990, p. 2)所描述的民族志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客观描述、精心组织、解释记录的"艺术产物"。强调发现和现实性图画的趋势可能是由于解释者的原因,而不是论文作者的原因②。但是,很多采用扎根理论策略的研究者精确地运用这种方法去建构客观主义(也就是实证主义)的定性研究。

对于民族志材料的定性分析,扎根理论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这是由于扎根理论是由一套具体明确的研究策略组成。任何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者都

---

① 据我的了解,那些提出批评的人并没有通过运用扎根理论而将问题解决。他们的建议各不相同,有主张放弃经验研究的也有主张叙述分析的。叙述分析关注或倾向于重视叙述的类型和结构而不是调查对象的意义,那么在这一意义上,我不认为它是扎根理论研究的一个更好的替代方式。我也不认为逐行记录调查对象的叙述会比访谈摘要提供一种更好的意义框架。

② 作者可能注意到某个问题,并形成一篇论文。但是作者的假设则是某一个问题构成了整个的经验的现实。例如,在我的关于疾病的分析完全聚焦于自我之前,我的论点是自我的失落是痛苦的一种基本形式。读者修正了我的观点,他们的结论是我错误地将自我的失落视为疾病的唯一经历(Robinson,1990)。

可以运用这些研究策略进行分析。扎根理论方法的力量在于:①指导研究者通过分析程序逐步进行研究的策略方法;②资料收集程序的自我纠错特征;③其方法天生的理论倾向以及其对非情境描述的偏离;④对比较法的强调。但是,像其他定性研究方法一样,扎根理论研究是一个突生性研究过程,而不是一种对某研究问题的逻辑演绎的研究,也不是一种逻辑归纳的研究。原初的研究问题可能是具体的、描述性的,但是研究者可以通过对他(她)的数据资料的研究形成更深入的研究问题。就像是美妙的礼物等待人们打开包装,早期的扎根理论文本暗示类别与概念包含在数据资料中,等待研究者去发现(Charmaz, 1990, 1995c)。格拉泽(Glaser,1978, 1992)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们收集资料可以不受个人偏见和自传的影响。相反,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认为类别、概念和分析的理论水平产生于研究者在实地中的互动、产生于对资料的提问。简而言之,研究问题的范围缩小、范畴与类别的形成,以及所建构理论框架的整合等反映了研究者关于塑造、收集数据资料的所思、所做以及如何考虑、如何做。

扎根理论者的分析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社会过程和情境的故事。研究者在编写着故事,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客观的读者面前展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反映着作者也反映着读者。扎根理论研究典型地是介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最近的后现代研究方法之间。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害怕扎根理论者对故事的破坏,因为扎根理论者塑造着资料的收集,而且当新的问题出现后,扎根理论者会重新确定分析的方向。现在,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也强烈地批判扎根理论的故事。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无意识地编写着我们的故事,否认了作者的情结(Clough, 1992),解构了研究的主体。而且,邓津(Denzin,1992a)指出,即使是新的解释方法也"给予研究者对主体的优先权,给予方法对研究主题的优先权,而且维持着对效度、信度、代表性等范畴的遵从"(p. 20)。这些批评适用于许多扎根理论研究。而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批评使我们的经验研究更具有反思性,使我们所完成的研究更具有情景特征。即使我们既了解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了解我们的研究主体对他们自己经验的描述,我们也只能够宣称我们解释了一个现实。

修正后的扎根理论必须考虑认识论的问题。扎根理论提供了一种途径,使那些想继续发展定性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可以不受客观主义和普遍性等实证主义圈套的牵制。因此,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在过去的实证主义和未来的解释性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修正后的扎根理论通过碎化的经验研究保持着现实主义,通过解释性的不断增强脱离了实证主义的倾向。

与克拉夫(Clough,1992)的批评形成对照的是,民族志研究可以借鉴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建构一种不用宣称代表现实的叙述方式。女性主义允许情感的表现、疑问的表达,允许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资料的收集减少了正式性,变得更直接,而且研究主体所关注的问题优先于研究者的问题。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在现实与真实之间作出区分。建构主义理论并不追求真实——即单一的、泛在的、持久的真实。但它仍然保持着现实主义,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的现实,它假设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存在。但是,无论是人类的现实还

是现实的世界都不是单向度的。我们在现实和世界中行动,因而对我们的所做、所思、所感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假设我们所得到的是现实,是客观的知识和真理,这基于我们的理论视角(Schwandt,1994)。象征互动主义的实用主义理论基础在这里表现出来。托马斯(W. I. Thomas)和托马斯(Dorothy Swaine Thomas)宣称"如果人类将他们的环境定义为现实的,它们就有现实的后果"(p. 572)。按这二者的理论,我们必须找出研究的参与者把什么定义为现实的,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界定现实。建构主义理论也有助于形成这样一些自我意识,即关于我们把什么归因于主体,关于研究者如何将这些定义表现为现实的,他们何时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因此,研究者的成果中的现实并不是调查对象的现实构成。相反,两者都是某种共享的或个人的现实,是多重解释中的一种解释。只有在以下这种意义上解释才是客观的,即该解释寻求建构分析调查对象和研究他们的社会科学家如何建构他们的现实——而不是将他们的现实视为单向度的、泛在的或不可改变的。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建构主义方法上,这使他们认识了多重现实以及其中的多重观点。它并不代表一种试图发现单一现实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布卢默(Blumer,1969)所谈论的社会生活的顽固特征。我们把关于社会生活的概念从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有待发现、有待应付、有待分类的世界改变为一个在思想上变成现实的世界,一个通过成员的语言和行动变成现实的世界。所以,扎根理论者所建构的不是现实的形象,而是一种现实的形象——即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外在的现实。

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 *VS*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认为读者创造了资料,读者通过与自己的所见进行互动之后才产生了分析。资料并没有提供一扇洞见现实的窗口。相反,所发现的现实产生于互动过程以及其临时性的、文化的和结构的背景。研究者和研究主体之间形成互动并赋予其意义。因而,观察者成为了被观察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后者分离。观察者的所见塑造着他(她)相应的界定、测量与分析。由于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者不同意这个立场,这个关键的分歧就反应在其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上①。

在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中,因果关系是提示性的、不完整的和非决定性的。因此,扎根理论期待着完善。扎根理论所注视的是"变量"是如何扎根的——被赋予意义并在研究主体的生活中表现出来(Dawson & Prus,1995;Prus,1996)。他们的意义和行动比研究者的分析兴趣和方法技术具有优先性,建构主义的扎

①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以及格拉泽(Glaser,1992),斯特劳斯(Strauss,1987)很早就指出在研究背景之下核心的问题变得很明显,似乎每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都可以发现它们。与之相应,研究者写作时就好像观点或立场都不会影响到观察者的所见和发现。

根理论寻求界定用来解释研究主体是如何建构其现实的有条件的论述,这些有条件的论述并没有达到某种概括化真理的水平。相反,它们构成了一套假设和概念,其他研究者可以将它们搬用到相似的研究问题和别的重要领域。这样,普卢斯(Prus,1987)所呼吁的对一般概念的研究与发展就得到了回应。所以说扎根理论者的假设和概念既提供解释又提供理解,完全实现了实用主义的有用性标准。

与之形成对照,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者更紧密地团结在传统科学的实证主义阵营之中(Glaser, 1978, 1992; Glaser & Strauss, 196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4; Wilson & Hutchinson, 1991)①。他们假定遵循一套系统的方法可以引导他们去发现现实,去建构一个暂时正确的,可检验的,且最终能证实的理论(Strauss, 1995; Strauss & Corbin, 1990,1994)②。这个理论不仅提供理解还提供预测。这一立场包含以下几个分论点:①系统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回应了实证主义所要求的信度与效度,因为专门的研究程序允许再测③;②扎根理论的假设检验导致了对新出现理论的证实或推翻;③扎根理论方法允许实施控制,因而使所研究的现实有改变的可能。

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接受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假设:即外部世界是可以被描述、分析、解释和预测的,是真理,但却是小写的。换言之,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随着环境的变迁是可以修正的。它假设不同的观察者都会发现这个世界,都会以类似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即研究的主体具有可比较的经历(例如,患有不同慢性病的人可能都经历过不确定感、生活规律被干扰、被医疗控制等体验),而观察者带着类似的问题、观点、方法以及概念等来分析这些经历。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者经常和研究的参与者享有共同的假设——特别是专业的参与者。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们假定调查对象和他们享有共同的意义。

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等提出的规则将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研究结构化。这些规则是说教性的、规定性的,而不是突出性的、互动性的。桑德斯(Sanders,1995)指出扎根理论程序"比关于如何将信息填入模型的指令更加严格"(p. 92)。斯特劳斯和考宾用一些科学术语(如轴心编码、有条件的模型等)将研究性程序分为不同的步骤(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3)。由于扎根理论方法变得越来越清晰、类别化和复杂化,该方法本身似乎具有了生命。规则演变为程序,再变成不可改变的准则,这就不同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原先提出的较为灵活的方法。通过将扎根理论方

---

① 实证主义的理论前提,参见:Denzin,1989。

② 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4)号召扎根理论的支持者放弃对真理(事实)的追求。但是,他们又支持对研究的证实,这一点就以对事实的追求为基础。在1994年版的本书中,他们也肯定了我早期所指出的两点:a. 研究者的分析是研究者的观点和资料的观点互动的产物;b. 早期的著作似乎显示研究者在资料中发现了一个外在的秩序(Charmaz, 1983, 1990)。

③ 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8)认为精确的复制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充分有效地重复测量。他们提议有相似的理论前提、资料收集程序和研究条件的研究者形成相似的理论解释。

法视为规定性的科学准则,研究者们进一步将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涂上实证主义的色彩。

假定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具有实证主义倾向,那么建构主义理论如何理解呢?它如何调和扎根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呢?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位于后现代主义定性研究方法(Denzin, 1991; Krieger, 1991; Marcus & Fischer, 1986; Tyler, 1986)和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Rennie, Phillips, & Quartaro, 1988; Turner, 1981)之间。研究者们现在不再只用单一的声音来处理话语,不再只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建构主义的目标是他们在处理过去的经历时所使用多种声音、多个观点和多重视野。那么人们如何完成这一目标呢?

建构主义的建构

什么对研究者发展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有帮助呢?它们如何形成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各个步骤呢?获得研究的深入和理解意味着研究者们能够实现布卢默(Blumer,1969)所呼吁的调查对象与其世界之间"亲密的熟悉"(Lofland & Lofland, 1984, 1995)。简言之,建构建构主义意味着寻求意义——既包括调查对象的意义也包括研究者的意义。

要寻求调查对象的意义,我们必须不停留于表面意义或假设意义,而是要深入探索。我们必须寻找行动和事实,也必须寻找观点和价值。我们需要寻找情境和结构,也需要寻找信仰和意识形态。通过研究隐含的意义,将调查对象关于现实的概念清晰化,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①。

建构主义方法认为与调查对象的关系是必要的。在这种关系中,调查对象可以将他们的故事用他们的语言来包装。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聆听他们的故事时要有开放的情感与体验。在我对慢性病的研究中,好几个人提到他们将我视为一个可以表达他们的私人想法和感情的倾诉对象。但是,有时候研究者组织问题的方式掩盖了本来的经历和未言明的情感。在探讨疾病之痛苦的研究中,我们可能不明智地给出一些信息,暗示我们不希望调查对象讲得太深入。而且,一次性的访谈将自身导入了一种对经历的偏颇的看法,一种公众的话语。访谈的结构可能妨碍了私人思想和感情的出现。这个结构强化了调查对象不得不讲述公众版的故事时所带有的种种倾向。而研究者们对研究的参与者的不断关注使这些问题有所减轻。

编码、写作备忘录、形成类别等的理论水平在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之中可能不相同。例如,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 1998)坚持对外在资料的描述。我的目标是通过把资料放在一起来理解其潜在的假设。例如,"活一天算一天"是人们处理困难时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每个人都知道"活

① 通过使那些希望阅读的研究主体阅读我们早期的论文,我们就使其有可能挑战或纠正我们的观点。

一天算一天"的意义。但它的假设是什么呢? 病人报告说"活一天算 一天"或"某天快乐或不快乐",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直到他们被问及这些话的经验的意义时(即,这些话与时间的关系,这些经历揭示了怎样的情感,等等)他们才开始为"活一天算一天"、"好的"一天、"坏的"一天等界定形式与内容。

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研究可能提供详细的描述和有条件的论述,但是这些研究可能保持在经历之外,不参与经历。而且,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引入研究程序增强了外在性特征,这套程序正是以经历为代价来增加精确性的,轴心编码可以导致蹩脚的科学术语和分类。这些科学术语和类别通过占领着中心的地位,吸引着外围的读者,它们所关注的却不是经历本身。程序和概念的图式显然可能会导致使经历模糊不清的复杂结构。任何形式的扎根理论都可以产生行话。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尤其可能在其理论分析上披上行话的外衣。

分类与所研究的生活保持一致有助于将生活置于研究的前台。积极的编码与随后的分类保持了经历的影子。例如,在我关于沉浸于疾病的讨论中,我所用的类别有"重塑生活"、"直面依附感"、"慢慢靠拢"、"滑入疾病的程序"、"平安度过严重事件"等①。

编码和分类的过程强化了研究者对资料提问的能力。各种问题可能出于客观主义立场也可能出于建构主义立场。这些问题可能是具体的,正如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 1998)所论述的那样,或者问题可能抽象一些。具体的问题产生于关于两个类别的讨论之中,即痛苦的经历和痛苦的减轻:"谁能给关节炎患者减轻痛苦?""什么可以减轻痛苦?""疾病是如何经历、如何解决的?""痛苦需要减轻至何种程度?""疾病何时产生、何时减轻?""为什么减轻病痛很重要?"(1990,pp. 78-79)。在这里,这些分类具有客观性、外在性特征——客观,是因为这些问题假定其答案反映了"事实";客观,是因为这些答案假定研究者发现了在病痛中是"所有的现实";客观,是因为病痛的主题现在具有了外在的特征,它可以被确认、研究和管理。

与之相对比,我的研究将病痛主题主观地视为一种感情、一种经历,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然后我提出以下的问题:什么使病痛痛苦(即,对于这个被所经历者界定的现象什么是最关键的)? 病人赋予该现象怎样的界定性特征? 他们何时这样做? 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个我以及斯特劳斯和考宾(Strauss & Corbin,1990, 1998)都关心的问题,即:人们是如何经历这种病痛的,他们对此又做了些什么? 我的问题目的是了解其意义,而不是获得真理。结果,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可能比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更直觉、更具有印象主义特征。

我所主张的扎根理论培养了研究者在形成新观点时从新的视角看待资料,反复地审视资料。研究者可以对资料多次地编码和再编码(Glaser & Strauss,

---

① 区分什么时候是行动者在表演,什么时候行动者被表演,这一点很重要。任何演绎的研究方法(如建构主义的方法)的危害之一就是过分强调个人。建构主义的方法导致了一种强调积极、反思的行动者的风格。然而社会力量也会对行动者产生作用力。所以研究者既需要了解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行动者,也需要了解行动者对于这些社会力量怎样想、怎样感觉以及如何应对。

1967)。对资料提出新问题会导致新的分析点。我经常在资料和论文初稿之间来回反复多次。在特定的访谈中我有明显的发现,而我想看看在其他访谈中这些所发现的特征是否明显。然后我又回到访谈对象那里,围绕新的类别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当我重新访问一位曾患病的年轻妇女,问她那段漫长、单调的康复日子在记忆中是怎样的。她马上就领会了我所关心的问题,并毫不犹豫地打断我说:“就像一眨眼那么快就过去了。”(Charmaz, 1991, p.92)。

每个定性研究者都有多种分析方式。其中最关键的是复杂程度的掌握。需要复杂到何种程度才能深入、清晰地表达故事?复杂到何种程度又会显得过于琐碎、使读者恼怒或困惑?到何种程度则会使某些分类变成概念上的混乱与过度简约化呢?为了达到恰当程度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明白潜在的读者是谁,必须明确写作的恰当风格与层次。

在写作中处理

当扎根理论研究者形成了理论分析框架之时,这并不意味着定性资料的分析停止了;相反,该分析继续延伸到写作阶段(Mitchell & Charmaz, 1996)。扎根理论研究者的客观主义倾向或建构主义倾向也贯穿于他们关于研究的写作之中。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代表形象就是科学实验室,也反映在精心组织、论述的,充满概念、证据、程序的研究报告之中。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形象就是一个伏案写作的作者,他(她)试图在理论解释和所唤起的美感之间建立平衡。下面我从早期的研究中找出一些写作策略与实例,以阐述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中理论分析是如何进入到写作过程之中。

正如劳雷尔和斯特劳斯(Laurel & Richardson,1990)所指出的,写作很重要。为了和后现代主义保持一致,我尝试着通过写作来唤起体验性的感情。这就意味着将读者带入到故事之中,通过语言风格和叙述结构来分享故事的情感。这种策略使写作远离了典型的科学写作模式而又没有将最终的成果变成小说、戏剧或诗歌。我给出了使经历中的节奏与情感产生的关键性的定义与区别。

> 当一个人掉入了将生活撕裂的连续的危机之中时,活一天算一天这种概念就产生了(Charmaz, 1991, p.85)。
>
> 其他人等待着勾画一个未来。等待着。他们控制着他们的身体和生活。他们注意着显示下一步怎么走的迹象。只有当他们确实感觉到疾病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时他们才描绘未来或者关注未来蓝图中的下一步。只有当他们感觉距离疾病足够遥远了,可以释放其感情之时,这些人才会描绘未来或者关注未来蓝图中的下一步。

类比和比喻可以使暗含在某个类别中的意义和感情明朗化(Charmaz & Mitchell, 1996; Richardson, 1994):

> 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感到被迫地活一天算一天。他们将这种想法强加给自己,几乎是紧咬牙关地接受。在这里,活一天算一天类似于在语言学校里学一堂不熟悉的、不太接受的语法课程;它是保持生命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前提条件(Charmaz, 1991, p.179)。

> 放任时间与抓紧时间形成对照。病人像球迷一样,当遭遇严重疾病时会放纵地打发时间(p.91)。

简单的语言和直接的观点使理论具有可读性。在许多故事中,理论是嵌入陈述之中的。这样,理论变得更容易理解,但却更难以确定了。有几种技巧有助于使写作具有可读性。掌握住经历的韵律与节奏,这使研究者能够在写作中再现它:

> 从局促不安到蒙羞受辱,从不适到疼痛,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然后是什么呢? 严格管制(Charmaz, 1991, p.134)。

> 一天天过去了,时间日复一日地滑过。因为几乎没有事件来打破一天、一周、一月的沉寂,所以日子显得特别长。疾病就像一段长长的不被打扰的时光(p.88)。

问题有助于将主要观点联结在一起或者给读者新的方向。有时候,我把自己当作一个长期患病的病人,而且从这个角色出发来问问题。

> 是癌症吗? 可能是心绞痛吗? 当一些新出现的症状(常常是未经诊断的)可能意味着严重的慢性病时,那种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痛苦就出现了(Charmaz, 1991, p.32)。

这种接近性将读者吸引到了故事之中。当前发生的故事好像正在将读者吸引到其中。通过描写过去的调查对象,我牺牲接近性来换取精确性,这样做是因为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过去①。作者将他们的故事置于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分析这些故事,这既可能将经历带入生活之中也可能将经历完全模糊化。

具体细节与分析类别的混合物将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或者甚至神秘的东西都联结起来。因此,在《好日子,坏日子》(*Good Days, Bad Days*;Charmaz, 1991)中,我用了一些以前用过的资料,例如关于慢性病生活的章节。当病痛减轻时,我带着读者看看杂乱的房间、紧张的时间安排、简化生活的压力、衰弱的步伐以及为使病痛减轻所付出的无数努力。这种细节给了读者一些想象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对让人难以回忆起的时间进行了分析。

作者运用某种线形逻辑来组织他们的分析,使经历易于理解。但是经历却未必是线形的,也不一定总是有明确的边界。例如,患病的经历并不总是适合一个总体过程。扎根理论方法强调对研究者在资料中所发现的基本过程进行分析。尽管我反复考虑要以某个过程来统帅全书,我还是不能确定一个总的主题。

---

① 对比里斯曼(Riessman,1990a)描述当前发生的故事。

患病的经历由许多过程组成,并不是某个单一的过程中包括一些子过程。而且,疾病时好时坏地变化着。慢性病的患者既能确定患病时期也能确定相对“健康”时期。因此,我选择用时间和经历来描述疾病。

书面的现象表现了作者描述主题的口气,反映了作者和他(她)的调查对象的关系。我的目标是好奇但不屈尊俯就,开放但不窥探隐私,参与但不支配控制。保持平衡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试图展现调查对象的世界与概念。通过研究和写作《好日子,坏日子》,我努力地想要超越调查对象对自己患病状况的那种对公众的展示。这种展示没有难题、没有恐惧痛苦,也没有道义上的两难抉择与难以决断。

如何表现调查对象,即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选择何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故事,作者对于这个问题要做伦理的选择。选择的做出也导致了研究者对作者角色的承担(Krieger, 1991)。在我的书中,我使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中有可信的人物,而不是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社会科学家。我的口气、风格与想象使那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特征得以弱化。但是,由于我使用概念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故事,我的作品与扎根理论以及多数社会科学文章还是协调一致的。

修改初稿可能会导致风格的变化,甚至分类的变化。在专业期刊中,精心划分的扎根理论范畴类别的作用相当于路标。书的编辑可能只瞟一眼就删掉所有的小标题。随着路标的变化,讲述的风格也变化。较直接的科学风格逐渐削弱而更有文学性的风格日见光大。当然,人们如何看待这种风格以及人们将其定义为科学抑或是文学的,这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可能将这种风格视为客观主义、现实主义和科学的;实证主义者可能完全视其为文学性的。我赞同阿特金森(Atkinson,1990)的观点,即,印象主义的故事常常被嵌入现实主义的叙述之中。我努力地吸引读者,使他们可以感觉和明白故事中的讲述者的情感。在这儿,范曼尼恩(Van Maanen,1998)所称的印象主义的故事和克拉夫(Clough,1992)所称的“带感情的现实主义”听起来完全一样。但是,也许是表现的情绪、感情和观点形成了二者在审美上的惊人相似吧。

小结与结论

作了上述分析之后,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扎根理论未来的走向如何呢?首先,扎根理论方法由于支持者的不同立场与取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的目标是给研究者提供一种明确的建构主义的方法。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认识论的理论前提,我们可能会承认我们研究中存在局限,会承认造成局限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对扎根理论方法的修改与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对经验世界的研究。

其次,我们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扎根理论来阐述、延伸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

这可以减轻或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可以给现实主义研究通报经历而不仅仅是判断是否摒弃经历。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已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我们与研究主体的关系以及对研究主体的代表身份。这一点将会长期地影响定性研究，其影响之深远可能会超过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本身的使用寿命。与之相似，对定性研究在历史与文化情境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得到了加强。我们扎根理论研究者只要对如何架构与写作我们的研究持一个更为反思性的态度，就能够在当前趋向于语言学、修辞学分析的潮流中立于不败。这个潮流支持扎根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方法，因为它明确地将作者的作品视为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客观已存在的事物。

第三，展望将来的扎根理论，既看到客观主义的前景也有建构主义的未来。科学的制度与陈规不太可能产生大的变化。课题资金评审委员会与学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也可能会长期青睐客观主义的研究而不是建构主义的作品。定性研究的革命已经给学者们提供了可能性与潜在机会，但是科学的守门人依然倾向于欣赏那些在研究上和他们最接近的学者。因而，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型研究包含极少的定性成分，大型的研究更多的是有多个调查点的团队课题。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将要凋零与式微呢？也不是这样。解释性研究的潮流、对理解的追求，以及对想象的挑战，这一切都促成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通过分享研究主体的世界，我们逐渐在头脑中形成了关于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构造的印象。



参考文献

Adler, P. A., Adler, P., & Johnson, J. M. (1992). New questions about old issu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3-10.

Atkinson, P. A.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Baszanger, I. (1998). *Inventing pain medicine: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clinic.*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est, J. (1995). Lost in the ozone again: The postmodernist fad and interactionist foibles.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7, pp. 125-134). Greenwich, CT: JAI.

Biernacki, P. L. (1986). *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ction: Recovery without treat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elen, W. A. M. (1992). *Street corner society*: Cornerville revisit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1-51.

Bond, G. C. (1990). Fieldnotes: Research in past occurrences. In 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pp. 273-28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ury, M. R. (1986).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8, 137-169.

Charmaz, K. (1983).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n ex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R.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p. 109-126). Boston: Little, Brown.

Charmaz, K. (1990). Discovering chronic illness: Using grounded theo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161-1172.

Charmaz, K. (1991).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rmaz, K. (1995a). Between posi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Implications for methods.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7, pp. 43-72). Greenwich, CT: JAI.

Charmaz, K. (1995b). Body, identity, and self: Adapting to impairmen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 657-680.

Charmaz, K. (1995c). Grounded theory. In J. A. Smith, R. Harré, & L.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pp.27-49). London: Sage.

Charmaz, K., & Mitchell, R. G. (1996). The myth of silent authorship: Self, substance, and styl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19, 285-302.

Chenitz, W. C., & Swanson, J. M. (Eds.). (1986). *From practice to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urs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Clarke, A. E.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gh, P. T. (1992).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From realism to social criti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Coffey, A., Holbrook, B., & Atkinson, P. (1996).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echnologies a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 (1). Available Internet: http://www. socresonline. org. uk/socresonline/1/1/4. html

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1990).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5), 2-14.

Conrad, P.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chronic illness: A commentary on method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257-1263.

Corbin, J., & Strauss, A. L. (1987). Accompaniments of chronic illness: Changes in body, self, biography, and biographical time. In J. A. Roth & P. Conrad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care: The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 (Vol. 6, pp. 249-282). Greenwich, CT: JAI.

Corbin, J., & Strauss, A. L. (1988). *Unending work and care: Managing chronic illness at hom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ressey, D. R. (1953). *Other people's money: A study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bezzlement.* Glencoe, IL: Free Press.

Creswell, J. W.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wson, L. L., & Prus, R. C. (1995). Postmodernism and linguistic reality versu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obdurate realit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7, pp. 105-124). Greenwich, CT: JAI.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1). *Images of postmodern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2a). The many faces of emotionality: Reading *Persona.*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 17-30).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2b). Whose Cornerville is it anywa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20-132.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1996). Prophetic pragmatism and the postmodern: A comment on Maines. *Symbolic Interaction*, 19, 341-356.

Denzin, N. K. (1998). Review of *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ing the social fabric. Symbolic Interaction*, 21, 221-223.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Prefa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ix-xii).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elding, N. G.,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Sage.

Gadow, S. (1982). Body and self: A dialectic. In V. Kestenbaum (Ed.), *The humanity of the ill.*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Ed.). (1994). *More grounded theory: A reader.*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8, February 19). [Contribution to workshop]. In B. G. Glaser & P. Stern (Leaders), *Advanced grounded theory, workshop II.* Workshop conducted at th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Conference, Vancouver.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8).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Johnson, J. L. (1991). Learning to live again: The process of adjustment. In J. M. Morse & J. L. Johnson (Eds.), *The illness experience: Dimensions of suffering* (pp. 13-88). Newbury Park, CA: Sage.

Kleinman, A.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leinman, S. (1993). The textual tur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11-13.

Krieger, S. (1991).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elf: Personal essays on an art for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derman, R. (1990). Pretexts for ethnography: On reading fieldnotes. In 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pp. 71-9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indesmith, A. R. (1947). *Opiate addiction.* Bloomington, IN: Principia.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fland, L. H. (1993). Fighting the good fight—aga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1-3.

Lonkila, M.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U. Kelle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41-51). London: Sage.

Maines, D. 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7-38.

Marcus, G. E., & Fisc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P. Y., & Turner, B. A. (1986). Grounded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2, 141-157.

McGuire, M. B., & Kantor, D. J. (1987). Belief systems and illness experience. In J. A. Roth & P. Conrad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care: The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 (Vol. 6, pp. 241-248). Greenwich, CT: JAI.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lia, K. M. (1996). Rediscovering Glase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6, 368-378.

Mishler, E. G. (198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In E. G. Mishler, L. R. Amara Singham, S. T. Hauser, R. Liem, S. D. Osherson, & N. Waxler (Eds.), *Social contexts of health, illness and patient care* (pp. 141-1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R. G., Jr., & Charmaz, K. (1996). Telling tales, writing stories: Postmodernist visions and realist image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 144-166.

Morse, J. M. (1995). The significance of satur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5, 147-149.

Orlandella, A. R. (1992). Boelen may know Holland, Boelen may know Barzini, but Boelen "doesn't know diddle about the North E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69-79.

Park, R. E., & Burgess, E. W. (1925).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us, R. C. (1987). Generic social processes: Maximizing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250-293.

Prus, R. C.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lived experie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eif, L. (1975). Ulcerative colitis: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life. In A. L. Strauss (Ed.),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pp. 81-89). St. Louis, MO: C. V. Mosby.

Rennie, D. L., Phillips, J. R., & Quartaro, G. K. (1988). Grounded theory: A promising approach to conceptualization in psychology? *Canadian Psychology*, 29, 139-150.

Richards, T. J., & Richards, L. (1994).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445-462).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2). Trash on the corner: Ethics and tec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103-119.

Richardson, L. (1993). Interrupting discursive space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ciological self.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4, pp. 77-84). Greenwich, CT: JAI.

Richardson, 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essman, C. K. (1990a). *Divorce talk: 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iessman, C. K. (1990b). Strategic uses of narrativ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illness: A research not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195-1200.

Robinson, I. (1990). Personal narratives, social careers and medical courses: Analysing life trajectories in autobiographies of people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173-1186.

Robrecht, L. C. (1995). Grounded theory: Evolving method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5, 169-177.

Sanders, C. R. (1995). Stranger than fiction: Insights and pitfalls in post-modern ethnograph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17, pp. 89-104). Greenwich, CT: JAI.

Schatzman, L. (1991). Dimensional analysis: Notes 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grounding of the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 R. Maines (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rocesses: Essays in honor of Anselm Strauss* (pp. 303-314).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Schwandt, T.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idel, J. (1991). Method and madn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to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7-116). London: Sage.

Shaw, C. (1930). *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now, D., & Morrill, C. (1993). Reflections upon anthropology's crisis of faith.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2, 8-11.

Star, S. L. (1989). *Regions of the mind: Brain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certain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 S. L. (1997). Another remembrance: Anselm Strauss: An appreciation.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21, pp. 39-48). Greenwich, CT: JAI.

Stern, P. N. (1994a). Eroding grounded theory. In J. M. Morse (Ed.),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p. 212-2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ern, P. N. (1994b).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ts uses and processes. In B. G. Glaser (Ed.), *More grounded theory: A reader* (pp. 116-126).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Strauss, A.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L. (1995). Notes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he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1, 7-18.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wanson, J. M., & Chenitz, C. W. (1993). Regaining a valued self: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to living with genital herp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 270-297.

Tesch, R. (1991). Softwar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Analysis needs and program capacities. In N. G. Fielding & R. M. Lee (Eds.),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6-37). London: Sage.

Thomas, W. I., & Thomas, D. S. (1928). *The child 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homas, W. I., & Znaniecki, F. (1918-1920).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Boston: Richard G. Badger.

Thrasher, F. M. (1963). *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Turner, B. A. (1981). Some practical aspects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One way of organiz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r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Quality and Quantity*, 15, 225-247.

Tyler, S. A. (198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122-1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idich, A. J. (1992). Boston's North End: An American ep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80-102.

Weitzman, E. A., & Miles, M. B. (1995).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ftware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Whyte, W. F. (1992). In defense of Street corner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1, 52-68.

Wiener, C. (1975). The burden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A. L. Strauss (Ed.),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pp. 71-80). St. Louis, MO: C. V. Mosby.

Wilson, H. S., & Hutchinson, S. A. (1991). Triangulation of qualitative methods: Heideggerian hermeneutics and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 263-276.

Zorbaugh, H. (1929). *The Cold Coast and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无所畏惧：来自生命历程和后现代的挑战 20

UNDAUNTED COURAGE: LIFE 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 威廉姆·G·蒂尔尼

是谁建造了底比斯的七扇大门？
在书中你会发现那些国王的名字。
是国王们拖起沉重的岩石吗？
当舰队沉没时，西班牙的菲力浦哭了，
他是唯一哭泣的人吗？

Bertolt Brecht,1934

约两个世纪以前，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任命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为太平洋远征队统帅。亚姆布罗斯（Stephen Ambrose）的书《无所畏惧》（*Undaunted Courage*,1996）描写了这段历程，描写了它的艰辛与苦难。亚姆布罗斯的写作获得了一片喝彩，他的书非常畅销。而刘易斯的努力却未能取得如此积极有益的后果，他在1809年秋天自杀了。

尽管亚姆布罗斯的书收录在"托马斯·杰弗逊和美国西部开发"系列丛书之中，但文本的主要关注点是刘易斯中尉。是哪种人愿意横跨他所一无所知的大陆呢？在当时军事领导权等级森严的情况下，为什么刘易斯提议他的好朋友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和他享有平等的军事指挥权呢？而且，最具悲剧性的是为什么在完成这样一件伟大探险，赢得了来自全国，尤其是朋友杰弗逊的高度赞扬之后，刘易斯却自杀了呢？

在他诗歌一般的文本中，亚姆布罗斯试图猜测刘易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些什么。他开枪自杀的地点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郊区的一个小村庄，亚姆布罗斯猜测可能他担心自己的财物情况，也可能他受酒精成瘾的折磨。或者刘易斯可能想起了他的敌人，或者回忆起了他的英雄探险行为。读者其实只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刘易斯有令人抑郁的个性人格，这最终要了他的命。

人们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阅读《无所畏惧》，对于某些读者而言，它是惊天动地的探险故事，它展开了人们的想象力，想象人们如何可能率领一支队伍横越北美大陆，然后再成功返回。杰弗逊的信仰以及美国人对征服的贪婪欲望提供了

对该书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有些读者可能将该书视为理解美国资本主义之根源的注解。人们对刘易斯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解读方式也不同。然后是刘易斯本人以及人们如何解读他。亚姆布罗斯对于刘易斯为什么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了许多合理的诠释,但漏掉了一点,请允许我对刘易斯的一生做出不同的解读。

众所周知,刘易斯是个单身汉,他爱上了克拉克中尉,刘易斯让克拉克和他一起共同指挥探险队。书中对他俩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作了详细的描写。在向太平洋进发后又返回的旅程中,探险队的所有人都感染了梅毒,除了刘易斯——他不和女人睡觉。刘易斯后来回到华盛顿和费城但在追求异性方面总不成功。事实上,他经常写一些他追求女人的故事,但朋友们从没有碰到过这些女人。另一方面,克拉克返回家乡后很快结婚了,人们很有可能作出结论刘易斯一两年后自杀是由于伤心欲绝。

当然刘易斯可能不是同性恋,也可能不是死于伤心欲绝。我既不是早期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我在这里提起刘易斯自杀的事件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当作者和读者写作和阅读生命故事时必须要讨论的。例如,在一个层面上,我发现了突出的一点,即亚姆布罗斯十分老练竟然在书中没有提关于刘易斯的性特征问题。在另一层面上,我想知道有多少非同性恋的读者愿意认为刘易斯可能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另外,在 19 世纪早期同性恋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同性恋的身份对刘易斯的影响比他与克拉克的性行为的影响更大,但它的意义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酷儿理论家所论的 20 世纪末的男同性恋那样。正如加姆森(Joshua Gamson)在本书第 12 章中所指出的,根植于后现代主义的酷儿理论"正在对性别主观性进行解构",以至于作者、主题、读者等身份绝不是统一、稳定的。

某些人可能指出,把过去(后现代主义)和处理过去所发生事件(生活故事)的方法放在一起,颇有同床异梦之感。但是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生活故事之间的关系给作者和读者提供了批判性的视野,使他们不太关注死的过去而是关注发展的未来。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Best & Kellner,1991)所指出的:

> 后现代主义理论批判了"理论反映现实"的说法和现代信仰,相反它采取"视角(perspectivist)"和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理论最好对其研究主体提出部分视角,认为对世界的所有的认知都受到历史和语言学的影响(p.4)。

的确,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其实,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不确定性,并且包含解构/重构,因此,如果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众分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混乱、混淆。正如在本章中我即将讨论的,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基于批判理论的;我反对现代主义的一些理性观点,如自治主体、话语一致、基础认识论等。为什么某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行为(例如,刘易斯的自杀)的单独的观点会被拒绝考虑,我热衷于创造一种替代性的诠释,在考虑文本形成过程中身份和研究者/作者角色的不稳定的特征下,提供一个创造性的可供选择的诠释。

那么,本章在很多方面是关于现在的历史。我调查过去的创作以把它当作对目前状况的评价。我并不寻求勾勒出后现代主义基本概念的框架,也不想为那些想研究生活故事的人提供方法论的指南;相反,在下文我首先讨论生活故事的一种形式——证词,勾画出后现代生活故事的课题应该怎样;然后,考虑记忆和历史间的差异,以作为强调事实和神话间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张力的一种方法;最后,通过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建构与叙事的方法来实现研究主题的去殖民化。在这里我的目的是给方法找点麻烦,质疑原来不成为问题的生活历史研究的各个侧面。这样做,我的意图是把类型搬到新的课题之中,搬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新的关系之中,而防止以前的"他人"的殖民建构。

生活史和证词:"我,刘易斯……"

生活史(life history)是一个对许多人而言具有多重意义的术语。施瓦特(Schwandt,1997)指出它也可称为"自传方法(the biographical method)"(p.82)。沃森和沃森—弗兰克(Watson & Watson-Franke,1985)认为"生活历史是个人以书面形式或以口头形式对他自己生活的回顾性记录,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全部或部分,它常由另一个人吐露、描述出来"(p.2)。沃森(Watson,1976)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生活史的唯一直接目的是"作为对个体自身所理解的自我经历的个人观点的评价"(p.97)。多拉德(Dollard,1935)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史是"试图在文化背景下界定个人的成长并使它具有理论意义"(p.3)。邓津(Denzin,1989)用一个图表概括各种自传方法,他认为生活史是一种"基于访谈和观察之上的、对生活的记录"(p.48)。哈奇和维斯纽斯基(Hatch & Wisniewski,1995)指出"研究者对生活故事之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分析使生活故事变成了生活史"(p.125)。

很清楚,生活史定义的变化取决于人们的立场选择。例如,如果我打算介入亚裔美国人的生活史,我可能运用自传(Lee,1990)、口述史(Lee,1991)或者生活故事(Chow,1998; Espiritu,1995)。

对于某些人而言,生活史陷入了一个分类自传框架,它的重点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被研究者与他人的关系。生活史一方面是一个文化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诠释性的文献。它可能由方法来定义(访谈法和观察法),也可能由理论视角(语义学、现象学)或者由学科(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定义。

很明显,我并不是试图形成一个人人都同意的生活史定义,而是强调围绕生活史概念的多重定义。通常,正如我在前面所列出的那些定义,人们发现并不是作者们互相不同意对方的观点,而是他们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的。

当然,如前所述,生活史和自传相联系,它是一种回顾性的记录,并且涉及某种叙事陈述形式。但是,在本章中我的目的并不是重复以前已论述过的,而是要激起研究者、读者等对下一步做什么的评论。我提出①文本的目的,②文本的真

实,③文本的作者这三个在20世纪末遭到质疑,而一个世纪以前的生活史学家则不会受其困扰的问题。刘易斯和克拉克时代也很少涉及这三方面的问题。

尽管在本章中我可以论述生活史的不同形式,我仍选择着重论述证词(testimonio)这种形式的特征。我绝不是意欲表明在做生活史研究时研究者应该只使用证词的方法,我之所以选择证词形式作为讨论的对象是因为这种生活史形式表面上对作者的侵略性最小,它是本书所讨论的方法中最直接地源于定性研究技术的。而且,正如贝弗利(Beverley,1992)所观察的,证词"本质上是一个变化多端的、通俗的形式,还不受规范的文学规则所左右"(p.93)。我希望,通过强调一种不受规范框架制约的文字形式,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考虑改变、重新组合其他形式的途径。

或许,最著名的证词案例是《我,里戈伯塔:一位瓜地马拉的印第安妇女》(*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1984)。书的开头写道:

> 我名叫里戈伯塔,23岁。这是我的证词,它不是我从书中学来的也不是自学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我的生活,它也是我的族人的证词……我的故事是所有穷困的瓜地马拉人的故事,我个人的经历是整个民族的现实(p.1)。

因为我从第一页起就开始引用,人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我提供了本书的开头部分,但是实际上本书的编者伯戈斯—德伯雷(Burgos-Debray,1984)在前言部分介绍了这项研究的形式:

> 当我们开始用磁带录音时,我先给她一份提纲,一个时间次序:童年,青少年,奋斗过程中的家庭参与……当我们进行的时候,里戈伯塔越来越跑题,在她的故事中介绍了对文化实践的描述,一般不按我要求的时间次序……实际上我变成了里戈伯塔的听众。我任由她讲述,然后,变成了她的工具,任由她将口语变成书面语(pp. xix-xx)。

证词法的形成发展主要不是源于西欧或美国,而是源于拉丁美洲。和口述史不同,证词的讲述者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其文本常常如哈罗(Harlow,1987)所言是一种"抵抗文学(resistance literature)"。证词形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密友书信。在过去的年代里,证词的主要关注点是那些被社会镇压、放逐或边缘化的人。证词常常来自那些不识字的人(Barnet,1994; Dalton,1982)。

有人可能要争论(错误地)说,证词实际上抹杀了作者的作用。在一个按传统定义的生活历史或传记中,研究者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在证词中研究者的角色似乎变成了伯戈斯—德布雷所认为的那样,是作证者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证词是一种和其他传记文献根本不同的形式。生活史的写作是通过访谈展现个人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范畴而追求对生活的理解。证词的形成是依靠希望他(她)的生活故事将促使读者采取与其所确认的群体相一致的行动的作证者。证词有一种生活史与传记中不常有的紧迫性,自传更关注的是文学结构而不是变化万千的压迫性结构。在证词中,作证者的生活直接地与社会运动和社会变迁相

联系。

贝弗利(Beverley,1992)将证词界定为"一种以书或小册子形式出现的中长篇叙述。以第一人称讲述,讲述者也是所叙述内容的真正主角或事件的见证人,他(她)讲述的单位通常是'生活'或有重大意义的生活经历"(p. 92)。因此,证词和自传或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道德或社会的动力促使主角讲述他(她)的故事。尽管证词中可能也存在许多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描述,但是文本的核心还是针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受折磨、入狱、社会动乱、求生的挣扎等。

贝弗利(Beverley,1992)认为,"证词代表着对个人主体的一种确认……但它和边缘性、压迫、斗争等群体或阶级的状况相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存在,它就不是证词而是自传了"(p. 103)。证词的作者通常不被定义为作者,而是一个和他(她)所描写的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活动家。个人并没有超越斗争或置身于斗争之外。自传常常是回顾生活,其作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讲述着生活的挑战。这些斗争可能被克服了,也可能没有,但是回顾性的叙述更有怀旧情感而不是号召采取行动。所以,如果回到我早期的立场,我们开始定义证词的时候,可能会概括出它有如下特征:①其目的是社会变迁;②其真实性是通过讲述个人的事件而创造的,这种个人事件在别的地方可能被忽略;③作者就是证人,而不是研究者。遗憾的是,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包含所有这些特征的证词恐怕不容易见到。

文本的目的

创造一个文本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确,认定他或她本身有要被发掘的知识的不受约束的现代主义作家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参与证词谈话者的目的。确实,文本的目的取决于情境问题的多寡。

例如,刘易斯是否有可能执笔写一篇证词记录他对克拉克的思念呢?他是否有可能在1809年讨论性取向的本质问题呢?假定有写作能力甚至享有特权的白人在20世纪晚期可以完成一篇关于男女同性恋者面临的压抑或残疾人必须面对的边缘化问题的证词,但是,福柯(Foucault,1973)却告诉我们,社会建构是以情境和历史为框架的。正如韦克斯(Weeks,1995,p.5)和另一些学者(Halperin ,1997; Sedgwick,1990; 本书第12章)所论述的,如果将性仅仅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排除在社会、文化范围之外,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如果那时候同性恋这种方式还没有"发明",我们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刘易斯就不可能写一篇关于其苦恼的证词。他或许不能够理解对克拉克的思念,也不能给这种思念一个名称。正如蒙特罗(Montero,1997)所指出的,性别的定义不是一种那么僵化的身份,而是和其他的身份——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民族的等,在不同的时间相互交错的一系列重复的表现。

与之相似,麦德穆特和瓦伦纳(McDermott & Varenne,1995,p. 344)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残疾"并不是一种个人状态,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它取决于人们在其中作用并形成意义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界

定身份的方式去定义过去的身份,或者和我们在文化上不同的身份。

当然,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与里戈伯塔相联系的系列可怕事件,而是要承认个体并不是自由的,他(她)不是根本意义上的行动者,也不能独立地创造他(她)自己。个人的生活总是一种建构,它嵌入了社会文化力量之中,而这种力量对某些人是限制,对另一些人却是推动。在具体情况下,不管证词是如何的有批判性,也不管我是如何急切地想让作品更加深入地介入社会变迁,我还是认为,如果作者假定个体的身份不受具体权力关系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在冒创造另一个现代主义谬误的风险。

当然,我不是在暗示研究者必须参与斗争来消除不平等。相反,正如波普克维茨(Popkewitz,1998)所指出的,所有这些作品的定义受"权力效应的影响,当权力效应在当代研究与政策中没有引起注意的时候,它可能通过对斗争所需的理论与实践规则的论述而进入并形成变迁的机会"(p.3)。这个挑战并不是要抛弃证词,而是要以特定方式介入文本,即,使作者能够通过了解讲述者、作者、读者与真实的关系来展现变迁。

文本的真实

最近,关于里戈伯塔版本的真实性引起了一片争论。斯托尔(Stoll,1990),一位人类学家,他在中美洲投入了大量时间,指责里戈伯塔的文本有好几点都是错误的。里戈伯塔说她从未上过学,但斯托尔的研究显示她的邻居说她被送到了外面的天主学校。关于她所处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上的分歧——如果她住在寄宿学校,就不可能亲眼目睹她所讲述的那些事件。而且,里戈伯塔将她父亲描写成拉丁地主与国家的牺牲品。斯托尔(Stoll,1998)访谈了里戈伯塔的家人,认为实际上她父亲的岳父、表兄弟和叔叔打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偷了他们的地(p.9)。

这样的指责造成了一片混乱。斯托尔的观点不仅仅是要求真实可靠性;相反,他转向了证词方法(通过隐喻、生活史、传记和其他方法)本身。真实的决定因素不是文本和读者。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我们判断事件不同版本的能力,替代我们实施作为学者的权威"(Stoll,1998,p.11)。面对这些,斯托尔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当 Y 对事实负责的时候,人们不应该相信某人死于 X 之手。如果某人没有亲眼目睹,他就不应该说,"我看到了一桩谋杀"。诚然,在任何文献中都需要对关于叙述与经历之间矛盾的分析进行考察与审视。

但是,人们在疑惑,是否证词中的真实应该按斯托尔的方式来界定呢?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这类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抨击与争论。格兰丁(Grandin,1998)不同意斯托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不是纯粹生造的话,里戈伯塔的证词毫无疑问地包含着夸张与矛盾。但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玛雅人是天生的政治明星,能够形成自己的政治体制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p.52)。在这里关注的是斯托尔让读者判断那些叙述是否天衣无缝,而不是通过多层过滤(multiple filters)来判断。证词——就像生活史,生活故事,自传等方法

一样——是位于一系列复杂、暧昧的政治与文化关系之中的。文本肯定要像斯托尔那样被加以盘问,但对盘问者而言,当他们发现矛盾时,最终的结果不应该是某种学究式的宣称(gotcha);相反,他们应该努力地将对相互冲突的现实的多种不同表现组合在一起。

在她关于五个女人的文本中,贝特森(Bateson,1990)实事求是地论述道:“我没有试图证明这些叙述的真实性,没有参与讨论那些内在一致性问题,没有用我对个体的认识来检验它们……这些叙述是由每个人的抉择与选择性记忆来形成的……这些都是我过去常常思考的故事”(p. 33)。这个论点和斯托尔的事实检验的经验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另外,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斯托尔所考察的事实是否错误、是否相关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运用事实来决定我们该如何思考真实性以及如何阅读文本。

例如,在日记中,刘易斯没有对同性恋有任何的叙述,这未必就意味着他在撒谎,同时,缺乏这种信息也不应该暗示刘易斯是个双性恋。双性恋的读者可能也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斯托尔立场的支持者可能义正辞严地辩驳,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变回到 19 世纪早期,而且我们发现了刘易斯是同性恋的证据,那么就需要报道它——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使事实成为事实的不仅仅是某人看到或做的行动,而是取决于谁看到了什么,何时及以何种形式被谁所报道等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事实就像一只袋子,如果里面是空的,它就不会站立起来,”波兰德罗(Pirandello,1921/1952)如是说,“为了使它可以站起来,人们不得不往里面填入理智与情感,这些东西才使它保持存在”(p. 230)。

文本的作者

从最早期的生活史到最近的一些文本(Fernandez & Gutierrez,1996;Alvarado,1987),作者的角色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如伯戈斯—德布雷(Burgos-Debray,1984),认为他们是访谈对象的“工具”,就好像他们的作用不过是一部留声机。但是我们必须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文本是单个人独创的,即使是最反映提供“证词”的个体的文本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听听克罗以伯(Kroeber,1908)所表现的对战争的描述:“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听说了战争中的伟大事迹,我决心向那些英雄人物学习”(p. 197)。克罗以伯对于所观察到的超自然力量也以一个全知者的身份作了评价,“医生通过吮吸身体,洗刷身体而治好了人们的病。印第安人的风俗是如此,他们认为要吮吸皮肤而不是咬、切或在皮肤上针灸”(p. 222)。有谁真正相信一个土著印第安人——或者说任何人——会以那种方式讲话?我们发现在这里访谈者以一种非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故事,读者也发现北美印第安人讲话的方式和读者竟然差不多。

而且,作者经常以不同方式诠释他人的口语,这主要是因为讲述者的语言是特别的。翻译总是创造性的,不同的翻译者会以不同的方式翻译同一个文本。相反,作者却越来越倾向于研究那些和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个人或群体;即,

美国黑人可能研究美国黑人,女同性恋者可能调查一个女同性恋群体等。我再次重申,不能因为作者的研究是他(她)所熟悉的就假定作者的作用是不相关的。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所有的作者、所有的讲述者都是有情境的,所面临的挑战是作者如何将他们自己置于情境位置之中。

文本永远不是仅仅由叙述者或录音机的所有者所创造,它还有许多碰巧看到故事生成的编辑决策者共同参与创造。一方面是访谈者的问题。蔡斯(Chase,1995)注意到,她所问的问题构成了她的访谈对象如何讲述、讲述什么的框架:"尽管我一再声明我对她的经历感兴趣,(访谈对象)听到的还是我把主要兴趣放在她的经历与社会学思想的联系上面"(p.7)。人们不能回避的是收集资料的个体所做的不仅仅是收集资料。正如盖尔勒斯(Gelles,1998)所问,"如果由同情,而且政治上偏向于讲玛雅语的拉丁印第安人的研究者或由瓜地马拉本土的知识分子来做类似研究的话,那么里戈伯塔的叙述又会是什么样子呢?"(p.17)。他的发现并不是说明伯戈斯—德布雷有邪恶或错误的动机,而是说任何文本都是由合力作用产生的。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是资料创造过程的参与者。

另一方面,编辑或作者也塑造着书面的资料。例如,霍恩斯(Hones,1998)就曾建议"传统口语文化(如 Hmong)中所表现的节奏反复与惯用语应该以诗的形式来体现,而不应以散文的形式"(p. 240;Tedlock,1983;Tierney & Tincoln,1997)。整个 20 世纪所应用的那些构成学术语言的形式主要源于现代主义与西方思想。有开头有结尾的主题在文本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这种形式建构他们的生活。萨里斯(Sarris,1994)所研究的一个女医生的生活史清楚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萨里斯说:"当你写一本书时就要有一个故事或思想、主题。"她回答道:"噢,我可不知道什么主题。那是别人的规则。"(p.5)

人们讲话是表达式的,用身体和面部的动作来帮助解释传达词语的意义,但是这些动作在依赖语言的文本中通常不存在。如果我们相信现在所存在的大量的生活史研究的话,那么那些生活经历被报道的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语法最正确、逻辑最合理的讲述者。他们讲话用的是完整的句子,而且他们按时间前后的顺序来形成思想观点。学术的规则有助于形成生活故事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叙述的文本不能被视为非共创性的。

莱尼哈特(Rinehart,1998)有一段精辟的小结:"我们选择怎样地研究他人和群体——怎样将他们分类——常常更能体现我们,体现我们对事物的立场,而不仅仅体现他人或群体的真实性。它更能体现研究者的真实性。"(p.201)那么,即使是在证词形式中,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文献是可以用很多形式来传播的。

这种观念可能会引起现代主义者的关注,确实,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大多是现代主义者应该关注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错误地假定这是一个事实非事实的世界,作者总是参与资料的创造,而我在暗示一切都在变动中。但是,我所知道的现代主义者中没有谁认为论述的可证实性可以不经过检验,或者因为所有的生活史都是共同创造的,所以生活史都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讲,我留给后来者的挑

战之一就是探讨人们可以怎样评价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各种文本形式。

现在,在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由不同的群体所建构的多层次的社会中,存在的挑战就是要寻找某种声音和可以促使行动产生的中介。史密斯和沃森(Smith & Watson,1992)写道,"自传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即相互矛盾、相互赞同和相互接近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在那里交叉汇合的场所"(p. xix)。这样的叙述场所充满了潜力,我们努力要做的就是去实现其潜力——下面我要探讨一下这个挑战。

在记忆与历史之间

"历史永远怀疑记忆,"诺拉(Nora,1989)写道,"它的真正使命就是压制与摧垮记忆"(p.9)。那些采用生活史、证词、生活故事、自传等形式的研究者开始都假定这些形式有助于记忆。书面文本和叙述档案在物质的层面上寻求确认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过去存在的人和事现在未必还存在。这种论调似乎太实事求是了一点——谁能够争辩说过去不存在呢?——除非在当前这个时代,人们都患了一种历史失忆症。除了被当前的意识形态力量所建构(或未建构)的东西之外,人们不能够认识群体与个人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被记忆所掩盖。过去是一片异域的土地,在那里讲述的是不同的语言,历史学家常常简单地假定历史是对模式、地方和人物的发现。

与之相联系,贝克尔(Becker,1997)指出"20世纪应用得如此广泛的历史写作的线性方法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人类的经历是按次序前进的,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每一段经历都比前一段稍微地更有意义些"(p.344)。这种方法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哪两个个体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时间里,没有哪个临时的结构可以表达所有时间里所有人的多重性的经历。

长期以来,守旧的学者们出于一些原因,赋予生活史以重要性——或许是为了创造一种怀旧感("我们曾经那样"),为了形成意识形态的形象("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或者为了在一个表面上已经去仪式化的社会里重新创造符号象征特性。20世纪末的这个社会已经充满了如此深刻的转型与革新,它一般将生活史视为飞逝的记忆。那些认为历史不过是集体记忆的人忽略了意识形态是怎样勾勒、建构并界定那些所见和(或)所不为人知的东西。记忆肯定不是历史的外在形式,相反,二者以相互建构的态势联系在一起。

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发现关于生活史目标的讨论围绕着两个相关概念:切入点(portal)和过程(process)(Tierney,1998)。生活史的研究可能被当作一个切入点、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切入点,作者和读者可以了解一个不同于他们的文化的文化。其假设就是生活史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和不同的社会现象产生联系或者使读者投入地学习、研究一个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不同的世界。

生活史的切入点研究法一般都假定作者与读者和故事的经历者是不同的。很显然,在对待作者的态度上,证词法和切入点研究法是相互抵触的。不管证词

如何被调节,故事的经历者是直接卷入证词的建构的。文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外国读者对异邦的文化有所了解,而是为了使个人去证明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生活史的切入点研究法将他人异域化,使读者了解生活的奇妙。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会给予研究者以特权,强化动态的(dynamic)权力所划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动态权力的创造是通过作者控制有关他人生活故事的文本最终形成的。

生活史可能也代表着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与读者逐渐了解他人赋予世界以意义的方式。富兰克(Frank,1995)解释道,"生活史研究者考察讲述者所运用的、使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有意义的文化脚本与叙述技巧"(p. 255)。通过运用生活史,研究者和读者都有希望反映他们自己的生活。对于他们相互的关系,对于意义创造过程中的多重现实,他们都获得了一些了解。我认为文本——生活史、生活故事、证词等——应被视为一种本体论地位的个人叙述,作为两个(或更多)个人之间的口语互动,有助于创造、界定、增强或改变现实,因此,生活史研究的过程法更容易切入后现代的框架,更有利于诸如证词等文本的形成与发展。

那么生活史文本存在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某处。记忆并不是自发的单词联想,讲述者和研究者是从对现在的共同的立场出发来构造记忆。记忆被唤起是由于对某人——讲述者、研究者——来说很重要的理由,这部分地是基于目前对由身份、社会和文化等构成的情境定义。生活史不仅代表个体的记忆,它还制造身份。对于我们研究者的挑战是要确保个体不是我们的话语目标,而是复杂、非完整、相互矛盾的身份的载体,这些身份有助于他们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转型。

不多年前,那时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将"说出沉默的生活"(Mclaughlin & Tiernty,1993)视为一种赋予被历史画卷忽略的人们声音的方法。如果人们只阅读正史,那么他们可能错误地假定美国黑人、非洲印第安人、男女同性恋和其他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在上一代人中根本不存在。当然,妇女运动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特定的、只讲述男人作用的时代的历史是偏颇和不完整的。

但是,简单地"说出(naming)"沉默的生活是不够的。是的,一般的历史和特别的生活史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在社会和那些关于过去的正式记录中被忽略的人与群体之间建立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如果我们证明了那些被正史所忽略的人物有其代表价值,仅在研究的这儿或那儿加上一点他们的声音就算完成使命了。生活史很有帮助,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增加了已然存在的混合性,还因为它们有能力重新形成身份。在后现代时期,生活史研究的目标既不是一个基于对失乐园怀旧的保守的目标,也不是一个要使更多的人在人类社会中找到其位置的自由的目标,而是要打破那些确立关于真实、合法性与身份的规则的宏大叙事的瓶颈。生活史的研究变成了干预文化成分的调查,变成了对语法的诘问和对其规范的去中心化(Tierney,1997)。在做这项工作时,生活史成功地体现了一种自由的风尚——原来排除在正史之外的群体现在被包括进来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原来那些排除在外的群体以及其他个人与群体获得了重新界定与重新描述。史密斯和沃森(Smith & Watson,1992)的相关论述在这里值得长篇引用:

> "西部的自传与文化上的造神(mythmaking)共谋——它的功能是作为一个孤立的种类,其他主题的叙述参照它来衡量和解读。在吸引所有主题参与其实践的同时,还提供了一种限制的范围或"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各主题及其不同的自我叙述形式被判断和发现。为了分开个体和他的意义,我们需要调整和重新架构我们对于传统与反传统的自传实践的理解(p. xviii)。

在对里戈伯塔的证词分析的基础上,斯托尔(Stoll,1998)争论道,该文本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的诗化。他将神话诗化界定为"一种造神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人们讲述特定的故事来为他们所偏好的对世界的诠释加以辩护"(p. 9)。当然,人们觉察到斯托尔真正担心的是神话并非历史的素材。积极的造神是一种理智的欺诈,讲述者犯错时形成神话是研究者必须实践其作为学者的权威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贝弗利(Beverley,1992)肯定地评价里戈伯塔的研究"是一种证词表达主义(expressionism),或神奇的实在主义(realism)"(p. 101)。林肯和邓津(Lincoln & Denzin,1994)将这种策略界定为"解构主义的可能性(deconstructive verisimilitude)"(p. 580),这个界定被包含在斯托尔所接受的——一个单独的现实(a singular reality)能或不能被证明的理念范围之内的。贝弗利努力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感悟,即文本是一个关于现实与其意义的政治斗争场所。林肯和邓津(Lincoln & Denzin,1994)认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再生产和解构那些建构现实的产物与刺激(p. 580)。

克里尼格(Krineger,1996)和斯蒂德曼(Steedman,1986)提供了一些介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文本。斯蒂德曼(Steedman,1986)在作品中写道,"这本书是关于诠释的,是关于那些已经给予了当前事件以意义,我们正在对其重新研究的内容所发生的场所的"(p. 5),她继续写道,"关于过去的个人的诠释——通常和官方正式的有关文化的诠释策略有着深刻、暧昧的冲突"(p. 6)。斯蒂德曼的措辞非常具有目的性、非常明确。她不是仅仅说明她的研究是对过去的重构——给沉默的生活以声音——她所表达的是其文本涉及了对过去的"诠释策略"的问题。策略之一就是历史。但是,研究者的研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引起怀旧的记忆刺激,因为如果每个研究者所做的只是引起一种无关意识形态的,对过去的追忆,那么他(她)的研究将不可能引起变革,所以,研究者的作品介于记忆与历史之间,迷失在二者的夹缝之中了。

享受阉割(Meriwether)的去殖民化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看到了关于生活史写作的各种实验形式。自

我民族志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它被应用于那种作者明显卷入其中的文本。生活故事运用的是通过故事所传达的讲述者生活中的具体片段,人们更关注的是文本可能具有的隐含意义而不是文本的精确性。贝哈(Behar,1996)写道:“生活史和生活故事正在和证词相融合。证词以接近与转变现实的关键形式见证我们的时代。”(p.27)但是,证词形式的研究者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诸如生活史这样公然受调节的文本和证词所努力要表达的在内容相接近。很显然,在证词和生活史、自我民族志等形式之间必然存在语气、风格和紧迫性方面的不同,但是,前一段时间产生的大量文本应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若干新进展,在特征上和证词的叙事结构颇为接近(Behar,1993;Broun,1991)。

我们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有不同的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不像别的文本,作者远距离地观察、访谈主体,收集对方的生活事实,然后做出“客观的”判断。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具有源于过去生活史和上文的总的评论的三个不同条件。首先,交换的现实和收集的资料是建构性的;第二个条件与声音的本质及其易受攻击性有关,索德奎斯特(Soderqvist,1991)称之为“使建构和反身具体化(embodied construction and reflexivity)”(p.145)。第三个条件涉及了为什么我们写我们所写。这三个条件和本章第一部分的讨论相联系,它们为研究者创造了将主体去殖民化和为变迁打开通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三个条件结合在一起了。研究者们抛弃任何“发现(discovering)”资料的观念,似乎资料“等在那儿(out there)”被发现,相反,他们认为资料是被创造出来的。危险也存在着,即每个条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而且作者的某种自恋情结可能主导整个文本,作者因而再造了另一个版本的帝国主义,而不是为民主变迁创造一种动力。由于作者踏上了没有方位标识的方法领域,他们不了解研究设计,但是,从上面所讨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几个条件来看,一般的方向感还是明显地具有的。

讲述故事

从后现代主义的框架出发的生活史假定其潜在的目标是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提供可证实的信息。而考虑到我所主张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就是在创造文本和表现文本的研究中接受多重的考虑,而不是把这些考虑隐藏起来,希望它们不存在或假设它们都已得到了解决。这样的话,如何分类与构造生活就成了最中心的问题。个人与群体的声音建构了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例如,大约二三十年前,关于一个同性恋的生活史可能被建构为一种对越轨的探索,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故事可能会留下一些能够展现无家可归者思想的结构性条件(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没有考察。与之相似,一个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可能被视为一种理解异质性“他者(other)”的方式,而一个白人公司总裁的生活史可能被忽略,因为他不是“他者”。后现代主义生活史的基本假设、身份是不完整的、可质疑的,有时还相互矛盾。这个立场使以前被殖民的人们——如北美印第安人、残疾人、因性取向而自杀的同性恋者的去殖民化成为可能。

现代主义者可能不同意我的这些思想。一方面,我批判那些像窥淫癖一样

追求记录边缘人群——如北美印第安人、同性恋等——生活的研究者;另一方面,我也批判我们传统文本中缺乏对边缘人群的研究。有人也许会问,那你不是把生活史学家放到了一个难堪的两难境地了吗——如果他们做(生活史研究),他们会受到学术批判,如果他们不做,也会受批判!

答案在于采取何种理论框架。最关键的肯定不是说人们必须歪曲被殖民的人们的生活史,也不是说试图理解他人是一种无结果的行为。相反,研究者必须一开始就理解身份的不完整本质,必须建造一种文本使读者可以看到作者/讲述者如何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充满相互冲突意义的身份。

在回忆录《夜幕降临前》(*Before Night Falls*, 1993)结尾之际,阿里纳斯(Reinaldo Arenas)写道,"女巫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p. 294)。经验主义者可能想去证明女巫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更有可能去考察阿里纳斯的心智状态,去解释为什么阿里纳斯有这种迷信思想。就像前面关于里戈伯塔的证词的评论一样,我认为如果不考察一下这种经验主义,研究者只回答是否有女巫存在,这将会丧失很多东西。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一部分源于研究者要逐渐地接受和他(她)们自己的不同的替代性现实(alternative realities),而不是将他们异化、将他们搬上舞台。研究者要创造去殖民化的条件,通过这样做,研究者努力以一种移情方式去了解死于艾滋病的某个古巴同性恋者的生活。这个立场重新定位了生活史学家的研究取向。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努力发现或解释女巫的存在,而且还要反映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重要,而别的问题没那么重要。研究者/作者与研究对象个人及文本的关系现在需要加以考察与分析。

使结构和易遭攻击性具体化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关于在文本中使用第一人称的讨论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尽管代表性在较狭窄的范围内依然在讨论,但是至少定性研究者的立场已发生了改变。他们原来假定在生活史研究中他们自己出现的唯一合理形式是作者缺失或通过第三人称。确实,大量近期的民族志研究成果既不主张也不运用第一人称(Denzin, 1994; Ellis & Bochner, 1996; Ellis & Flaherty, 1992; Richardson, 1998; Tierney & Lincoln, 1997)。我欢迎这个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作者的角色得到延伸,作者的声音与作品需要表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的弱点。请允许我从个人的角度详细论述这一点。

西方的知识论是由这样一种信念塑造着,即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排除情感。作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映就是将第一人称植入文本。一个人未必需要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要认识到作者可能有多种方式来运用第一人称。实际上,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太清楚自己是怎样运用自己这个另类同性恋学者的声音了,有一个自我在那里说,"我是同性恋——你想怎么样?"这是以一种耍赖的态度做出的蔑视传统的宣言,因为我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学者、读者——恨我不过是由于我是同性恋。在我自己的研究和我的生活中,我有时会运用这样一种叙事策略——我假定那些面临着类似压迫和边缘化的人可以理解产生出这

种声音来的防卫性姿态。

另一种运用自我声音的形式就是我在本文前面所表现的那样。如果读者回到本章的介绍部分,就会发现我在前文中并没有说出我是同性恋,当我提出享受阉割的性取向时我暗示了这一点。就这样,我运用了一种潇洒的学术姿态,这种姿态和运用无所不在的叙事者的现代主义姿态非常接近。"我(I)"被假定随文本而动,而作者不具有公然的侵略性。当然,还有多种另外的运用第一人称的可能性。

我认为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和我们自己易受攻击。是的,有些时候我应该是一个叛逆的酷儿(queer)男人;有时候,返回到一个著名同性恋学者的声音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有那么一个场所使我可以发出易受攻击的、感情炽烈的声音。例如,进入了新世纪,我太清楚有多少朋友由于艾滋病而失去了生命,这种失去不可改变地与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所有我的生命,包括个人的、政治的、学术的。在我们的作品中有时也需要听到这种易受攻击的脆弱声音,如果没有这种声音,我们只会去关注那个充满权力和统治色彩的一致的声音。

我赞成贝哈(Behar,1996)的观点。她写道:"由于我将自我放到了民族志图景之中,读者们感到他们在逐渐地认识我,他们倾注着自己的情感来完成对我的建构,就这样他们慢慢地确认了我,或至少确定了关于我的虚构的形象"(p.16)。如果我们的写作易受攻击,那么我们也使他人的反映易受攻击。当然,并不是每个定性文本都需要在读者那里引起易受攻击的反映,然而,有些文本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要摒弃远距离地记录资料、不参与观察者的角色,那么我们的声音必须反映出我们自己易受攻击的脆弱性。有时候我也很受困扰,因为最后使用的第一人称常接近于指出我是个同性恋者。有时候我在文本中听到作者有象征意味地讲,"各位,我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使用了!"也许是第一人称,却表现了潇洒,不参与。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为什么作为研究者和作者,我们使用这一人称。我同意,有时候我们对第一人称的运用是正确的,毕竟,正如汤普金斯(Tompkins,1993)所指出的,"要和陈规决裂就要冒不被倾听的风险"(p.26)。我们想被倾听,我们有一大堆正当理由为自己辩护,但是,如果我们想为去殖民化创造条件的话,那么我们研究的身份和声音的脆弱易受攻击性也需要被听到。

惯例与他人

我们不应该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不管研究如何有缺陷,在有些研究中我们还是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一些变化。我们在运用第一人称,使自己变得易受攻击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与责任,这涉及那些我们参与创造其生活史、生活故事与证词的个体。

当文本完成之时,作者应该具有的一个目标就是使读者明白作者是何许人。这个目标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唯一的目标。如果我在前面提及我被权力充斥的声音所困扰,即使是使用第一人称,我同样也深受一种自恋声音的困扰,这种自恋的声音歪曲了对研究对象的关注。生活史研究必须不仅仅体现作者的声音,

因为如果没有别的内容,那么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叙述的小把戏,一种语言学的伎俩,运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接近于现代主义者运用第二三人称的方式。研究者/作者控制着形势,研究对象个体在学术性讲述者的文本中再一次处于后排位置。

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像瓜地马拉的农民关于其国人被谋杀的证词那样具有社会紧迫性。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个分支却假定变迁是不可能的,或没有价值的。这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讽刺与玩弄辞藻(wordplay)。但是,在这里我所遵循的后现代主义受到了批判理论的影响(Tierney,1993,1997)。挑战变成了改变压迫性生活的愿望。生活中的这些压迫性因素使一些人沉默无语、边际化,使另一些人享受特权。没有谁不喜欢权力,但是生活史的研究应该努力去理解人们生活、工作、死亡的背景条件,因此每个参与生活史的人——研究者、故事的讲述者、读者——都有可能重新描绘他(她)的生活。

结 论

本文开始部分讨论的是刘易斯以及他是同性恋的可能性。正如我所提到的,某些读者可能对刘易斯是同性恋的"证据"不太信服。但是,我用刘易斯为例是要阐明研究者和读者对于事件和过去的人物的多重诠释。刘易斯可能是同性恋,这个想法肯定会出现在同性恋读者的头脑中——当他们仔细阅读亚姆布罗斯的文本时。经验主义者要证据,而我认为这样的证据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谬误。

然后我讨论了生活史,特别讨论了证词这种形式。许多读者可能对证词这个术语不太熟悉。我对生活史的选择不仅仅是为方法百宝箱增加一个新的工具,而且,我肯定无意去说服所有的生活史学家证词是建构生活故事的唯一合理形式。相反,主要是因为证词法还没有规范化的框架,所以它还引起了关于生活史的特别关键的讨论,我们将之归纳为生活史的三个转折点。做生活史研究,人们需要考虑①文本的目的(作者想做什么,为什么),②文本的可验证性(如何处理所表现的现实),③文本的作者(谁执笔写这个故事)。尽管我不是暗示这里有不考虑上下文或情境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我要说的是当人们诠释、建构、阅读文本时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通过讨论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我详细论述了上述几点。我认为生活史不仅仅是集体记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框架有助于界定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如何建构过去的故事。身份不是一种固定与预先决定了的东西,相反,它不断地重新创造着。在这种重新创造中,过去的历史帮助建构着未来。我还指出生活史,特别是证词,不能是简单地挖掘未讲过的故事。相反,从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如果文本不过是文学的实验或讲述未讲过的故事,那么这种文本就是失败的。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生活史偏离了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家

长作风(paternalism),它追求创造一些方法对那些被生活压迫变得沉默、被遗忘或被撕裂的人去殖民化。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任务不仅要求建构文本的新的思考方式,而且还要思考对待研究对象的不同关系和对待“他者”的不同立场。作为新生活史学家,我们需要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对于研究对象我们需要更具体的社会责任,而不能持一种超然的经验主义态度。

可能有人会指出我犯了根本的逻辑错误。我将本文的标题定为“英勇无畏”,这就是暗示着写作生活史就像两个世纪以前横穿美洲大陆那样困难和需要勇气。我也暗示刘易斯是个同性恋,暗示他被去殖民化了,这样一个曾对殖民美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现在他自己却成了去殖民化的对象。那些赞同后现主义的人也有可能批评本文标题中“勇气”一词的运用,因为我是从亚姆布罗斯关于刘易斯的书名中借用过来的。亚姆布罗斯从现代主义的立场建构了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带着“勇气”横穿美洲大陆。

勇气像声音一样有不同的形式。现代主义者认为勇气是探索未被探索的外部领土,这是一个视角。我认为这里的勇气是一种允许作者跨越边界及其自我的形式。作者放弃了关于真实或知识的浪漫主义思考,但是也接受了努力沟通差异的任务。刘易斯的现代主义勇气就是率队到达了太平洋然后又折返回故乡。

后现代生活史学家创造的文本是一个史学家、讲述者和最终读者共同的创造旅程。通过将某些个人与群体置于结构之内而将另一些置于沉默边缘状态,文本曾经这样被用于对人的殖民化。去殖民化的课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作者启蒙的任务,也不能与日常情况分离——作者、讲述者和读者就是在日常情境中发现自己。实际上,在这里所提出的该课题的下一步也许是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形成好文本的参数。

作者所具有的权力就是其形成反身文本的能力。这样的文本增加了读者对作者的了解,逐渐和故事的主人公打成一片,并且反思读者自己的生活。我所支持的这种反思性作品使作者、讲述者、读者更具易受攻击的特点。易受攻击性并不是一种虚弱的状态,而是一种能够引起变迁与社会关系的状态。

参考文献

Alvarado, E. (1987). Foreword. In M. Benjamin (Ed.), *Don't be afraid, gringo: A Honduran woman speaks from the heart.*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mbrose, S. E. (1996). *Undaunted courage: Meriwether Lewis,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Arenas, R. (1993). *Before night falls: A memoir.* New York: Penguin.

Barnet, M. (1994). *Biography of a runaway slave* (W. N. Hill, Trans.). Willimantic, CT: Curbstone.

Barrios de Chungara, D. (1978). *Let me speak! Testimony of Domitila, a woman of the Bolivian min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teson, M. C. (1990). *Composing a life: Life

as a work in progress. New York: Penguin.

Becker, M. (1997). When I was a child, I danced as a child, but now that I am old, I think about salvation. *Rethinking History*, 1, 343-355.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st, S., &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Beverley, J. (1992). The margin at the center: On testimonio (testimonial narrative). In S. Smith & J. Watson (Eds.),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women's autobiography* (pp. 91-11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rown, K. M. (1991). *Mama Lola: A Vodou priestess in Brookly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gos-Debray, E. (1984). Preface. In R. Menchú,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 Trans.). New York: Verso.

Chase, S. E. (1995). Taking narrative seriously: Consequences for method and theory in interview studies. In R. Josselson & A. Liebech (Eds.),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ow, C. S. (1998). *Leaving deep water: The liv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at the crossroads of two cultures*. New York: E. P. Dutton.

Dalton, R. (1982). *Miguel Marmol* (M. Randall & M. Argueta, Trans.). Willimantic, CT: Curbstone.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Denzin, 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ollard, J. (1935). *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With analysis of six notable docume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Flaherty, M. G.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Espiritu, Y. L. (1995). *Filipino American l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ernandez, R. V., & Gutierrez, C. E. (Eds.). (1996). *Andean lives: Gregario Condori Mamani and Asunta Quispe Huamán* (P. H. Gelles & G. M. Escobar,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rank, G. (1995). Life historie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50, 251-264.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E. Gallimard, Trans.). New York: Vintage.

Gelles, P. H. (1998, April). Testimonio, ethnography, and processes of authorship.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pp. 16-17.

Grandin, G. (1998, April). She said, he said.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p. 52.

Halperin, D. (1997). Questions of evidence. In M. Duberman (Ed.), *Queer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lives, reading cultures* (pp. 39-5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arlow, B. (1987). *Resist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Methuen.

Hatch, J. A., & Wisniewski, R. (1995).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Questions, issues, and exemplary works. In J. A. Hatch & R. Wisniewski (Eds.), *Life history and the narrative* (pp. 113-136).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Hones, D. F. (1998). Known in part: The transformational power of narra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Inquiry*, 4, 225-248.

Krieger, S. (1996). *The family silver: Essay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roeber, A. (1908). Ethnology of the Gros

Ventre.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4),196-222.

Lee, J. F. (1991).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al histories of first to fourth generation Americans from China, the Philippines, Japan, India, the Pacific islands, Vietnam and Cambodi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Lee, M. P. (1990). *Quiet odyssey: A pioneer Korean woman in America* (S. Chan,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75-5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McDermott, R., & Varenne, H. (1995). Culture as disability.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26, 324-348.

McLaughlin, D., & Tierney, W. G. (1993). *Naming silenced lives: Personal narratives and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Menchú,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A. Wright, Trans.). London: Verso.

Montero, O. (1997). Notes for a queer reading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M. Duberman (Ed.), *Queer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lives, reading cultures* (pp. 216-22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5.

Pirandello, L. (1952).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In E. Bentley (Ed.), *Naked masks: Five plays by Luigi Pirandello.* New York: Meridi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Popkewitz, T. S. (1998). The culture of redemp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freedom as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8, 1-34.

Richardson, L. (1998).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Where am I now? *Qualitative Inquiry*, 4, 41-48.

Rinehart, R. (1998). Fictional methods in ethnography: Believability, specks of glass, and Chekhov. *Qualitative Inquiry*, 4, 200-224.

Sarris, G. (1994). *Mabel McKay: Weaving the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wandt, T.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mith, S., & Watson, J. (1992). Introduction: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In S. Smith & J. Watson (Eds.),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women's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oderqvist, T. (1991). Biography or ethnobiography or both? Embodied reflexivity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power. In F. Steier (Ed.), *Method and reflexivity: Knowing as systemic social construction* (pp. 143-162). London: Sage.

Steedman, C. (1986).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London: Virago.

Stoll, D. (1998, April). Life history as mythopoesis.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pp. 9-11.

Stoll, D. (1999). *Rigoberta Menchú and the story of all poor Guatemalans.* Boulder, CO: Westview.

Tedlock, D. (1983). *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ierney, W. G.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of differenc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Tierney, W. G. (1997). *Academic outlaws: Queer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Tierney, W. G. (1998). Life history's history: Subjects foretold. *Qualitative Inquiry*, 4, 49-70.

Tierney, W. G., & Lincoln, Y. S. (Eds.). (199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ompkins, J. (1993). Me and my shadow. In D.

P. Freedman, O. Frey, & F. M. Zauhar (Eds.), *The intimate critique: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atson, L. C. (1976). Understanding a life history as a subjective document: Hermeneut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Ethos*, 4(1), 95-131.

Watson, L. C., & Watson-Franke, M. (1985). *Interpreting life histori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eeks, J. (1995). *Invented moralities: Sexual valu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证词、从属地位以及叙述的权威



TESTIMONIO, SUBALTERNITY, AND NARRATIVE AUTHORITY

⊙ 约翰·贝弗利

在一篇很著名的作品当中，罗蒂(Rorty,1985)以认识论的形式区分了他所指称的“求团结的欲望”和“求客观的欲望”：

> 有两种主要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将自身置于更宽广的空间当中，并为生命赋予意义的。第一种方式讲述了人们的生命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这里的社会可以是真正的历史的生活空间，也可以是意念上的、远离人们生存时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着许多历史或传奇中的英雄人物。第二种方式是将人们描述为生活在一个与人类无关的现实当中。这种关系并非起源于现实与人们生存的部落、国家或意想上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我应当说前一种表达方式显示了对团结的欲望，而后一种则展示了对客观性的欲望(p.3)①。

对于证词问题——证据的叙述性——近年来已经被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上了议事日程，部分的原因在于证词在生产、流通和接收上是与“求客观的欲望”和“求团结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的。

证词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通俗的和异质的形式，因此，任何一种对它的正式定义都有失偏颇②。但以下的论述或许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证词是一种小说或长篇的传记，它以被打印出来的文稿的性质而存在，并被第一个记述者讲述出来；这个讲述故事的人或许就是第一个目睹他/她所讲述的事件的人。记述的单位通常是一个“生命个体”或是一件生命历程中的大事。在许多情况下，故事的直接讲述者或者是功能性文盲，或者是受过教育但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因而证词的产生也包括了新闻工作者、民族志学者和文学家所进行的录音和编辑的工作。

---

① 罗蒂(Rorty,1985)的论述会使得读者回想起哈里斯(Marvin Harris)对 *emic* 和 *etic* 的著名解释(在他的论述当中，前者指的是有关个人和团体的“故事”，而后者则代表了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基于实践经验对事物的观察)。

② 不同的叙述形式也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充当证词，这些叙述形式包括：供认、法庭证据、口述史、纪念物、自传小说、编年史、生活史、小说证词、“非虚构的小说”以及“文学事实”。

尽管证词的一个勿庸置疑的前身曾是桑切兹(Sanchez)的儿童人种学生活史,但证词并不是对生活史(或语言史)的种属的精确测量。生活史将重点放在了口述者和记录者(如民族志学者或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上;而证词却将重点放在了直接的讲述者身上,讲述者(从实用论的角度讲)把民族志上的对话者放到了一个引起听众关注的位置上——中产阶级的氛围中——在这一氛围中,听众通常不会介入其中,因为相对于强有力的证词而言,他们是处于从属地位的①。换言之,证词并不是将原始资料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制度化。用贾拉(Rene Jara)的话来说,它是一种"紧急情况"描述——包括了压抑、穷困、边缘化、剥削或简言之有关生存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蕴涵在叙述当中的。总之,证词的性质符合女性主义的一句名言"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目前,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和跨国界的政治而言,证词的旨趣或许可以联系到1960年代的反文化,甚至也可以将口语证词视为是一种个人或集体用来宣泄和求得解放的形式。比如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意识崛起的过程,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倾诉苦痛"运动,还有心理治疗学派的倾诉疗法等都曾包含有这种形式。

证词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提供文本,并借此将声音直接传递给听众,它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要求被认可,并希望或者要求大家给予其重视。里韦罗(Rivero,1984—1985)写道,"所讲述的东西被如实地录制下来,而后被转化成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证词。这一过程精确记录了讲述者和对话者的一系列活动……它不断地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不断地询问:对吗?你在听吗?所以呢?"(pp. 220-221)。正如里韦罗所说的那样,这样将最终导致"如蜗牛爬行般"的对话方式,与讲述者的一番对话却使得读者迷惑不解,处于云山雾罩当中。

这种传递声音的方式,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人;人的欲望不是被压抑的、否定的,也不是被置于一个被排除有权力和优势地位的机构之外。因此,在证词中坚持用个人的名字或身份,比如说"我"和西班牙语的Rigoberta Menchú,以及说"我是一个青少年越轨者","让我来讲"等,都表现了这方面的思想。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了证词与自传(以及与此相关的形式,比如个人日记)之间的亲和力。正如自传一样,证词是对个人经历的权威性的肯定,但是,与自传不同的是,当自我身份与证词所讲述的群体和阶级相互分离时,证词无法对自我身份予以界定。证词抹煞了某些功能,特别是"作者"的存在,而作者又恰恰强有力地存在于西方文学和其他学术作品当中②。相比之下,自传和自传体作品——即"书写某人自己的生活"则表明叙述者已经不再处于他(她)所描述事件的边缘,也不再处于从属地位;叙述者在文化上被赋予了作者的地位(总之,是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的经济地位)。换言之,从故事的叙述者到作者这一身份的转化表明了与此相伴而来的从团体到社会,从口述文化到书面文化,以及从传

---

① 普拉特(Pratt,1986)将证词描述为"自我民族志"。

② 用巴尼特(Barnet,1986)的话来说,证词中的作者已经被当作了"编者"或者是"鼓动者"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还类似于电影的制片人。

统的集体身份到现代的个体身份界定的转化。这些转化同时标示着自由政治和经济理论主体的形成①。

证词所具有的转喻的特性——即它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还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方面,同时它也开创了叙述与读者相沟通的形式。因为它并不要求或构建一种叙述上的权威等级,证词在本质上是讲求民主和平等的一种形式。这表明任何一种被叙述的人生都有其在符号和认知上的价值。每一个证词都能激发起各种不同的声音,得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和经历的回应(第一人称的单一证词最常见的变化形式就是转化为在同一事件中有众多参与者的证词)。

如果说小说是一种固化的形式,也就是说故事和角色本身随着故事的结束而结束,那么证词相对而言则模糊了故事和历史、表象和现实、公众和私人的空间以及客体和团体的界线(见罗蒂的论述)。用埃科(Umberto Eco)的话来说,证词是一个"开放的工作"。证词的叙述者是存在于真实时空中的真实的人,并且这种真实性持续存在。证词永远不会创造虚幻,它不会将文本自动生成与日常生活的现实环境相对立的东西——这也是形式主义文本分析方法的根基。证词的出现以及它在近年来的日渐流行,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有着类似的经历,这种经历或许不被历史学、人种学或其他文学形式的主流所重视,因为这些主流形式常常是背离或者错误地体现了上述经历。

由于对声音的依赖,证词是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将文学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挑战。而性别、种族、民族、国籍以及文化权威的不平等和相互冲突又决定了证词叙述者所面临的"紧急"形势,它很可能会再造叙述者和对话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叙述者要求从不同的种族、阶级背景去为证词创造一个"有教养的"的对话者时。它首先要求去引发和记录叙述者的陈述,而后将其转化为文本,并发表和发行。与此同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应当记住,证词的叙述者并非处于从属地位,他/她是一个有机的智者(这里引用格莱姆西的术语),叙述者以从属者的地位和身份,用转喻自身的方式与权威进行对话。

与此相类似的是,证词声音的从属性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假相——有点类似于俄罗斯形式主义所称的 skaz:直接口语表达的文本模拟物。换言之,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证词的叙述者和对话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所谓的"现实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证词的叙述者运用了对公众发表演说和口语故事的形式。从叙述的霸权形式和表达上讲,对话者便是对叙述者的演说进行改编、编辑并整理成故事的人。斯科罗多斯卡(Sklodowska,1982)就此曾这样写道:

> 认为(在证词中)文本和历史是直接同源的想法非常幼稚。目击者对某

---

① "对于权威的任何声名,除了用明白的方式指出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找其他证人签字的办法也不外乎在于此列。这就是我所说的元语言是无法为人所用的,或者更格言化地说,没有其他的其他。因此,当立法者(宣称设立法案的人)试图去填补这一空白时,他也不过是在招摇撞骗而已(Lacan, 1977, pp. 310-311)。

一事件的讲述并非是其自身经历的折射，它同时也受到目击者的记忆、意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作者和编辑的意图和意识形态又进一步地驾驭着原始文本，他们可以在选材和编辑的过程中在不破坏原有文本基本风格的前提下，将原来文本修改得模棱两可、更富有书面色彩和让人难以琢磨。因此，尽管证词采用一系列的方式去增强准确性和权威性——它以第一目击证人作为证词的陈述者——但是虚幻与历史的不可融合性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见我的翻译作品，p. 379；Sklodoweka，1996）。

上述观点应该是众所周知的，我在这里或许是小题大做了。正如证词在界定生活史时（斯科罗多斯卡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证词文本统一了对话者和编辑者的观点，而非仅仅重视叙述者的一面之词。或者最好说证词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所提供的证词的现实效应。因为叙述者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将故事讲述给了对话者，证词而后又用不同于文学作品、用第三人称陈述的新闻报道或民族志作品的形式将信息传递给读者。在西班牙语中，"证词"一词包含了在法治和宗教意义上对目击者的肯定和证实。与此相反，证词的读者却好似身处于法庭中的陪审团成员。换言之，读者总是被证词所质问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证词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演说，它规范着某种道德和认识论上的要求（当我们被某人所直接询问时，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在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要求我们做出某种评判。我们有义务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回应；我们当然也可以不把它视为一种义务，但我们却无法对别人的询问视而不见）。

证词所质问读者事实上就是罗蒂所指的团结——也就是说是一种对自身身份、期望和价值给予身份界定的能力。理解这一现象就是去理解证词是如何以对话的形式去运作的，而非去理解什么是证词。

在门楚（Menchú，1984）最著名的证词I（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流派模式）中，门楚描述了她的兄弟Petrocinio被Guatemalan军队在一个叫Chajul的小城处罚的情形，这个小城也是朝拜者们每年聚集的地方。以下是她的部分陈述：

长官下命令要求把被判刑的人带走，那些犯人浑身赤裸，身体肿大。士兵将他们拖着，这些犯人已经没法儿走路了。当士兵把犯人拖到指定地点之后，犯人被排成了一排。长官首先传那些重罪犯（他们也被称为Kaibiles）。他们的着装和其他的士兵是不同的。士兵是训练有素和颇具权威的。长官传Kaibiles之后，士兵将汽油浇到了每个受刑者的身上。长官说："这并非是对他们最后的惩罚，还有一个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对这些颠覆分子的惩罚，因为这些人必须在暴力下死亡。

如果这个教训还不够的话，这一切都会发生在你们每个人头上。"这位长官试图去说服人们，但与此同时他的言论也激怒了在场的听众。但不管怎么说，士兵将受刑者排成一列，然后用火点燃他们。许多受刑者请求宽恕。有些受刑者尖叫着，更多的人则是在那里默默受刑——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呼吸已经被切断了。但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在场的

许多人都有武器,有些正准备去(农场)干活的人手里还有火棍,还有一些是赤手空拳的人。但当他们目睹士兵在受刑者身上纵火时,他们都有与士兵争斗的倾向,尽管这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尽管士兵都荷枪实弹……面对这种场面,士兵感觉到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随时准备和他们对抗了。你可以看到即使是孩子们也被激怒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他们的愤怒而已(pp. 178-179)。

上面的描述无疑是极其生动和颇具感染力的。它通过目击者的述说将读者带入了其所描述的情景之中,同时门楚的描述也使得团结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人类学家斯托尔(Stoll,1999, p. viii)发问道:"如果门楚的描述都不是真的,那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基于在对大规模屠杀可能发生的地点所做的访问,斯托尔总结说屠杀门楚的兄弟不太可能是在这种情境下发生的,门楚也不可能是她所描述的事件的直接目击证人,因而她的陈述以及她证词中的许多细节在斯托尔看来都是"神秘的夸大其词"(pp. 63-70, 232)。

更准确地说,斯托尔所展示给我们的是:门楚的一些但并非全部描述是不真实的。斯托尔并非是在置疑门楚的兄弟被军队屠杀这一事实,而且斯托尔也强调"她故事中的绝大多数重要情节都是勿庸置疑的:独裁者屠杀了众多本土的农民,其中许多受害者包括了门楚一半的直系亲属,门楚本人逃亡到墨西哥才保住性命。而后她加入了一个反抗组织去解放自己的国家"(p. viii)。但斯托尔也说门楚在其描述中的不精确和某些省略使得她无法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的述说者。为了回答斯托尔的质询,门楚自己也公开承认,她确实借用了一些其他人的经历并将其加入到自己的描述当中。特别是她承认她本人并不在屠杀她兄弟的现场,她描述的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她母亲的叙述,而她的母亲当时是在现场的。门楚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得她的描述更具有连贯性,而不至于使其成为一个有关个人的自传。但问题是:如果证词的权威在认识论和伦理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这种权威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和直接目击证人的基础上的,则正如斯托尔所说的那样:"*I, Rigoberta Menchú*,并非是这一流派中的最著名的例子,因为'我'的描述不是目击证人的描述。"(Stoll, p. 242)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斯托尔和门楚的争论并不涉及谁是真正的叙述上的权威的问题(斯托尔和门楚的争论是一个政治上的争论,它让人们误以为是认识论上的争论)。同时,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证词是如何运作的。斯托尔对门楚不满之处在于她运用了自己的行事方式。斯托尔想要门楚按照他所期望的模式去进行描述(即从民族志的角度去收集信息和进行评估),但门楚却以一个有机学者的身份进行了描述,并致力于去构建一个有关地方历史的文本——也就是在过分地强调霸权。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最著名但同时也是最生涩难懂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论述:"从属者有发言的权力吗?"(Spivak,1988)这一观点也可以换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即从属者是否可以发言——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对我们确实有重要影响力的方式去发言。这样一来,就让我们觉得必须去倾听他们,进而从属

者的地位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斯皮瓦克的论述是在表明,在民族志学者和行为主义者所持有的姿态的背后,允许和促使从属者发表言论是在构建另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是可以和我们对话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可以和这个人对话,在与其对话的同时我们自身也感到很舒服)。同时,中和现实的差异和对立又是在提升我们在全球系统中的相对权利。而斯皮瓦克的观点却是:从属者本身所包含的一个涵义就是无关紧要,不值得我们去倾听,或者即使被我们"倾听"了,也得不到我们的理解。

而斯托尔对门楚的论战却主要集中在争论门楚的证词是如何变得至关重要的。在斯托尔看来,当将门楚作为代言人的当地农民已经不再支持1980年代瓜地马拉的武装斗争之后,学术界和团结主义的行为主义者对这场武装斗争所进行的国际主义援助是非常不明智的。"在当地农民都已经不再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局外人是如何运用门楚的故事去支持它的"(Stoll, 1999, p. 24)——这是斯托尔探讨的主要问题,而不是不精确或是省略的问题。在斯托尔看来,使得门楚的故事看起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所有贫穷的瓜地马拉人的故事"——也就是说,运用证词转喻的手法——*I, Rigoberta Menchú* 错误地代表了一个存在于本土农民中的、更加复杂和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的环境。它反馈给读者的不是从属者是如何如何的,而是自以为是的幻想从属者应当是怎样的:

> 像《我》这类书,书的作者门楚是颇受赞誉的,因为这类书告诉学术界他们想要听什么……是什么造就了《我》,门楚在大学中的颇受欢迎误导了我们在瓜地马拉所发生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地理解 Guatemalan 农民,而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偶像崇拜的迷雾所包围了(Stoll, 1999, p. 227)。

当然,一方面,斯皮瓦克所关心的都市人种学的作品以及她所指称的"被驯化的他人(domesticated other)"之间的文学对话,还有斯托尔将门楚视为学术政治修正的偶像,所有这些都具有某种一致性。斯托尔的论点很明显是指向斯皮瓦克的,作为喜欢大量运用《我》的"后现代学者"的代表,门楚试图解构形而上学的存在。因此,斯托尔说:

> 正如一些文学理论家诸如塞德(Edward Said)和斯皮瓦克所说的,人类学家变得非常关心叙述、声音和代表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是如何错误地解释声音而非解释我们自身的。一些人类学家回击道:通过替换假设、证据,以及概括具有时尚形式的内省(introspection),文本的效果阻止了人类学成为一门科学(p. 247)。

或者说:"在后现代主义(它削弱了一系列的事实)和身份政治(它要求接受对受害者的宣判)的影响下,学者们在置疑一些修辞时变得越来越犹豫了"(p. 244)。或者说:"随着后现代主义对解释和权威的批判,许多学者开始摒弃求证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他们将(故事的)陈述者作为值得他们同情的受害者而逐字逐句地去进行解释时。"(p. 274)

斯皮瓦克所关心的是霸权文学或科学的代言人是如何抹煞从属者的有效存在和从属者所代表的机构的,斯托尔反击门楚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使叙述者再从属化促成了(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化权威的形成。因为在构建叙述者的论述和将叙述者自身营造为政治偶像的过程中,门楚正在从从属者的地位中解脱出来,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她正在成为历史的主体。她的证词是一种表演,而非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对话。她对叙述的选择,她的沉静、回避,都说明:如果真想说明"真正发生了些什么",那么门楚就得将她自己的陈述予以权威化。

也就是说,在任何社会场景之下,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阶级或者社会集团内部,也极有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或者互相对峙的派别。"显然",斯托尔(Stoll,1999)写道,"门楚代表了玛雅合法的声音。看看玛雅那些梦想着迁移到洛杉矶和休斯顿的年轻人,以及要养活一大家人但只有三亩贫瘠的土地因而迫切希望能得到一辆收割机以便于尽快收割的壮汉,这些人都只能够片面地代表玛雅人"(p. 247)。其他各种声音的存在使得瓜地马拉成为一个颇具本土色彩的社区——看看门楚的直系家庭,它们也是被各种各样的内部纷争所困扰的。

与此一脉相承的就是否定附属机构的存在,因为霸权计划从定义上来讲就是对意愿和行动的集合,而这种集合又是通过以削弱各种敌对力量为目的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夺权、排斥和压迫而实现的。对"多元化"的诉求实际上是将局外人(人种史研究者和社会科学家)排除于权威之外,因为只有这些局外人是能够倾听和归纳各种相互冲突的证词的。

斯托尔对于证词和身份政治的融合的论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基础上的,即多元文化的权利也蕴涵着加拿大哲学家泰勒(Taylor,1994)所指称的"等值假设"(*I, Rigoberta Menchú* 是美国不可更改的多元文化和种族融合的最好见证)。而这一假设反过来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相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主体的启蒙模式批判的不谋而合。如果真理不存在统一模式的话,那么对真理的宣称则只能是文本形式上的:这些宣称要阐明在相同的性别、种族、阶级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的情境中,人们是如何构建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和历史性记忆的。正如对证人《我》的真理性阐述,门楚构建了一个特殊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去体现从属者的声音和经历。与这一具有权威性的声音,特别是与这一声音可以充分地代表社会集合体(贫穷的瓜地马拉人)的假设相对立的是——斯托尔所期望的建立人类学和新闻学事实收集和求证权威的过程,换言之,斯托尔期望的是将门楚仅仅视为人种学数据中的一部分,并且用更客观的方法去评估她。而从定义上讲,直接的讲述者是不能提供这些评估的。但是斯托尔用以驳斥门楚陈述的最终证词也只能是其他的证词:或者说其他的声音、证人或观点。在这些声音和观点当中,斯托尔总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们算是有所了解了。而在人类对话系统之外,却没有这样一种事实层面可以保证这种或那种代表的真实性,因为社会自身也并非是先于指代而出现的,它是在不断地与指代和过度指代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也就应了本

杰明的名言"就连死者也并不安全"的深层涵义:即对过往的历史性记述也可能是支离破碎的、相对的和转瞬即逝的。因而证词对于处于从属性地位的记述而言,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战略。

如果我们仅仅将证词的陈述者比如门楚视为证人,而不将其视为具有构建自身叙述权威和争取真理和代表性的能力的主体,那么我们会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经典人类学的本土被访者。也就是说,从属者当然可以发表言论,但不仅仅是通过"我们",和通过授予权威的组织和假装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些人能够帮助人们澄清记述者所陈述的原始材料)。而是通过机构认可的权威和客观性,并将其以陈述真理的形式表达出来。从属者每天都要经历争战并在经济上受剥削,同时遭受警察和军队武装的压迫,他们的居住地也时常受到侵犯。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常有发生的。

因而一个对机构的疑问就随之而来。证词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从属者是如何代表受害者利益的,还包括它如何作为一个机构去为受害者代言。这犹如一项以称霸为旨趣的工程一样。在这项工程中,我们与自身在全球系统中的相对权利和权威在结构上是相互排斥的,证词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但它并非标志着自身的终结。对于门楚和其他一些共同构造我(I)的同盟者而言,门楚自然意识到了文本在营造人权和集合体过程中的重要性,它也很可能还在文本自身所描述的大规模屠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作者的目的并非将文本树立为我们的客体,或帮助我们了解其经历的手段;而是希望该文本引领社区和社团的旨趣,并界分作者的证词所指代的对象:"贫穷"的瓜地马拉人。这也是证词应当具有的形式,因为证词并非由我们单方面的意愿所决定。

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似乎并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这样的道理驱使我们去"漠视权益"。而"漠视权益"就意味着要求我们意识到从属文化的旨趣不在于向我们张扬其自身的从属性。如果证词的旨趣在于张扬,那么斯科罗多斯卡将证词批判为一种现状和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外衣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像 *I, Rigoberta Menchú* 这样的证词的力度就在于它削弱了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及他们所认可的文化——包括历史、文学、新闻和民族学。像任何见证人(或者说任何人)一样,门楚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在某种意义上她又与格莱姆西所指的传统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那些传统知识分子是人类和科学高雅文化的代表。他们对于证词当中从属机构以及其权威性的关注取决于知识分子及其作品是如何处理这种主导和从属关系的。

这与德秀扎(D'Souza,1991)所论述的斯坦福西部文化对本科生的要求(斯坦福将 *I, Rigoberta Menchú* 列为其课程之一)有某种相关性。德秀扎(D'Souza,1991)认为 *I, Rigoberta Menchú* 并非什么杰出之作。德秀扎(D'Souza,1991)写道:"那些庆祝被压迫者的作品,除了具有其他艺术、历史和文学评判的标准之外,还夸大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同时赋予这种庆祝以美的姿态并假装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事实上,那些被压迫者并不曾经历这些作品所描述的苦难"

(p.87)。笔者认为,*I, Rigoberta Menchú* 可以被视为过去几十年中拉丁美洲杰出文学作品的代表;但同时正如德秀扎所论述的那样,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学术界的挑战。从属性一词,从定义上讲是一种社会位置;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人文科学和大学是构造和保持从属性的机构的集合体,就认为人文科学和大学可以充分代表这种社会位置,那就错了。

笔者在这里并非要给学术和从属性划上绝对的界线,因为证词首先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介入——而从属性则不然。证词的论述严重并置了叙述者与对话者的地位,证词也是在诸如主人/奴隶这类互为反义的对话中被构建出来的:都市/边陲、国家/地区、西欧/本土、克里奥尔人/混血人、精英/普通民众、都市人/乡下人、知识分子/蓝领、男性/女性、"受过教育的人"/文盲和半文盲。然而,证词已不再是对这些具有对立意义的描述的简单文字转化,它要求我们运用一种类似于文化革命一样的途径去废黜或颠覆产生压迫、剥削以及不平等关系的状况。同时证词也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去陈述这种对立,用崭新的合作模式去描述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

再回到罗蒂关于"团结的欲望"的观点,证词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形象地代表并接纳了作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代表和人文科学的实践者的我们与诸如门楚之类的从属者之间的团结关系。证词支持了先前匿名的和默默无闻的追求明主的民众——但是它是以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以对话者/读者的身份被质询,但不失去其专业身份;并与其陈述的事件相结合(或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的形式出现的。

如果说在第一代证词诸如 *I, Rigoberta Menchú* 中,证词以民族史生活故事的形式抹煞了对话者的存在,那么"新民族论"则对对话者日渐重视,并使得对话者和叙述者的互动和交涉成为了证词所要证实的一部分。举例来说,贝哈的作品《被转换的女性——由埃斯波兰萨的故事看世界的建构》(*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1993)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民族学作品的模本,在这一作品中,民族学学者的权威性(和身份)与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主体的生活史的声音和权威是相互排斥的。与此类似的是,在《寻求尊重》(*In Search of Respect*, 1995)这一作品当中,布古以斯(Philippe Bourgois)对波多黎各在东哈勒姆的生意人所做的创新性分析时常包涵有作者的价值观与其视为友人的生意人和这些生意人的故事和对话的对立。在《事件、隐喻、记忆:乔瑞乔凹(1922—1992)》(*In Event, Metaphor, Memory: Chauri Chaura*, 1922—1992, 1995)中,研究从属群体的历史学家亚敏(Shahid Amin)追述了"地方志"所记载的发生在 1922 年印度北部一个小城的农民暴乱。在暴乱中,农民包围并且焚烧了警察署,致使 23 名警察身亡。亚敏同时也关心如何将事件的记录者正式地纳入这些历史事件当中,进而摒弃一直以来将历史学家视为万能的讲述者的传统;同时将社区中的各种声音都变成可以讲述历史的史学家。

这些构建证词材料的方法(显而易见,可以被不断地复制)表明:证词不仅仅是一个"驯化他人"的过程——正如斯皮瓦克对异议的论述;同时,还是在可能

的、基于团结的基础上的一个人(读者/或直接的讲述者)与另一个人(直接的叙述者)对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证词也体现了政治机构的一个新趋势(它本质上是斯托尔所反对的趋势),即流行的、处于前沿地位的后现代主义的联合政治;它必须是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各个政党的严重不对等基础之上的。另外,除了对自由主义和清廉政治的同情,证词还有着对联合的追求。正如索莫尔(Sommer, 1996)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证词(的性质)"是逢场作戏,而非推心置腹"(p. 143)。

参考文献

Amin, S. (1995). *Event, metaphor, memory: Chauri Chaura 1922-199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net, M. (1986). La novela-*testimonio*: Socioliteratura. In R. Jara & H. Vidal (Eds.), *Testimonio y literatur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deologies and Literatures.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njamin, W. (1969). *Illuminations* (H.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everley, J., & Achugar, H. (Eds.). (1992). *La voz del otro: Testimonio, subalternidad, y verdad narrativa* [Special issue].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Latinoamericana*, 36.

Bourgois, P.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ey-Webb, A., & Benz, S. (Eds.). (1996). *Teaching and testimo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Souza, D. (1991). *Il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Gugelberger, G. M. (Ed.). (1996).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ugelberger, G. M., & Kearney, M. (Eds.). (1991). [Special issu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8-19.

Guha, R. (Ed.). (1997). *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uha, R., & Spivak, G. C. (Eds.). (1988).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ra, R. (1986). Prólogo. In R. Jara & H. Vidal (Eds.), *Testimonio y literatura* (pp. 1-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deologies and Literatures.

Jara, R., & Vidal, H. (Eds.). (1986). *Testimonio y literatur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deologies and Literatures.

Lacan, J. A.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Menchú,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ú: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E. Burgos-Debray, Ed.; A. Wright, Trans.). London: Verso.

Pratt, M. L.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basa, J., Sanjinés, J., & Carr, R. (Eds.). (1996). Subaltern studies in the Americas [Special issue]. *dispositio/n*, 19 (46). (Contributions written in 1994)

Randall, M. (1985). *Testimonios. A guide to oral history*. Toronto: Participatory Research Group.

Rivero, E. (1984-1985). Testimonio y conversaciones como discurso literario: Cuba y Nicaragua.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Culture, 1.

Rorty, R. (1985). 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In J. Rajchman & C. West (E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pp. 3-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klodowska, E. (1982). La forma testimonial y la novelística de Miguel Barnet. *Revista/Review Interamericana*, 12, 368-380.

Sklodowska, E. (1996). Spanish American testimonial novel: Some afterthoughts. In G. M. Gugelberger (Ed.),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pp. 84-10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ommer, D. (1996). No secrets. In G. M. Gugelberger (Ed.), *The real thing: Testimonial discourse and Latin America* (pp. 130-16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80-31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oll, D. (1999). *Rigoberta Menchú and the story of all poor Guatemalans.* Boulder, CO: Westview.

Taylor, 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 Taylor, K. A. Appiah, J. Habermas, S. C. Rockefeller, M. Walzer, & S. Wolf,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 Gutmann,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参与行动研究 22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 斯蒂芬·凯米斯　罗宾·麦克塔格特

在诸多研究领域和研究场景中，研究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可能会涉及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参与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参与行动研究这个术语仅从名称上就反映出了争议，“行动研究”的标题也许最能囊括大部分研究方法，而“参与研究”又可以覆盖剩余部分的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最初使用“合作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这个术语，特别用来强调大学里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互相依赖关系。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使用“参与行动研究”术语，以承认我们的研究工作和人们在不同领域从事的“参与研究”活动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趋同性。

本章中，我们着力于介绍近年来参与行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图景。首先，我们简要描述一些重要的方法和与之针锋相对的代表性批判论点。

“参与行动研究”的领域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概要介绍几种不同的调查方法，这几种方法时常会用到“参与行动研究”这个术语。我们的概述只包括那些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有所贡献的调查方法。当然，这里所将要提到的方法内部和方法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一般争议主要围绕下面几个问题：第一，这种研究是正当的（defensible）吗？第二，“参与”如何重要，这里如何体现？第三，这种研究究竟是关注社会进步还是仅仅关注效率，没有基本价值问题吗？第四，在改善人类状况中，研究者、研究和其他社会行动者分别扮演哪些合适的角色？

尽管文中涉及的各种方法之间存在争议，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关注点，而且持久的争论在保持一定差异的同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对每一种方法的介绍首先是概述其基本要点，然后指出各种方法在实践中最明晰的位置和场景，以及标明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评论。我们以相当自然的方式提出批判意见，不规则的表述如同我们所见到那些缺陷在实际中产生的形式一

样。在末尾我们提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点,以期对这些评论的实质进行反思。

参与研究

参与研究(常称为 PR)是一种社会研究(和社会生活)的选择性哲学(alternative philosophy),这种社会研究往往和第三世界的改革联系在一起。参与研究不仅源于神学解放运动和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群(community)发展(例如在拉丁美洲),而且与人权运动有相当大的渊源关系(例如在亚洲)。参与研究的三个典型特征使之与一般研究区分开来:共享研究计划的所有权,对社会问题进行基于社群的分析和具有社群行动的倾向。鉴于参与研究致力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回应普通民众的要求和意见,参与研究方法的倡导者强调常规社会研究的政治性。他们认为,正统的社会科学尽管宣称自己是保持价值中立的,但事实上充当了为有钱人和有权者的地位和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Fals Borda & Rahman, 1991; Forester, Pitt, & Welsh, 1993; Freire, 1982/1988; Hall, Gillette, & Tandon, 1982; Horton, 1990; McTaggart, 1997a; Oliveira & Darcy, 1975; Park, Brydon-Miller, Hall, & Jackson, 1993)。

研究场景。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参与研究的人员主要来自城市中的西班牙社区和贫民窟、偏远且资源匮乏的乡村、萧条的产业、濒临失业的人群和流浪者。研究的提倡者往往是穷人中最穷的、被压迫和剥削的人,他们和大学、农业拓展机构(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cies)、社群发展组织、教堂以及工会里的激进者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从事参与研究的人员致力于从学术上将大学责任和社区工作结合起来。参与研究多被用于不同背景和不同类型的群体中,如教育、社会工作、健康关怀、自然资源管理和城市规划等。

评论。参与研究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方法缺乏科学严谨性,将社会活动、社群发展和研究混为一谈。这类实践可能会采取一定合意的手段去实现理想目标,但他们把这种实践和研究混淆起来——甚至更糟糕的是把这种实践伪装或夸大为一种研究——从这点看来,这是欺骗和操纵研究的一种基本形式。参与研究的倡导者和他们所研究的社群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联也被质疑,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种密切关联使研究者把自己看作特殊和不同的,同时使他们疏远了学术圈里潜在的同行。

人们有时对参与研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联系颇有微辞。他们认为,在确定调查研究问题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那些贫穷者、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本身,而是作为局外人的政治鼓动家。反过来却是这些弱势群体承担了进入参与研究的后果,即承担福利、生存状态有时甚至使生命受损的风险。此外,更有甚者,参与研究的提倡者被视为不满者、破坏分子而不被承认。

批判行动研究

批判行动研究(critical action research)宣称致力于将各种社会研究整合起

来:具有反思性的集体自我研究实线、语言的使用方式、地方情境中的组织和权力,以及改善状况的行动。批判行动研究在教育行动研究文献中极为常见,它是在批判课堂行动研究不足中凸显出来的。很明显,课堂行动研究缺乏一个认识教育和社会变迁关系的广泛视角。批判行动研究极力推崇研究的参与性和带有批判社会科学传统的社会分析。批判社会科学传统揭露工业社会产生的去权力化和不公平的现象。近段时间以来,批判行动研究又开始关注由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在早期曾经涉及过(Carr & Kemmis, 1986; Fay, 1987; Henry, 1991; Kemmis, 1991; Marika, Ngurruwutthun, & White, 1992; McTaggart, 1991a, 1991b, 1991c, 1997a, 1997b; Zuber-Skerritt, 1996)。

研究场景。批判行动研究计划往往包括了混合的参与群体,如大学研究者、教师和校长、课程顾问、社区成员以及其他擅长于或者对行动和调查感兴趣的人。人际关系网络非常重要,因为参与者意识到变化和创新需要广泛的支持。群体成员可以从他人那里寻找意见和建议,从而有助于获得变化发展的信息,受到启发,继而促进进一步的变化和提高。

评论。对批判行动研究的诸多评论主要来自对参与研究的批评。批判行动研究可能被视为一种将“激进”的思想置于社会场景中的“危险”工具。这种观点暗示批判行动研究使社会参与者依赖于“激进思想家”,而且怀疑社会参与者的自我理解能力是否能够独立形成批判的自我反思和解放的思想。换而言之,批判行动研究只不过是学术(家长式)话语对参与者本人参与行动和表达体验方式进行侵略扩张的另一种工具而已。类似但更为委婉的批评观点认为,批判行动研究是一种“浪漫”的追求,它过高估计了人们参与改革行动计划的意愿和能力。

课堂行动研究

课堂行动研究(classroom action research)主要指教师(通常是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通过运用定性的阐释性调查和资料收集方式,对如何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见解。课堂行动研究具有深远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时而大红大紫,时而默默无闻,这主要是因为证明其价值的理论工作大大滞后于前进中的教育实践工作。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唯有教育实践才能赋予教育行动研究以生命力(McTaggart, 1991a; Noffke, 1990, 1997a,1997b)。这种研究首先要考虑的是教师的自我理解和判断。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即强调教师和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形成的阐释模式,依照这种阐释在行动中实践着的过程。也就是说,课堂行动研究不是理想主义的实践和空想的方法,也不是仅仅关注阐释模式在“理论”上的差异,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理性观中的实践,即关注个体在面对具体情境中如何采取恰当的行动的实践。当大学研究人员进入研究中时,他们的职责是为教师提供服务和帮助。这样的大学研究人员通常认同“教师的知识(teachers' knowledge)”,拒绝承认或者主动消减对相关理论话语(如批判理论)的使用。

研究场景。正如“课堂行动研究”名称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课堂行动研究中核心参与者是教师,研究场所主要是以中学学校为背景(虽然行动研究开始越来越多运用在大学课堂里)。其他参与者可能是大学研究者,偶尔也有课程顾问和学生。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在研究中占据最核心的位置。

评论。课堂行动研究因其对教师知识的强调而遭到一些批评意见。批评者认为课堂行动研究对教师知识的重视超过了对学校正在出现的其他观点的重视。对教师知识的优先考虑隐藏着这样的假设,即课堂教学的显著提高可以离开广泛的各类社区共同体支持和社会变迁作用而实现(因而忽视教育变迁发展的文献;Fullan, 1982,1991)。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还暗示了,即使没有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和其他类似话语(大学和社团中产生的运动,而不是中学学校产生的)等理论传统资源,教师意识也可能得到提高和解放。

行动学习法

行动学习法(action learning)最先始于其倡导者里万斯(Reg Revans)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传统的管理研究方法已不能解决组织中出现的问题。里万斯早期曾和煤矿管理者一起尝试提高工作环境安全,这个经历标志着专家角色的转折——他们直接解决组织中的管理问题。

行动学习法的基本观点是使人们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彼此的经验。它强调研究个体自身的位置,辨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努力排除遇到的障碍。虽然,行动学习的倡导者肯定他们自己和管理者在行动过程中对道德意图和满意度的追求,但组织的效度和效率仍然是最核心的追求。

研究场景。行动学习法最初是用于提高管理水平,现在依然如此。但更广泛的参与也被用在其他一些场景中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行动学习最多被用在商业中(例如早期和煤矿管理者的合作),同时也用在公共事业部门(例如医院、公共住宅区),尤其应用于在努力追求所能意识到的(在许多环境中)成功合作的商业管理实践的组织中。

评论。行动学习法早期的工作开始于和煤矿管理者的合作实践。有人指出,行动学习法强调管理,强调主要施加在管理者身上的行动学习组(群体)的共同实践,这会制约引发变革的能力,也会限制对不同工作场所参与者关注的反应。这种行动学习法倾向于强调“效率”(或潜在的可征用性),忽视了价值问题、组织的社会责任,忽视对处于不同水平和不同位置的参与者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关怀的关注。也有人认为对“工作场所学习”和个体组织发展的强调否认了一种批判的观点,即较少“学习”而仅仅应用他人发明的模式,相信他人提出的理由,为他人提出的期望服务,实现他人提出的目标,表达他人倡导的价值观。行动学习法强调“解决问题”,这容易使人分散注意力,减少了对类似工作场所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的关注,同时限制了建构关于组织或行业活动的基础理论的一贯追求。

行动科学

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关注组织背景下实践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形成新的认识和提高实践水准。行动科学的研究领域系统地建构于一种关系之中,即学院式组织心理学(academic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和组织内体验到的实践性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它认同专业知识的两种形态:一是规范的知识(formal knowledge),即所有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都具备的知识和专家在接受早期学术训练时所需要吸纳的知识;另一种知识形态是用于阐释和制定规则(enactment)的专业知识。在专家"信奉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差距,而且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断裂(gap)"往往成为引发变迁的关键之处。专家们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裂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关键在于帮助专家揭示覆盖在一定位置上的"遮掩物",尤其是当参与者感到焦虑和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明显。这种方法追求"反思性从业人员(reflective practitioner)"的发展(Argyris, 1990; Argyris, Putnam, & Smith, 1985; Argyris & Schön, 1974, 1978; Reason, 1988; Schön, 1983, 1987, 1991)。

研究场景。行动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专业性职业中。教育家往往推崇这种方法,多半是因为对更对称、更互补的"临床性监督(clinical supervision)"和"反思性实践"观点的认同。

评论。行动科学面临着类似于行动学习一样的批评。这些评论主要围绕着"技术主义"展开的。参与者遭遇这样一种论断:即"所信奉的理论"和研究者所描述的"实践中的理论"是不相匹配的。其中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所信奉的理论可以充分阐明行动,但在理论和实践认知层面上存有一个基本的缺陷。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裂自动地使参与者受到局外人的干涉,尤其局外人还可以扮演消除参与者戒备心的角色。此外,这种方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主义,它使每个参与者都遭受局外人的影响,容易屈服于局外人的影响。还有评论者指出,这种方法缺乏对参与者"群体"角色构成进行清晰的说明,同样参与者群体和研究者、顾问之间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化。

软系统法

软系统法(soft systems approaches)产生于专门进行工业生产而采用所谓工程"硬系统"的组织中。软系统方法论是一种人文"系统",它类似于产品和信息流的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的定义是相对于强调假设检验的实证主义科学而言。研究者(典型的例如局外顾问)充当了在真实问题情境中作为讨论合作者或教练的角色。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些具体情境的系统模型,运用这些模型来审视情境,进而提出关于行动的修正程序(Checkland, 1981; Checkland & Scholes, 1990; Davies & Ledington, 1991; Flood & Jackson, 1991; Jackson, 1991; Kolb, 1984)。

研究场景。软系统方法被广泛运用在各种工业和公共部门组织场景中。参

与者往往包括了一个外部的管理顾问,他在对种种旨在获取发展的尝试总结经验时承担关键作用。顾问明确地遵从参与者所宣称的组织价值观,表现为一个中立的过程管理顾问。

评论。相关评论主要指向软系统方法对参与的不明确界定和顾问所扮演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角色。顾问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契约性关系)会导致顾问对潜藏在角色中利益的关注。顾问通常被描述成"促进者"或"程序管理者",评论者对顾问是一个价值无涉、中立的或者政治上冷漠的角色的假设提出强烈质疑。基于理论化的立场来看,调查的过程和组织的文献评论之间的关系微弱。一个主流的看法是,组织改革是一个过程(一次性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强调过程中信息的提供和顾问的诊断意见,但却忽略了其他实质性信息的提供或者忽略了除顾问以外其他信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

工业行动研究

工业行动研究(industrial action research)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勒温主义(post-Lewinian)在组织心理学上的影响,以及英国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the 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和美国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的组织发展。这种研究典型地受顾问的引导,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家和组织中不同层次的成员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常常用工作场所民主化的语言来表达,但最近的探索开始更加明确地追求研究行为本身的民主化,遵循参与研究取向的理论和实践。工业行动研究在近期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它从"行动科学"和对认知的强调中分化出来,更加集中于反思和追求更广泛的组织和社会变迁。虽然一些支持者主张运用批判理论来表达对工作和评估更具参与性形式的渴望,但更为常见的风格是有些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而不是"批判的"色彩。对组织社会系统的强调是普遍的,例如提高组织效度、改善雇员关系等。同时,勒温主义从变化中学习的目标仍然是一个稳定的主题。

研究场景。工业行动研究中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参与者主要是车间(shop-floor)工人、中层管理者和来自组织外部的一起参与合作的顾问。相关资料显示,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工业(或服务业)场景中,而且行动研究法为工作场所中的"民主化"带来了广泛积极的影响,这作为令人信服的证据已传播开来。

评论。有人提出,工业行动研究完全没有涉及科层制问题和工业场景的目标问题。依此观点,"参与"仅仅限制在组织中的低层人员内,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及股东被排除在组织基本价值和方向的问题讨论之外。虽然工业行动研究比工业背景下的其他形式的行动研究更加慎重地对待社会理论,但是参与研究的评论者指出,需要更加谨慎小心地采用参与研究的宝贵思想,以及一些来之不易的实践。这些实践主要指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中产生了严重的功能失调和贫穷的经历。虽然工业行动研究可能促进组织的发展,在组织的某些部门体现了

民主,但它还是令人担心,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技术员、协作者(co-operative),甚至会发展到控制实践,例如质量图和质量保证。

研究和社会实践

许多当代参与行动研究是由实践社会场景中的应用性研究扩展演变而来的,参与者承担了先前社会研究者来自场景外部的角色(Adelman, 1997; Altrichter & Gstettner,1997)。相对而言,参与研究和合作行动研究或多或少故意表现出反对传统研究实践的姿态。传统研究实践被某些参与者理解为殖民化行为,即一种规范和驯化人们的手段,使人们遵从中央机构施加于地方群体或共同体的研究和政策议程,而这种研究和政策议程已远离地方性的关注和兴趣。

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政治”的或者是“历史”的旨趣的转变。一些关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性质的基本假设受到了挑战,诸如关于社会生活性质的假设,关于谁能成为一名研究者的假设(我们将在本章后文中讨论这些问题)。建立参与行动研究的理论需要清楚阐明处于一定社会场景中的参与者在决定他们自己去建构和重建社会现实时所暗含的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赋予这种意义以正式的形态。此外需要明白参与者并不是孤立地建构和重建社会现实,而是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行动者角色。

理解这种观念转变的一种途径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从中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Fals Borda, 1979,1988; McTaggart, 1991a, 1997a; Noffke, 1990, 1997a, 1997b)。从一些支持和从事参与行动研究的研究者的视角来看,通过自传体形式或者现象学方法也可以理解这种转变。这些研究者将参与行动研究作为他们投入政治反抗的一部分,而这种政治反抗是经历着各种形式压迫的群体所进行的研究中,或者是为了他们而进行的研究中所孕育出来的一种反抗。这一类行为也存在着(Horton, 1990; McTaggart, 1999),其中有一些与参与研究的历史有关联。在本章中,我们采取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参与研究暗含的一些逻辑,建立参与者视角和社会研究方法论传统文献之间的一些关联,以此超越半个世纪以来使社会研究陷入混乱之中的“范式之战(papadigm wars)”。

正如吉登斯(Giddens,1979, p.71)在多年前指出,社会场景中的参与者不是“文化傀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行动和意图提供合理的解释,而且通常可以展示对自己处境的老练的(虽然不具有足够社会科学性)理解。此外,这些参与者不像社会理论家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理论传统中去尝试对一个场景进行理论建构。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去“看”自己的处境,而不必带着一种特定的理论化传统去“看”。事实上,参与者看事物时经常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不仅从他们自己的视角也从相关他人的视角,不仅从个人的视角,也结合场景中的“宏大图景”的视角,这意味着将本土情境和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境况联系在一起。

当参与者对事态不满意时,他们不是希望事态不该如此,而是认为他们和其他人可以一起去改变事态,这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说参与者往往意识到通过实践可以建构社会场景,而且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参与行动研究(有时也采用别的名称)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情境中,即人们深思熟虑地去谋求变化,或者说经过批判性反思后去寻求变化。参与行动研究也会出现在人们从现实主义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诸如他们此刻处于何地,事物是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进而事物在实践中如何发生变化等问题。

采取一种"现实性"的视角来审视一定情境中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实践,这通常意味着参与者用多维视角而不是只用一种狭隘的视角来看待实践。有鉴于此,社会理论家有时将参与者视为"天真的"和"纯朴的"。但我们不愿接受这样的表述。相反,我们坚称参与者一点也不"天真"。参与者的见解对社会理论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即参与者不受社会理论家观点的影响,而由自己去说出普通日常的感受,这种普通感受是可信的。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和将陌生的事物熟悉化)的过程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细微的差别:一方面是采取一种对付情境的态度,这种态度旨在揭示和暴露情境工作中的潜力(一种带着特殊视角进入情境的局外人态度);另一方面是阐明和澄清情境中要素之间的关联和紧张,这些情境中的要素是参与者自己认为可信的要素(尤其要注意参与者在先前深思熟虑中低估和贬低的关系问题)。真实性(authenticity)准则涉及一种辩证观,有时又称为"视野的熔合(the melting of horizons)"(Gadamer, 1975),即互为主体地看问题,从自己的视角和他人的视角(从内在的视角和外在的视角)看问题。

在下文中,我们将简要考察"实践"一词的含义,以此作为联系参与者的实践观点和不同理论传统对实践研究之间的桥梁。然后再审视参与者对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关系所持有的特别见解。

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

"实践"一词尽管随处可见而且人所尽知,但它的含义却决不是不言自明的。在理论和研究中,对不同的人来讲,"实践"的含义也不大相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研究者从不同知识传统出发来考察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往往将注意力投向实践的不同方面。后果就是造成理解的混乱局面。不同的理论家在如何理解"实践"本身存有分歧,由此导致他们在实践如何得以改善和实践应该如何改善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如果我们对不同实践研究中所强调的实践的五个方面进行区分,这将有助于着手厘清 "实践"理解中存有的一部分混乱。这五个方面分别是:

(1)强调构成实践的个体行为、事件和结果。这是一个局外人客观、外在的视角(参与者的个体行为呈现在一个局外观察者的面前)。

(2)强调构成实践的互动和广阔的社会物质情境。这是一个局外人客观、外在的视角(实践参与者的社会互动模式呈现在一个局外观察者的面前)。

(3)强调构成实践的目标、意义和价值。这是参与者个体本身内在的主观视

角(个体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呈现在作为认知主体的参与者面前)。

(4)强调构成实践的语言、话语和传统。这是从参与者自己话语群体成员的"主观性的"、内部的社会视角来观察。这些参与者的话语群体成员在实践中为了谈论实践,提高实践水平而必须对实践进行表达、描述、解释和评估,例如行业的话语群体成员(当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描述实践时,关于实践的语言呈现在参与者群体面前)。

(5)强调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它综合考虑了上述实践的四方面。这种观点是在历史的维度下,把实践理解为是随着时间而不断经历着反思性重构和转变的。

不同的实践研究路径往往只注意到实践诸方面中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这样的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研究实践的不同传统。基于这样的观点,即观察实践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一些人把这些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看作是互相排斥和相互竞争的;另外一些人用多元视角来看待这些不同传统,认为每一种传统在研究历程中仅仅坚持自己的方法,因而它们之间有差异但未必有竞争;有些人将这些不同传统看作是一种自说自话——彼此间不能形成互惠性的评论和争论,也就不能对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和互补地方进行深入探讨;也还有一些人持这样的观点,即关于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可以整合于更大范围的、综合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内。现在谈论不同观点如何形成一个具有概括性和一致性的综合体还为时过早,但这种对不同方法之间互补可能性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

认识论视角

不同领域中实践的研究和理论存在着多种思想流派,尽管这些思想流派在研究问题、现象和采用的方法上差别很大,但我们可以通过辨析这些差别,从而将一些关于研究问题、现象和方法的假设置于显要位置。一般而言,这些属于认识论范畴的问题,即关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事实"本质的问题。这里我们考虑的是实践的"真实性"。目前,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组划分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的二元对立:一是主要以个人主义视角来看待人文社会生活和主要以社会范畴(social realm)视角来看待人文社会生活之间的对立;二是主要以客观的视角(好比外部的视角)来对待问题、现象和方法与主要以主观的视角(好比内部的视角)来对待问题、现象和方法之间的对立。我们想指出的是,每一种划分都是虚假的二元论。如果我们不是将两分的两个方面看作是对立的,两个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而是将之看作辩证联系的,彼此互补的,都是更全面理解实践意义的必要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偏向任何一方。

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向辩证思维模式的转变可以比作是从"不是……就是……"的思维模式向"两者都是"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在下文中,这些表达形式暗含的逻辑会变得更清晰)。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暂时认为用辩证的观点超越了"个体—社会"和"客观—主观"任何一个二元对立。我们可以利用这两种区分,以此作为对实践考察的不同方法分类的基础(见表22.1)。

表 22.1 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之间的关系

焦点 视角	个体	社会	两者结合:对“个体—社会”关联性的反思辩证观
客观	(1)实践被看作是个体行为,关注其行动、事件和结果方面: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和大部分认知主义方法。	(2)实践被看作是社会互动(例如,惯例性的、系统结构化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方法。	
主观	(3)实践被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带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心理学理解(移情式理解)和大部分建构主义方法。	(4)实践被看作是社会结构化的,受话语和传统影响:阐释的、历史审美式理解和后结构主义方法。	
两者结合:“主观—客观”关联性的反思辩证观			(5)实践被看作是社会历史建构的,由权宜性行动和社会行动重建:批判理论和批判社会科学。

(1)实践被看作是个体行为,采用客观研究方式。关于实践的第一种观点主要是对实践“从外部来看”,将之视作个体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认为行为科学是“客观的”,并用这种观点来理解实践。心理学的不同传统,包括行为主义传统和认知主义传统采取这种实践观。

此观点对实践的研究采用相关法或准实验法。它很有可能使用描述性统计和推论性统计方法,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持一种工具性观点,研究的场所被理解为“第三人”(行为被改变的对象)。这种研究实践的方法很有可能在这样的时候被采用,即组织管理者通过改变系统组织的输入(inputs)、过程(processes)和输出(outputs)来引起变革,进而提出问题的时候(这个系统中人们被看作是系统要素)。

(2)实践被看作是群体行为或惯例,采用客观研究方式。第二种观点同样是“从外部来看”实践,但是从社会群体角度来看实践。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把对群体行为研究称为“客观的”。许多社会心理学视角、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视角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系统理论形式都采用这种实践观。

这种观点对实践的研究也采用相关法或准实验法,也可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推论统计,用工具性视角来看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研究场所被理解为“第三人”(行为被改变的对象)。而且,和第一种观点一样,当组织管理者通过改变系统的输入、过程和输出来引发变革,进而提出问题时,在这种时候可能采取这种实践观。

(3)实践被看作是个体行动,从主观视角来研究。第三种观点试图从“内部”来理解实践,也就是说从个体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这种观点认为,不能把人类行动(包括实践)理解为“纯粹”行为,而需要看到这种行为受到参与者的价值取向、意图和判断的影响。由于这种观点尽可能从参与者角度考虑实践这些要素,因此经常把这种观点视为从“主观视角”来看实践(虽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把这种观点归为“主观性”并不等于说这种实践研究的方法完全没有科学性主张的能力——事实上,这种观点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和传统)。心理学上有多种方法采取这种实践观(在此仅列举其中的几种:如“临床式”方法、“人本主义”方法、“格式塔”方法等)。早期关于人类及其行动研究的主流传统,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他就是建立在对动机、目的、价值和道德主张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且他把实践(实践感)理解为人们通过在既定的情境里行动而产生判断的过程,认为在真实历史环境中的行动往往是不确定的,不能借助于技术规则和原理来全部确认,但行动往往必然反映出行动者最佳的判断。这种实践观不仅出现在一些关于实践的神学作品中,还出现在某些人文哲学中。

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实践的研究一般采用定性方法(包括自传体式的、具体的现象学方法),倾向于有限地使用统计方法,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采取“实践”观点,把研究场景用“第二人称”来理解(即作为明白的、有责任感的自主性的对象——人们像研究者本人“他”或“她”一样,必须自己决定在自己所知的情境中如何行动)。那些自认为在人际关系和互动中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的人们提出研究问题时,往往采用这种实践观。他们相信要改变生活世界必须将自身及相互关系融入或者重新进入共有的生活世界场景中去。

(4)实践被看作是社会行动或社会传统,从主观视角来理解。关于实践的第四种观点也尝试着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实践,但不是从单独的个体行动出发去理解,而是把实践理解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这种社会结构有利于形成人们在情境中去理解行动或实践的方法。这也是一种主观性观点,但它也考虑到人们及其行动方法是历史形成的,他们所面临的情境是已经形成的,而且现在只有采取一定类型的行动才是合适和可能的。进一步说,这种观点也注意到必须重视人们自己的观点和他们特有的语言,这些观点和语言是在历史中和社会生活互动中形成的,即由历史性、社会性和话语建构而成。许多社会理论、社会道德哲学和许多神学都是建立在这种实践观之上的。

麦金太尔(MacIntyre,1983)对实践下了一个详细定义,记录了这种实践观:

> 实践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连贯的、综合的人类合作活动形式。人们在努力建立“卓越”标准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活动意识到活动的内在力量。人们向上超越的能力,人们相关的目标及物质的概念得到系统性拓展。鉴于这种进步,以“卓越”的各种标准来描述活动是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部分确切的(p. 175)。

麦金太尔举了实践的例子,并把实践和实践机构作了区分:

> 实践不能和实践机构混淆起来。下国际象棋、物理研究和医务工作是实践,而国际象棋俱乐部、实验室、大学和医院是机构。机构需要涉及外部物质性物品,而且以此为特征。机构需要钱和其他物质,它们按照权力和地位来建构,把钱、权力和地位作为回报来分配。它们不仅需要维持自身,而且要维持所承载的实践,否则机构将无所作为。如果没有机构的支持,实践将不可能存在。因而机构和实践形成了一种富有特色性的单因果关系。在这个因果链中,实践的理想及创新性往往受到机构目标的影响,实践对共同利益协作性关注程度也取决于该机构的竞争力(p. 181)。

这种实践观下的研究和第三种实践观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比较相似(尽管可能也会采取客观的或者批判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有那些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清楚的方法,如主张一些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相似还体现在对实践的推理的看法,以及研究者相对于被研究场景中其他人的立场等方面。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把自己不仅看作是某种社会情境下的另一个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个人类行动者,和其他行动者一起必须在社会、历史和话语已经建构的情境下的任何一个特殊时刻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他或她是和其他传统竞争的传统的一个代表(因为种种关于不同事物的具有竞争性的传统会在任何一种特定情境下同时起作用,这一点具有典型性)。就此而言,这种传统的研究很可能认为自己具有某种"政治感"——因为它所研究的情境是"政治"的。

(5)具有反思性的实践,带有辩证性的研究。关于实践的第五种观点认为,从更加自觉的意义上来讲,实践是具有"政治性"的。研究实践就是改变实践,研究实践的过程也是"政治性"的,实践的立场倾向于通过行动过程去发生改变,而行动的过程是启发个体研究实践和启发实践本身的过程。

这种实践观挑战了将前面四种观点彼此分开的二元论,即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它尝试着从事物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看每一个维度,而不是从相反对立的角度来看。因此,它把个体和社会、客观和主观看作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互相联系的方面,辩证地理解。也就是说,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和历史世界相互对立(有时甚至矛盾)又相互需要的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对另一方面有所帮助。

从这种角度来看,实践是个体在历史情境和巨大的社会互动历史网中行动而形成的,这种看法是有必要的。同样,我们有必要把实践理解为既包含客观方面(外部既定的),又包括主观方面(从内部理解和解释),只有结合两个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实践是如何真正实践的,实践是如何历史地和社会地构成的,以及如何才能转变实践等问题。这种关于主观和客观之间关系的见解有时也被描述成"反思性"的,因为改变客观条件也就改变情境被阐释性理解的方法,继而改变人们在"外部的""客观"世界中行动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们所作所为被不同地理解和阐释,其他人也以不同方式行动等。这种反思和自我反思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人类行动在历史中的动态、流动和反思的特征。在这种实践观里,参与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加入了改变历史的行动,他们很可能把研究看作是从行动和历

史中学习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他们在行动和历史里实践，而不是站在研究外面，扮演记录者、评论员或者更高层次的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角色。

因而，这种反思辩证的实践观尝试着在更大的历史、社会和话语建构和再建构的框架中为前面四种实践观寻找位置，尽力去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不仅人们的行动是由其意图和环境促成的，而且人也创造行动和历史。这种实践观旨在观察这些过程如何在研究过程本身的范围内发生。

基于这种实践观的研究往往采用具有反思性的研究方法，正如那些在批判社会科学（Carr & Kemmis, 1986; Fay, 1987）、合作行动研究和“记忆工作（memory work）”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这些方法的反思性主要体现为，它使参与者进入到自己所关注的社会变革的合作性过程中，并改变参与者进入的方式以及社会变革的进程。这种观点下的研究持有一种“解放性的”观点和研究目的，参与合作者尝试着重新实践和提高实践，以克服扭曲、断裂、矛盾和不公。它选取“第一人称”观，人们把研究的过程创建为一种合作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起改变实践，改变对实践的认识，甚至改变实践的场景。类似上述的第四种实践观，这种实践观也将研究看作是“政治性”的，但它的目标是使研究进入政治中去，在某些明确的方面去替代和重建研究背景中现有的政治。实际上，它旨在通过合作行动去改变一定背景中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文化、经济和政治）（尽管承认背景和研究的内在社会进程是和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冲突的，但这些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不会仅仅因合作研究者改变自身而中断或改变。因此研究者会结合这些“宏大的力量”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去“支持”或者“反对”它们）。

尽管其他四种关于实践的传统在它们自己的领域里是有用的，具有特定的研究意图。但对一部分人来讲，第五种传统才特别适合他们的旨趣，这部分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他们在参与合作研究中的努力去改变实践。这种关于实践的研究传统旨在使“客观”和“主观”维度，个体关注和社会关注，结构和行动，以及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楚。

此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联系（connections）”一词的意义。对实践的研究，例如对类似教育实践、培育实践或者公共管理实践等复杂的实践研究，可以说是对“联系”的研究。人们总是置身于社会、历史和话语整合而成的语言、行为、权力媒介之中，人们之间产生各种沟通性、生产性及组织性关系，这一切必须从动态和关联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少研究方法旨在探索这些联系（connections）和关系（relationships），通过参与其中，改变人们参与形式、实践、理解路径以及改变实践所在的场景。这样的一个研究传统最佳的目标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关系（impinging）”到他人的“客观”力量，而且是具有和他人共享的意图和观点的主体；不仅是按超越我们每个个体的话语形式所建构的方法行事的人，而且是在和那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人们之间互动中创造意义的人。

建构在社会物质实践上的研究传统

研究实践往往存在于社会和物质关系之中。居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立

场,我们甚至会想到用奥尔苏瑟(Althusser,1971)对实践下的一个定义来理解研究实践。"大体上讲,实践是一个将已确定的原材料转变为一定产品的过程,这个过程受一定的劳动力以及劳动方式的影响。"(Bennett, 1979, p.111)这个定义非常恰当地补充了上述五种实践观传统中的第二种(这个定义特别偏向第二种实践观)。然而它也注意到构成实践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具体方面——人和事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包括关系的符号类型和关于人的阐释和关于事物的注释之间的关系)。奥尔苏瑟对转变过程的界定包括了"原材料"、"产品"、"人类劳动"和"生产方式"——所有这些在任何特定的个案中都是确定的。我们应该问自己,运用这些术语可以描述实践中某种特定情况下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哪些要素,以及这些关系的实质(比如在教育、护理和公共管理实践中)。

方法论视角

就实践研究中不同传统的"产生方式"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考察这些传统所采用的有代表性的各种研究方法。不同的实践研究者在调查中强调实践的不同方面,依赖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这些研究方法和技术和他们所用的实践观互相吻合。也就是说,实践研究中不同的方法论视角是和关于实践本质的不同认识论视角相关的。由此,不同研究技术将各种类型的现象"建构"为它们研究(实践)的对象。表 22.2 勾勒出不同实践研究传统所采用的典型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表 22.2 实践研究不同分支的方法和技术特征

焦点 视角	个体	社会	两者结合: 对"个体—社会"关联性的反思辩证观
客观	(1)作为个体行为的实践:定量的、相关性实验法。心理测量和观察技术、测试以及互动安排表。	(2)作为社会系统行为的实践:定量的、相关性实验法。观察技术、社会测量、系统分析和社会生态学。	
主观	(3)作为有目的的行动的实践:定性的、解释性方法。临床分析、访谈、问卷、日记、杂志、自我报告及反省。	(4)由话语和传统社会性建构的实践:定性的、解释的、历史的方法。话语分析、文献分析。	
两者结合: "主观—客观"关联性的反思辩证观			(5)实践既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又是人类行动和社会行动重塑的:批判方法、辩证分析(多元方法)。

这些论点暗示了当代在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领域中关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争论。他们认为,用定量方法或者用定性方法来确定真实性和必然性的存在是不对的。有人相信研究方法和技术可以为真实性和必然性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只是一种错觉。但令人遗憾的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这种错觉。另一个极端是,一部分人认为真实性和必然性不可能获得,因此没有科学意义,只存在美学和诗学意义。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仅仅由词语、符号和想法组成,也许除了以故事或神话来打动人(例如 Lyotard, 1984)之外,其他任何有说服力的方面都无权宣称反映和表现了社会世界。这些观点的假设都是错误的,要么认为真理是确定的,要么认为真理是完全不存在的。其实,"两难困境"之外还存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真理"往往而且只能是暂时性的,往往有偏差,往往由一定的视角和物质、社会、历史的环境共同建构。它只能用互为主体性的方法,通过不断探索,以达到看起来准确、道德上公正和恰当,以及从生活中体验理解是可信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科学或者教育科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创造这样的环境,即基于互为主体性的、暂时的和有偏差的"真理"主张是可以去探求的。我们认为,在理论建构的实践中,需要从事这样一项有意义而且艰巨的工作。

在用不同途径建构实践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中存在一种自我实现的断言。他们勾勒出实践的"图像",但和所有其他"图像"一样,他们是从特定的观察角度,用所采用观察方法所规定的特定术语、特定的观察媒体(话语)体系来建构"图像"世界的。因此,举例来说,一种传统从行为方面来看实践,另一种传统从参与者价值观和兴趣来看实践,还有的传统从话语形态角度来看实践。对一部分人而言,这些视角是无法进行比较的①,而对另一部分人而言,这些视角之间可以互补。在研究方法和技术层面,我们可以确认存在一种多元的视角。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多元视角理解为暗示建立了一种更高水平的视角,即我们通过

---

① 范怀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描述20世纪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两大传统:实证主义(他提到了伽利略的世界观)和解释学(他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他的结论是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是不可比较的——但他又有所保留地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对话,暗示存在某种发展的可能"我尽力把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些进步和两大传统历史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近百年来,科学哲学如何相继归附于两种基本对立传统中的这种或那种。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实证主义,世纪更替间围绕着反实证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之后出现新实证主义;现在又转向黑格尔复兴的亚里士多德的论题。"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错觉,即认为真理会明确站在两种互相对立观点的一边。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考虑一些琐碎的东西,如两个部分都包含了部分的真理,以及在某些疑问上可以达到折中。这有可能是对的。但放弃调和与驳斥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事实,是一种很本性的对立。对于整个争论,它又进入原始的基础概念的选择中。这个选择,有人也许会说,是'存在主义的'。这种选择观没有进一步根据。"

"不过,这两种立场之间仍然有所对话,有一定的进步。当两种取向中的一种暂时占据主导地位,这往往是另一种取向遭受各种批评最激烈的结果。激烈的批评之后,出现的不仅仅是之前的一些思想的复原,而且存有所经历各种批评观点的印象。这个过程正说明了黑格尔用'aufgehoben'和'aufbewart'两个术语所描述的意思,也许翻译过来就是'替代'和'保持'的意思。处于被替代过程中的理论取向往往失去了与对立理论立场过时特征进行辩论的精力,而且倾向于将处于上升势头的立场看作是自己一种变形的影子。这就是将要出现的,例如,今天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反对'理解(verstehen)',也许有效反对狄尔泰(Dilthey)或者科林伍德(Collingwood),或者当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心理学哲学误认为仅仅是行为主义的另一种形式。"(pp. 32-33)

“三维视角”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观点以形成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虽然这种视角不能保证包括了全部、整体或者对不同视角进行了高水平整合,但至少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这些不同视角互相整合起来。

参与行动研究的实践

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参与行动研究有时主要也采用上文诸多传统中的一种。但更多的情况下,参与行动研究持一种较为综合性的实践观。这仅仅是因为处于情景中的参与者很难排除情境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参与者及其互动者观察事物的方法是没有关系的。更重要的是,参与行动研究往往更多出现在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第五种观点):参与者在实践中创造变化,又从变化中学习改造实践。

下面,以我们自己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关于土著教师教育的一个研究为例。土著教师希望探索在学校传授更多土著文化的实践。西方统治渗透在课程、教学和组织之中。兰休普依(Wesley Lanhupuy),一个土著老人,用他自己的语言概述了土著居民对这种统治的反抗,他也是一个代表他所生活的地区选民的北部地区议员。他是这样来描述土著教师所面临的问题:

> 在澳洲及其土著居民殖民化过程中,学校也成了殖民化的一部分。随着土著居民和新移民之间为争夺土地而进行激烈斗争,殖民者把学校引进并强加给土著居民。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澳洲的每一个州和区域都逐步沦为殖民地,这一切可想而知。
>
> 殖民化进程发生在北部地区生活记忆中,不幸的是,如今在我们的许多学校里,这种殖民化过程还在继续。这些学校处于困难时期,统治者利用学校公然俘获土著孩子的思想,并使他们接受占支配地位的巴兰达(balanda)文化。由此可见,在非土著的澳大利亚人努力将土著居民同化进巴兰达社会时,学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学校强烈的巴兰达文化取向,以及巴兰达教师和管理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些都不可避免会影响孩子的思想,使他们轻视土著文化遗产。现在土著居民认识到,如果学校要服务于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那么,作为一个机构,学校需要与土著社会本身相吻合。只有当学校的文化导向成为雍古(Yolngu,土著地区)文化,学校才能整合进土著居民自治运动中来。如今,土著居民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就是土著社区的学校去殖民化的问

题(Lanhupuy, 1987,p. 31)①。

由我们提出的教师教育计划得到了优秀的土著教师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大学同行的帮助,几个方面的实践已经付诸行动并发生转变:课程实践、教学实践、管理实践与社区共同体相关的实践,还有通过和土著教师一起参与来了解我们整个工作的研究实践。

随着教师和教师指导者逐渐开始明白土著社群的追求目标,学校和迪金(Deakin)大学中的课程、教学和组织实践都在发生着变化。作为此场景中的教师指导者,我们密切关注土著教师的发展进程,他们改变着自己的教学、课程和组织实践,更忠实地表达出他们自己对被他们称之为"土著教学"的理解,或者使用他们自己的四种语言:Blekbala Wei, Deme Nayin, Yolngu Rom,和 Ngini Ngininingawula Ngawurranungurumagi (Bunbury, Hastings, Henry, & McTaggart, 1991; Marika et al. , 1992; Yirrkala Homeland Schools,1996)。土著教师对他们变化中的工作进行反思,这些反思为非土著教师指导者生成的自我实践基本原理和评论提供了材料和证据(Kemmis, 1988; McTaggart, 1987, 1988, 1991b, 1991c)。参与行动研究的准则通过不同方式得以表达(Carr & Kemmis, 1986; Kemmis & McTaggart, 1988),人们认识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和惯例逐步进入土著居民和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这些都表明了实践得到提高和改善。只有理解了我们工作所处的历史位置,分析土著居民的认识,我们才能完全参与到改变工作的进程中。现在,我们尝试表述我们对实践第五种观点的界定:同时将教育实践理论和教育研究实践理论连为一体,使之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和相互挑战。

实践研究中的社会关系

实践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实践,它可以从先前提到的实践的五种类别来进行描述。此外,和其他实践一样,实践科学是建构在社会关系之中,会涉及关于实践的技术理性、实践理性和批判理性等基本原理。实践科学如何从研究行为的社会关系方面理解自身,这对于认清实践科学的类别是很重要的。

研究视角的差异不能只归结为研究手段(研究技术)的问题,也与研究者在研究行为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哈贝玛斯(Habermas,1972,1974)在试图阐明知识生产和分配的政治性和他的知识建构旨趣理论时曾经论及这一点。不同类型的研究是为不同类型的知识建构旨趣(通过研究建构和论证对知识探索的

---

① 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顶端的东北角——阿能地(Arnhemland)东北部地区,使用雍古—玛萨(Yolngu-Matha)语言的土著居民,用"balanda"这个术语专指白种人(caucasians)。雍古—玛萨语(雍古族使用的语言)中的这个术语最初是来源于另一个词语"Hollanders",土著的印尼人(马六甲人)使用"Hollanders"这个术语指侵略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同样地,马六甲人很自然就将"Holland"译为"Beland")。在澳大利亚出现白种人移民前几百年,土著印尼人就到阿能地东北部地区的沿海水域寻找海参,由此雍古族人在白种人到达阿能地之前,就从土著印尼人那里学会了这个词来指白种人。与18~19世纪白人侵略者的野蛮相比,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和澳大利亚人早期的跨文化交流十分温和而友好。

动机)服务的,他们通常建立在不同的推理之上,往往被表达为"工具"或"技术"理性,"实践"理性和"批判"理性或"解放"理性(Carr & Kemmis, 1986; Grundy, 1987; Habermas, 1972, 1974)。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技术理性一直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理性,即为达到预定目标而努力提高手段(如策略、方法或政策)的效度或效率。结果是不需要讨论的,关键是达到这些结果的手段。根据教育和社会科学的一些观点,这种理性是科学工作的核心: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提高改善实现目标的手段。教育和社会科学中这种理性的支持者经常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和自然物理科学工作本质上是连续体的,于是他们用自然物理科学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对象看作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和研究者自身一样的有理解能力的主体。

相对而言,实践理性将目标和手段都看作是有问题的。从科学角度看,它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断裂的,因此需要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实践理性认识到研究对象是有理解能力的主体,他们的行动不是由自然法则完全决定的,而是受行动者的理性观点影响——这些观点和理性会发生变化,反思性地改变着行动者的所作所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践理性被认为是我们所采纳的一种理性形式。当我们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境中行动,而且知道我们的行动和行动结果是有一些复杂,有时甚至矛盾的价值来进行判断,这时我们采纳的就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在情境中最明显的表现为"不幸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境中,行动者明知在冲突的价值中选择的结果是获得此方面认可,而被彼方面否定,但他仍必须在冲突的价值观中做选择。雷德(Reid,1978)曾经出色地描述过需要实践理性的情境。"实践问题"或者他所谓的"不确定的实践问题"是什么呢? 他这样写道:

> 首先,它们是必须要回答问题,虽然答案也许是决定什么也不做。就此而言,它们不同于学术或者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答案,或者完全不需要答案。第二点,做决定的依据是不确定的。谁也无法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应该考虑谁的利益,应该考虑哪些证据,而哪类的论点应该放在优先位置等。第三点,为回答实践问题,我们往往不得不考虑一些存在的事件。我们不可能做到从完全崭新的起点开始,难免会受到历史传统和现实存在的影响。第四点,随之而来的是,每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属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以及其他我们不能详尽说明的特殊性。第五点,毫无疑问,我们的问题促进我们在充满竞争性的目标和价值之间进行裁定。我们可能会选择最大限度满足一系列目标的手段,但这会以损失其他某些方面为代价。第六点,我们不能预测我们所选择的特定手段所带来的后果,也不能知道如果选择另一种不同手段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最后,我们决定从某个特定角度去回答问题不是依据指望它能达到最佳行动,而是依据它能引导我们预想:行动可能会导致某种理想状态(p.42)。

每天当我们面对选择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多次用到实践理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决定以及决定产生的后果会遭遇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评价。

当行动者面临实际问题必须做出决定时,有必要向他们提及科学——以及研究形式,科学的目标在于支持和巩固实践理性。它把行动者看作是有理解能力的主体,可以依据对自己感知到的情境的丰富理解而做出较为理性、慎重的决定。这种科学研究不同于那些支持和鼓吹技术理性的科学研究,它的目的不在于控制(为达到既定目的而改变实践手段)行动者或参与者,而是训练行动者或参与者,帮助他们更多理解行动的本质和结果,帮助他们权衡用什么来指导行动。

批判理性在某些方面扩展了技术理性和实践理性。它承认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在面对不确定实践问题时有必要做出决定,但它不认为问题是由行动者个体独自决定的。它的目标是理解情境如何影响人们做决定(参见雷德上文提到的"不确定实践问题"的第三个特征),以及思考事态可能被如何重建,未来的情境可能发生改变——这可能导致行动者依据当前外在的事态而做出不同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说批判理性也涉及技术理性中关于实现既定目标所采取手段方面的内容,但它也会考虑影响事态发展方向的种种目标,以及会依据结果来判断这些目标的适当性(例如,考虑教育目的的表达方式和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方式在历史结果方面是否合适)。特别是,批判理性会根据结果来评价情境——主要从实践后果对那些参与改变情境和由情境改变而受影响的人们的非理性、不公、偏离或不令人满意的程度方面来评价。基于此,批判理性旨在帮助参与情境和受情境影响的人们去确认、面对和共同克服产生那些意外后果的情况。虽然如此,正如实践理性一样,批判理性也不可能详尽描述出具体情境,或者不可能完全肯定地预测出他们行动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技术理性、实践理性和批判理性在社会关系不同模式中得以实现,这些社会关系主要指进行推论的人和推论所指对象,如人、社会系统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严格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但在目前人们热衷于发展、改革、转化或者转变实践的情境下,工具(技术)理性的实践方法所存的预设是,思考实践的人和实践参与者(其他处于变化中的环境或系统中的人)的关系是"第三人称"关系,实践理性方法预设"第二人称"关系,批判(尤其是解放)理性方法预设"第一人称"关系。

在关于实践的技术理性中,研究者对实践场景中的一切持一种客观态度,把它们视为一个"系统"中的要素。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一开始就倾向把实践场景中的事物视为"他们"——即"第三人称"。如同常见的社会研究一样,一些行动研究(例如,行动学习和行动科学的一些案例)采用这种"第三人称"的实践观。他们把实践看作是一种战略性行动——一种实现目标的途径。依此观点,进入实践中的研究的作用是改变和提高实践,作为实现既定目的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它对研究目的持技术或工具性观点。

在关于实践的实践理性中,研究者对实践场景持一种比较"主观"的态度,把情境中的参与者及其他看作是共同的生活世界的成员——像研究者自身一样,作为有理解力的主体,不仅是"他者"而且也是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的行动者,应

该受到关注。研究者把这些“他者”作为“你们”——即第二人称。同样在一般的社会研究中,一些行动研究采用这种“第二人称”观点(例如,教师研究的一些案例)。他们把实践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充满参与者的价值和意义。由此看来,进入实践中的研究的作用是训练参与者,提醒他们在特定案例中对实践的本质和实施进行实践性的深思熟虑。它对研究目的的看法是带有实践性观念的。

在关于实践的批判理性中,研究者对实践场景持辩证的态度,关注场景的主观和客观方面,个体和社会方面。从这种观点来看,研究者把场景中的其他人看成是合作参与者,通过他们每天参与场景的建构和重建的实践,他们可以一起工作来改变他们建构场景的途径。因而,研究者倾向于把这些群体成员看作是“我们”——即第一人称。在一般的社会研究中,一些行动研究(例如,批判行动研究和参与研究的一些案例)采用这种第一人称(尤其是第一人称复数)观点。他们把实践看作是话语、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此外通过参与者行为和有目的的行动实现的。但是他们不把实践看作是仅仅由参与者产生的,而是或多或少认为参与者进入实践时,已经部分地受到所处情境中的话语、社会关系和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研究进入实践的目的在于改变实践、参与者和实践背景(或者我们可以说,改变工作、工作者和工作场所)——因为改变实践不仅需要改变行为或者有目的的行动(包括参与者理解实践和实践场景的方式),也需要改变实践实施的场景。

这些理性形式,在场景的社会关系上松散地和“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联系在一起,对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所暗含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上,各自表明对变化过程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一般来说,工具(技术)理性宣称自己是一种系统的、制度的和控制的态度——集中在社会场景中“系统”方面(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抽象、概括而且无实质性的方法)。相比较而言,实践理性宣称自己的态度是重视在共有的社会场景中对做什么进行明智而谨慎的判断(被认为是一种局部的、具体的和历史性特别的方法)。而批判—解放理性宣称自己的态度是共同反思、建构理论以及直指对背景进行解放重建的政治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比较辩证的方法,包括个体和政治的建构与被建构,本土和全球的建构与被建构)。

前面两种方法,即工具性和实践性的方法是和 19 世纪末西方的社会理论、政策以及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在 20 世纪,这两种方法却在尖锐对立的社会理论、政策和实践中分离开来。第三种方法,批判方法,出现在 20 世纪早期(对应于马克思理论出现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自觉尝试着去克服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开放的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两级化的趋势。但如果认为批判方法已经真正成功,那这就错了。从某种实践意义角度来看,克服这种两级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 21 世纪初,所有这三种方法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许多人还明显地反对、排斥其他观点,因此当代关于社会变革的本质和目标的争论依然持续混乱和充满政治化的色彩(从狭义上讲),各种观点的支持者相互争夺着各自理论、

政策和实践的领域。

我们在表22.3中,提供了实践研究中不同研究传统的“地图(map)”,包括了不同知识建构旨趣类型的一般性共同点。

表22.3 不同研究传统和不同知识建构旨趣之间的总体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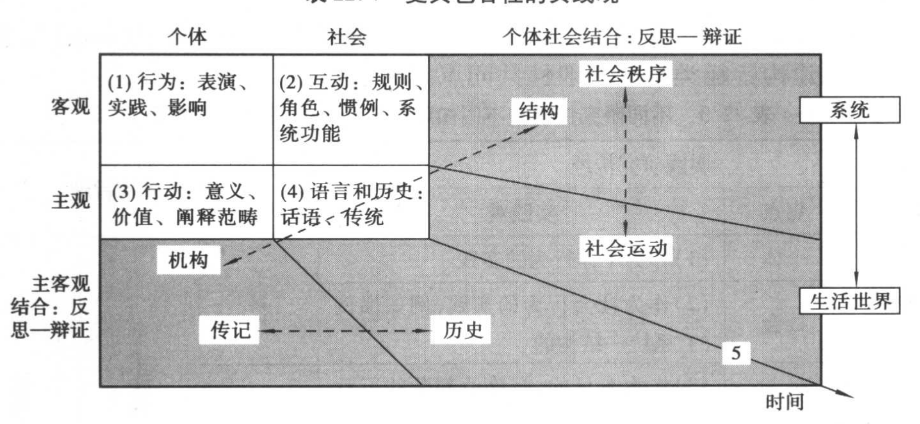
<table>
<tr><th colspan="3">实践研究传统</th><th colspan="3" rowspan="2">知识建构旨趣</th></tr>
<tr><th>视角</th><th>焦点</th><th>实践观</th></tr>
<tr><td rowspan="2">客观</td><td>个体</td><td>(1)作为个体行为的实践</td><td rowspan="2">工具性</td><td rowspan="4">实践性</td><td rowspan="5">批判—解放性</td></tr>
<tr><td>社会</td><td>(2)作为社会行为的实践,例如惯例的、系统—结构的</td></tr>
<tr><td rowspan="2">主观</td><td>个体</td><td>(3)作为有目的、有价值判断的行动的实践</td><td rowspan="2"></td></tr>
<tr><td>社会</td><td>(4)作为社会建构的、话语和传统塑造的实践</td></tr>
<tr><td colspan="2">结合“主观—客观”、“个体—社会”关系的反思辩证观</td><td>(5)作为社会、历史和话语建构的个体行动和社会行动的实践</td><td colspan="2"></td></tr>
</table>

不同实践研究传统的调和

关于实践的不同研究传统关注实践的不同方面。最初,我们认为探索这些传统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具有可能性,但是不必将这些传统所采用的典型研究方法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因为每一种方法或技术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盲区,而且各有自己独特阐释实践的途径。换一种思路,我们建议应该去发现理论化实践更具包容性的路径。现在,我们提出一种有可能进行这种理论化建构的方法。

在表22.1和表22.2中,我们已概括了不同实践研究传统之间的一些关系。在表22.4中,我们再将这些关系置于多种实践的维度中,这些维度互相联系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践观内。这里所提出的实践观,让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真正的实践,如果我们从前面概括出的实践的五方面的角度去理解,那这是比较复杂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途径,参考表22.4所描述的三个空间维度(正如我们即将要看到的那样,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被认为通过行动研究“在改变实践的过程中表明自己的态度”)。

表 22.4　更具包容性的实践观



在《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第二卷标题为"生活世界和系统:对功能理性的批判(*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一文中,哈贝玛斯(Habermas,1987b)明确指出社会理论的不同流派之间缺少联系。哈贝玛斯并不强求理论观点和范式之间的容忍度,而是为一个新社会理论观点辩护,这个新观点认为可以将当前围绕"当代社会现象"①争论不休的各种观点整合起来。他的论点使他提出一个"双层(two-level)"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克服已有见解的片面性:

> 如果我们不考虑并不十分复杂的行为主义,那么现在关于现代社会的现象有三种主要的研究思路(这里他指的是:①结构分化理论,主要对现代社会发展关于劳动、结构和功能典型详细分类的途径进行一定程度的描述性说明,而不是解释性说明;②系统—理论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从系统功能和结果角度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功能;③行动理论方法,典型的解释社会学,从行动参与者体验经历到的角度来解释现代社会——在最坏的情况下,从现代社会的"受害者"的视角来解释)。我们甚至不能说它们之间有竞争,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几乎不对话。
>
> 理论相互对比的努力并没有带来相互之间的批判,成熟的批判可以加深一般的理解,这种成熟的批判在这些不同理论之间几乎没有得到发展,最多在一两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相互之间的生疏,这就是:由于它们都是某种片面性抽象的结果,而这种抽象在无意之中割断了构成现代社会的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因而,各种方法对应的对象没有进行接触(pp. 375-376)。

实践研究的不同方法和传统遭遇了哈贝玛斯在社会理论中所指的那种相互

---

① 注意,这里哈贝玛斯提到的是现代社会的"单个现象(phenomenon)",而不是"许多现象(phenomena)"。这是因为他所感兴趣的理论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形式——社会形成特定阶段的产物和塑造社会生活特定模式和动力学的框架结构。

不理解(隔离)——这种隔离近似地建立在关于实践研究的对象域的不同见解之上。对象域是依据实践研究的不同范式和传统建构的,表达了实践理论和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现象的不同观点,各自采取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被认为最符合所关注的问题和对象。

我们从体现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的三个维度矩阵来描述这种差别:第一,个体、社会和包含个体社会的反思性辩证观维度;第二,客观、主观和包含主客观的反思性辩证观维度;第三,时间和历史维度,也可以表述为共时态(synchronic)、历时态(diachronic)和包含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反思性辩证观维度。虽然哈贝玛斯不是从这三个维度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理论,但他对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表述提供了认识社会变迁以及改变社会和教育实践过程的一种崭新视角。

基于自己在《交往行动理论》(1987b,pp. 113-198, 374-403)中清楚阐明的理由,哈贝玛斯认为他所讨论的三种方法(结构分化理论,系统—理论方法和行动理论方法)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不能完整解释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问题。他提出,结构分化理论不能有效区分现代社会两个不同领域的动态差别,而这对于理解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一个是系统观中的社会(不严格地说,就是从社会的制度、结构和功能来看社会——好比我们从角色和功能角度来看我们活动),另一个社会是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不严格地说,就是从我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局部场景,我们自己、我们的合作参与者、家庭、工作场所、邻里等背景关系的意义来看社会)。结构分化理论采用整体描述性方法混淆了这些方面,这种方法试图从整体上来理解社会,而没有从系统和生活世界互动的视角去完成区分,继而不能联系地看待区分的模式及变化。

其余两种主要的方法具有局部的偏爱——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系统—理论方法主要从系统整合的视角来论述现代社会的社会生活(参见 Giddens, 1979),它主要参照社会系统中各种日渐复杂的功能。这样做它忽略了所论述的社会生活中参与者的观点。哈贝玛斯认为那些系统理论方法的倡导者是通过限制或放弃传统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以此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体系。因此,

> 一旦系统功能主义“净化”了社会学传统的“杂质”,它就变得对社会反常现象不再敏感了,而这是在社会整合行动的领域中主要关注的对象。系统功能主义将沟通结构化的生活世界的变迁提升至媒体动态水平(media dynamics)。从观察者角度,通过吸收同化它们来打破系统间交换平衡关系,从而剥夺了身份—危机畸变的意义,这是从参与者视角来看变迁历程(p. 377)。

相比较而言,行动理论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整合的视角,依据社会生活中的参与者解释和体验他们的世界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生活。有时,

> 浓缩成从牺牲者角度书写的历史片断。于是,现代化所呈现出来的是人们所遭受苦难的样子,这些人必须为新生产方式和新国家秩序的建立付出代价,这些新生产方式和新国家秩序是从生活传统和形式中分裂出来的。这种类型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解,促进我们进行批判性

回忆……但是它很少考虑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内部系统动态,也很少考虑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结构逻辑。因此,亚文化折射和反射出现代性的社会反常现象,保留了一些不可理解事件的主观和偶然性特征(p. 377)。

哈贝玛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为自己建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二阶"理论("two-level" theory),这个理论可以避免系统化的局限性——要么混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动态性,要么优先强调系统观点或者优先强调生活世界观点等(Habermas, 1984, 1987a, 1987b, 1990, 1992;评论观点也参见 Bernstein, 1985, 1992; Fraser & Nicholson, 1988; Honneth & Joas, 1991; Honneth, McCarthy, Offe, & Wellmer, 1992; Rorty, 1985, 1989; Thompson & Held, 1982)。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哈贝玛斯通过重新建构社会理论先驱选择的核心概念开始这项工作,这些理论大师包括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帕森斯、米德。

我们发现促使哈贝玛斯进行辩论的是关于"现代社会现象"研究的三种主要当代方法不能为彼此提供互补性的批判——实际上,它们之间甚至不能称作竞争者,因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域。早前,我们试图说明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选取了相应不同的实践观作为研究对象域。对哈贝玛斯来讲,克服社会理论中主要方法片面性的一种方法是确认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现象中的关键性要素。他所提到的三种主要方法(结构分化的理论、系统理论和行动理论)的资源可以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角度进行重建。这样,每一种方法都可能为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的全部问题提供相关的资源。

我们认为教育理论和研究也可以从系统—生活世界区分中受到启发,因为这种区分阐明了当代教育实践和政策中的一些紧要问题——它甚至点明了教育实践研究(大多数时候使用行动理论观点来进行研究)和教育政治研究(大多数时候使用系统理论观点来进行研究)方法之间的一些典型差异。当代一些教育理论(例如关注教育的历史和社会形式,关注特定元话语和知识权力结构所支配下的当代教育政策和实践的调整)提出了类似结构分化理论使用的方法,这样说也可能是事实。依照哈贝玛斯的观点会引来争论,这些教育理论不能完全区分植根于系统功能的社会动态和植根于生活世界过程的社会动态。

在我们看来,教育的社会形态——在实践和政策中是一个大量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动态消退的重要领域。而交往行动理论看起来有希望建立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以解决将来出现在教育理论和研究实践政策中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也提供了理解参与行动研究本质和操作的基础。虽然很少有参与者会运用这些理论,但我们坚持主张:一方面,参与者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看作是由塑造和限制行动的系统结构和功能构成的,他们改变实践的努力必须包括面对和重建社会世界的系统;另一方面,参与者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理解为是通过生活世界中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社会化—个性化的过程而塑造的,他们改变实践的努力必须包括改变这些过程的实质内容。此外,参与者还认识到,社会世界的系统和生活世界两方面之间存在着紧张和联系,每一方面都形塑和限制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改变他们的实践还必须包括考虑这些紧张和

联系的本质和内容。

参与行动研究是一种"局内人研究"形式,参与者在两种思考位置中变换:一种是从"局内人"视角看待自己、自己的理解、实践以及实践的背景,这种"局内人"视角是一种私下的甚至"自然"的方法,可能受制于局内人特有观点的偏见;另一种是从"局外人"视角来看待自己、自己的理解、实践以及实践的背景(有时采用一个抽象、想象中的局外人视角,有时尽力从场景内和场景周围真实存在的个体或角色扮演者的视角看),这种视角既没有局内人的偏见,也没有"局内人知识"所带来的优势。在这些视角中切换,使局内人带有批判审视的距离——这种批判视角源于让局内人思考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可能性和真实性。

对许多研究方法论者而言,这种交替观太容易出错,以至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基础。他们不会将参与行动研究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因为只有局内人才有可能获得"局内人知识",才可能将内部知识和外部观点进行对比,社会研究中选择的方法往往是参与行动研究——当然这需要参与者教育和自学进程的发展,这才能使参与者具有批判性启迪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教育过程的目标是产生符合常规学术研究的社会研究人员,更确切地说,使参与者可以提高能力,更好地在表 22.1 中所提到的观点中切换,即结合以下几种角度来看他们自己、自己的理解、实践和实践的背景:从场景中和场景周围的个体的视角,然后从社会的视角(既包括系统整合又包括社会整合,结合系统和生活世界两方面);从"主观/局内人"视角和"客观/局内人"视角;从关注"事物怎么样"的共时态视角和关注"事物如何形成"、"事物将会怎样"的历时态视角。简而言之,在参与行动研究中,参与者可以从三个维度去提高足以探求社会世界所必需的能力和复杂的技艺,表 22.4 以图表形式呈现出来的三个维度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观点。

参与者观点不仅仅是场景中一个特有的视角,也是组成场景中大部分社会生活意义上的一种视角。尽管如果要改变参与者、参与者的理解、参与者实践和实践的背景,改变外部的结构和功能是必要的,但如果参与者不主动改变自身、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实践和实践的背景,这种改变将是不可靠的。参与者转变是社会变迁(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定参与行动研究是旨在促进社会和教育转变的社会和教育研究的一种首选方法——当然我们也承认从事参与行动研究,把参与行动研究做好的条件和环境并不总是能够获得。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那些除了参与行动研究外致力于社会和教育变迁的研究经常采用类似参与行动研究使用的方法,即促使参与者反思他们自己、自己的理解、实践和实践背景。就此意义而言,社会和教育研究有可能被参与者认为是合法的,保证他们的赞成和承诺。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研究忽视了参与者观点或将自己观点(过程或发现)强加给参与者,这有可能被参与者认为是非法的,加深了异化或者敌对,由此引发反抗。

参与行动研究是"可靠"的研究吗

在前文中,我们概括了一些实践研究中不同传统的典型认识论观点(表

22.1)和方法论观点(表 22.2),以及相关的研究目的(知识建构旨趣,参见表22.3)。我们指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实践研究的不同观点在这些表格中占据不同的位置,类似地,不同类型的行动研究对实践的本质和实践研究目的存有不同观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实践本质的更具包容性的观点(表 22.4),这种观点可以将实践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起来(将客观和主观,个体和社会,共时态和历时态等实践的不同方面辩证地联系在一起)。

采纳这种观点是一种苛求。我们认为,它要求多数是讨论会式的研究(symposium research)——不同社会实践研究传统的专业研究人员相互联系地进行研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共同研究实践的构成和转变。

在参与行动研究中,任务看起来更为艰巨——上文提到的讨论会式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所提到的每一种研究传统在评估研究时相应的优秀标准,这种讨论会必需要有专家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specialis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参与才能实施,那么作为特定场景中的本土参与者是否具有这种专家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呢?我们知道还没有研究者尝试明确这个任务,仅有一些研究者尝试类似的目标——但也仅是含蓄的——例如由 Gloria Maria Braga Blanco, Jose Maria Rozada Martinez, César Cascánte Fernández 和他们的同事在西班牙北部的亚斯图里亚斯(Asturias)实施的计划(1995)。在这个研究项目中,许多从事儿童教育、初级教育、高级教育(一部分是人文教育,一部分是科学和数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教师多年来一直研究他们自己的实践,探寻教育中的民主主题(Kemmis, 1998)。研究小组使用了不同的专业研究方法和技术,作为整个参与行动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但即使在这个计划中,研究人员也没有全部用到表 22.4 中归纳出的实践研究的方法。

在大多数行动研究中,包括参与行动研究,研究者往往会牺牲方法和技术的严格,以换取更多表面有效的即时性收获:他们收集的证据在具体情境中对他们是否有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有时我们把参与行动研究归为"低技术"研究:为了产生及时的证据,以用在(实践、参与者和实践背景的)实时性转变过程中以及进一步提高这种转变,宁可牺牲方法上的严密性。

一些研究者陷入困惑之中:这种低技术化趋势是否会使参与行动研究成为"不可靠"的研究——甚至在一定场景中,这种研究在改革的民主化过程中的实践意义是否可靠?这种担心存在这样的预设,即研究是否"可靠"取决于方法论基础而不是认识论基础(这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证据,按照参与者批判使用证据来思考什么对研究目的来讲是确切的、相关的、合适的、恰当的)。这表明,方法论严密性和"真实性"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易(trade-off),这种真实性是参与者能够在他们所处的真实情境中批判性获取的即时证据意义上而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效度在参与行动研究中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也不认为传统的效度标准不需要修正(McTaggart, 1998)。

就我们看来,在变动着的社会行动具体实践情境中适当牺牲一些方法的严谨性还是值得的。方法的严谨性在许多研究者作为"第二人"或"第三人"类型

的研究中是首要关注的。在这些研究中,解释和分析往往是在调查研究的背景以外,而研究结果需要经受仔细审查,审查者一般是对特定调查研究不感兴趣的其他研究人员——兴趣集中在更一般普遍的社会现象上的研究人员。同时,研究结果的审查者往往和参与者所生活经历的现实没有什么重要关联,然而参与者的生活和研究过程及结果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在生活中体验着转变的后果,这正为研究者转变研究的质量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检验",他们的实践是否有效果,他们的理解是否更清晰,他们实践的场景是否更理性更公平,以及他们是否产生了他们所想要实现的那种类型的结果。对参与者而言,收集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关键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自己的行动来避免有意或无意的伤害。符合这类"现实检验"的证据经常是"低技术"的(从研究方法和技术上来看)或者是"印象主义"的(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他缺乏局内人解释证据所依据的场景性知识)。但是,从参与者理解特定意图和转变的本质和结果角度来看,这类证据仍然可能是"高保真"的,在他们自己的情境中——他们是有"特权"的观察者(而不是古登斯所谓的"文化傀儡")。

我们认为,大多数行动研究(和大多数参与行动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利益的交易中选择实践的重要性高于方法的严谨性是正确的——在什么证据对参与者具有批判意义和什么证据可以满足非特定情境的方法论标准(或外部研究人员的要求)之间选择。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要收集更多的涵括表 22.2 和表 22.3 所涉及的种种观点的证据,需要加强更多的行动研究——包括参与者的行动研究,而不仅仅是局外人的行动研究。也就是说,全面建议大多数行动研究者收集和考虑来自不同实践传统的证据:从局外人视角来看,把实践看作个人行为的证据(表 22.2 和表 22.3 中的第一种传统);从外部视角来看,把实践看作是规则和系统的证据(第二种传统);从局内人视角来看,把实践看作是有意义且有意图的行动的证据(第三种传统);从实践的历史和传统视角来看,把实践看作话语、社会和历史建构的证据(第四种传统);结合前面四种传统将实践看作是参与者自己塑造的历史形式和批判变革的一个连续统一的证据(第五种传统)。

博尔达(Borda,1979)曾指出,行动研究是"为了改变现实而去研究现实"。我们赞同这种观点,但要补充的是行动研究也是为了研究现实而去改变现实。这里我们讨论的现实不是超越任何特定地方情境的元物理意义上的"现实",而是指参与者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日常生活现实。行动研究的目的就是改变这些日常生活现实——人们生活、工作、奋斗和遭遇磨难的现实。行动研究致力于这样一个过程的实施,即参与者共同对他们的实践、认识和实践的场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以对抗和克服实践场景中以及与实践后果相关的非理性、不平等、异化和困难。我们认为,这比所谓元物理意义上的真理或者方法论的严密性更能作为一种标准,对行动研究的研究水平进行衡量。研究是不能自我证明的,也不能仅仅依靠内部标准来评估(例如方法论标准),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可以用我们所列举的行动研究目的来衡量——也就是说,依据研究在对抗和克服非理性、不公平、异化和困难时所起到作用的程度来衡量,不仅体现在研究场景中,也体现在

更一般、更广泛的后果方面。

参与行动研究的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行动研究有不同形式。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在我们看来,行动研究的发展更多归功于来自实践情境的压力,而不是归功于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行动研究和其他研究方法最大的差别之处在于它对常规研究观念的一种反抗,包括对研究者的看法(例如,关于谁能成为一位研究者的看法)和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例如,关于理论——尤其是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起支配角色的看法,类似关于只有通过对真理的宏大宣称或者方法论精确才能保证改变实践的看法)。许多行动研究坚持认为参与者可以成为一名研究人员——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或者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同时,实践中的研究——不仅仅是结合实践的研究,可以产生出证据和观点,这些证据和观点可以坚持实践的批判性转变。

来自行动研究所处的不同情境中的压力会继续影响行动研究的未来。一些行动研究会继续以一种实地研究来发展,参与者致力于主要从技术方面提高自己的实践;一些行动研究继续朝着参与者从实践方面提高他们的实践方向发展(例如,通过自我反思的参与者和反思性专业人员的见解的不断发展;Schön, 1983, 1987);一些行动研究会继续以一种批判社会科学来发展,致力于对实践、参与者和实践场景共同转变。

这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我们还是相信参与行动研究在未来 10 年里,不仅更具有实践性,而且具有理论上的深邃性。更具实践性主要体现在参与行动研究会发展成为一种被更广泛使用和接受的社会实践形式,它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对参与者更合适。而参与行动研究理论深邃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实践是什么,特定社会实践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通过集体社会行动改变社会实践等具有一个更综合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参与行动研究者(和其他类型的行动研究者)已经成功挑战了“学术”研究人员在研究社会实践上相对垄断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获得许多政府和当局现代主义信仰者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认为参与者在改善实践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技术方面受到追求上进人员的喜爱,但不仅仅如此)。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从学术和其他高度专业化制度和组织控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参与行动研究中立足于实践的参与者逐渐意识到影响他们实践的社会条件不能被纯粹的本土观念和惯习一扫而空。这种转变的阻碍不仅仅指参与者可以随意改变的技术环境,还包括社会结构和媒体可能屈服于——有时仅仅是逐渐的——持续存在的集体力量。社会转变不仅仅是一件技术事情,它也是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认知的事情。

因此,我们希望参与行动研究持续发展,成为一种纷繁复杂而坚定的批判形

式。今后,它可能很少再坚持具有马克思理论特色的特定的现代主义批判形式,这在过去曾表明过参与行动研究的一些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它更有可能在理论上变得越来越折中,同时也坚守着一个信念,即人们通过共同行动可能改变压迫他们的环境。同样地,在操作过程中,既定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框架(例如学校、医院或政府机构)对它的束缚也将会减少;相应地,通过"侧面(flanking)"活动,它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明朗化,这使得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影响许多关键社会制度下实践的假设和预想受到了怀疑和考验。

由此可推断,我们希望参与行动研究在以后采取表22.4所呈现的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实践观。社会研究中的"范式大战"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基础上,围绕人文科学中真理的性质而争论。这些立场之间的竞争没有任何成效,很显然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真理"不站在任何一种观点那边。现在需要的是,在这些竞争方之间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着眼于探索它们之间能够促成更深入的互为主体性的理解和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的程度,共识和理解主要指特定历史环境状况下特定实践的性质、动态和结果等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和理解。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讨论会形式的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可以为这种类型研究的共同合作提供特别丰实的基础。它能这样做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对它的支持者而言,依据实践行动及其结果组成的"现实检验"非常重要,而不是为了满足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深奥要求。尽管近期现代性处于这样的状态,即参与者逐渐感到生活和工作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和异化感,而且社会系统的合法性也逐渐遭到怀疑,参与行动研究仍然为实践者提出一条集体性道路,重新关注意义、价值和重要性问题,以及为了共同利益采取个体和集体行动等问题。尽管功能理性无处不在,它是社会系统建构绝大多数社会现实所持有的典型理性,参与行动研究仍然重新唤醒了实践理性和批判理性。与此同时,它也恢复了一种在过去曾经被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认知的最佳途径)所替代的人文主义(Toulmin, 1990)。

图尔敏(Toulmin,1990)认为,在16世纪末兴起的"文艺复兴"中出现了现代性。他指出,早期的现代性从文艺复兴转向笛卡尔式理性主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转变来获得充分理解:第一,由以修辞理论和实践在建立辩论证据中占中心的口述文化转向以正式逻辑为中心的书写文化;第二,从对理解和处理具体事情的实际关注转向对整体规则发展的更理论化的关注;第三,从关注局部的、具体方面的差异到关注一般的,对抽象原理的理解;第四,从即时性(关注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暂时的情境中做出明智、谨慎的决定)到永恒性(关注理解和解释事物持续的,也许是永恒的性质)的转变。在晚近现代性时期,出现了阻碍这些转变的复兴旨趣——重新对口述文化、修辞理论和实践,对理解和处理具体事件,对局部而不是一般抽象,对即时性而不是永恒性产生的兴趣。不管这些旨趣是否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更广泛复苏,它们体现了许多在本土背景和环境下从事参与行动研究群体的特征。这种更具人文性质的方法加强了实用性和合作性精神,这种精神反驳范式之争时期的教条主义,鼓励了讨论式的研究形式,我

们相信会在以后的参与行动研究中发现这种讨论式的研究形式。

我们推测参与行动研究因为其强调差异的取向会继续发展,如果这个推测是恰当的,那么在我们看来既定的权威(包括政府和一些不易改变的学术领域)可能会做更加艰苦的努力来接收和吸纳参与行动研究。如果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参与行动研究很有可能会回避和拒绝被称作"不科学"——即使被视为"叛徒"。因此,我们希望继续讨论参与行动研究是否或者是否应该被认为是研究(或"可靠的研究"),继续加强参与行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发展。

参与行动研究的主要特征

我们仅从步骤的机械序列方面来对参与行动研究的过程进行简描述,它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反思性循环的螺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图 22.1):

制定改变的计划,
执行并观察变化的过程和结果,
反思这些过程和结果,然后
重新制定计划,
执行并观察
反思……

在现实中,研究过程不可能像这个计划、行动和观察、反思的循环螺旋模型所表现的那么井然有序。每个阶段发展过程中有重叠,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实践学习中很快变得过时。事实上,研究的过程更可能是流动的,开放的和反应迅速的、衡量成功的标志不在于参与者是否忠实遵守研究步骤,而在于参与者是否具有发展和改变他们实践、对实践的认识以及实践场景的强烈而真实的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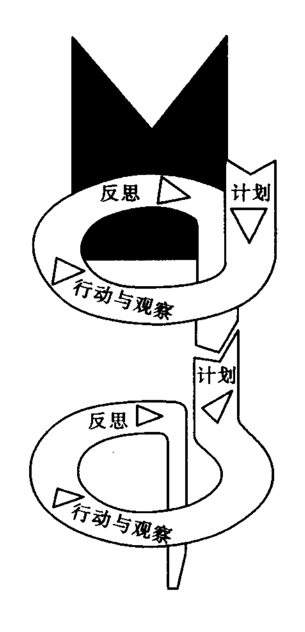


图 22.1 行动研究螺旋图

在参与行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一起合作最大限度地执行了反思螺旋模型规定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所有参与行动研究的理论者都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合作过程,在参与行动研究中加以强调。他们认为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系统化反思的单独的过程。我们承认有时是这样的,但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参与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和教育的过程。第二个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参与行动研究直接针对研究、重建和改造实践,而实践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社会性。如果实践是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之间形成的,那么改变实践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固然,一个人可能发生变化致使其他人也必须对这个个体改变的行为做出不同的行为和反应,但是最终,组成实践

的社会互动者的自愿和坚定的参与是保证转变所必需的条件。参与行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形成“论坛”的机会，人们可以作为参与者参加论坛，为重新改造互动的实践而斗争——论坛可以同时追求理性和民主，而不会导致两者的敌对。哈贝玛斯在1996年的《事实与规则》(*Between Facts and Norms*)一书中，他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开放的沟通空间”。在最佳状态下，这是一个合作学习的社会过程，各种群体通过在共同的社会世界中的互动，一起参加改变实践来实现这个过程的——所谓的共同的社会世界指的是无论好坏，我们都在他人行动后果的影响下生活。

我们也会强调行动研究关注的是真实的实践，而不是抽象的实践。它伴随着对特定场景中特定的个体所实施的真实、具体且具有物质性的特定实践的学习过程。虽然，行动研究不可能将抽象悬置一边不予考虑，因为这些抽象在我们用语言对事物进行界定、描述、解释以及评估时不可避免会发生。但我们和其他形式的研究所具有的区别之处在于行动研究坚持致力于改变特定实践者的特定实践，而不是集中在一般或抽象意义上的实践。我们认为行动研究者勿需对他人将其研究看作世俗的，而且历史中处处遇到困境而进行辩解；理想主义存在着一种哲学和实践的危险——暗示一个更抽象实践观可以超越或兴起于历史之上，以及一种错觉——认为在那些解释但并不构成实践的抽象命题中更可能找到安全的庇护所。行动研究是一个学习过程，不断去发现一些真实而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于：①人们在做什么，②他们是如何和世界及他人互动的，③他们的意义何在、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④他们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的话语。

通过行动研究，人们能逐渐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和教育实践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社会、历史场景之中，这些场景生产(再生产)着实践——可能改变实践。关注实践具体而特定的方面，可以使实践对过去的环境进行反思、讨论和重构，以便可以塑造现在的环境和为未来环境的塑造而做好准备。行动研究承认每一个实践是暂时性的，瞬间即逝的，只能用语言惯用的抽象(尽管有些令人安慰的含糊)术语来表述实践。但同时，行动研究坚持致力于在特定场景中去理解特定实践，而不会将其化约至一般的、抽象的或者理想化的“幽灵般”的地位——或者有人也许会说“虚幻的”。

如果行动研究从这些方面来理解，那么通过行动研究者的调查，他们会对特定实践的方式非常敏感，包括生产、交流与社会组织的物质的、符号的和社会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塑造了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社会结构并被这些社会结构所塑造；塑造了语言(话语)、工作与权力的社会媒介并被这些社会媒介所塑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参与者自己的知识——参与者用来表达理解、技艺和价值观的知识，并被参与者自己的知识塑造；反过来讲，这些社会实践也塑造了生产、交流与社会组织的物质的、符号的和社会组织的行动，并被这些行动所塑造等。

行动研究者可能会思考，例如他们在交往、生产和社会组织中的行为是如何在真实具体的实践中相互联系和缠绕在一起的，真实而具体的实践把他们和其

他人联系在真实情景里。在真实情境中,他们能够发现自我(例如,在社区、邻里、家庭、学校和其他工作场所里)。他们也可能会思考,通过实践中的其他人共同改变参与实践的方式,他们如何能改变实践,改变他们对实践的理解和他们生活工作的情境。

对许多人来讲,自我反思的螺旋循环图(计划、行动和观察、反思、重新计划)已经成为作为一种方法的行动研究的主要特征。我们认为,参与行动研究具有至少和反思螺旋图一样重要的其他方面的关键特征。这七个特征分别是:

(1)参与行动研究是一个社会过程。参与行动研究细致地探讨了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它肯定"没有社会化,个性化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个性化,社会化也是不可能的"(Harbermas,1992,p.26),而且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持续地塑造着情境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情境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我。参与行动研究是一个遵从类似教育和社会发展背景下的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独自或共同去尝试理解认识他们的个体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他们和不同背景中的其他人是如何建立起关系的——例如教师一起工作或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提高课堂中的教学实践过程。

(2)参与行动研究具有参与性。参与行动研究使人们审视自己的知识(理解、能力和价值观)和解释范畴(他们对自己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中的行动的解释方法)。这是一个过程,群体中的每位成员都尝试理解用自己的知识去塑造认同感和行动的方式,以及批判地反思目前知识是如何构建和限制自己行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参与性的,人们只能独自或共同对他们自己进行行动研究,而不能对他人进行行动研究。

(3)参与行动研究具有实践性和合作性。参与行动研究使人们审视社会互动中联系彼此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人们探求他们沟通的、生产的和社会组织的实践的过程,人们尽力去探求如何通过改变建构互动的行为来提高改善互动——减少参与者在互动中(和长期后果)经历的非理性、徒然的(或无效的)、不公平的和令人不满意的(疏远的)程度。参与行动研究者的目标是共同通过重建组成社会互动的行为来重新建构他们的社会互动。

(4)参与行动研究具有解放性。参与行动研究旨在帮助人们从社会结构的限制中找回自己,解放自我。这种社会结构是非理性、无效、不公平和令人不满意的,限制人们自主性和自我发展。这是一个过程,人们探索宏观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塑造和限制他们实践的方式,思考他们是否能够调解那些限制,把自己从中解放出来——或者如果不行,最好围绕这些限制以最大程度减少这些限制导致的出现在人们之中非理性、低效率、不公平和不满(异化),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了创建一个共享的社会生活。

(5)参与行动研究具有批判性。参与行动研究旨在帮助人们从植根于社会媒介中的限制中恢复自我和解放自我。他们是通过这些社会媒介进行互动沟通:他们的语言(话语)、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们从中体验了联系和差异,包含和排斥——这种关系,从语法方面来讲,是指他们和第三人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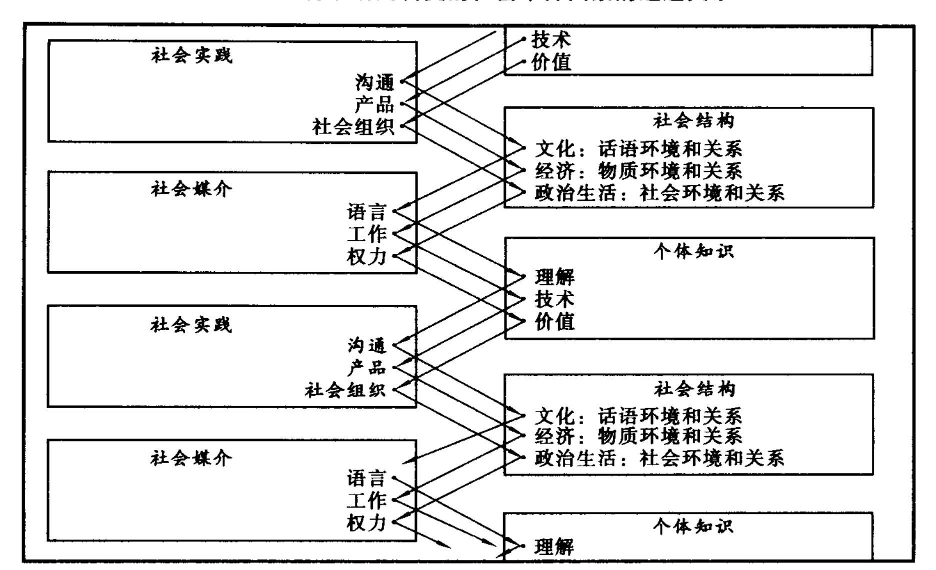
第二人称或者第一人称的其他人互动关系）。这是一个过程，人们有目的地对解释和描述他们世界的方式（语言/话语）、工作方式（工作）和其他相关的方式（权力）中的非理性、无效率、不公平或者令人不满的（异化的）现象进行挑战和重建。

（6）参与行动研究具有循环性（反思性和辩证性）。参与行动研究旨在帮助人们为了改变现实而研究现实（Borda，1979），以及（我们加上的）为了研究现实而改变现实——特别是通过批判、自我批判的行动和反思的螺旋循环来改变他们的实践，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社会过程，帮助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实践、实践的知识、塑造和限制实践的社会结构和表述实践的社会媒介（和建立关于这些方面的理论）。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建构实践的理论的意思。但参与行动研究不采用不切实际的理论化观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和他人一起参与——改变我们在共享的社会世界中互动的方式。不论好坏，我们都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行动和他人行动的结果影响中。表22.5呈现了一种尝试勾勒知识、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和社会媒介之间关系的循环特征。

（7）参与行动研究旨在理论和实践中转换。参与行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上没有认为理论或者实践具有优先性。它的目标是通过对理论、实践及其结果的批判性理性思考，清楚表达和发展实践和理论。它并不是要发展出位于实践之上或超越实践的理论形式，好像实践被理论控制和决定，而不考虑参与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特殊的实践情境。同时，它也不是要发展自我证明的实践形式，好像实践可以不考虑理论框架而进行评价，理论框架赋予了实践价值和意义，为实践及其后果出现的对参与者和受影响者的非理性、不公平、异化或者不满的程度提供实质性判定标准。因此，正如身处特定情境中的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参与行动研究可以从特定情境的细节入手"向外延伸"，来发掘不同的视角、理论和话语的潜力。这些不同理论有助于理解特定实践和实践背景。要提高对事物如何转化的批判性理论和见解，特定的实践和实践背景是基础。同样，参与行动研究也从不同视角、理论和话语所提供的立场"向内拓展"，去探索不同的视角、理论、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为实践者提供一个对具体的地方情境中真实面对的问题的批判性理解视角。参与行动研究致力于转化参与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对那些可能有助于形塑特定地方情境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转化。由此，参与行动研究连接了本土和全世界，生动体现了这样的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

以上就是参与行动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我们的观点比较特别，也许有些"派性（partisan）"特征。有一些关于行动研究的作者喜欢从行动研究的一个总体性描述（特别是反思性螺旋图）很快转移到方法论和研究技术方面的问题上——讨论在不同社会和教育情境中收集资料的方法和途径。这种行动研究观点带有某种程度的方法论倾向，它暗含的假设是研究方法使行动研究成为"研究"。

表 22.5 行动研究转变的社会中介因素的递进关系



在我们看来,按照前面所提到的实践的五个方面和实践研究的五种传统,具有方法论倾向的参与行动研究会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假定中,即假定实践必遵从一种或另一种实践研究传统。基于所采用的系列假设,它可能发现自己不能进入一种足够丰富且多维方式的实践研究——即承认实践的不同方面,公平对待实践的社会、历史和话语建构。

如果参与行动研究是从前面提到的实践的每一方面去探索实践,那么,它需要考虑实践研究的不同传统,不同研究方法和技术如何能够为这一任务提供多重复合的资料。例如,参与行动研究者可以合理规避那些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即尝试把实践看作是完全"客观"的方法,似乎它可能排除参与者意图、意义、价值和对实践理解的解释范畴的影响,或者可以排除不同群体解释他们实践的语言、话语和传统框架的影响。它并不认为定量方法与参与行动研究没有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有关联——但是没有许多定量研究者使用方法和技术上的诸多限制。实际上,当定量研究者用问卷将参与者观点转换为数据资料时,他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考虑参与者的观点,是无法去理解实践的。参与行动研究者在收集和使用这些数据上不同于单一的定量研究者。因为参与行动研究者把数据资料看作是粗糙地接近参与者理解自己的方式,而不(像定量研究者那样肯定地)因为资料是量化的,就把资料看作是严密的(合理的、可靠的)。

另一方面,参与行动研究也不同于单一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主张行动只能通过定性视角才能被理解——例如,对个体的观点进行严密临床诊断式或者现象学分析,或者对塑造参与者理解特定实践的方式的话语和传统进行严密的分析。参与行动研究者也想探索变化中的"客观"环境(行动、事件、效果、互动模式、规则、角色和系统功能)是如何塑造以及被参与者观点的"主观"条件所塑造的。

我们认为,研究方法的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相比较于那种方法论倾向的观点),我们想指出的是,使参与行动研究成为"研究"并不是研究技术的手段,而是对社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持续关注。就我们看来,在确定哪类研究方法适合我们的研究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实践"和"理论"是哪种类型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哪样的资料或证据可能于描述实践有关联,哪类的分析在解释和评价人们在所工作的具体情境中的真实实践是适合的。在这种参与行动研究观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实地"中的"实践",如果这样,就可以从实践中获得更系统化的理论发展了。一旦我们对理解(理论化)实地中的实践的意思形成一个总体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哪类的证据,然后哪些研究方法和技术可能适合提高发展我们对任何特定时刻的实践的理解。表22.5描述的理论方案指出,建立实践的理论可能是这样进行的,即在参与者的知识框架下,联系社会结构,依据社会媒介对实践定位。通过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践观(例如表22.4中所指出的),我们可以用更丰富、更复杂的方式去理解实践,建构实践理论,通过一种参与行动研究似的批判社会实践,可以解释和重建强大的社会动力学(类似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和联系)。

参考文献

Adelman, C. (1997).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 of participation. In R. McTaggart (E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pp. 79-10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 Brewster, Trans.). London: New Left.

Altrichter, H., & Gstettner, P. (1997). Action research: A closed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science? In R. McTaggart (E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pp. 45-7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rgyris, C. (1990).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defenses: Facilitat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oston: Allyn & Bacon.

Argyris, C., Putnam, R., & Smith, D. M. (1985). *Action science: Concepts, methods, and skills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Argyris, C., & Schön, D. A. (1974). *Theory in practice: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effectivenes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Argyris, C., & Schön, D. A. (197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Bennett, T. (1979).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

Bernstein, R. J. (Ed.). (1985).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Bernstein, R. J. (1992).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Braga Blanco, G. M., Rozada Martínez, J. M., Cascánte Fernández, C., et al. (1995). Hacia un modelo dialectico-critico en la enseñanza: Grupos asociados para la investigaciónacción. In Departamento de Didáctica y Organización Escolar (Ed.), *Teoría crítica e investigación acción* (pp. 162-172). Madrid: Departamento de Didáctica y Organización Escolar.

Bravette, G. (1996). Reflection on a black woman's management learning. *Women in Management Review*, 11 (3), 3-11.

Bunbury, R., Hastings, W., Henry, J., & McTaggart, R. (Eds.). (1991). *Towards Aboriginal pedagogy: Aboriginal teachers speak out, Blekbala Wei, Deme Nayin, Yolngu Rom,*

and Ngini Nginingawula Ngawurranungurumagi.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Carr, W., & Kemmis, S. (1986). *Becoming crit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Checkland, P. (1981). *Systems thinking, systems practi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Checkland, P., & Scholes, J. (1990). *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in ac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Clark, P. A. (1972). *Action research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 London: Harper & Row.

Dadds, M. (1995). *Passionate enquiry and school development: A story about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Davies, L., & Ledington, P. (1991). *Information in action: 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Elden, M. (1983).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t work.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Behavior*, 4(1), 21-34.

Elliott, J. (1988). Developing hypotheses about classrooms from teachers' practical constructs: An account of the work of the Ford Teaching Project. In S. Kemmis & R. McTaggart (Eds.), *The action research reader* (3rd ed., pp. 195-213).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from *Interchange*, 7[2], 1976-1977, 2-22)

Emery, F. E., & Thorsrud, E. (1976). *Democracy at work: The report of the Norwegian Industrial Democracy Program.* Leiden,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Emery, F. E., Thorsrud, E., & Trist, E. (1969). *Form and content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Some experiences from Norway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London: Tavistock.

Fals Borda, O. (1979). Investigating reality in order to transform it: The Colombian experienc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 33-55.

Fals Borda, O. (1988). *Knowledge and people's power.* New Delhi: Indian Social Institute.

Fals Borda, O., & Rahman, M. A. (Eds.). (1991).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 New York: Apex.

Fay, B. (1987).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Liberation and its limits.* Cambridge: Polity.

Flood, R. L., & Jackson, M. C. (1991).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Total systems interven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Forester, J., Pitt, J., & Welsh, J. (Eds.). (1993). *Profiles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Foster, M. (197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on research in work organizations. *Human Relations*, 25, 529-566.

Fraser, N., & Nicholson, L. J. (1988).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373-394.

Freire, P. (1988). Creating alternative research methods: Learning to do it by doing it. In S. Kemmis & R. McTaggart (Eds.), *The action research reader* (3rd ed., pp. 291-313).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from *Creating knowledge: A monopoly?* pp. 29-37, by B. Hall, A. Gillette, & R. Tandon, Eds., 1982, New Delhi: Society fo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Asia)

Fullan, M. (1982).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Fullan, M. (1991).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London: Cassell.

Gadamer, H.-G. (1975). *Truth and method*(2nd rev. ed.; J. Weinsheimer & D. G. Marshall, Eds. & Trans.). New York: Crossroad.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Grundy, S. (1987). *Curriculum: Product or praxis?* London: Falmer.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J. J. Shapiro, Trans.).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74). *Theory and practice* (J. Viertel, Trans.).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Habermas, J. (1987a).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F. G.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87b).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Habermas, J. (1990).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 Lenhardt & S. W. Nicholso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92).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Philosophical essays* (W. M. Hohengarten,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W. Rehg,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Hall, B., Gillette, A., & Tandon, R. (Eds.). (1982). *Creating knowledge: A monopoly?* New Delhi: Society fo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Asia.

Haug, F. (1987). *Female sexualization: A collective work of memory.* London: Verso.

Henry, C. (1991). If action research were tennis. In O. Zuber-Skerritt (Ed.), *Action learning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pp. 102-114) Brisbane: AEBIS.

Honneth, A., & Joas, H. (Ed.). (1991).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Honneth, A., McCarthy, T., Offe, C., & Wellmer, A. (Eds.). (1992).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Horton, M. (with Kohl, J., & Kohl, H.). (1990). *The long haul: An autobiogra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Jackson, M. C. (1991). *Systems methodology for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New York: Plenum.

Kemmis, S. (1988, May). *Critical educational research.*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ritical Theory Pre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gary, Alberta, Canada.

Kemmis, S. (1991). Action research and post-modernisms.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11 (4), 59-66.

Kemmis, S. (1998). Action research exemplary projects: The Asturias project. In J. Angwin (Ed.), *The essence of action research.*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Change.

Kemmis, S., & McTaggart, R. (1988). *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 (3rd ed.).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Lanhupuy, W. (1987). Balanda education: A mixed blessing for Aborigines. *Aboriginal Child at School*, 15(3), 31-36.

Levin, M. (198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Norway.* Trondheim: ORAL.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cIntyre, A. (1983).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London: Duckworth.

Marika, R., Ngurruwutthun, D., & White, L. (1992). Always together, Yaka gäna: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t Yirrkala 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Yolngu education. *Convergence*, 25(1), 23-39.

McTaggart, R. (1987). Pedagogical principles for Aboriginal teacher education. *Aboriginal Child at School*, 15(4), 21-33.

McTaggart, R. (1988). Aboriginal pedagogy versus colonisation of the mind.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8(2), 83-92.

McTaggart, R. (1991a). *Action research: A short modern history.*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McTaggart, R. (1991b). Principles for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4(3), 168-187.

McTaggart, R. (1991c). Western 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 to Aboriginal education.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23, 297-325.

McTaggart, R. (Ed.). (1997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cTaggart, R. (1997b). Revitalising management as a scientific activity. *Management Learning*, 28(2), 177-195.

McTaggart, R. (1998). Is validity really an issue for action research? *Studies in Culture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4, 211-236.

McTaggart, R. (1999). Reflection on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action and scholarship: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2(5).

Noffke, S. E. (1990). *Action research: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Noffke, S. E. (1997a). Professional, person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action research. In M. W. Apple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22, pp. 305-343).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offke, S. E. (1997b). Themes and tensions in US action research: Towards historical analysis. In S. Hollinsworth (Ed.), *International action research: A casebook for educational reform* (pp. 2-16). London: Falmer.

Oliveira, R., & Darcy, M. (1975). *The militant observer: A sociological alternative*. Geneva: IDAC.

Park, P., Brydon-Miller, M., Hall, B., & Jackson, T. (Eds.). (1993). *Voices of chang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oronto: OISE.

Pasmore, W., & Friedlander, F. (1982). An action-research program for increasing employee involvement in problem-solv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7, 342-362.

Pedler, M. (Ed.). (1991). *Action learning in practice*. Aldershot, England: Gower.

Reason, P. (Ed.). (1988). *Human inquiry in action: Developments in new paradigm research*. London: Sage.

Reid, W. A. (1978). *Thinking about the curriculum: The nature and treatment of curriculum problem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evans, R. W. (1980). *Action learning: New techniques for management*. London: Blond & Briggs.

Revans, R. W. (1982).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ction learning*. Bromley, England: Chartwell-Bratt.

Rorty, R. (1985). Habermas and Lyotard on modernity. In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 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gor, R. (1992). *How to conduct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Alexandria, VA: ASCD.

Sandkull, B. (1980). Practice of industry: Mismanagement of people.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1, 159-167.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ön, D. A. (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chön, D. A. (Ed.). (1991). *The reflective turn: Case studies in and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tenhouse, L.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ondon: Heinemann.

Thompson, J. B., & Held, D. (Eds.). (1982).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Cambridge: MIT Press.

Torbert, W. R. (1991). *The power of balance: Transforming self, society, and scientif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The b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Von Wright, G. H.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armington, A. (1980). Action research: Its methods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7, 23-39.

Weiner, G. (1989). Professional self-knowledge versus social justic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eacher-researcher movement.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1), 41-51.

Whyte, W. F. (1989).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rticipation,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2, 502-512.

Whyte, W. F. (Ed.). (199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London: Sage.

Yirrkala Homeland Schools. (1996, May). Linking business. *Big Link*, 5, 2-6.

Zuber-Skerritt, O. (Ed.). (1996). *New directions in action research.* London: Falmer.



围墙边的对话

我们离天堂更近了。抗乳腺癌行动取得了新的进展，地方和国家媒体再次热烈庆祝它所创造的最新奇迹——一种对乳腺癌有预防作用的新药。1992 年，美国许多地方共有 13 388 个携带乳腺癌遗传因子的高危妇女充满希望地参加了一项解释性的、双盲的(double-blind)、随机控制的试验，该试验的目的在于证明它莫西芬对乳腺癌的预防效果。几年后该试验提前结束了，因为结果已很明显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Fisher et al.，1998)。尽管人们仍在严密关注该药的短期副作用，欧洲的两项研究相互矛盾(Powles et al.，1998；Veronesi et al.，1998)，以及人们对该药的社会、精神或长期效果尚无了解，但全国范围的热销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说服了食品和药品行政管理部门、内科医生与妇女们认真考虑对它莫西芬的大规模应用。

这是许多善意的个人、充满期待和恐惧的公众与制度性社会力量(instituational dynamics)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卫生学术中心得到赖以生存的科研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这些基金中的大多数被用于生物分子/遗传"实验"的基础研究和随机临床试验，大型的制药企业被迫为在开发和检验方面需要巨额投资的药物寻找新的市场。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兴旺与前述这些压力相联系。特殊利益群体、媒体和文化势力怀着迫切的心情不断地激励人们对治疗和康复、对基因组中的无限生长分化进行研究，对研究的要求是找到按预先计划的标准化方式起作用的通用的(即可概括的)干预方法或药物，并具有巨大的销售量。"给我证据"意味着"给我数字"，它意味着"说明适宜的利润额度"，意味着"确保我们被危及的特权地位安然无恙"。欢迎你到临床研究领域中来。

此时，在大西洋中部由小农场、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呆板的私人住宅围墙构成的风景中，凯米勒(Camille)加入了单乳妇女的队伍(Williams，1991)。她心中充

满了困惑和忧虑，贫穷、恐惧且50岁的她知道她的乳腺癌正在扩散，她的由记忆、孩子、职业、爱人和期望构成的生活似乎被撕成了碎片。她害怕没有人倾听她的诉说。她参加了乳腺癌干预试验(Fisher et al.,1998)，服了药，但仍得了癌症。她感觉受到了打击和忽视。在肝酶检验和提供实验性化疗临床试验协议的背后，她的医生们掩盖了他们的恐惧并丧失了同情心。他们感到疲惫不堪、负担过重，对不断强调削减成本的做法愤怒不已，并在死亡面前感到力不从心，但在专业“客观性”的屏障和对它莫西芬成功的留恋背后，他们掩盖了自己的情绪。凯米勒的朋友格罗利亚也参与了研究并且效果很好，但不敢确定是该药所起的作用。她不喜欢每天服药，因为这使得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自从她参加该项研究，她对每件事的忧虑都加重了，于是她停止了服药。艾丽丝对该研究公然地表示愤怒。她也服用了它莫西芬而不是安慰剂，但她的腿部出现了很大的血凝块，现在患有慢性腿疼和背疼，几乎不能走路。日尼科制药厂的市场研究人员正在指导焦点小组学习更有效的方法来说服妇女和内科医生相信它莫西芬的有效性，然而这些事情“公众”并不知晓。这些事情如果完全不被人所知的话，就会被有意的隐瞒和无意的文化偏爱作用所掩盖，它们也会在定性术语和学科传统的学术屏障背后隐藏起来，于是，在阻挡我们所有人的围墙上的可能通道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这是医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定性临床研究者感兴趣和期待的是缺席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事情是如何被表达的。“痛苦被标准化了”。在“这一有代表性的医学研究”中与乳腺癌有关的痛苦被表达为一种对某种可销售的预防性产品的普遍需求，痛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被限制在这种表达中了。重要的声音和证据不见了。了解该药的效果，即它的内服有效性，就足以支持运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说服所有的妇女“选择”该药并把它作为生命健康的需要。凯米勒每天服药且这种服药表明她从前健康的自我和身体面临着威胁的体验不见了，她的丈夫、孩子和父母的声音不见了，关系和道德讨论不见了。感觉、精神和生态关系不见了。这种“胜利”，这种天堂的幻觉成为可能只是因为细节和背景被简化或删除了，关系被分解和孤立了。但这种胜利是不彻底的。当该药进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它的缺陷将会暴露，它的市场价值将会下跌，人们的失望将会上升直到下一次“突破性的成功”。幸运的是，公众的不满也不断上升，并把这种不满表现为对替代性和补充性治疗方法、精神和/或原教旨主义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以及对卫生保健改革成果和服务的愤怒。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临床研究领域——围墙背后的对话，即使科技在“进步”，在临床领域中也还有不断增加的痛苦、困惑和需要探究的东西。公众的不满和消失的证据就是该章的基础。我们想象一个临床研究领域，在该领域中凯米勒及其医生、生物医学制品行业和研究者们聚在一起寻求某种变革。该章想象一种在围墙边(Brueggemann,1991)——在围墙和临床现实相遇的地方的对话。在这堵把临床医生与病人、定性与定量、学术与实践相分离的围墙边，各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文化可以聚在一起并相互对话。本书展现了围墙背后定

性研究群体的谈话——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改革(这一改革在那里得到支持)的信念和期望的内部讨论,把这一谈话转移到围墙之外并进入临床研究领域的机会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十年前要求改变严守实证主义原则的做法并提倡更为多样化的方法论(包括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如,Freymann,1989; McWhinney, 1986,1989;Waitzkin,1991)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定性方法正在寻找得到基金机构赞助的途径,特别是在基本卫生保健、卫生服务和护理领域。定性方法和多重范式的应用正在扩展,但这种努力还仍是一种大杂烩,它更多地表现在临床研究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中。病人和临床医生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研究的谈话中去①。这些方法也在逐步发展,开始从其母体(如民族志学、现象学和扎根理论)中脱离出来并在临床研究领域中产生新的结合体。

该章的内容就是延伸和促进这种发展、这种探索和围墙边的这种对话。从应用人类学和基本卫生保健,特别是家庭医生业务的联系中会进一步加深对我们所讲的临床研究的理解。我们二人都在家庭医学领域中任职,都受过人类学训练,并对相互隔离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了解。我们的社会科学之根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临床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中(Chrisman, 1977; Chrisman & Maretzki, 1982; Fabrega,1976,1979;Foster,1974;Foster & Anderson,1978;Polgar,1962)汲取营养,其发展受后来的克雷恩曼(Kleinman,1988,1992,1995;Kleinman,Eisenberg, & Good,1978)、古德双氏(Good & Good,1981;Good,1994)、洛克(Lock,1982,1986,1993)、佩尔图双氏(Pelto & Pelto,1978,1990)及扬(Young,1982a,1982b)的思想影响,现在又受到后结构主义观点(Burawoy et al. ,1991;Clifford & Marcus,1986;Haraway,1993;Jackson,1989)和批判理论(Baer,1993;Morsy,1996;Singer,1995)的激励。我们中的一个(WLM)有繁忙的城市家庭医生业务,指导着一项医学毕业生的高级训练计划,并担任一个门诊部的主任;另一个(BFC)担任着某一家庭医生业务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并且是国家研究顾问。我们都是政治学和理论生物医学与理论社会科学讨论的积极参与者。生物医学的影响及治疗规则的发展方向是有实效的干预及明确一致地收集资料与决策,并且强调了实证主义和技术的要求。病人护理中显现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临床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McWhinney,1989),并使人转向讲故事、关系和解释。对获取赞助基金、在生物医学杂志上发表讲故事的知识和改变主导行为方式所做的努力,揭露了权力和霸权的现实。

我们的指导前提是:临床经验中出现的问题构成了对话的框架,并对研究设计起决定作用(Brewer & Hunter,1989;Diers,1979;Miller & Crabtree,1999b)。临床研究者能够采用的研究类型至少可分为六种:实验研究(experimental)、调查研究(survey)、文献—历史研究(documentary-historical)、实地(定性)研究(field

① 病人一词源自拉丁语词 patiens(意思为"遭受痛苦")和拉丁语 paene(意思为"近似的")与 penuria(意思为"需要")。人们去找临床医生是因为他有需要和正遭受痛苦,他们不再完美,他们缺乏足够的支持,他们仅仅是"近似的人"。人们去找临床医生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不足的和/或不健全的,他们是"病人",需要采取行动恢复健康。

(qualitative))、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和行动/参与研究(action/participatory),临床研究领域需要对所有这些可能的知识来源和类型开放。因此我们围绕着下面三个目标形成该章的结构:①为面向临床领域并运用定性和多重范式方法(multiparadigmatic approaches)的研究创造一个空间;②为在该空间里发现和解释临床故事与知识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转译(translations);③确定和描述讲故事与共享知识的方法。由于我们自己在该领域的地位,我们把重点放在西方生物医学的临床主题和基本卫生保健中隐含的特殊主题上,而这种讨论很容易转换到其他的临床背景中,如护理、教育和组织管理(亦可参见:Berg & Smith,1988;Bogdan & Biklen,1992;Morse & Field,1997;Sapsford & Abbott,1992;Schein,1987;Symon & Cassell,1998)。

创造一个空间

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界和小规模的定性研究群体都坚持方法论和理论的严格性,创造一个临床研究空间要求把二者拉到围墙外并找到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语言,**围墙边的临床问题就是其共同基础**(Taylor,1993)。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去重新发现消失的证据(人群、体验和背景)及"有效性"含义的丰富性和深度,去探索限量和成本问题、生物工艺学及基因工程中人的含意,并深入到非常规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冲突中去(这是一种"花园"与"机器"的对应)(Beinfield & Korngold,1991)。我们将描述创造和进入这一共同基础及改革临床研究的两个核心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像现在那样直接进入生物医学领域;第二个策略是加入到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the 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领域中去。我们还提出四个附加策略:更明确地运用理论;扩展跨学科的合作;以更开放的、多元方法的和纵向的方式思考问题;从事更多的参与性研究并大力倡导这种研究。这些策略假定变革更多的是建立在经验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上,临床参与者如果想采用某些方法必须积极地尝试这些方法。因此我们对临床参与者(包括病人)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们应采用适合自己问题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走进生物医学

走进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tic)的生物医学领域并在其中工作是令人胆怯的,并且常对知识分子和个人的诚实提出挑战。在该领域发展需要理解生物医学的文化背景,同时还要用语言清楚地表述出突出定性临床研究的临床含义的模型。如果还有病人和其他群体参与的话,这种知识有助于谈判、调停和形成共同语言,而这种共同语言使得在围墙外创造一个新的研究空间成为可能。用现在临床领域和病人所熟悉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创造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共同运用听和看的方法上演改革故事的地方。

生物医学的主导范式植根于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利用理性和分类进行**

控制是最重要的主题。生物医学模型根据下列九个基本前提进行分类:

1. 科学理性。
2. 强调个人自治而不是家庭或社会。
3. 身体就像机器,强调生理化学数据和客观的、数字化的测量。
4. 心灵/肉体分离和二元论。
5. 疾病是统一体。
6. 病人是客体及由此导致医生与病人的疏离。
7. 强调直观。
8. 从外部进行诊断和治疗。
9. 简化论(reductionism)和追求普遍性(Davis-Floyd & St. John,1998;Gordon,1988)。

根据这一模型得出的临床医学领域的日常特征包括:

1. 以男性为中心。
2. 以医生为中心。
3. 专家取向。
4. 强调资历。
5. 重视记忆。
6. 强调惯例同时高度重视"科学"和技术的过程取向。
7. 强调短期效果的治疗实践主义(therapeutic activism)。
8. 把死亡看做失败。
9. 把临床领域分为"台前"(接待员、收银员和办公室管理人员)和"台后"(医生、护士和抽血医师)。
10. "医疗时间"的限定与重要性、不可侵犯性。
11. 强调病人的满足。
12. 利益驱动体制。
13. 尊重医生—病人关系不受侵扰的自由。
14. 不能容忍其他治疗方法或手段(Davis-Floyd & St. John,1998;Helman,1994;Pfifferling,1981;Stein,1990)。

这些假设、价值观和信念说明了临床医学主导话语的特征,并在目前限定了临床研究的首选范围。通过与美国的主流文化规范高度一致,生物医学文化得到了加强和支持,这些"规范化的意识形态"包括对环境的控制、理性的决定、未来取向、生活是一个有序的、连续的整体以及个人主义,同时强调生产率、坚韧不拔、自主性和自力更生,它们在关于家庭、自我、性别同一性和衰老的日常讨论中体现出来。病人和医生都求助于这些意识形态与相关讨论从受疾病干扰的混乱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Becker,1997)。

生物医学中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声音现在已成功地在美国得到了普及,它的明确目标就是消除疼痛、痛苦和疾病。这种研究倾向于非理论性、以医院为基础和以疾病为取向。当前形势中的许多方面都代表了商品化和普遍主义的胜利,

它强调的是成本、顾客、成果、结果、有效性、标准化和证据。把结果放在中心地位的前提是告知选择(销售方法)、规定义务(制订规章的方法)和改善护理(管理方法)。对定性研究者来说,幸运的是在临床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通常被忽视的声音,如果这些声音作为证据加入到讨论中来,临床研究领域将会扩大并潜在地发生变革。

作为一个定性临床研究者,要成功地进入生物医学领域需要有一种多视角的调和模型(model of mediation)。生物医学模型是从"客观性"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定性临床研究者需要学会从三种视角看问题——生物医学的视角、内在反省的视角和第三种视角,即寻找产生和形成研究问题的多重的、相互联系的背景。就像神话中的萨满教魔术师那样(Hyde,1998;Hynes & Doty,1993;Radin,1955),我们作为善于在多种视角间斡旋的魔术师进入生物医学领域。这种调和的定性临床模型以下列九个前提为特征:

1. 压抑激动的感情,把自己置于临床领域的中心。

2. 关注在哪儿开始出现的问题。

3. 采取中庸(both/and)的方式,承认生物医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并突出缺少的东西和没表达出来的、看不到的、被忽略的东西;缓解保健与其能力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Good & Good,1993);既运用定量的客观主义,又重视定性的启示。

4. 遵循自然历史的方式,它表现了本土医学传统和历史早期的西方医学的特征,并仍是基本卫生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Harris,1989)。

5. 参与性。包括病人和医生参与到研究工作中来。

6. 保留并公布那些不合常规的反常行为、发现和数据;反常行为是改革的手段。

7. 允许"真理"是意外的而不是预先设想的、辩护性的或有说服力的。

8. 尊重临床领域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对临床行动的请求和对一致性的需要。

9. 要谦虚和耐心。这会使其他一切事情成为可能。

定性临床研究者可以把几个有影响的视角运用到临床谈心治疗(the clinical encounter)中去,它们会有助于发现那些看不到和听不到的东西,并加深对已展现的东西的认识,其中包括把疾病理解为一种文化建构(Breger & Luckmann,1967),了解其他医学模型,如生物—心理—社会或人文主义模型(biopsychosocial or humanistic model)(Engels,1977;Smith,1996)、整体主义模型(holistic model)(Gordon,1996;Weil,1988)和顺势疗法(homeopathy)(Swayne,1998),对中医(Beinfield & Korngold)、印度传统医学(Sharma & Clark,1998)和萨满疗法(Drury,1996)这些非西方式的模型,以及对人类生活中的信仰和精神意义的认识。定性研究者还认识到,治疗或治愈过程不仅发生在门诊阶段,还存在于门诊外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为围墙外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其他的视角和声音。在多视角调解模型的支撑下,你就可以进入诊所了。

诊所是一个倾诉烦恼和缓解痛苦的庇护所①。每一个临床参与者从"事实"和"感觉"中构想每一次临床谈心治疗的内在意义，并从中寻求安慰和支持。凯米勒及其家人、艾丽丝及其朋友、格罗利亚及其家人都来到诊所会见她们的医生及其助手。这些参与者把他们过去的幻影，目前在感情、身体、思想、社会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不确定性与相互矛盾的要求，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全都带到诊所来。这是临床实践的真实世界，它涉及身体、动机、意义、主体间性、价值观、个人知识、自然生态学和伦理学。然而在已发表的临床研究中大多数只包括观察性的流行病学(Feinstein, 1985; Kelsey, Thompson, & Evans, 1986; Kleinbaum, Kupper, & Morgenstern, 1982; Sackett, 1991)和临床试验设计(Meinert, 1986; Pocock, 1983)。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从当地的日常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感兴趣的变量，把这些变量放入一个受控制的研究环境中，然后试图把研究结果运用到最初的背景中去。例如，艾丽丝的临床医生知道随机控制试验说明了背疼病人短期卧床休息的临床效果(Deyo, Diehl & Rosenthal, 1986; Wiesel et al., 1980)，但在把这一知识运用到艾丽丝所遭受的特殊背疼和伤残时却遇到了困难。需要给这种谈心治疗提供的证据是很多的，理想的情况是，临床参与者对自己加以研究，然后对自己现有的知识提出异议并改变自己，这就要求他们把定性方法运用到临床经验中去。让我们加入到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研究领域中来。

加入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

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是临床护理和临床研究中非同寻常的新生事物，其前提是个人的临床专业知识必须与"从系统研究中可以获得的最佳外在性临床证据"相结合(Sackett, Richardson, Rosenberg & Haynes, 1997, p. 2)。人们认为随机临床试验(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RCTs)和总分析(对多种随机临床试验的系统评估)为用来解答治疗性干预方面的问题出示了最佳的外在性证据。一个由临床医生、方法论学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国际性群体成立了科尔克林合作组织来作为促进这种系统评估的集中、实施和传播的工具(FullertonSmith, 1995)，他们创建了科尔克林图书馆，利用光盘、互联网和《英国医学杂志》的医疗保健刊物可阅览该图书馆的资料。专业立法提案权正在发展以确保所有的内科医生，特别是在基本保健水平上，运用这种证据来指导他们的临床决策(Shaughnessy, Slawson, & Bennett, 1994; Slawson, Shaughnessy, & Bennett, 1994)，临床实践准则的急剧增加就是这些立法提案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是定性研究价值的相对下降。然而，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事实上为定性临床研究者在围墙外创造一个研究空间提供了很多机会——有这么多消失的证据！

就像我们在导言讨论乳腺癌干预试验时所说的那样，双盲的(保密的)随机临床试验有很高的内在效度，但通常其外在效度很令人怀疑，并几乎没有背景方

① 诊所一词源自希腊词 klinikos(意思为"床的")和 klinein(意思为"斜靠"或"斜躺")。从这个意义上，诊所就是一个为那些需要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是医学的、管理的、教育的、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护理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的人们提供物质的和社会的依靠场所。这种理解把诊所明确规定为一个有限制的研究题目。

面的资料。阅读任何一篇随机临床试验报告,你听到的只有干预的冷冰冰的声音和研究者偏见的微弱回音,而病人、临床医生、保险公司、律师、制定规章的政府机构、消费者利益群体、社团机构、办公室工作人员、同行和家庭混乱的不和谐声音却无法听到,当地的政治态度和反驳要求变得悄无声息。除了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之类的东西和相关的关系动力学(relationship dynamics)、人际关系和病人偏好领域,还很少有人研究过个人的临床专业知识;关于病人和临床医生在现实中是如何使用"最佳证据"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另外,有许多临床实践的灰色地带,在这些地带,有关相互对立的临床选择方面的证据是不完整的或相矛盾的(Naylor,1995),乳腺癌干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乳腺癌高危妇女应该忍受预防性的乳房切除术、终生服用它莫西芬、在有或没有常规的体格检查和严格的乳房自我检查的情况下做较频繁的胸部 X 射线检查、吃促进长寿的食物及服用抗氧化的维生素,和/或顺其自然吗?有益的定性临床研究在哪里?这里就是临床研究者的通道,我们可以加入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随机临床试验领域并扩展它的想象力。

新的黄金标准(如果完全应该有一个的话)需要把定性方法和随机临床试验一起包括在内。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领域,定性方法还有助于使学习曲线形式化、检验理论、告知假设的检验和将来的工作并促进临床试验向临床实践的转换。我们提出把多元方法的随机临床试验概念化为一个双股的 DNA 螺旋物,一股是处理背景、意义、权力和复杂事物等问题的定性方法,另一股是提供测量和概括的依据的定量方法。这两股线由研究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定性和定量两股线缠绕在一起围绕问题螺旋式前进,并建立在较好的临床护理中表现出来的理解原则。我们期待临床研究者设法找到那些正在做关于症状处理、治疗、临诊程序和社区干预方面的临床试验的人,向他们鼓吹运用定性方法的重要性。这一工作也将有助于鉴定新的成果,即把强调的重点从个别治愈及消除痛苦和疾病转向护理、发展、生活质量、更有益于健康的关系和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与生态系统。

已有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乔利(Jolly)、布莱德利(Bradley)、沙普(Sharp)、史密斯(Smith)和曼特(Mant)运用随机临床试验技术检查了一项由护士领导的干预行动,该行动旨在帮助那些患过心脏病而存活下来的患者实施一项康复计划和改善卫生习惯。定量的随机临床试验产生的是毫无意义的统计结果。幸运的是,威尔斯(Wiles,1998)在试验的第二周和第五个月对 25 个参与者做了定性的深度访谈研究并发现了几个有临床价值的结果。在第二周,大多数患者都相信关于他们所患疾病和所需采取的预防措施的官方报告。到了第五个月,大多数患者失去了对官方报告的这种信任,因为它不能充分说明他们心脏病发作的不规律性、患病的严重程度和康复水平。许多病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存活是因为他们的心脏病是轻微的,而且,由于医生安慰他们一切都会在六周内恢复正常,病人们以为他们在六周内能够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方式。另一个关于随机临床试验的 DNA 模型的例子是有关戒烟干预研究的,它是在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的威尔姆斯(Willms)和威尔逊(Wilson)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中找到的。这些研究者了解到,对戒烟者来说,病人赋予香烟的意义比尼古丁口香糖和忠告所起的作用更大(Willms,1991;Willms et al.,1990;Wilson et al.,1988)。让我们用定性的问题和方法来对基因组的内部展开想象力。

作为围墙上展开想象力的窗口的以临床为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在卫生保健背景中寻求支持的临床医生和病人面临四个临床实践中的根本性问题:

1. 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2.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谁拥有什么权力?
4.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和权力三者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

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分为感情的、身体的/行为的、概念的/象征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和精神的/精力的这些小的方面。例如,在凯米勒、格罗利亚和艾丽丝的故事中就有大量关于支持的问题。忍受乳腺癌高风险的情绪体验是什么?在预防乳腺癌方面它莫西芬比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效吗?它将怎样影响我的家庭和社会团体?对病人和临床医生来说有乳腺癌患病风险的生存经验和意义是什么?在作为"有组织的团体"的医务所中发生了哪些有助于或妨碍对凯米勒、格罗利亚和艾丽丝护理的事情?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对人的生活或生平的支持方面的。乳腺癌的解释模型与患病风险的体验和后果相适应吗?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如何与乳腺癌的患病风险相适应并对它莫西芬做出反应?病人和临床医生对乳腺癌的期望、失望、恐惧和不安全感是什么?过去的经验如何与眼前有乳腺癌患病风险或参与临床试验的经历联系起来?有一些是关于人们是如何得到支持的有关权力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护理组织背景下,当乳腺癌高危病人来找临床医生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感情上的苦恼是如何表露或压抑的?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有什么样的模式?谁影响了谁?病人或临床医生的权力是如何得到削弱或加强的(Fahy & Smith,1999)?当地的政治态度是什么?有一些问题是有关关系支持方面的。在临床谈心治疗中什么样的行动对家庭关系起促进作用?个人、家庭和诊所作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这些问题中有许多只有在定性方法进入临床研究领域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这就是所需要的证据!我们需要把这四种问题类型应用到今后十年中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去,如限量与成本,生物技术与基因产品,以及非常规医学和生物医学经常发生的冲突。卫生保健的分配如何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情感、身体、思想、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后果是什么?上述这些问题可以向许多新的(和旧的)生物技术产品提出来。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权力在谁手中,它是如何被运用和被抵制的?受其影响并作为技术运用中介的关系和复杂系统是什么?未预料到的后果是什么?病人如何对治疗做出决定?在把他们的身体同时看做花园和机器时他们是如何在二者间勉强保持平衡的?还有什么其他隐喻被用过,这些隐喻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结果的,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问

题是无穷并具有挑战性的。基本保健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由其背景决定的职业,在目前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形式中缺乏背景因素;它迫切地需要定性方法。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理论的应用

多元方法的随机临床试验还为临床研究者把理论重新引进临床研究创造了机会。在标准的定量临床研究中,理论经常被忽略,而这常常导致无根据的事后理论说明,定性资料有助于揭示隐含的理论假设并提出新的可能出现的结果和关系。理论还有助于在主流生物医学领域和其他文化领域间架起一座桥梁。最近在医学人类学家、现象学家、符号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关于"身体(body)"比喻的理论探讨对生物医学关于人体及其边界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并突出了远远超出肉体范围的由文化和社会建构的"身体"方面(Csordas,1994;Gordon,1990;Johnson,1987;Kirmayer,1992;Martin,1994;Scheper-Hughes & Locke,1987;Shildrick,1997;Turner,1992)。有个人身体、社会身体和身体政治,有医学身体、作为身体的地球和与人交际的身体。身体被想象为可变的、有漏洞的或兴奋的,被想象为机器或花园,这些想象塑造了社会身体、身体政治和世界身体并同时被后者所塑造。如富兰克(Frank,1995)把讲故事作为恢复有关身体的话语的手段,身体的症状被理解为包括文化方面的创伤对身体的影响。就像这些身体创造了历史一样,症状还扩展到社会领域。由于它们的复杂性,描述如专业组织之类的社会身体特征的最佳方法通常是利用比喻,它们可能被描述为大脑、系统、组织或丑陋的脸(Morgan,1998)。定性方法成为聆听这些故事及其相关比喻、在关系中护理以及抵制制度化医学的殖民话语的一个基本源泉。对身体及其在疾病与健康的产生与表现中所占地位的研究成为临床研究中的核心策略,并使得范式的结合和临床研究领域的开放成为可能。

跨学科的合作

这一开放的临床研究领域需要合作,而这种合作强调的是多元联系和跨学科关系的不同类型。联系可以是垂直的,即人们在不同的层次或等级间(如分子、个人、地方和地区层次)上下流动;联系也可以是水平的,即在诸如医疗行业、学校和地方商行之类的社会组织的同一层次的不同部分间沟通;联系还可以是历时性的或不同时期的。最后,还有许多理论联系,其中包括那些与"公众"、执业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参与者的理论联系(Miller,1994)。

多元方法与纵向策略

配合这种多元方法,跨学科研究要求通才(generalist)的研究者具有运用批判的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plism)框架的技巧和思想倾向(Coward,1990;Miller,1994)。通才研究者的这些技巧与视角包括商谈、转译、理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社会取向及以临床实践作为支持并扎根于临床实践。运用批判的多元

主义框架,这些技巧和观点被成功地付诸实践。批判的多元主义认为多元的认识方法是必要的,并且要求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和选择。多元主义不仅指多元方法,还指多元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多元的参与者、多元的研究和多元的范式与视角。批判指的是以当地历史、权力角色和统治模式以及不同方法相互补充为基础,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批判性的选择。有六个原则对批判多元论者的复杂工作很有指导意义:①懂得你为什么选择去做某件事,②保持方法和范式的完整性,③注意分析的单位,④记住研究的问题,⑤选择那些优缺点相互补充的认识方法,⑥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对方法论进行评价。批判多元主义对于参与性临床研究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参考框架。

参与和辩护策略

参与性研究(Macaulay et al.,1998,第 23 章;Thesen & Kuzel,1999)提供了对研究领域进行改革的另一条途径,并带着我们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研究问题上来。我们假设临床研究者与临床参与者一起研究临床经验中出现的问题,注意并揭示出所有潜在的价值观和假设,而且使研究结果主要针对临床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把临床研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临床经验上并重新限定它的边界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这是谁的问题?临床领域中隐含的假设被揭示出来了吗?研究结果是打算为谁服务的(即谁是受益者或拥护者)?病人和临床医生被邀来用任何必要的方法去研究他们自己和/或彼此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临床研究者和临床参与者共同进行研究,使得主导范式的家长式偏见的基础受到削弱,并使其假设在研究中公开化。这是情境性的知识,是“某个特别的地方”(Haraway,1991,p. 196),这里为临床研究具有范围更大、内容更丰富的视野创造了空间。

要获得这么多类型的证据要求临床研究者参与到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领域中,发展跨学科的合作,以批判多元主义者的概念化方式来运用多元方法,运用桥梁式的比喻和理论(如“身体”),并不断强调参与和辩护策略。运用这些策略,临床研究领域就会为通才临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开放。定性研究者已经看到和听到了凯米勒、格罗利亚和艾丽丝的故事和痛苦,但是它们是用一种病人和临床医生不理解的语言重述的(如,Fisher,1986;Fisher & Todd,1983;Lazarus,1988;Mishler,1984;West,1984;Williams,1984),临床医生和病人都不懂得“民族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诠释学”、“现象学”、“符号语言学(semiotics)”和“解释互动主义(interpretive interationism)”的语言。大多数定性临床研究发表时所用的语言和发表的地方是有利于研究者,而不是病人和执业医生的。定性研究者要求临床医生参与、倾听和讲述“生活世界的话语”(Mishler,1984),我们要求临床定性研究者也做到这一点。

提供工具和转译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提供把定性方法和传统运用到临床研究领域所必需的工具和转译。开头我们先对定性研究过程和临床过程加以比较，这种近似直接的一致性使得临床研究者能够让临床医生和病人很清楚地了解定性方法。比较之后是对定性方法以及如何在临床背景中进行多元方法的研究设计做一简要的概述。最后，我们用一个临床研究实例（它运用了所讨论的一些策略）把所有的方面加以综合。

研究过程

当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临床经验中出现的问题上时，临床研究领域就产生了，从而为运用各种定性资料搜集和分析方法呈现出许多可能性（这些定性方法中有许多在该书的其他部分出现过，并且我们在为基本保健的定性研究者编写的一本教科书中对它们有更详细的论述。参见：Crabtree & Miller，1999a）。对研究者提出的挑战是把定性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转译为清晰的、没有行话的语言，同时不牺牲以围墙背后的学科对话为基础的方法的完整性。这里所说的转译的一个根本原则是：问题和临床背景是第一位的，方法必须与临床背景和临床问题相适应。解释性社会科学传统上对多元方法有顾虑，是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把定性方法仅作为一种从属于实证主义范式或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想象一个临床研究领域，在这里定性方法得以运用并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和批判/生态学范式包含在内。关键是要认识到定性研究过程和临床过程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像它在基本卫生保健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图 23.1 是对以关系为中心的临床方法（RCCM）的一个图解，是一种教授和学习基本保健临床谈心治疗的新兴工具（Stewart et al.，1995；Tresolini & Pew-Fetzer Task Force，1994）。注意这一过程包括四个不同的步骤——探讨、理解、发现共同的基础和自我反省，这四个步骤依次进行，但在任一特定的谈心治疗中所有的步骤都要与其他步骤一起重复，对某一特定的疾病事件来说，整个过程通常要循环许多次，如慢性疾病保健将终生与医生打交道，而耳朵感染可能只需要与医生打一至三次交道（即把这种临床方法循环重复一、二或三次）。

例如，当凯米勒诉说她的乳腺癌扩散的事情时，她和她的临床医生就开始了探讨特定疾病问题（如新发现的肿块）的谈心治疗。但她们也共同感受凯米勒的恐惧和期望，并把这些与凯米勒正在发展的病史相联系。同时，临床医生也在寻求理解所有这些如何与凯米勒的家庭、社会和生态学背景相联系。从探讨和自我反省中获得的新信息为正在形成的理解提供了信息，反过来，又提出了要问的新问题。在谈心治疗开始后不久，凯米勒和她的临床医生也开始寻找关于最关心的问题、护理的目标和他们各自的角色的共同基础。这一步骤还和其他步骤相互提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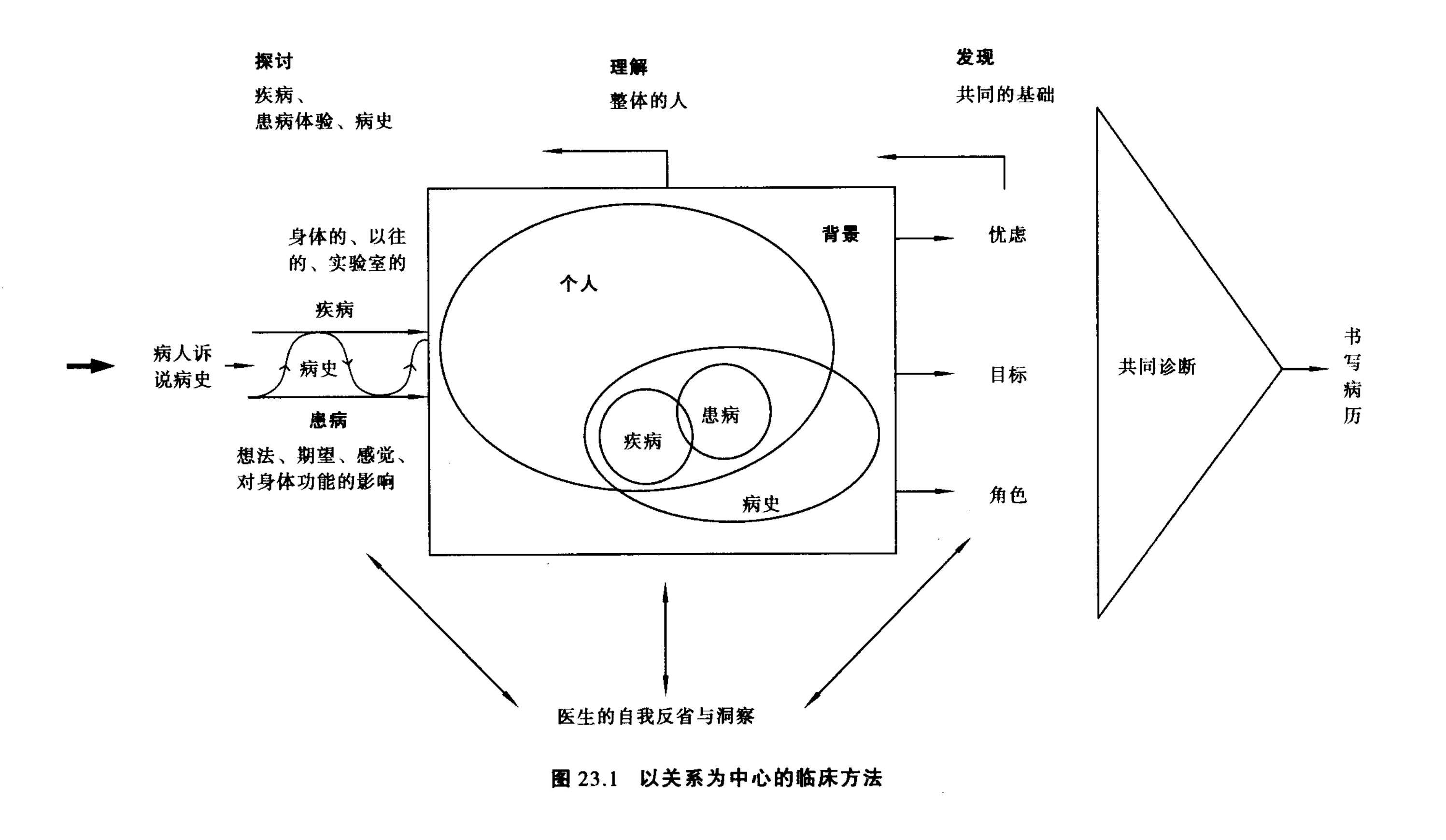


图 23.1 以关系为中心的临床方法

运用这种临床方法感觉像用快进方式做定性研究——而它就是这样。以关系为中心的临床方法的四个临床步骤与定性研究的四个步骤直接对应：资料收集、分析、解释和反省，这些对应的步骤用图 23.2 来说明（研究步骤上面括号里的是对应的临床步骤）。如果我们用定性研究的语言来描述临床过程，其对应过程和定性行话的转译就变得更清晰了。通过运用有目的的或信息丰富的抽样方法来搜集资料，临床医生开始了他们的谈心治疗。他们把访谈、参与性观察和涉及的重点放在与病人所忧虑的或所讲的事情有关的可能的解释上。这种探讨寻找的是“疾病”信息，遵循的是生物医学模型，但这一过程也在寻求对病人的病史和他或她的患病体验的理解，特别是对病人关于自己所关心的健康问题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的想法、期望和感觉。在继续搜集其他信息的同时临床医生立即就开始了对资料的分析。这种分析寻求的是在病人的生活世界背景中——病人的个人、家庭、社会和生态学故事，理解他或她的忧虑。这种理解是围绕着敏感的概念、对话的类型、个人的经验模板（templates）或原本（scripts）以及所寻找的被已有证据证实的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运用参与性方案，临床医生与病人（或其他人）周期性地达成新的理解并一起寻求共同的解释。在这个反复过程的始终，临床医生都在用自我反省、个人感觉和直觉来为资料的搜集、分析和解释提供信息。当执业医生和病人一致认为他们对执行初步的行动计划已有了足够的资料（即饱和），出诊就结束了，其成果是病人的行动计划和由医生撰写（或口述）的对谈心治疗的描述性报告。临床医生的报告偶尔也受到同行的评论。这听起来、看起来和感觉像定性研究——只是大多数临床医生不知道罢了，研究者需要用临床的语言来转译定性的方法和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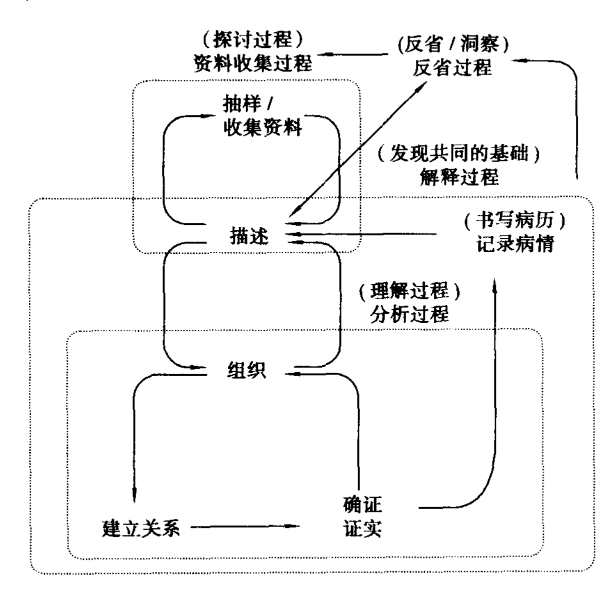


图 23.2 定性研究过程及其临床对应过程

注意到临床护理还如何反映了前面所述的与 DNA 相似的、多元方法的随机

临床试验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在二者中,对行动的简单化的一致性(“疾病”)与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性(“生病”与“病史”)处于动态的平衡中,而这种平衡是通过对护理的要求、通过研究的问题来保持的。当关系中和更大的卫生保健系统中对权力的分享和理解本来就不平衡的时候(如该系统就是),这种情况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多种声音必须都被披露出来并得到人们的关注。在相关人员的复杂关系中,在特定的生物文化范围内,各种观点交织在一起。这些方法必须与临床过程相对应并为自我批判和修正做好准备,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与反省是相互贯穿的。

研究设计

临床研究中的研究设计本身要求多元方法的思考或批判的多元主义,同时对由研究问题和临床背景所推动的资料搜集、分析和解释方法进行特定的结合。在对每一项研究加以设计,并且常常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对研究设计加以改进而逐步发展成为一项研究的情况下,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有无限的可能性。在临床研究中,设计可能在整体上是定性的或定量的,其中包括只运用一类方法,但设计却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的多元方法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Tashakkori & Teddlie,1998)。在研究特定的临床问题时,临床研究者必须坚持多元方法的思考并在方法的组合与协调方面不拘一格。

有许多问题和背景要求只用一种方法,然而,这种单一方法的设计仍然应该放在多元方法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如果研究者在着手研究问题并决定只有某一种方法适合所研究的问题前考虑到所有可能用到的方法,他或她就是在进行多元方法的思考。大多数临床研究问题是复杂的并要求运用多种方法来加以研究。由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特定的多元方法一般是根据多元方法设计的类型学(typology)表现出来的(Stange,Miller,Crabtree,O'Connor & Zyzanski,1994)。在现实的实践中,把这些精简为类型学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并倾向于把研究过程的复杂变化过分简单化。在对一项研究进行构思时,临床研究者从各种资料搜集和分析工具中产生一项设计,它很像小孩用组装式玩具棒和轮子或垒高、拼装玩具砖块进行的创造。一个小孩可能拼装出很多飞机、汽车、风车和大楼,但很少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多元方法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过程的纵向性质。大多数临床研究问题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无法在一项研究中得到解决。在设计过程中,临床研究者经常要在解决问题的要求和完成研究的可行性之间进行充分的权衡。潜在地缩小目标会损害问题的完整性,然而试图完成太多的任务会使人无力对付并可能在资金上承受不起。因此,在研究设计的构思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决定做一系列的纵向研究以满足较大的研究议程的要求。如何使一项设计最终成为一个整体依赖于研究的问题和环境。史奈登(Snadden)和布朗(Brown)很想了解对成年哮喘病患者的污名化所产生的影响,回答这个问题要求他们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他们必须鉴别那些自称被污辱的哮喘病患者;接着,他们必须探究这种污辱

对病人生活的所谓影响。研究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先用一个测量关于哮喘病态度的问卷来鉴别报告了高水平耻辱感的回答者,然后用定性的访谈和分析方法来对这些个人进行访谈。

也可以用多种方式把多种方法在某一项研究中直接结合。例如,如果针对同一研究人群的两项相互独立的研究同时进行并且研究结果一致,那么把二者结合起来有时可能是有益的。这是为多元方法的随机临床试验所建议的方法(Wiles,1998;Willms,1991)。另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多元方法研究的设计方式是在某一项研究中把多种方法进行更紧密的结合。如鲍坎、夸克和苏里万(Borkan,Quirk & Sullivan,1991)注意到髋骨骨折对许多老年患者来说经常是走向死亡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对什么因素导致了那些病人与其他只有很少并发症的痊愈病人的区别感到很疑惑,而研究文献并没有揭示出任何明显的传统生物医学因素。研究者很想知道病人对自己骨折的叙述是否和他们的结局有关系。他们采用了流行病学的抽样设计并抽取了住院的髋骨骨折老年病人的样本,多种生物医学指标被作为自变量加以测量,同时把恢复健康的效果作为因变量来加以测量。这里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该项设计将确保被预期的临床读者所接受。该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研究者还对每个病人如何在其生活经历中理解髋骨骨折进行了深度访谈。几种明显不同的伤害叙述出现了。研究者对这些叙述做了归类后把它们作为另一个自变量放入统计结果模型中,发现叙述类型对恢复健康的结果具有最强的预测力。

在与临床医生和病人讨论定性研究设计时,我们把行话简单化了。我们把资料搜集方法分为访谈、观察和文献回顾(其中包括录像带),又把访谈进一步细分为深度的、焦点小组的和民族志的(或重要的信息提供者)(Mitchell,1998),把参与性观察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把定性分析的许多传统、技术和“令人迷惑的”行话表达为“解释的艺术(dance of interpretation)”,其中有三种理想化的组织方式——投入/具体化(immersion/crystallization)、编辑和模板(template)(详见图23.3;亦可参见:Miller & Crabtree,1999a)——促进了不断变化的、创造性的、反复而又有一定规则的定性解释技巧。在某一特定研究项目不同的搜集/解释反复中的某一阶段,三种组织方式可能都会用到。

综 合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个关于家庭医学实践模式的个案研究以进一步说明多元方法框架的应用(Crabtree、Miller、Aita、Flocke, & Stange, 1998; Stange et al., 1998),该研究受大型的联邦基金的资助——这一事实证明了多元方法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对基本保健的直接观察(DOPC)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社区诊所中病人找家庭医生就诊的描述来说明临床实践中的“黑箱”,其研究重点是预防卫生服务的供给。这项大型的定量的抽样的描述性研究运用修正过的、高度结构化的Davis观察编码方法(Callahan & Bertakis,1991)以及病人求诊、病人退出调查、医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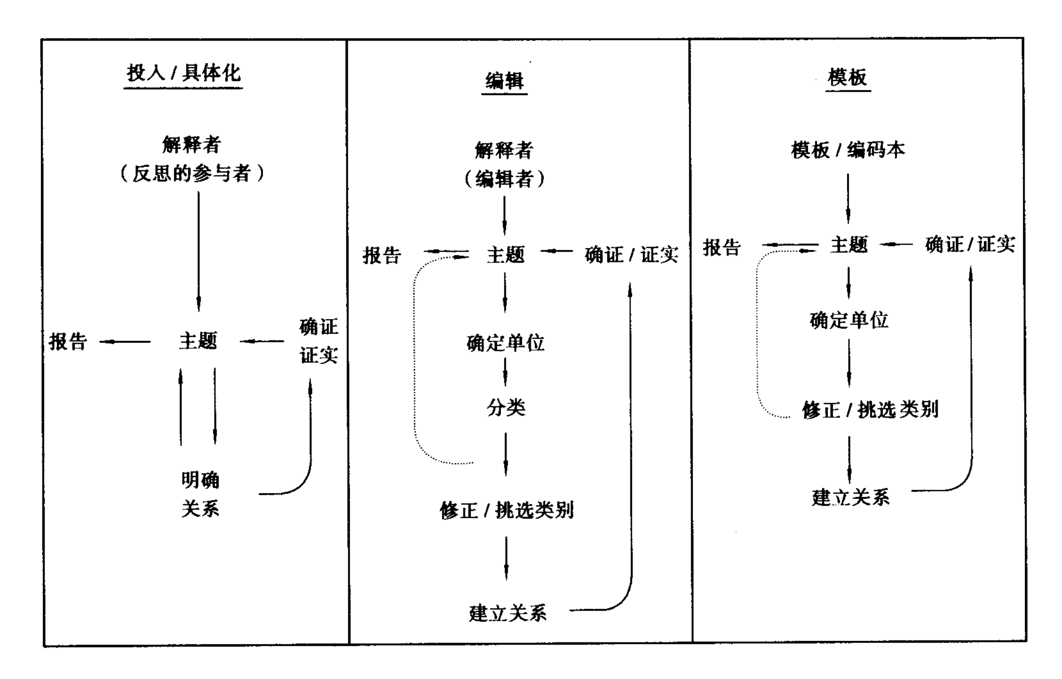


图 23.3 三种分析的组织方式

来源:Crabtree & Miller,1999a

录检查、账单资料抽取、内科医生调查表方面的清单,对病人求诊进行直接观察,并把重点放在门诊病人求诊的内容和背景上。为了对这些定量资料进行补充并提高其价值,作为研究人员的护士在每一次求诊之后立即口述实地观察笔记以对研究变量做更丰富的描述。这些民族志资料是建立在印象基础上的,并根据关键特征,如执业地点、职责关系及诊所如何发挥作用,把重点放在对医疗实践的描述上。这些资料最后共有2 000多页的实地笔记,它们来自对 84 项不同的家庭医生业务中的 138 位内科医生所做的观察。这些定量描述对家庭医学实践的全部内容(Stange et al. ,1998)及家庭、医生业务的其他许多方面(*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998 年 5 月版的全部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认识。定性实地笔记列出了一长串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理解在日常基础上,特别是预防服务的提供方面医生的业务是如何运作的非常重要(Crabtree et al. ,1998)。这些定性资料还被用于阐明一个建立在综合理论基础上的关于执业组织的新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为两项后续的受联邦基金资助的研究打下了基础(Miller, Crabtree, McDaniel & Stange,1998)。这两项新研究包括运用民族志技术对家庭医生业务的深度个案比较研究和运用综合理论所做的多元方法的临床试验,该试验被作为改进家庭医生业务中预防卫生服务供给的一项干预策略。另外,这两项研究的参与性更强,并在分析和反馈中直接涉及医生业务。这三项大型研究提供了以资料为基础的对家庭医生业务的认识,并大大超越了他们所关注的预防医学范围。这种建立在先前研究结果基础上的从多元方法的观察性研究到深度的个案比较研究再到干预性试验的发展,显示了多元地点、多元方法的合作性研究的潜力。

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都采用了合作研究小组的方式，该小组包含了内科医生、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一起对研究进行设计，在研究过程中经常聚在一起评述定性资料并对研究加以调整，还做了彻底的反省工作（Barry, Britten, Barber, Bradley & Stevenson, 1999）。这一长期合作小组使得该群体能够对定性方法和操作范式的应用加以扩展。

讲故事

写作的策略

一些特殊的写作策略对于提高定性临床研究的表达技巧及增强对定性临床研究的接受能力是很有用的（Richardson, 1990; Wolcott, 1990），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是作者要避免行话，语言应简单、具体。运用类型学和连续统作为修辞框架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从开始就表现出是理性的和可测量的，其质量受到传统的临床研究者很高的评价。研究者可以借助强调其研究的文化/历史和/或归纳意义，以及以现实临床经验为基础来支持其研究的解释部分。在表达方式上运用生物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直观模式（借助表格、图表、图解和数据模型的应用）或临床中所熟悉的病例报告叙述模式对研究者也是很有益的。后者通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来记录病情（Hawkins, 1993），或由医生用第一人称对其病人的情况加以叙述（Loxterkamp, 1997; Sacks, 1984）。

临床研究的大多数读者把“效度”、“信度”和“概括性”视为科学的根本信条，这导致了对偏见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其合作的多元方法研究的报告中，达里和麦克唐纳德（Daly & McDonald, 1992）描述了心回波描记术（echocardiography）对病人的自我观念所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经历描述了在围墙边进行对话会如何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医生们把定性研究方法看做是……容易有偏见的。高度结构化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得到有效的运用……这些方法对多学科小组中的‘自我保护’可能是必要的”（p. 416）。达里和麦克唐纳德介绍了定性研究者可用来从围墙后转译他们的知识及在围墙边进行对话的策略。定量方法的方法论准则对定性临床研究者是没有意义的。定性临床研究的证明规则可以为临床读者转译成讲述在方法论、修辞和临床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

讲述具有说服力的故事

一个在方法论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回答的问题是，研究是如何设计和进行的？研究者阐明其研究设计、抽样策略、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方法是如何与问题和研究背景相适应以及为什么相适应（就像该章前面讨论的那样）是很重要的，当研究设计是抽样的、预期的、由病人控制的，或从观察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与其

他某项设计相似的时候,对此加以简要的提及对研究者是很有益处的(Ward,1993)。他或她还应该提出具体的技术(当这些技术是可应用的时候),如三角测量、成员登记和寻找证伪的证据(Guba & Lincoln,1989;Kuzel & Like,1991)。

对临床经验来说,关系是本质性的东西。卡恩(Kahn,1993)提出了一种用于评价临床定性研究在方法论方面适当性的关系语言。一个在方法论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关系: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注意在研究过程中二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者与资料的关系(特别是研究经验的循环或反复方面);研究者与读者的关系(所以著者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如果研究者打算进入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领域,方法论的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帮助基本保健临床医生成为"信息专家"或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专家的一个流行方法是教会他们赏识富有诗意的东西或"以病人为取向的重要证据"(Slawson et al. ,1994)。在第一阶段,临床医生浏览一篇文章的摘要,看其结果是否与日常临床实践中常见的或大量的结果有关并对病人很重要,以及其结果是否可能潜在地改变他或她目前的临床实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临床医生就采取第二个步骤:他或她阅读这篇文章并判断其结论在方法论上是否合理。定量研究有简单的一页清单,下面是由我们改进的目前用于对定性文章进行评估的清单:

1. 方法是否与问题相适合?
2. 抽样是否恰当,信息是否丰富?
3. 研究过程是否具有重复性?
4. 解释过程是否缜密,对其描述是否清晰?
5. 是否提出了反省?

一个在方法论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不是一个让实证主义者满意的故事,而是一个使定性研究同行、临床医生和病人满意的故事。因此运用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清单是很有帮助的,但必须有很大的灵活性使得它们对定性研究不会起阻碍作用(Chapple & Rogers,1998)。上述方法是与奥尔瑟以德和约翰逊(Altheide & Johnson,1998)的"反省说明的有效性"思想相一致的,在这里,研究者或研究小组、理解过程和研究问题或主题是相互作用的,重点在于意义是如何建构的,这是临床护理中对效度处理的一个很好的描述。

一个在修辞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回答的问题是,该文本如何具有可信性?读者被故事所吸引并开始想象这个故事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结论对他们就更有意义了。写作的语言与风格应为读者所熟悉,所选择的一些对解释加以举例说明的引证和观察资料也应反映读者的经验和/或价值观。一个在修辞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使读者确信作者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邦奇(Bunge,1961)对一个可信的故事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做过评论。

一个在临床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回答的问题是,该研究具有临床意义吗?一个故事如果成功地表现了临床研究领域中的三个重要特征,它在临床方面就是有说服力的。研究问题必须与临床参与者有重要关系,而结果必须是专门解

答该问题的，这通常意味着把注意力指向临床领域的实际干预和政策焦点方面。读者或受益者也是与研究结果有重要关系的临床参与者，这一点在文章中应明显地表现出来。最后，文章揭示出关于临床参与者的身体、生活和/或权力的自然/行为、社会/情感、文化/历史或精神方面的假设。

如果方法与研究问题相适合并明确提出研究者与被调查者、资料及读者的关系，如果读者在研究结果中认出自己，以及研究问题和结果与临床参与者有重要关系，定性临床研究就是具有说服力的。如果由一个合作小组来从事研究，所有这些标准就更容易得到满足了。当该小组包括临床参与者时，一个讨论群体就产生了，围墙边的对话就可以在这里开始了(Denz-Penhey & Murdoch,1993)。

到哪里去讲故事

定性临床研究广泛地出现和发表在基本保健内科医学和家庭医学、护理、社会工作及教育研究的书籍和杂志上，过去十年中的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所做的特殊努力，即利用业务通讯和强调临床有效性的方法方面的出版物，在专业会议的研讨会上转译和介绍定性研究。定性临床研究现在不断出现在临床杂志上，特别是在基本保健领域。《定性卫生研究》(*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定性调查》(*Qualitative Inquiry*)与《文化、医学和精神病学》(*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带着其几乎独有的定性临床研究的鲜明色彩，起着桥梁性的作用。所有的基本保健杂志都有在定性研究方面受过训练的校阅者并乐于发表定性研究成果。《家庭医生杂志》现在在其网站上为增补资料提供了“发表”的场所，这使得作者可以根据医学杂志的篇幅要求对文章进行压缩。定性临床研究者的下一步工作是在更大的一般性医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cine*)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并改进与病人群体交流研究成果的方式。世界范围网络的应用可能成为在病人和更广泛的群体面前展示研究成果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工具。

总　结

有许多临床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寻求支持和行使权力的场所。临床领域和人们对支持的需要表现在护理、基本卫生保健、特殊医疗护理、行政管理、教育、社会工作、家庭治疗、精神卫生护理、公共卫生、工程和法律方面，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来自于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从事定性临床研究的问题、背景和参与者。这是对话开始的地方，对研究的评判标准是它所产生的临床效果。

人们不断地汇合在临床领域，希望给人提供安慰和支持，但建立的关系和模式现在更加多元化、更令人迷惑并通常代价过高。对使用途径和代价的关注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承认在临床医学中女性的经验被滥用和肢解，病人体验的权威

逐渐丧失,临床医生无助的被束缚感越来越强烈,以及越来越多的问题、突变性、文化冲突和局部社会生态的恶化,我们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对它们加以解决。了解其可能性是不够的,通常也是不适当的。故事、独特性和背景也是基本的要素,没有它们,保健和道德讨论的范围仍然是狭窄的,我们的身体和生活仍然是不完整的,权力仍然是强制性的。凯米勒仍然被隔离在单乳妇女的圈子里,她和我们需要定性研究,她和我们需要在临床领域恢复关系的地位。

十年过去了,凯米勒、格罗利亚和艾丽丝现在是一个社区卫生顾问小组的成员,为几个当地的基本保健诊所与一个地区性的卫生网络和医院系统提供咨询。她们加入了一个由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当地雇主、制药企业和一个来自国家卫生学会的成员组成的跨学科小组。该小组正在设计一项由国家卫生学会和一个当地基金会联合资助的新的地域性研究行动,该研究将运用多元方法的随机临床试验设计(其中包括定性方法的广泛应用)来检验一种有前途的预防乳腺癌的新药。这些妇女的女儿将加入由当地控制的研究中。定性资料的分析将独立于随机临床试验的分析并贯穿于试验的全过程。凯米勒、格罗利亚和艾丽丝是定性分析小组的成员,她们有权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终止该项研究。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定性方法,但要把参与性、合作性和多元方法结合在一起。定性临床研究者必须从围墙后走出来,把临床经验与研究问题相结合,并在围墙边的讨论群体中形成谦逊和诚实的习惯。这是一种危险的但又令人兴奋的谈话,因为它预示着没有人能够不发生变化。要谨防对控制、对测量的盲目崇拜,如果需要测量,应坚持邀请病人和临床医生参与到研究过程中,坚持测量痛苦和喜好。要把当地的生态关系考虑在内,要把结果复杂化,要测量生活的依恋与超脱、神秘与魅力、生命的瞬间与节律所起的作用,要测量治疗的过程。我们的研究需要冒险在临床领域中恢复关系的地位。临床研究通过转化为实践可以消除分歧,最终,所有的围墙都崩塌,权力转移,和解开始。我们离那个危险的和未发觉的伊甸园不会更近了。感谢上苍,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们正在开始一起理解生活。



参考文献

Altheide, D. L., & Johnson, J. M. (1998).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pp. 283-312).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er, H. A. (1993). How critical can clinical anthropology be? *Medical Anthropology*, 15, 299-317.

Barry, C. A., Britten, N., Barber, N., Bradley, C., & Stevenson, F. (1999). Using reflexivity to optimize teamwork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 26-44.

Becker, G. (1997). *Disrupted lives: How people create meaning in a chaotic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infield, H., & Korngold, E. (1991).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 guide to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Ballantine.

Berg, D. N., & Smith, K. K. (Eds.). (1988). *The self in social inquiry: Researching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Borkan, J. M., Quirk, M., & Sullivan, M. (1991). Finding meaning after the fall: Injury narratives from elderly hip fracture patient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3, 947-957.

Brewer, J., & Hunter, A. (1989). *Multimethod research: A synthesis of styles.* Newbury Park, CA: Sage.

Brueggemann, W. (1991). *Interpretation and obedience: From faithful reading to faithful living.* Minneapolis: Fortress.

Bunge, M. (1961). The weight of simplicit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aying of scientific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28, 120-149.

Burawoy, M., Burton, A., Ferguson, A. A., Fox, K. J., Gamson, J., Gartrell, N., Hurst, L., Kurzman, C., Salzinger, L., Schiffman, J., & Ui, S.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lahan, E. J., & Bertakis, K. D. (1991).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Davis observation code. *Family Medicine*, 23, 19-24.

Chapple, A., & Rogers, A. (1998). Explicit guidelin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 defense of the "soft" option, or a form of sociological imperialism? *Family Practice*, 15, 556-561.

Chrisman, N. J. (1977). The health seeking process: An approach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llnes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 351-377.

Chrisman, N. J., & Maretzki, T. W. (Eds.). (1982). *Clinically applie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sts in health science settings.* Boston: D. Reidel.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ward, D. D. (1990). Critical multiplism: A research strategy for nursing science. *Image: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22 (3), 163-167.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Eds.). (1999a).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1999b). Researching practice settings: The case study approach. Iii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abtree, B. F., Miller, W. L., Aita, V., Flocke, S. A., & Stange, K. C. (1998). Primary care practice organization and preventive services delivery: A qual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6, 403-409.

Csordas, T. (Ed.). (1994).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ly, J., & McDonald, I. (1992). Covering your back: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linical setting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 416-438.

Davis-Floyd, R., & St. John, G. (1998). *From doctor to healer: The transformative journe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Denz-Penhey, H., & Murdoch, J. C. (1993). Service delivery for people with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A pilot action research study. *Family Practice*, 10, 14-18.

Deyo, R. A., Diehl, A. K., & Rosenthal, M. (1986). How many days of bedrest for acute low back pai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5, 1064-1070.

Diers, D. (1979). *Research in nursing practic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Drury, N. (1996). *Shamanism.* Shaftesbury, England: Element.

Engels, G. L. (1977).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 *Science*, 196, 129-136.

Fabrega, H., Jr. (1976). The function of medical care systems: A log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0, 108-119.

Fabrega, H., Jr. (1979). The ethnography of illn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3A, 565-575.

Fahy, K., & Smith, P. (1999). From the sick role to subject positions: A new approach to the medical encounter. *Health*, 3(1), 71-93.

Feinstein, A. R. (1985). *Clinical epidemiology: The architecture of clinic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Fisher, B., Costantino, J. P., Wickerham, D. L., Redmond, C. K., Kavanah, M., Cronin, W. M., Vogel, V., Robidoux, A., Dimitrov, N., Atkins, J., Daly, M., Wieand, S., Tan-Chiu, E., Ford, L., & Wolmark, N. (1998). Tamoxifen for prevention of breast cancer: Report of the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P-1 Stud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90, 1371-1388.

Fisher, S. (1986). *In the patient's best interest: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medical decisio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isher, S., & Todd, A. D. (Eds.). (198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Foster, G. M. (1974). Medical anthropology: Some contrasts with medical soci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6, 1-6.

Foster, G. M., & Anderson, B. G. (1978).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Frank, A. W.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y, R. (1994). *Eye juggling: 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a looking glass and a glass pan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Freymann, J. G. (1989). The public's health care paradigm is shifting: Medicine must swing with it.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4, 313-319.

Fullerton-Smith, I. (1995). How members of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prepare and maintain systematic reviews of the effects of health car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1, 7-8.

Good, B. J. (1994).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 B. J., & Good, M. D. (1981). The meaning of symptoms: A cultural hermeneutic model for clinical practice. In L. Eisenberg & A. M. Kleinman (Eds.),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science for medicine* (pp. 165-196). Boston: D. Reidel.

Good, B. J., & Good, M. D. (1993). "Learning medicine": The constructing of medical knowledge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S. Lindenbaum & M. Lock (Eds.),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pp. 81-10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rdon, D. R. (1988). Tenacious assumptions in Western medicine. In M. Lock & D. R. Gordon (Eds.), *Biomedicine examined* (pp. 19-56). Boston: D. Reidel.

Gordon, D. R. (1990). Embodying illness, embodying canc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4, 275-297.

Gordon, J. (1996). *Manifesto for a new medicine: Your guide to healing partnerships and the wise use of alternative therap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Haraway, D. J. (1993). 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 Determina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 In S. Lindenbaum & M. Lock (Eds.),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pp. 364-4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ris, C. M. (1989). Seeing sunflow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39, 313-319.

Hawkins, A. H. (1993). *Reconstructing illness: Studies in pathography.*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Helman, C. G. (1994). *Culture, health and illness.*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Hyde, L. (1998). *Trickster makes this world: Mischief, myth, and ar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Hynes, W. J., & Doty, W. G. (Eds.). (1993). *Mythical trickster figures: Contours, contexts, and criticism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Jackson, M. (1989). *Paths toward a clearing: 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lly, K., Bradley, F., Sharp, S., Smith, H., & Mant, D. (1998). Follow-up care in general practice of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or angina pectoris: Initial results of the SHIP trial. *Family practice*, 15, 548-555.

Kahn, D. L. (1993). Ways of discuss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nursing research.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5, 122-126.

Kelsey, J. L., Thompson, W. D., & Evans, A. S. (1986). *Methods in observational epidem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rmayer, L. J. (1992). The body's insistence on meaning: Metaphor as 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illness experienc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6, 323-346.

Kleinbaum, D. G., Kupper, L. L., & Morgenstern, H. (1982). *Epidemiologic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Belmont, CA: Lifetime Learning.

Kleinman, A. M.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leinman, A. M. (1992). Local worlds of suffering: An interpersonal focus for ethnographies of illness experien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 127-134.

Kleinman, A. M. (1995). *Writing at the margin: Discours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einman, A. M., Eisenberg, L., & Good, B. (1978). Culture, illness, and care: Clinical lessons from anthropologic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88, 251-258.

Kuzel, A. J., & Like, R. C. (1991). Standards of trustworthiness for qualitative studies in primary care. In P. G. Norton, M. Stewart, F. Tudiver, M. J. Bass, & E. V. Dunn (Eds.), *Primary care research: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pp. 138-158). Newbury Park, CA: Sage.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Lazarus, E. S. (1988).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of a perinatal stud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 34-58.

Lock, M. (1982). On reveal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4, 19-21.

Lock, M. (1986).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system: Center and periphe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2, 931-932.

Lock, M. (1993). Cultivating the body: Anthropology and epistemologies of bodily practice and knowledge.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22, 133-156.

Loxterkamp, D. (1997). *A measure of my days: The journal of a country doctor.*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Macaulay, A., Gibson, N., Commander, L., McCabe, M., Robbins, C., & Twohig, P. (1998). *Responsible research with communitie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primary care* [On-line public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Primary Care Research Group]. Available Internet: http://views. vcu. edu/views/ fap/napcrg, html

Martin, E. (1994). *Flexible bodies: The role of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Beacon.

McWhinney, I. R. (1986). Are we on the brink of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clinical method?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35, 873-878.

McWhinney, I. R. (1989). An acquaintance with particulars. ... *Family Medicine*, 21, 296-298.

Meinert, C. L. (1986). *Clinical trials: Design, conduct, and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 L. (1994). Common space: Creating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onversation. In B. F. Crabtree, W. L. Miller, R. B. Addison, V. J. Gilchrist, & A. Kuzel (Eds.), *Explor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primary care* (pp. 265-2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er, W. L., & Crabtree, B. F. (1999a). The dance of interpretation. In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er, W. L., & Crabtree, B. F. (1999b). Primary care research: A multimethod typology and qualitative roadmap. In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er, W. L., Crabtree, B. F., McDaniel, R., & Stange, K. C. (1998).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primary care practice using complexity theory.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6, 369-376.

Mishler, E. G. (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 Norwood, NJ: Ablex.

Mitchell, M. L. (1998). *Employ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gan, G. (1998). *Images of organization: The executive edition.*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Morse, J. M., & Field, P. A. (1997). *Principles of qualitative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sy, S. A. (1996). Political economy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C. F. Sargent & T. M. Johnson (Eds.), *Medical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method* (Rev. ed., pp. 21-40). Westport, CT: Praeger.

Naylor, C. D. (1995). Grey zones of clinical practice: Some limits to evidence-based medicine. *Lancet*, 345, 840-842.

Pelto, P. J., & Pelto, G. H. (1978).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lto, P. J., & Pelto, G. H. (1990). Field method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T. M. Johnson & C. F. Sargent (Eds.), *Medical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method* (pp. 269-297). New York: Praeger.

Pfifferling, J. H. (1981). A cultural prescription for medicocentrism. In L. Eisenberg & A. M. Kleinman (Eds.),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science for medicine* (pp. 197-222). Boston: D. Reidel.

Pocock, S. J. (1983). *Clinical trials: A practical approach.* New York: John Wiley.

Polgar, S. (1962).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 Areas of interest common to the social and medical sciences. *Current Anthropology*, 3, 159-205.

Powles, T., Eeles, R., Ashley, S., Easton, D., Chang, J., Dowsett, M., Tidy, A., Viggers, J., & Davey, J. (1998). Interim analysis of the incidence of breast cancer in 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 tamoxifen randomised chemoprevention trial. *Lancet*, 352, 98-101.

Radin, P. (1955). *The trickster: A study in American Indian mythology.* New York: Schocken.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ackett, D. L. (1991). *Clinical epidemiology: A basic science for clinical medicine*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Sackett, D. L., Richardson, W. S., Rosenberg, W., & Haynes, R. B. (1997).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 Lond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Sacks, O. (1984). *A leg to stand on.* New York: Summit.

Sapsford, R., & Abbott, P. (1992). *Research*

methods for nurses and the caring professions. Bristol,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Schein, E. H. (1987). *The clinical perspective in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Scheper-Hughes, N., & Locke, M. (1987).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 6-41.

Sharma, H., & Clark, C. (1998). *Contemporary ayurveda: Medicine and research in maharishi ayur-veda.* Philadelphia: Churchill Livingstone.

Shaughnessy, A. F., Slawson, D. C., & Bennett, J. H. (1994). Becoming an information master: A guidebook to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jungl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39, 489-499.

Shildrick, M. (1997). *Leaky bodies and boundaries: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bio)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Singer, M. (1995). Beyond the ivory tower: Critical praxi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9, 80-106.

Slawson, D. C., Shaughnessy, A. F., & Bennett, J. H. (1994). Becoming a medical information master: Feeling good about not knowing everything.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38, 505-513.

Smith, R. C. (1996). *The patient's story: Integrated patient-doctor interviewing.* Boston: Little, Brown.

Snadden, D., & Brown, J. B. (1991). Asthma and stigma. *Family Practice*, 8, 329-335.

Stange, K. C., Miller, W. L., Crabtree, B. F., O'Connor, P. J., & Zyzanski, S. J. (1994). Multimethod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9(5), 278-282.

Stange, K. C., Zyzanski, S. J., Jaen, C. R., Callahan, E. J., Kelly, R. B., Gillanders, W. R., Shank, J. C., Chao, J., Medalie, J. H., Miller, W. L., Crabtree, B. F., Flocke, S. A., Gilchrist, V. J., Langa, D. M., & Goodwin, M. A. (1998). Illuminating the "black box": A description of 4454 patient visits to 138 family physicians.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6, 377-389.

Stein, H. F. (1990). *American medicine as 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Stewart, M., Brown, J. B., Weston, W. W., McWhinney, I. R., McWilliam, C. L., & Freeman, T. R. (1995). *Patient-centered medicine: Transforming the clinical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wayne, J. (1998). *Homeopathic method: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medical science.* Lond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Symon, G., & Cassell, C. (Eds.). (1998).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ylor, B. (1993). Phenomenology: One way to understand nursing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30, 171-179.

Thesen, J., & Kuzel, A. (1999). Participatory inquiry. In B. F. Crabtree & W. L. Miller (Eds.),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Tresolini, C. P., & Pew-Fetzer Task Force. (1994).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and relationship-centered care.* San Francisco: Pew Health Professions Commission.

Turner, B. (1992).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Veronesi, U., Maisonneuve, P., Costa, A., Sacchini, V., Maltoni, C., Robertson, C., Rotmensz, N., & Boyle, P. (on behalf of the Italian Tamoxifen Prevention Study). (1998). Prevention of breast cancer with tamoxifen: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the Italian randomised trial among hysterectomised women. *Lancet*, 352, 93-97.

Waitzkin, H. (1991). *The politics of medical encounters: How patients and doctors deal with social proble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rd, M. M. (1993). Study desig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assessing quality.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8, 107-109.

Weil, A. (1988). *Health and heal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West, C. (1984). *Routine complications: Troubles with talk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iesel, S. W., Cuckler, J. M., DeLuca, F., Jones, F., Zeide, M. S., & Rothman, R. H. (1980). Acute low back pain: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conservative therapy. *Spine*, 5, 324-330.

Wiles, R. (1998). Pati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heart attack and recovery: The influence of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6, 1477-1486.

Williams, G. (1984).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6, 175-200.

Williams, T. T. (1991).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New York: Pantheon.

Willms, D. G. (1991). A new stage, a new life: Individual success in quitting smoking.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3, 1365-1371.

Willms, D. G., Best, J. A., Taylor, D. W., Gilbert, J. R., Wilson, D. M. C., Lindsay, E. A., & Singer, J. (1990).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rimary prevention research.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4, 391-409.

Wilson, D. M. C., Taylor, D. W., Gilbert, J. R., Best, J. A., Lindsay, E. A., Willms, D. G., & Singer, J. (1988). A randomized trial of a family physician intervention for smoking cess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0, 1570-1574.

Wolcott, H. F. (1990).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Young, A. (1982a). The anthropologies of illness and sickness. In B. Siegel, A. Beals, & S. Tyler (E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1, pp. 257-285).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Young, A. (1982b). When rational men fall sick: An inquiry into some assumptions made by medical anthropologist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5, 317-335.